[美] 詹姆斯·莱德贝特 著
(James Ledbetter)
傅莹 袁靖 译

黄金的故事

揭示金价波动之后的大事件
黄金投资者一生之中难得的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艾拉·卡茨尼尔森
美国《财富》杂志简报栏目编辑 安妮·范德梅
联袂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黄金的故事

作者:[美]詹姆斯·莱德贝特

译者:傅莹　袁靖

ISBN:978752171039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写给亨利，是他告诉我黄金有多么稀有

序

任何想了解美国的人都不能对美国的资金状况掉以轻心。美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成为最大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所在地，它是席卷美国内外——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消费社会的鼻祖，美国即美元，美国就是赤裸裸地追求美元。

然而，尽管美元如此强大、无所不在，历史上美国与美元的关系仍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磕磕绊绊、争议不断的状态，几近引起骚乱。美元的价值是多少？根据什么来确定它的价值？该如何衡量它的价值？在4个世纪的美国金融史里，这些看似根本的问题从未得到让人一致满意的答案。从18世纪美国建国伊始时的政治狂热，至21世纪的总统辩论，人们一直在争论美元问题，人们也十分清楚，美元问题绝非一张纸的成败问题这么简单。美国的货币问题被美式爱国主义、美国的自我价值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裹挟着，而美国的地位永远不会像美元和美国军事力量所体现的帝国影响力那样自信或坚定。在现代美国，美元是向世界展现力量的一种方式，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元还必须代表除了它自身以外的东西；美元应该是一个持久的承诺；正如约翰·F. 肯尼迪总统首先说的那样，美元应该和黄金一样货真价实（他之后的许多总统也说过同样的话）。

“货币和黄金一样货真价实”的概念很简单，易于掌握，符合人性；至少早在公元前1500年金币就成为一种交换标准，而且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在早期的许多商业活动中都使用金币和银币作为货币。黄金具有人们希望与货币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品质：坚固、稀有、迷人。

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黄金绝非如此简单。从美国成立伊始，美国人似乎就不能冷静地看待黄金。这种金属是用之不竭的财富的象征，这使之超越了其纯粹的物理属性，契合了人类的心理，从而使黄金在人的精神层面代表着力量、掌控，甚至是崇拜的非理性图腾。人们寻求黄金永恒的特性，正如宗教假定上帝以及来世的神圣永恒，仿佛黄金能用某种方法将人们与永恒维系在一起，保护人们免受现实人生变幻莫测的影响。

问题是作为货币的黄金无法做到这些。货币与黄金挂钩，储备大量黄金并不能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如巫医的药水并不能包治百病。以常人的眼光来看，黄金信徒的所作所为像那些宗教狂热者的行为一般近似疯狂和误人不浅。从美国的早期开始，黄金蒙蔽了美国人对周围金融现实的认识。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和虚假希望——这些是黄金带来的副产品，时至今日仍在人们身边。

为了打破对黄金的大肆炒作，美国人需要清楚地了解美国的历史。仅仅怀古是不够的，因为黄金热带有自己的历史怀旧色彩。的确，黄金可以让美国人变得非常富有，20世纪对私人拥有黄金的限制也遭到极力反对并得以取消。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对黄金还有许多偏见，这些偏见有些是有争议的，有些是危险的。为了避免黄金政策走上错误的道路，人们需要溯本清源，对那些过于频繁、过于随意、不加甄别就通过的一些假设进行检验。期望本书对此能有所建树。

前言

在1848年12月5日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James K. Polk）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国会宣读国情咨文之际，他的发言里看似没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虽说波尔克当时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年轻的一位，但是总统任期的工作影响了他的健康。波尔克气色委顿，此后不久就因霍乱离开了人世。刚结束的美墨战争造成数千人死亡，带来当时高达1亿美元的巨额损耗。注这场战争和强硬外交的呼声虽然给这个年轻的美国带来了一些好处，然而它加剧了因是否要废除奴隶制而造成的紧张局势，并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宣称南北战争的发起“毫无必要并且违背宪法”，他的观点得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赞同。

波尔克演讲中倒是有一处亮点令他的政治盟友和敌人都激动不已。美国从美墨战争中赢得的战利品之中有加利福尼亚，这是一块离俄罗斯、中国和南美都不远的宝地，波尔克预言它将成为“伟大的商业中心”。波尔克对观众宣称，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那就是据报道加利福尼亚拥有大量的贵金属矿。“最近的发现表明矿藏可能比预期的分布更广、更有价值，”他抑扬顿挫地说，“关于该地区蕴含丰富黄金的记载非比寻常，令人难以相信，然而公职人员亲临矿区观察，他们基于第一手资料提交的真实报告证实了这些记载。”此次演讲中，波尔克还宣读了美国战争部的报告，并宣布将在旧金山开一家新的铸币厂，以便于“更快地、更充分地利用这些矿区未开发的财富”。注

在美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中，还从未有任何总统的演说像此番话语那样一石激起千层浪。地下蕴藏着无限财富，这个驱使着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去征服新大陆的梦想，现在看起来成真了，现实甚至比梦想更美好。《奥尔巴尼阿古斯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的记载，“与上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区一比较，传说中的埃尔多拉多就毫无价值了”。注对加利福尼亚黄金的狂热不仅唤起许多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且更甚之：某家周报报道，“无论是弥赛亚的到来或千禧年的曙光，它们带来的激动都比不上波尔克总统的声明”。的确，19世纪的美国刚刚步入第三次大觉醒，将世事解释为神旨是很平常的事，因而黄金的发现在许多人看来证实了上帝已为美国制订了宏伟的计划。《美国评论》写道：“在即将来临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似乎注定要成为地球上新的历史中心。”《美国评论》是与埃德加·爱伦·坡和辉格党有关联的月刊。（辉格党是波尔克的竞争对手，于1849年入主白宫。）“上帝打算在此，就在北美大陆上，给人类思想和意志提供自大洪水以来未曾见过的巨大能量……来克服和消除人类努力的旧有局限、开发地球的物质资源、创造无限的财富和供人自由驰骋的活动空间和收获无尽的愉悦。”注仿佛黄金已经扭转了伊甸园的诅咒，使人类恢复到无须劳苦就能获得财富的状态，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是件好事。“拜金狂”和“拜金病”的提法颇为常见，美国各地的宗教机构都宣讲要警惕奢靡、拜金以及传统价值观的丧失。现实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担忧，加利福尼亚迅速成为吸引边缘人、行骗者、违法者和亡命徒的地方。两位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淘金热是大规模狂热情绪的产物，它给加利福尼亚定下了基调，造成了一种以贪婪、混乱暴力频现的不良风气。”注

无论是好是坏，加州淘金热清楚地表明，彼时美国所谓的天命与自人类文明以来一直令人着迷的黄金交织在了一起。当然，在19世纪

黄金并没有被突然神化，但对黄金的庇护在美国宪法中已经得到了体现。美国宪法第1条第10款规定，各州不得“使用金银币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尽管如本书所示，这条规定看似简单，但它的含义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从美国制宪会议时期到最近的总统竞选活动，黄金一直是美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例如，2012年和2016年的共和党纲领均提到“美国货币的金属基础”，且不合时宜地呼吁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为美元设定固定价值的可行途径”。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提倡回归金本位制的总统候选人。“回归金本位将十分困难，但是，这会非常棒。”特朗普说，“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可以作为货币基础。”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转向浮动货币几十年后，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主要政党建议将本国的货币退回金本位制。注

显然，黄金具有一些普遍吸引力，而且它的吸引力并不局限于美国。黄金将人们与古老的文明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它将人们与无数的文化指标联系起来，从圣经到莎士比亚到坎耶·维斯特注。黄金在人类的语言和生活中随处可见：最好的运动员赢得金牌；最畅销的音乐唱片用黄金铸造（现在只是象征性地这样做）；人们提到同类产品中最好的东西就称它具有“黄金品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资都离不开黄金，无论是《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金砖路”还是嘻哈明星青睐的金牙套。就算我们能在一夜之间抹去国际货币体系中黄金的作用——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和20世纪后期美国决策者的目标，黄金仍然会在我们的语言中随处可见，我们在用完美、不可磨灭的符号进行思考时也离不开黄金。

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黄金的吸引力更为具体且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体验之中。黄金带给美国人一种民族自豪感和与生俱来的权利。美洲大陆的金矿开采至少可以追溯到4 000年前，来自欧洲的探险家和征服者在美洲首次接触到黄金就对它着了迷，想要占有它。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巴哈马群岛后注意到，当地居民打着鼻洞，佩

戴着金鼻环，他早期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就是试图打听哪里可能找到更多的黄金。注这个发现似乎自然而然，因为哥伦布航行就是想要寻找一条路线，通往遍地黄金的亚洲。哥伦布的发现掀起了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寻找黄金和其他财富的探险浪潮。例如，庞塞·德莱·昂报告说他于1513年在佛罗里达找到了黄金宝藏。

美国独立后不久，在1799年意外地发现了黄金。北卡罗来纳州卡巴鲁斯县的一名12岁男孩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用弓箭猎鱼时发现了一块特别的岩石。这块17磅重（约7.7千克）的岩石“跟小的熨斗那么大”。男孩把它带回家用作农舍的门挡。3年后，美国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的一位珠宝商鉴定这块岩石是黄金，于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黄金开采开始了。不久后，佐治亚州发掘出了黄金，真正的淘金热到来。成千上万的人在矿山工作，19世纪初在这个地区开采和提炼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黄金。1829年之前，所有在美国开采并在费城铸币厂铸造的金币都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注卡罗来纳淘金热预示了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遍及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西部各州的“黄金热”。

美国人把拥有黄金作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感受不仅仅是象征层面的。蓬勃发展的黄金产业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西迁以及矿业城镇的发展，加利福尼亚成为真正影响全球经济的地区。黄金也是经济扩张和创新的源泉。自加州淘金热的早期开始，金矿开采业就成为人们寻求技术和商业模式得以突破的实验场所。此外，运输黄金的需求是造成铁路扩张及其过度扩张的主要原因。这项创新并未止步于19世纪；从早期的晶体管一直到太空计划，黄金将继续在代表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高科技产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当时，许多美国人——从美国最高层的政府人员到采矿者和工人——都坚定地将黄金视为财富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公共和私人储备的黄金一直是美国实力和繁荣的有力象征（即使有时是欺骗性的）。19世纪美国突然拥有了大量的黄金——19世纪早期北卡罗来纳州发现金矿、加利福尼亚淘金热、19世纪与20世

纪之交时在克朗代克河发现金矿，它们就是一级级台阶，引领美国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顶峰。可是令人羡慕的大堆黄金却从未像政府和银行家所期望的那样保护经济、防止经济紧缩。不过就美国大部分历史时期来说，积累大量黄金并非一种非理性的策略，在19世纪动荡的全球财政状况下，黄金确实有助于一个刚起步的美国成为信誉良好的国家。

同样，在美国大部分历史时期，黄金的的确确是货币，于是它点燃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一些政治斗争。美元的金属基础是19世纪政治的热点之一。例如，依赖货币黄金[注]是以安德鲁·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的基石。在北方各州需要为南北战争提供资金之时，首次发行了美国政府批准的与金银价值脱钩的货币；直到如今，一些美国人还认为这些“绿背美钞”有违宪法。在20世纪，黄金作为美国货币基础的作用已经减弱，到了1971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采用“浮动”制。尽管如此，如今仍有数百万美国人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美国的经济状况会更好。

经济依赖于黄金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一就是所有主要的美国战争都与美国的黄金供给挂钩，并且战争经常迫使美国果断地改变货币现状。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为了金矿开战，19世纪末波尔人和英国人倒是为争夺金矿在南非打过仗。尽管如此，美国的战争与黄金之间的关系依然深刻而复杂，这种纽带有时会同时让美国既分裂又团结。1848年在加州发现黄金之际，恰是美墨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刚刚获得这块土地之时。美国南北战争及各州自治权与联邦权力之争有一点很相似，即这些斗争均围绕货币的地位展开。实际上，北方各州通过首次发行与黄金脱钩的法定纸币来资助战争，随之而来的黄金市场因战争得以存在，密切观察投资状况的黄金投机者有时比白宫更了解战场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应对美国参战发行的自由债券以黄金为支撑。美国最终在1971年脱离金本位的关键因素是越南战争的消耗貌似一个无底洞。

所有这些对黄金的依恋都是很久远的事了。除了最富有的美国人之外，最近大部分美国人又兴起一种强烈迷恋黄金的风尚：黄金投资。倘若不去追溯美国成立时期的政治历史力量，就无法理解当代美国人购买黄金的经济因素。到了19世纪末，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没钱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而且由于多年来日常所用的钱币是由黄金制成或可以与黄金兑换的，所以即使是有钱投资的人，也显然不可能将黄金作为首选的投资。后来，自1933年以后的40年，美国人拥有任何数目的黄金都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美国的黄金投资者貌似比例也很小，同时投资黄金的附加费用也相当高，高得让人望而却步。

尽管如此，想拥有黄金的美国人或许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盖洛普民意测验每年都会调查美国人对投资的看法。2011年，当黄金价格相对较高时，黄金被认为是最佳的长期投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有34%的人看好黄金（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投资，有19%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注]但随着黄金价格下跌，认为黄金是最佳的长期投资的人数占比低于看好房地产投资的人数占比。2014年看好黄金投资的人数与看好股票和共同基金的人数持平。值得注意的是，与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更相信黄金的投资功能。此外，美国家庭收入越高，他们选择黄金作为最佳长期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选择房地产、股票和共同基金。黄金似乎是那些买不起黄金者的首选投资工具。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理论上黄金可以让你变得富有，即使是——尤其是——没什么其他可行的投资选择时，但这是任何民意调查都难以测出来的。从2008年开始，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金融危机的开始，美国人的投资坐上了过山车——大多是下坡路。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所有曾经被认为是谨慎可靠的个人投资策略都显示出不足之处，这让无数的美国人即便没觉得是彻底的上当受骗，亦是感到了迷惑不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唯有黄金投资者一直喜笑颜开。2001年至2011年黄金的价格增长了6倍。在此期间，实际上没有其他合法的、

投资性资产类别能比得上黄金的表现——石油、股票、债券、其他大综商品、“新兴市场”都不行。

当然，与任何投资一样，有涨总会有跌。那些在2011年或2012年购买黄金的人5年后发现他们投资的黄金价值下跌了。然而，无论好坏，投资取决于择时这个不幸的现实似乎并没有阻挡人们投资黄金（或房地产或股票），并且没有理由认为当代人的后一辈会有什么不同的举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主张允许个人持有黄金的美国人就像是离经叛道者那样，行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其中一些人一直担惊受怕。虽然自美国法律允许私人持有黄金以来，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了，但人们的担忧并未完全消失；一些人担心经济崩溃将导致美国政府没收黄金或禁止对黄金的投资。正如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虽然年代已远，但这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这些观点可能代表极端的少数，但它们在美国黄金投资界却不仅仅停留于表面，有时这些观点被融入推销宣传。因此，虽然只有极少数美国人真正拥有黄金，但拥有黄金的自由就像拥有枪支的自由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共鸣。

把私人拥有黄金比作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风马牛不相及；别忘了并非所有美国人对于黄金的联想都是积极的。在19世纪中叶的许多基督徒眼里，那些去淘金的人引起了大规模人口迁移，这代表了混乱，是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标志。1849年《纽约先驱报》发出呐喊：“这是对黄金永不满足的欲望！它注定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痛苦啊！”[注]报纸声称那些涌向加州淘金的人并非寻求安分守己的日子。“他们是为了攫取金灿灿的黄金。在过去的岁月中，黄金玷污了普天之下那些曾经拥有金矿的国家，带给它们一桩桩谋杀、杀戮和其他罪孽。”这可能听起来过于夸张，但其中基本的观点在当今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谈及的“资源诅咒”中得到了呼应。

尽管加州金矿毫无疑问地增强了美国经济，但黄金的支配地位却并非人人赞赏。在加州淘金热之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民

粹主义者谴责黄金是经济压迫的主要手段。自然主义作家弗兰克·诺里斯在他的小说《麦克提格》中讲述了一个凄凉的寓言故事：一个活人与一个死人被手铐铐在了一起，他最终拥有了黄金却无福消受，对黄金的欲望以死亡谷中的僵局而告终。对黄金病态的、疯狂的迷恋甚至令掌握最先进技术的美国政府官员在20世纪摈弃了常识去研究炼金术。

无论黄金对美国而言是国家的救赎还是诅咒，它始终都是现代性抗争的表征。黄金是永恒力量的象征，也是经济进步的促进因素。它还象征着进步所带来的分化，这些分化存在于城市与农场之间、技术与传统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这种现代性的斗争导致许多国家陷入政治极端和内战。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能够抵制这种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不了解黄金如何塑造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何继续塑造黄金，人们就无法充分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

---

1. 1848年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18年32.8美元的购买力。——编者注
2. James K. Polk: “Four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5, 1848,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489.
3. “Mineral Wealth of California,” Albany Argus, reprinted in Pittsfield Su, December 7, 1848.
4. “California,” The American Review, no. 16（April 1849）: 335.
5. James Rawls and Walton Bean,Californi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Boston: McGraw Hill, 2011）, 113.
6. 2014年瑞士一群金本位的提倡者发起全民公投，意欲将瑞士央行用于支撑瑞士法郎的黄金储备从7%提高到20%。公投最终以78%的反对票告终。
7. 美国知名说唱歌手。——编者注
8. Peter Blakewell, “Gol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in Gold in History, Geology and Culture: Collected Essays（Raleigh, NC: Nor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2001）, 83.

9. Fletcher Melvin Green, “Gold Mining: A Forgotten Industry of Ante-Bellum North Carolina,” The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14, no. 1（January 1937）: 3.
10. 货币黄金指政府依据其实际拥有的黄金总量的价值确定其所有发行货币的价值，这些黄金仅可在各国央行机构之间进行交易。——编者注
11. Gallup Poll Social Series: Economy and Personal Finance .Interviews conducted April 3－6, 2014.
12. “A Man Who Is Not Going to California,” New York Herald,February 19, 1849, 1.

第一章

传说成真



1848年1月詹姆斯·马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马附近的这个锯木厂发现了金片。虽然这并非第一次在美国发现黄金，但相比之下，这次发现更多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政治面貌。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作为农场主或商人，乔治·华盛顿不是特别成功，可他记账是一丝不苟的。1779年，在新泽西州的蒙茅斯战役陷入僵局后，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将领在米德布鲁克地区安营扎寨数月。在华盛顿给侄子的一封信中，他倾诉其正因为个人财产受损而苦恼。战争伊始，华盛顿通过婚姻继承的大部分财富就借给了弗吉尼亚州的邻居和商人。麻烦在于当借款人还钱给他时，这些钱的价值与先前相比严重贬值了。华盛顿抱怨道："我现在收回的债务每镑已经缩水为20先令。假如我对借钱的人不那么宽容，在我离开弗吉尼亚前这些债就应该收回了。"1英镑贬值为20先令，这等于损失了九成五。在同一封信中，华盛顿说他的损失超过10 000英镑；据某位传记作者的估计，这大约是他农场一年的收入。华盛顿接下来写了一大段谴责的话："衷心希望这些州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以加强纸币的公信力，力惩投机分子、垄断分子及掠夺我们伟大国家财富、将一切置于险地的人。"战争结束时，华盛顿对于分文不值的纸币极其不满，于是"他付给农场经理人的是农产品而不是纸币"。注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大多数美国开国元勋以及大多数美国统治阶级，实际上都对纸币极其厌恶。大多数州发行的货币贬值到几乎分文不值。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声称，这些州本身就为它们自己发行的纸币所困，它们同意建立联邦政府只是想要减轻债务负担，"因此，纸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纸币的抵触，有力地确保了联邦宪法获得通过"。

美国的货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让19世纪的美国人十分烦忧。除了蓄奴制，再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比货币问题能引起更久、更激烈的争论了。货币问题在那个时代每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都刻着深深的痕迹：美国政府结构、经济增长和国土扩张、地区及个人财富的累积、战争行为，以及战争造成的债务和通货膨胀，甚至是美国宪法的含义，包括结束蓄奴制本身的修正案。

尽管美国人讨厌纸币，但却没有其他通用货币可选。在今后将成为美国的这块地区，用于从事贸易活动的货币比前一世纪更为杂乱。这些货币之中黄金是最持久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坚挺的货币：直到20世纪，黄金在任何时候都能用于偿还绝大多数种类的债务，而且一些特定类型的债务指定要用黄金偿还。然而，任何基于实物的货币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黄金—— 一种必须经过开采、精炼、测定、提纯、严防盗窃及不便携带的金属——尤其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作为一种货币手段是过誉了：因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只有特定数目的黄金，如果没有人愿意放弃他所持的黄金，那么经济活动，尤其是经济增长怎么能够发生呢？

大多数时候，答案是：经济无法增长。因此，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替代物兴起了，有时还是外国货币。银币于19世纪初正式开始铸造，19世纪30年代中期还得以在美国广泛使用，但在许多地方，它们的使用频率却没有其发行机构所声称的那么高。黄金和白银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意味着熔化了的白银往往更有价值。一位美国政府官员估计，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整个美国的银圆流通量可能不到1 000美元。注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各个时期，西班牙钱币因为流通广、价值可靠，所以被视为半官方货币；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西班牙的八雷亚尔古钱币在美国都是法定货币。英国、法国、俄罗斯、葡萄牙和荷兰的钱币——这些都是它们竞相成为殖民强国的例证——也都在美国市面流通。据一位观察者所说，在美国许多地方，“又破又烂”的墨西哥币也通用。注华盛顿亲笔记录了他某次去费城所携带的钱币：“除了银子和纸币，还带了6枚乔（joe），67枚半乔（half joe），2枚十八分之一乔（one-eighteenth joe），3枚达布隆（doubloon）金币，1枚比斯托（pistole）金币，2枚莫艾多金币（moidore），1枚半莫艾多金币（half moidore），2枚法国双金路易金币（double Louis d’or），3枚法国单金路易金币（single Louis d’ or），80枚几尼

金币（guinea），7枚半几尼金币（half guinea）。”这些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货币。

尽管金属钱币盛行，但从殖民时期开始，纸币的数目也很多。大多数州都有银行系统，能发行自己的钞票，这些钞票理论上可以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但实际上把它们当作纸更有用，即便其面值打了折扣。在所谓的“自由银行时代”——从1837年美国第二银行倒闭到1863年通过《美国国民银行法》为止，数百家监管松散的银行开张，它们印刷的纸币被称为“膏药纸币”“破烂纸币”“红狗”“光滑的猴子”“生病的印第安人”。[注]在某些地区，由个别城市和公司发行，被当作缴纳本州应缴税款的凭证还可以在本州当作货币流通；在西部地区，一些铁路甚至创造了具有货币功能的、可重复使用的“火车票”。南北战争中产生了在南方流通的邦联货币，在北方则制造出了由联邦政府印制的、不能兑换黄金或白银的“绿背美钞”。

一些早期的美国领导人相信非金属货币是必要的，他们积极倡导使用这些货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众多领域都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恰恰由于美国本土没有黄金或白银的供应，所以美国应该拥有纸币。其他人，特别是那些经历过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纸币通货膨胀并为之所伤的人则持不同意见。曾经的种植园主托马斯·杰斐逊担心的是私人金融家发行纸币，他警告道：“钞票将像橡树叶一样不值钱。”但他主张发行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纸币。[注]虽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素有分歧，但他们关于纸币的看法相同。当然，对于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美国政府让特定的货币合法化——丝毫不管此种货币的物理媒介是什么 ——的想法代表了国家与金融力量的糅合，而这样的糅合并不令人愉快。在美国的早期，关于什么构成货币的争论很快成为关于人们喜欢什么类型和多大规模的政府的争论。对美国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系最强烈的抨击，来自辉格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以及民主党的前身。

因此，虽然现代金本位的倡导者有时会对18世纪和19世纪货币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但早期极不稳定的美国货币会使任何明智的人都渴望不变的价值尺度。在货币混乱的背景下，黄金为早期美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安全感。在一个接受政治上革命性变革的国家，黄金是与古代世界相连的至关重要的纽带。黄金意味着自给自足：它无法被摧毁，而且它的价值相对纸币的价值而言不容易被操纵。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拥有的黄金越多，他们就越能减少对欧洲（特别是英国）金融家的依赖。经济上依赖欧洲的这种状况即使在美国成立后也长期存在，这令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尤为烦恼。注

到19世纪中期，像美国这等经济规模的国家尚未采用统一的纸币，这一点似乎令人惊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为的结果。在大众的思想中，纸币意味着欺诈和破产，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糟糕的财务管理应该负主要责任。早期殖民地的纸钞往往会引起迅速的、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在罗得岛州，18世纪30年代发行的纸币到了1750年，它的价值不到面值的4%。在整个19世纪早期，银行倒闭比比皆是，而因为银行倒闭，纸币持有者的钱变得一文不值，这种情况极其常见。一位商人和出版商在19世纪早期写过他的经历：“在新泽西州，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我携带的一张一美元的零钱在收过路费的关卡的这一端可以用，而在100码注以外的另一端就不能用了。纸币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注

就算在一些地方——通常指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纸币相对来说带来了便利，它也与历史发展格格不入。美国政府的规模和结构是由那些强烈希望取消英国殖民统治的税收政策、摆脱其对各州的干预的人所构想的。例如，根据英属北美十三州最初的《联邦条例》，国会无权征税；只有各州有征税权，而许多州没能征收或放弃征收那些所欠缴的税收。宪法没有设置中央银行，在美国宪法获得批准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特别是安德鲁·杰克逊——坚持认为美国宪法明确禁办国民银行。1819年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

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支持国民银行的合宪性，然而这完全没有改变杰克逊确信国民银行违宪的立场。注因此，对于那些主张有限权力的小规模联邦政府的美国人来说，黄金作为货币不仅是唯一合法的全国性货币，它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纲领服务：黄金阻断了联邦政府得以膨胀的任何途径，因此有助于确保理想中各州的权力。

这一点在杰克逊反对设定中央银行的斗争中显而易见。在美国第一银行（1791年成立）和第二银行（1816—1836年）的短暂存在期间，银行的管理人员明目张胆地将银行资金用于政治目的，或者用于有时具有破坏性的货币政策，这些都不利于银行达到服务于美国人民之目的。但就其核心问题而言，杰克逊的改革运动关乎政府的构想——美国将效仿拥有中央银行和本国纸币的欧洲大国，还是维持一个规模和实力受到金本位制货币制约的联邦国家。

杰克逊对银行的看法近乎偏执，而他不信任国民银行以及依附于国民银行的政治权力，这种观点普遍存在，并且反映了自耕农的想法，即商业和金融力量集中在美国东北地区有可能引起腐败，最起码会对美国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不利。（难怪1791年法令批准建立美国第一银行时，马里兰州北部只有一名国会议员反对，而马里兰南部只有三名议员支持。）注甚至在杰克逊离开白宫后，美国法律中这样一种观点还占了上风：联邦政府必须与银行脱离干系，并且联邦政府只能以黄金进行支付。注

杰克逊把1832年总统大选演变为对国民银行的公投，在那以后，他从国民银行撤回联邦政府资金并将资金放入一系列选定的他认可的“模范”银行，他这一击狡猾而果断。注杰克逊经常不用经济术语，而是以绝对的道德术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对手是被误导的银行崇拜者，而他追求的是一条真正的货币道路。杰克逊打了一个多少有些本末倒置却又热情洋溢的比喻：“若是所有金牛犊的崇拜者都向我请愿要求恢复存款银行，那么我会在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前将我的右手

从我的身体上割下来。其他人或许崇拜金牛犊，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会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注

把联邦资金转入“模范”银行之举摧毁了国民银行，它的营业执照于1836年到期。杰克逊在政治上取得了全面胜利，几十年来民主党因其奉行硬通货标准和对任何中央银行制度带有偏见而具有很强的识别度。可是杰克逊反对设立国民银行的斗争导致了一切想要让国民银行制度合理化的努力都变得非常困难。他的继任者，温文尔雅的马丁·范布伦总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财政国库制度，于是美国政府既不需要国民银行，也不需要那些受其青睐的私人银行；它只将钱存入自己的金库。大多数贸易资金业务都在州立银行里进行。这些州立银行通常不受什么监管，它们往往热衷于土地投机、不顾后果地扩张铁路运营里程以及其他可疑的金融业务。就在国民银行的命运被盖棺论定后，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开始了，美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衰退一直持续了10年。注

从杰克逊对硬通货的理想化之中，可以管见美国货币的终极论证，即上帝希望货币是金本位的，特别是在美国。正如历史上的黄金热爱者所指出的那样，自有历史记录以来，黄金就与神灵和宗教崇拜联系在一起。尽管《圣经》通常谴责物质主义，尤其是明确地谴责过度追求黄金，但在美国建国以来的100年中，主流基督教思想却毫不犹豫地将黄金和上帝的意志等同起来。1865年10月，美国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在韦恩堡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所有国家一致同意，黄金和白银是唯一真正的价值衡量标准……我毫不怀疑这些金属是由上帝有目的地预备的，正如我确信上帝有目的地准备了铁和煤。”注

在一个金银相对丰富的国家，黄金和白银反映上帝意志的这种想法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麦卡洛克直白的声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这件事对美国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一大批加州人——从报纸编辑到军队士兵——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去河流中淘金。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西部寻求一夜暴

富，这使美国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国领事对其同事说："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有过如此令人兴奋之事。"[注]

人口涌动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矿工从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中国、智利纷沓而至—— 一个自南方迁来的人称之为"来自几乎所有文明地区的——从行为举止判断，也有一些来自荒蛮地区的——人员大杂烩"。[注]截至1860年，加州竟然有14%的人口来自德国。淘金热在美国西部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和政治中心。到1849年底，加州人口从1848年的约1.4万人增加到近10万人，到1852年底为22.3万人。1848年初人口还不足千人的旧金山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的重要城市。到了1900年，生活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住在旧金山奥克兰地区。淘金热创造的第二产业也不可忽视。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区之一。人们在圣华金和萨克拉门托山谷种植小麦供那些来到西部的人食用。

美国的黄金当然也改变了美国和全球经济。1848年美国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黄金生产国，而在1851—1855年，它的黄金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45%。黄金流通量激增，造成了全球的经济波动。旧金山证券交易所迅速成为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在19世纪70年代它还短暂地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注]

然而，与许多大众现象一样，重要的是将不同的影响区分开来。对淘金热的描述，无论现在还是当时，都聚焦于早期淘金者的非凡运气和难以想象的财富。1848年7月，在萨特磨坊最初发现黄金后的几个月，一名陆军上校说："4 000多人在黄金产区工作，其中超过一半是印第安人，每天至少出产价值3万~5万美元的黄金。"[注]此外，既没有学识也没有专业技能的人能在几分钟内赚到1个月或1年的工资，这导致当时许多评论家宣称全新的劳资关系的时期已经诞生，这种关系使劳动者无须长期依赖富裕的地主或贷方。加州的一家报纸声称："无须本钱，没有资本干预，全凭气力，公平竞争！曾经一月辛苦赚

得只够解决温饱的劳动者，已成为价值不菲黄金的所有者了！淘金者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资本家了！。”[注]几十年后，一些理论家认为，加州淘金热与发现其他殖民地一样对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这些说法影响广泛，时至今日仍在为淘金热的神话助力，但对这些说法需要明辨。或许比19世纪中期挖掘出的巨额财富更引人注目的是财富的迅速消失。矿藏开采就是这样，一开始能产出很多矿，然后矿产量增长速度减慢；在许多情况下，几个月或几年内矿藏就开采完了。因此，加州的黄金总产量迅速上升，在1852年或1853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南北战争爆发。超高的报酬更加不堪一击；当然，少数最早开始淘金的人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都能获得好运（尤其是假如他们把开采做业区扩展到加州以外），1848年以后，普通淘金劳工每天的收入就再也没有像淘金热伊始时那样多到令人兴奋了。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每天约3美元的平均工资仍然高于美国东海岸的工资水平，但因为基本生活用品得靠长途运输过来，西部的生活成本大约是美国东海岸的两倍。对那些将淘金热作为个体劳动者的胜利来庆祝的人来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由于采矿业的成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极少有单个淘金者可以凭一己之力成功了，露天采矿者已经不可能随时找到黄金了，剩下的就需要复杂的机器——因此就需要大量资金——才能有效地开采。

此外，在美国原本欠发达地区发现了珍贵资源，美国政府如何获取这些收益成了一个复杂且棘手的问题。几乎所有在加利福尼亚（以及后来的其他西部地区）发现的黄金都被默认为是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理论上，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发现的财富本可以分配给所有美国人。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认为联邦政府拥有权力、资源或基础设施就可以利用黄金这种意外之财的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更别提将所获的财富分配给未参与淘金的人了。理查德·巴恩斯·梅森是一名军人，他被派去对金矿进行报道，在萨特磨坊发现金矿的几个月内梅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我认真地考虑了如何能够使美国政府获得租金或一些费用，因为美国有权得到这些黄金。”但

是考虑到此时规模已经很大的矿区、那些需要受到监管的人的品行以及联邦政府薄弱的力量，梅森决定放弃尝试。在南北战争前，美国西部的公共机构才刚建立，力量薄弱，因而对矿工之间激烈争端的解决方案（通过社区共识，有时候是通过暴徒的私刑）往往决定了法律体系，而不是反过来，由法律体系决定解决方案。可以理解的是，“边疆正义”如何创造了一种基于美国西部的政治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对东部盛行的政府概念是抵制甚至是有敌意的。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将矿产丰富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1850年）、内华达州（1864年）和科罗拉多州（1876年）纳入联邦，代表采矿业的政治家也直率地主张从中获得应有的权益。[注]

抛开历史学家凯文·斯塔尔所谓的“阴暗面”来审视淘金热的影响也是有失偏颇的。比如说，从淘金热伊始，从中国来的矿工就被剥夺了去产量更高的矿井开采金矿的权利；他们在似乎快要发财的时候就被轰出营地，还有的被以所谓法律的名义私刑处死。例如，1848年马里波萨县的矿工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任何试图开采金矿的中国人在收到通知的24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否则矿工将对中国矿工施加他们认为适当的惩罚”。这些事件构成了19世纪后期加州制度性歧视的基础。[注]成百上千的亚洲、印第安和墨西哥妇女被迫为离开家中妻儿的矿工提供性服务（1850年加州人口中男性占92%，在矿区所在的城镇则多达98%）。矿业毁掉了埃尔多拉多县美国原住民赖以生存的狩猎业和渔业。来自采矿城镇的岩屑破坏了下萨克拉门托的排水系统，19世纪70年代几乎每年都会暴发大规模洪水。采矿对水和木材的巨大需求造成了影响巨大且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大量水银被用来从地下获得金子（单个洗矿槽就要用数百磅水银），150多年后水银仍污染着加州和内华达州的水和鱼。[注]

然而，这些发人深省的事实并未减损黄金在美国神话般的自我形象中的地位。美国人与黄金之间的心理认同在19世纪得到了建立和加深。没有人会声称每个美国人都能快速致富；到了19世纪50年代，许

多人坐上挂着类似“到派克斯峰掘金，要不就受穷！”标牌的篷车向西部行进，但遗憾的是事实证明多数人都是铩羽而归。但是人们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致富，而且顺理成章地认为几乎每个人都想这样做，这种想法并没有错。这是美国精神中的全新事物，这种渴望财富的动力是与加尔文主义者奉行的节俭观念或者信奉致富只能来自不懈的努力和精神奉献这种观点背道而驰的。根据H.W.布兰兹的概述，这种新出现的思潮认为，“埃尔多拉多不是清教徒的山顶之城，而是美国人民的合适居所”。[注]通过黄金瞬间致富的可能性给美国的自由观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在哲学层面上不光是否定的维度（例如免受压迫），而是字面上肯定的维度：财富的无限性。

相信不用受多少苦难就能获得物质财富似乎有违基督教教义，并且有些人认为西部黄金的诱惑导致美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19世纪的基督徒认为，赌博、酗酒和卖淫是对上帝犯下的严重罪行，对他们来说早期西部淘金者的定居点显然就像罪恶的中心。然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与淘金热相关的物质财富并不会让人们摒弃美国是幸运的国家的观点。相反，它暗示黄金和白银是美国与生俱来的，这同时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并且这片土地上的金银是上天实现承诺的手段。这种说法在现代世俗之人看来很奇怪，但是当时处于第三次宗教大觉醒时期[注]的美国人认为，仁慈的上帝特意将金银置于地表之下。许多人认为珍贵的矿产资源位于某些地方——比如落基山脉而不是其他地方——是美国的幸运；在这个前提下采矿和利用这些矿产创造美国财富也是上帝安排好的，美国人有义务将它付诸实践。19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受到了上帝和金子的庇护，是无人能敌的，但这样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19世纪50年代的前期，美国的繁荣似乎势不可当。造就这种繁荣的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移民（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带来移民的原

因之一）、修建铁路以及由于英国进口关税降低导致的出口增长，黄金生产则为最突出的因素。由于淘金热是前所未有的，人们轻易地认为美国每天生产黄金已成为新常态。

然而，合乎逻辑的现实则要复杂得多。大多数乃至一切强劲的经济增长都容易引起周期性的过度扩张，例如铁路融资很可能会在实际建设铁路的日程之前就发生，这令一些投资者陷入困境。美国将持续产出黄金的巨大利好也可能具有欺骗性。淘金热最为奇怪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为一个在表面上一点都不合理的尝试提供合理的理由：投机性的长途航海。仅在1849年，就有超过500艘帆船驶离美国东海岸并试图在西部靠岸，并且其中大部分都计划穿过危险的合恩角水域——大约15 000英里[注]的旅程，至少需要5个月而且往往更久。船舱内拥挤不堪，恶臭连连，就像是漂浮在海面的病房，到处都是患有晕船、痢疾和坏血病的人。幸存者的日志描述了变质的食物、蛮横的船长驾驭渗水的船只、一些乘客在航行中途发疯而不得不被铐住手脚关起来等情形。1853年加州第一家精神病医院斯托克顿加州疯人院成立，这并非巧合，当时已有的医院设施已经安置不了淘金引起的精神病患者了。

长途航海中的一项重大创新是穿越巴拿马地峡；未来的阿尔戈英雄可以沿大西洋海岸航行，通常在哈瓦那或金斯敦停留并停靠在巴拿马东海岸。在那里，他们将穿过47英里左右的地峡（1855年之后，经由铁路），然后换另一艘船沿太平洋上行到旧金山，整个行程通常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的旅程既不便宜（船舱票价200美元，外加穿越地峡的30美元费用），也不轻松：巴拿马地峡地形艰险，丛林里充斥着蚊子和病菌。但是人们对黄金的渴望如此强烈，因而到1850年，太平洋邮政公司每两周就发一次船，每艘轮船载有数百名乘客。[注]这些轮船还载有数万封信件。此外，因为船队有兴趣从风帆动力转为蒸汽动力，运营商也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补贴。除了太平洋邮政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邮轮公司之外，还有很多竞争对手很快就会出现，其中包括由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经营的一条线路。

这些航行频率高、速度较快，因而在美国西部有铁路之前的日子里它们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主要并非因为成千上万想去淘金的人涌向美国西部，而是由于回程旅行通常载满了那些已经一夜暴富的人。在西海岸发现丰富的黄金矿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经济，也大大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经济。19世纪30年代，全球出产的黄金的价值平均每年约为1 300万美元，1853年则达到了1.55亿美元。天降之财令美国金融业爆炸式地增长。在1841年美国第二银行被清算后，大多数企业依赖于各州特许银行。整个19世纪40年代，美国这些银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700多家，到1856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约1 400家，流通中的贷款和票据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注]某家经济期刊在1852年提道：“国内遍地都是新兴的事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这表明财富快速增加、繁荣程度大幅提高。”这样的影响也是国际性的。货币市场的黄金总量增加了，加利福尼亚（以及1852年以后的澳大利亚）的黄金抬高了各地的物价，这对英国制造业和出口业尤其有利。[注]

然而，经济繁荣并未令黄金运输更为便利或在本质上更为可靠。1857年9月，隶属美国邮轮公司的“中美洲号”载着572人离开哈瓦那驶向纽约。[注]该船于几天后在距离佐治亚海岸约100英里处遭遇了一场大飓风。“中美洲号”船舱很快漏水，人们一整夜抢修也无法使船泵和发动机保持正常运转。船长命令用救生艇撤离船上所有妇女儿童，他们大多被其他船只救出。然而，这艘船最终沉没了，船长及400多名乘客和船员丧生。报纸称这次事件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海难之一”，也是“因飓风造成的严重的单艘商业船只灾难”。

“中美洲号”的沉没带来了另一件让大众着迷的事情，它的吸引力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中美洲号”的许多乘客坐船回美国东部时都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当他们慌慌张张跳上救生艇时，许多人被迫在他们快速获取的财富与生命之间做出选择——虽说他们坐上这艘船就是为了携带财富。被丢弃的装满金粉的旅行包和满是金币的手提箱散落

在船上。一名乘客把20磅金粉和自己捆绑在一起，沉船前他被撞到水中（尽管起初他往海里下沉，但最终他获救了）。随船一起沉没的黄金总价值估计约为130万美元，约有3万镑的黄金，据称这些黄金相当于当时纽约所有银行所持有的黄金总量的20%。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队海洋探险家确定了沉船残骸的位置，并打捞回了大量的黄金（探险队的投资者与探险队负责人汤米·汤普森之间发生了纠纷，汤米在找到黄金几年后失踪了）。

在人们的回忆中，他们普遍声称“中美洲号”的沉没造成了或极大地影响了被称为“1857年恐慌”的经济衰退。一位历史学家说：“‘中美洲号’黄金货物的损失给了美国经济沉重的一击。”[注]金融恐慌中一大批银行倒闭，尤其是在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多只铁路股票暴跌。造船业、制造业和烟草业的快速裁员使金融危机蔓延到了主流行业，那一年10月，恐慌的高峰时期，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聚集在银行外面，几乎所有纽约的银行都被迫关门。[注]

鉴于“中美洲号”的沉没造成的死伤及作为自淘金热开始以来几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人们很容易夸大此事件对经济的影响。这也是电报时代最早发生的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之一，公众对这起造成很多人死亡及财富随着死者消失在海里的神秘事件给予了持久的关注。毫无疑问，美国经济整体上已陷入危机，黄金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快速扩张和股票投机活动盛行。特别是1857年下半年银行和铁路的股票波动性很大，对任何意外损失都很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船上属于银行和企业的黄金投了保（尽管属于个人的黄金可能没有投保），保险公司（主要在伦敦）同意立即汇款。此外，在“中美洲号”起航之前，美国东海岸的经济已经出现了萧条的迹象。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和法国的利率上升，受此困扰的美国股市在夏季表现出疲软。即使没有发生携带黄金的轮船沉没事件，谷物价格下跌、铁路产能过剩以及令人担忧的蓄奴制和叛乱状况（德雷德·斯科特关于蓄奴制的诉讼于1857年3月做出判决）也完全可能导致经济衰退。8月份，

俄亥俄州最大的银行倒闭，其主要原因是纽约办事处的管理者挪用公款。此时恐慌已经开始了。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中存有隐患——在短短几年内，美国金融体系已经过度依赖黄金。由于西部各州黄金丰富，人们以为黄金供给既容易又无穷无尽，幻想着经济总会增长。为了抓住淘金热带来的经济机会，信贷快速扩张，美国东海岸最大的银行成为一种适时的（just-in-time）金融体系：黄金刚进入银行大门，就会以扩大信贷的形式被放出去，但是如果供应受到干扰，就不太可能轻松地扭转信贷扩张的进程了。当时的一位银行家是如此概括这次经济危机的："剧变是由纽约那些银行直接造成的……它们在7月份将贷款从1.17亿美元扩大到1.22亿美元，随后对黄金的损失感到担忧，于是又尽力以最快的速度收缩到1亿美元。"[注]或许在数百万人的心目中，在美国土地上发现了大量的、改变世界的黄金代表了天意和理想中的黄金国埃尔多拉多的崛起，但这还不足以抵御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幻莫测性和经济衰退的必然性。

如果说经济周期的作用扰乱了黄金、货币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和谐关系，那么战争通常会彻底将它打破。战争产生了迫切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新的支出需求，常以关税和税收来支付，这很有可能在战争结束后造成损害。战争将资本和人力从生产性经济活动（如农业和制造业）转移到破坏性的活动领域。战争可能（通过封锁、抵制或其他供应和分配壁垒的形式）威胁到任何经济链中的每一个环节。1860年前，美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其中至少有两次战争——1812年的战争和美墨战争（1846—1849年）——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后果。

支持硬通货的一个长期论据，是它对政府的规模和扩张保持了绝对的制约，南北战争的来临使这一常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一目了然。南北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政府支出能力显著下降，从根本上重构了美国政府、人民和货币之间关系。虽然南北战争时期关于绿背美钞滥发的历史或许无法像数十万战争死难者的牺牲那样能让人

感到悲痛不已，也没有美国奴隶的解放那么令人激动，但其影响同样持久。

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几年，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糟糕。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和布坎南政府累积的债务为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尽管人们都还不知道西部各州的黄金产量已达到了顶峰，但产量已经开始下降。在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当选时，联邦政府的金库已经亏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说：“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给国会议员发薪水。”注因此，几个月后，当萨姆特堡袭击发生时，联邦政府面临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动员，迫切需要筹集数亿美元资金投入使用。如果不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谁都想不出从何处去筹集这些必要资金的可行方案。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学人》刊物断言：“我们判断，美国人无论是想从国内还是从欧洲都不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巨额款项：欧洲人不会借给他们，美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注

交战前后双方都找到了满足其财务需求的方法，林肯内阁和国会的确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采取了惯常的方法：税收、关税和借款。但是这些方式既不够快，筹到的钱也远远不能满足200多万部队人员的需求。1861年7月美国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财政部长萨蒙·蔡斯预估第一年军需将超过3.185亿美元。试想一下，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3亿美元，并且与联邦政府年度支出相比，战争支出是天文数字了；布坎南政府每年借入约1 000万或2 000万美元外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另一个参照尺度是，在包括美墨战争的三年（1846年4月—1848年2月）中，美国陆军部的全部支出达到了8 000万美元。

事实上，蔡斯要求用来与南方作战的第一年的花费超过当时流通中黄金和白银的总价（当时北方和南方流通的金银总价约为2.5亿美元）。这一缺口并不代表黄金缺乏——恰恰相反，黄金以创纪录的速度流入美国的银行；缺口表明了战争动员的巨大代价。此外，联邦政府没有真正意义上现存的硬通货。即使很容易征集所有金子，但如果

不破坏州立银行就无法进行征用，因为法律要求州立银行应对各种贷款和债券持有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

在1861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蔡斯试图用传统方法拼凑到战争资金。联邦政府发行债券和国债（尽管由于美国处于动荡状态，就算国债能出售，其利率也非常高），还与北方的银行商定拨给联邦政府贷款。贷款计划很复杂，可能注定是失败的。撇开其他障碍不看，1846年的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只能收付黄金和白银，甚至各州的纸币也不允许作为支付手段。11月，一名美国舰长在一艘中立的英国邮轮上逮捕了两名南方邦联代表，这引起了重大的外交纠纷——被称为“特伦特号事件”，美英战争和南北战争似乎都一触即发，蔡斯的精心计划瓦解了。股市产生恐慌并迫使美国几乎所有银行在12月底暂停钱币支付。美国财政部当年发行的大部分国债突然不畅销了，很明显需要立即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注

这是美国首次实施《法定货币法案》背后的严峻情况。在纽约的银行宣布暂停兑现的同一天，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创建可偿还所有债务的纸币，但纸币不能兑换任何种类的金属。这并非完全没有先例，许多欧洲国家已经拥有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在独立战争之前，几个殖民地也成功发行了纸币。有些州发行的纸币还特别受欢迎，比如弗吉尼亚州，特别是在纸币被用于偿付某笔特定期限的特定贷款的情形时。但对于商业和政治阶层的许多人来说，纸币是破产的代名词。例如，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由此还产生了“不值一张大陆券”这个流行的短语，这样的先例直接导致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指定除了金银币之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法定货币”。

因此，这是美国首次尝试创建一种除了政府的许可之外没有其他支撑的全国性纸币，并且这种纸币还具备法定货币的力量。这一想法假定并宣称联邦政府拥有金融主权，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以来这种想法一直备受争议，它与南北战争背后各州与联邦之间的紧张局

势相仿。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埃尔布里奇・斯波尔丁提出了法定货币法案，这位共和党前银行家称这项法案为“战时措施”。无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出于真情实意，斯波尔丁阐述的理由都是毫不含糊的，他一再以“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为该法案的不寻常手段辩解。

这样一种对美国货币的革命性改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得以在缺少行政部门全力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在如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很显然当代的叙述几乎没有提及林肯对纸币问题的看法，更谈不上他对此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仅有的一些细节探讨也模糊不清。注 国会以外的核心人物是蔡斯，他将自己对这个法案的立场描述为不情愿的默许。尽管蔡斯赞同杰克逊主义关于硬通货重要性的观点，但在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在经济方面却经验不足。他在1861年底提出了两个替代计划，斯波尔丁和他的筹款委员会认为，这些计划无法完成为陆军和海军的紧急筹款（他估计每天的军需为160万美元）。在国会的催促下，蔡斯就纸币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赞同纸币此时已经“不可或缺”。但即使如此，他也觉得有必要将他的个人观点和实际操作区分开来。他说他的立场不是让纸币成为法定货币，而是因为一些公司和个人会拒绝使用纸币，所以要想办法使纸币得到普遍接受。正是由于使这种用例论证如此普遍并显得有说服力，比如说，证明纸币与美国重要的宪法规定相矛盾，证明了美国人对纸币的敌意。美国财政部和国会之间明显缺乏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创建的独立财政系统的不干涉方式，也可能反映了蔡斯和斯波尔丁之间的紧张关系。下一章中将要谈到，政治上雄心勃勃的蔡斯很可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无论如何，正如一位时事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财政史上，从这个案例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内阁部长与立法部门之间丝毫不协调的关系。”注

能够预见的是，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美国银行最初都反对斯波尔丁的法案。纸币作为法定货币既会威胁到它们现有资产的价值，也会加

剧它们从政府获取营业牌照的竞争。来自国会的反对者更加激烈，他们明确指出宪法禁止除了金银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作为货币。反对者们认为，宪法的制定者不仅规定联邦政府不具备发行货币的权力，并且这样的规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美国宪法刻意将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排除在外，因为它的构想就是联邦政府不应该具有这种权力。”[注]他们认为，使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因而可以适用于所有债务）会破坏现有的契约，因为纸币肯定会贬值，所有债权人的收益都会低于他们的预期。

由于辩论涉及用于残酷战争的开销，所以它逐渐演变为关于美国民族自豪感和公共道德的夸夸其谈。一些人认为给士兵支付纸币既具有破坏性又是一种欺诈行为。假设纸币具有本质上的缺陷，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拒绝接受战争使之合理化的前提：“如果纸币是一种战时措施，那么它就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我为军队提供纸币我宁愿给木枪。”其他人认为，用纸币就是允许道德败坏。俄亥俄州的V.B.霍顿说：“该法案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已经破产了，我们不仅软弱，还缺乏诚信。”[注]在讨论法定纸币的实际操作——例如，预测这将导致金融崩溃、造成通胀失控、劣币驱逐良币并鼓励纸币永久发行——时，该法案的反对者想象出了一个印钞厂如同魔鬼制造车间的场景，认为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道德败坏在货币上的反映。一位国会议员警告说：“材料便宜、易于发行、机器生产、机器盖章，美国财政部长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纸质魔鬼。”[注]

斯波尔丁及其盟友声称，美国宪法禁止任何金银以外的物品作为法定货币，这只适用于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不仅如此，宪法还赋予国会制造货币并“规范其价值”的权力。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控制金属货币的价值（包括规定金属的纯度以及黄金白银之间的交换比率这些重要的事项）。斯波尔丁认定，他的法案只不过将这种监管权转移到了纸币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承认，美国宪法可能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但它也没有赋予联邦政

府发行国库券的权力，然而自从1812年的战争以来，对于联邦政府发行国库券的法律认可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另外，纸币支持者并不认为纸币注定会失败，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在1797—1821年实际上已经转变为没有金银支撑的纸币本位，而这并没有引起经济灾难。

宪法辩论有时令人着迷且晦涩难解（在确定必要一词的正确含义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但辩论在法庭复审之外永远无法得到最终解决。与南方作战的紧迫性胜过任何哲学甚至实用的货币观点，正如斯波尔丁所说："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必须拥有对他们来说比金银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必须拥有食物、军服和战争物资。"参议院于2月13日以30票对7票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其中有一些很快将遭到全方面攻击的、看似适度的修改），众议院和总统于2月25日批准了最终版本。

到这个时候，《法定货币法案》几乎与支持处于战争中的联邦的法案难以区分了。这个法案有利于强大、权力集中的联邦政府，它承认了工业革命及其相关的社会影响已经使美国社会经济契约达到宪法中有争议的条款（不仅仅是有关金银的条款，亦有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第十修正案）所允许的极限。转向全美国认可的纸币是对杰克逊主义经济学的一次打击，不仅因为它打破了货币的金属罩衣，而且因为它正式承认在所有情况下负有债务都不必担心，债务是美国增长必不可少的部分。法定纸币也迫使北方各州在一系列不可同时兼顾的价值观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尽管保护联邦、打击蓄奴制和坚持硬通货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不可能实现所有目标。在设计未来模式时，当基本国家目标与严格坚持硬通货直接冲突时，就只能牺牲硬通货了。此外，正如下一章将特别指出的那样，纸币向全世界发出信号，即货币价值不是由上帝给定的，因而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可变的，受到人为评估和意外情况的影响。金融历史学家布雷·哈蒙德把关于法定货币的辩论上升到一个政治形而上学的领域。"作为国家主权的行使，"哈蒙德写道，"纸币将国家政府的权力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它们增加了联邦的权力……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通过立法制定一个新名称，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注]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同样的：支持主张金银作为货币唯一可能的支撑的论点与那些支持各州的权力、脱离联邦和蓄奴制的观点难以区分了。它们支持对联邦政府在形式上限制权力（通过不赋予其印刷纸币的权力），在事实上限制规模（通过量入为出）。在那些宪法未明确赋予联邦政府权力的问题上，这些观点默认其是各州的权利。鉴于美国金融权力的地理分布，农业地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在杰克逊时代已经很强大了，现在更深化了；而工业城市变得更加认同纸币。而且，由于法定纸币代表了一种新的货币周期，金本位的倡导者觉得他们本质上支持传统、反对现代性。然而，即使这些争端代表了南北战争所有的苦难，但它们也禁受不了即将来临的动荡。

---

1. George Washington to Burwell Bassett, April 22, 1879, in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14:432.该传记作者做出的推测参见Paul Leland Haworth, George Washington: Farmer（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15）, 286。

2. John Sherman’s 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 in the House, Senate and Cabinet: An Autobiography（Chicago: Werner, 1895）, 254.

3. Sherman’s Recollections, 254.

4. 有关自由银行利弊的详细考察可参见：Arthur J. Rolnickand Warren E. Weber, “Free Banking, Wildcat Banks and Shinplaster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6, no. 3（Fall 1982）: 10－19。

5. 那篇对于杰斐逊货币观做了最全面概括的文章就是以此处引用的金本位为标题；Donald F. Swanson, in Th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1, no. 1（January 1933）, 37－52。

6. Drew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138.

7. 1码≈0.91米。——编者注

8. Ebenezer Smith Thomas, Reminiscences of the Last Sixty-five Years（Hartford: The Author,1840）, 2:84－85.

9. 关于杰克逊逐步扼杀美国第二银行的精彩描述可见：Robert V.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the Bank War（New York: W. W.Norton, 1967）。

10. Davis Rich Dew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Longmans and Green, 1903）, 100.

11. 在Sovereignty and an Empty Purse: Banks and Politics in the Civil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一书中布雷·哈蒙德就美国人关于美国银行以及政府的“纯洁性”的困扰进行了尖锐的讨论。

12. 有关杰克逊“模范银行”战略的详尽说明参见：Harry N.Scheiber, “The Pet Banks in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Finance,1833－1841,”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no. 2（June1963）: 196－214。

13. Jackson to Van Buren, January 3, 1834, Van Buren Papers, LC. Cited in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the Bank War, 154－155.

14. 19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战争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将杰克逊的银行政策与后来的繁荣和危机联系起来，但彼得·特明在The Jacksonian Economy（New York: W. W. Norton, 1969）一书中强调经济主要受杰克逊无法控制的因素驱动。不管原因如何，默里·罗斯巴德认为“1839—1843年经济收缩出清了不合理的投资、债务和银行，包括带来危害的美国银行，这对经济有益”。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2）, 103。

15. 1865年10月11日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演讲，Hugh McCulloch, Addresses, speeches, lectures and letters upon various subjects（Washington, DC: W. H. Lepley, 1891）, 49。

16. Abraham P. Nasatir, “The French Consulate in California, 1843－1856, The Moerenhaut Documents,”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13, no. 1（March 1934）: 66.

17. S. M. 麦克道尔写给家人的信，可能写于1853年初，引自Malcolm J. Rorhbough, Days of Gold: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and the American N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213。

18. 理查德·沃克的论文“Another 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 San Francisco”涵盖大量关于淘金热对旧金山经济影响的数据，参见：Urban Geography 17（1996）: 60－94。

19. 理查德•巴恩斯•梅森上校1848年8月17日提交给R.琼斯准将的关于金矿的官方报告，引自http://sfmuseum.org/hist6/masonrpt.html。

20. “The Gold Mine,” The Californian，August 14, 1848. 该社论引自加州数字报纸收藏。

21. 淘金热对人们通常认为是美国私有财产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系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替代性其他选择和挑战。只要金矿开采盛行，大片富有的土地在法律上就只属于首先声称占有土地的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任何私人都无法进行干预—— 这一制度与欧洲和美国东部地区的财产制度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到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将出现一个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法律框架，不过那要在美国声势浩大的擅自占地者的权利运动登台之后了。参见：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New York: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42）, 385－386; 及Donald J. Pisani, “The Squatter and Natural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gricultural History 81, no. 4（Fall 2007）: 443－463。

22. Robert F. Heizer, The Other Californians: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under Spa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192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155－156. See also John Soennichesen,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ress, 2011）.

23. Charles N. Alpers, Michael P. Hunerlach, Jason T. May, and Roger L. Hothem, “Mercury Contamination from Historical Gold Mining in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2005. http://pubs.usgs.gov/fs/2005/3014/.

24. H. W. Brands, The Age of Gold（New York: Doubleday, 2002）, 442.

25. 根据福格尔的观点，美国经历了数次的宗教复兴运动。第三次大觉醒时期始于1890年，截止于20世纪初。——编者注

26.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7. 有关巴拿马航线开发的详情参见John Walton Caughey,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8）, ch. 4。

28. 银行数据汇编自Banker’s Magazine，参见William G. Sumner,A History of Banking in All the Leading Nations（New York:Journ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Bulletin, 1896）, 456。

29. 有关淘金热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的探讨参见：Gerald D. Nash,“A Veritable Revolution: The Global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in A Golden State: Mi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old Rush

California,ed. James T. Rawls and Richard J. Orsi（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76－292。

30. 关于“中美洲号”轮船沉没及其后果的详情参见：E. Merton Coulter, “The Loss of the Steamship Central America, in 1857,” 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54, no. 4（Winter 1970）: 453－492。

31. Albert J. Churella,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Volume 1: Building an Empire, 1846－1917（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192。

32. 对于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仍有很多争议。James L. Huston, The Panic of 1857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2.对其展开了全面描述。

33. W. P. Tatham to Messrs. Baring Brothers & Co., October 12, 1857, cited in Austin E. Hutcheson, “Philadelphia and the Panic of 1857,” Pennsylvania History 3, no. 3（July 1936）: 182－194.

34. Sherman’s Recollections, 251.

35. “Will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 Financially Successful?,” The Economist, August 24, 1861, 927.

36. 许多银行家和国会议员在1862年坚持认为采用“绿背美钞”与其说是绝对必要，不如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即使为了资助战争而需要大量的税收和异常高的贷款利率，这些仍然优于采用宪法上合法性受到怀疑的纸币。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持这一观点，包括Wesley Clair Mitchell，参见其所著的A Historyof the Greenback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3），Nathaniel Stephenson在其所著的Abraham Lincoln and the Un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0）一书中声称，据“普遍”的估计，纸币的使用增加了6亿美元的战争成本。其他人坚持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绿背美钞”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对硬通货有偏见。

37. 林肯曾经的盟友，作家唐纳·皮亚特1886年的记录提供了林肯和蔡斯之间一次未注明来源及日期的对话，从中可知蔡斯坚持认为纸币不符合宪法，林肯则回答：“如果有必要，我会违反宪法以拯救联邦。”正如斯蒂芬·索耶和威廉·J.诺瓦克写的，这是一个“现在认为是虚假的故事”。其他说法着重提到了一封信（貌似写于1864年，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公开），林肯在信中称一位朋友E.D.泰勒上校是“现代美元之父”。但这封信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内容是自相矛盾的：这封信称泰勒在1862年“1月16日左右”的会议期间向林肯建议了一种纸币系统。然而那时候斯波尔丁的法定货币法案已经起草、提交委员会、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进行辩论，并分发给美国最大银行的负责人。杰弗里·佩雷的著作Lincoln’s War（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中写道，泰勒和林肯的会面是在1862年夏天，这更不合理，因为2月份有关法定纸币的法律已经产生了。

38. Davis Rich Dew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03）, 284.

39. Pendleton，引自Elbridge Gerry Spaulding, History of the Legal Tender Money Issued During the Great Rebellion（Buffalo: Express Printing Company, 1869）, 44。

40.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Greenbacks, 59.

41. 议员Clement Vallindigham，引自Spaulding, History of the Legal Tender Money, 53。

42. Hammond, Sovereignty and an Empty Purse, 227.

第二章

崩溃、交锋、罪恶



这块黑板用于记录1869年9月24日美国“黑色星期五”中黄金价格的疯狂波动。市场崩溃夺走了财富，动摇了美国人将黄金作为美国经济保护者的信心。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869年6月中旬，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与家人一起在美国东北部旅行。他参加了母校——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他的儿子就读于该校三年级。格兰特的日程上还安排了出席美国和平纪念活动，这是在波士顿举办的为期3天的大型音乐节，有数万名表演者参加。在

这两个活动之间，格兰特和他的妻子去拜访了新婚的妹妹，她住在位于曼哈顿西27街的豪宅里。格兰特的妹妹弗吉尼亚一直与父母在俄亥俄州过着平静的生活，到了37岁还没一个好归宿。因哥哥的政治前途，事情起了变化，一位名叫埃布尔·科尔宾的61岁金融家对弗吉尼亚投以了关注。他们在格兰特3月就职典礼后不到两个月就结婚了。

按计划格兰特只在曼哈顿停留数小时，但他不知道的是，一群精于算计的商人——包括他的妹夫——利用这次会面来接近总统，这是他们密谋的一步棋，几周后，这个密谋引起了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黄金恐慌。[注]杰伊·古尔德在格兰特妹妹和妹夫的家中等候，这个33岁的金融家因与范德比尔特兄弟狼狈为奸控制伊利铁路而落下了坏名声。一年前，古尔德和他的同伙奸商詹姆斯·菲斯克受到警告，他们一踏上纽约州的土地，就会被逮捕；现在他们却要在居家环境中与美国总统见面。古尔德与格兰特总统的女婿科尔宾在新泽西州的一次房地产交易中打过交道，两人因此结识。古尔德说服科尔宾允许他会见总统，企图游说总统采取涉及黄金和农产品价格的特定政策。这一切并非巧合，古尔德一直在打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的纽约黄金市场的主意，计划操纵黄金市场。他最近以每100美元金币13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价值约700万美元的黄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个数目的黄金占到了纽约市场上流通黄金的近一半。

当两人会面时，古尔德向总统提议，去波士顿旅行最愉快的方式是乘坐前往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轮船，再从那里乘坐火车。格兰特喜欢有钱人的陪伴，遂表示赞同。古尔德安排武装护卫护送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到钱伯斯街的码头。为迎接总统的来临而装饰豪华的“天佑”号停靠在那里，船主兼船长——古尔德的华尔街同伙詹姆斯·菲斯克预先就准备好了迎接总统的到来。总统走近时，码头上的铜管乐队演奏了《英雄今日得胜归》。船上提供雪茄、香槟和酒水；全船125间客房每间都配有鸟笼，笼中养着金丝雀。

晚餐大约9点开始，一小撮商人伴在格兰特总统周围与他一起抽着雪茄，其中有赛勒斯·菲尔德，他几年前投资铺设了第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现在与古尔德一起投资铁路。在座的还有显赫一时的股票经纪人威廉·马斯顿，他曾与菲斯克一起从事航运业务。这些商人急切地想要了解总统对黄金、货币和经济的看法。或许格兰特意识到招待他的这些人名声不佳，于是一直沉默寡言、不置可否。当时，格兰特赞成“回收纸币”政策，这是沿袭了陷入困境的安德鲁·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想法是不让纸币再流通，这个过程几乎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每当纸币作为税收收入时，美国财政部就将彻底销毁这部分纸币。国会批准了这项行动，尽管它希望对此采取限制措施。1866年，国会授权每月销毁多达400万美元的纸币，按此比率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将所有纸币从流通货币中剔除。纸币被视为邪恶之物，虽然曾经有其存在的必要，但现在应该被清除。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立场与美国许多开国元勋的理念一致，即纸币如果不能兑换成黄金，那么就是有辱于美国，“国会并不想让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毫无必要地让不可兑换成黄金的纸币流通、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名誉扫地”。(注)

格兰特赞同这一观点，并希望最终能够回归由黄金支撑的货币，他将这一事业等同于他赢得南北战争的荣誉和道义。格兰特在他1869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为了保卫美国的荣誉，每一美元的政府债务都应以黄金支付，除非合同另有明确规定。”在说出这一誓言的两周内，国会通过了《公共信用法案》——主要以党派为分界线，格兰特的共和党人支持这个法案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此法案要求联邦政府用黄金偿还所有资助南北战争的债券持有人。这是自战争结束以来表明联邦政府打算回归金本位制的最具体的行动（此时黄金价格在低点，恰好是古尔德抢购黄金时的价格水平）。

格兰特的就职演说将此理念更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在美国土地上发现黄金和白银的这个时机表明，用金银来支付美国的战争债务是上帝的意志。“看起来上天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结实的装满金银的盒

子，锁在遥远的西部荒山中，而我们现在正在锻造解锁的钥匙，以应对现在的紧急情况。”格兰特这样说。注

回收纸币的政策合乎逻辑的后续步骤自然是美国政府向私人市场出售其在南北战争期间获得的大部分黄金库存——价值约为1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为“再次跨入”黄金支撑的货币体系做准备。毕竟，如果银行像过去那样发行黄金支撑的货币，它们就需要重新储存黄金。因此，美国财政部在4月份向市场出售了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5月份出售了价值600万美元的黄金，而6月份则打算出售价值800万美元的黄金。联邦政府大规模地出售黄金打压了古尔德及其同伙所囤积的黄金的价值，令他们蒙受损失。铁路大亨古尔德认为，黄金价格保持高位和自由流通的美元对于在秋季运输美国的农作物并为其争取国外市场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他有独特的见解——美国国家的利益和他私人的利益完美结合。因此，在“天佑”号上，古尔德对格兰特默认的将更多黄金投入市场的计划提出了反驳。古尔德后来告诉国会：“我说过，我认为如果这项政策得以实施，就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几乎会导致内战；它会造成工人罢工，而车间很可能必须关闭，工厂将不得不停工。”注

古尔德认为，美国农业地区的金融破产或许会再次引起武装叛乱，他的话可能是危言耸听并且出于谋取私利之目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重新整合是联邦政府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当时的状况犹如战时一样纷纷扰扰。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记得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它废除奴隶制并赋予男性奴隶美国公民身份和投票权——然而这是美国经济和民权的巨变。奴隶是财产，解放奴隶意味着将财产从现有奴隶主手中夺走。修正案明文禁止任何州或联邦政府支付“因为失去或释放任何奴隶的一切索赔”。

因此，美国如何看待其货币，是可能影响到再次分裂和叛乱的问题之一。鉴于战争和纸币体系大大削弱了南方各州所依赖的银行体

系，它们总体上拒绝偿还其战争债务，而且即使愿意偿还也是困难重重。[注]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南方的种植园主期望重新加入美国的条件之一是，联邦政府会补偿他们的战争损失。自罗伯特·李将军投降以来，一直驻扎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位美国陆军上将说：“他们频繁谈论一旦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成为国会议员，他将努力争取为失去黑奴的人，或是依据总统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释放自己所有的黑奴的人得到补偿。”[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南方各州的居民还期望他们的房地产损失会得到补偿，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他们会设法不让国会议员支付北方的战争债务。当时安德鲁·约翰逊政府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如果允许南方在战前状态下重新进入联邦，它可能会与北方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基本上会再次发动南北战争。因此，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包含了影响深远的一则法律条款（该条款直到今天还备受争议），在其得以通过不到一年内，格兰特的就职典礼就援引了这一条款：“对于法律批准的美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暴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和奖金而产生的债务，不得对其效力有所怀疑。”对于格兰特总统和19世纪60年代的共和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重返金本位是兑现偿还美国巨额战争债务可信的方式。（战争债务估计超过20亿美元——远高于美国国内流通货币的总量，这还不包括本应从流通货币中回收销毁的4.28亿美元纸币。）不那样做就是质疑这场可怕的战争之结果的合法性，尽管叫停回归金本位恰是许多美国南方和西部的人期望的，也是古尔德所倡导的。

正如古尔德后来所说的那样，在游轮上的会面给他做多黄金市场的计划泼了冷水。但是他与菲斯克和科尔宾还有许多其他应对计划。总统妹夫的名头给科尔宾带来了极大的无形影响，他曾想让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婿得到任命，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负责监管黄金市场。但当此人发现他得在每次美国政府销售黄金之前给科尔宾通风报信时，他拒绝了这个机会。科尔宾的下一个人选是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巴特菲尔德是科尔宾家共同的朋友，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将军，也是美国运通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巴特菲尔德还从科尔宾那里筹集了格兰特总

统用以在华盛顿特区购买房子的钱。在巴特菲尔德上任后不久，他遇到了古尔德，后者给了他1万美元的支票，似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比他一年的薪金还高。借助他的新朋友，巴特菲尔德在他本应监督的黄金市场上保留了几个活跃的交易账户。

下一步是给公众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美国政府将放缓或停止销售黄金。由于美国政府在出售黄金和来自国外的资金流入，夏季美国的黄金价格一度从高位回落。古尔德和其他一些华尔街人士组成了一个“黄金多头集团”来尽量囤积黄金，在8月底之前，这个多头集团已持有价值超过1 000万美元的黄金。与此同时，古尔德和科尔宾起草了一份格兰特货币政策意图的评估报告，并设法说服亲格兰特的《纽约时报》将其作为未署名的社论发表。该报赞扬了格兰特的深思熟虑，并且按照古尔德预期的情景进行预测：“在庄稼收割之前，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出售国库黄金以冻结货币。”[注]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按财政部长乔治·鲍特韦尔的计划，9月份将是自格兰特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销售黄金最多的月份。但古尔德基本上确定，鲍特韦尔不会公开证实或反驳社论的主张，因此该社论有其预期的效果：黄金价格开始回升。为了增强美国政府与“黄金多头集团”正式合作的错觉，菲斯克在古尔德的经纪公司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国家黄金账户”的特别账户。

在此阶段，古尔德似乎成了他自己宣传活动的牺牲品。几乎所有他眼见的事情都证实了他的期望，即美国政府停止出售黄金。9月1日星期三，格兰特在萨拉托加北部度假几天后，在他妹妹位于曼哈顿的家中停留，与妹夫科尔宾一起吃早餐。早餐时格兰特实际上表明他已经转而支持古尔德的理论，即黄金应该是稀缺和昂贵的。收成看起来很好，农民应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格兰特告诉妹夫，他已经写信给鲍特韦尔让他取消美国政府9月份出售黄金的计划。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荒谬无比，就像是来自室内喜剧的剧本。美国总统被蒙在鼓里的是，美国最大的黄金投机者就在楼下的客厅里。科

尔宾向总统告退一会儿，关上了门，走下大厅告诉杰伊·古尔德，格兰特在不久的将来会放弃出售黄金。获取了这个最大的内幕，古尔德溜出房子急匆匆地赶到市中心购买更多的黄金。然后科尔宾回到厨房，继续与总统共进早餐。

早餐会是不是一个陷阱？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格兰特与其妹夫的谈话似乎不可能是不经意的口误，尽管此时此刻格兰特与“黄金多头集团”有意或无意的私交还未惊世骇俗。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显然格兰特并没有给鲍特韦尔下达“取消出售黄金的命令”。(注)

如果这是一个陷阱，那么它即将捕获猎物并使许多其他人也陷入数百万美元的灾难中。古尔德确信他现在掌握了内幕，那天他又买入了价值3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大部分是以科尔宾和总统妹妹的名义及财政部副部长巴特菲尔德的交易账户买的。几天之内，包括古尔德在内的“黄金多头集团”控制了超过价值1 800万美元的黄金，因为随着黄金价格持续上涨，银行和其他黄金持有者当然也不再愿意出售黄金了。

古尔德虽然得意扬扬，但他还是担心与他竞争的金融家可能会说服格兰特改变主意。古尔德说服科尔宾给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古尔德关于保持货币充足、黄金稀缺有利于美国农业的理论。这封信很是微妙，不能托付给普通的快递员，所以古尔德的合伙人菲斯克指派了一名伊利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送信。1869年格兰特多次度假（白宫当年正在进行翻修），信在格兰特某一次度假期间送到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离匹兹堡不远的地方。总统实际上正在与一位极信任的助手打槌球，古尔德曾试图用内含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账户贿赂这个助手。格兰特读了这封信，然后信使去了最近的电报局给古尔德和菲斯克发了一条电报：“信已妥善送达。”

然而，一切都乱了套。格兰特与这些华尔街的操纵者往来了一个夏天后，似乎终于明白他被耍了。格兰特派他的妻子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应该叫科尔宾退出“黄金多头集团”。当这封信于9月22

日星期三到达时，科尔宾给古尔德看了这封信，并要求立即清算他在“黄金多头集团”中的份额。古尔德表现得像走投无路的困兽那样力劝科尔宾给自己一条出路，他当场给了科尔宾10万美元现金。科尔宾想了一夜，但第二天坚持要退出合作。古尔德离开科尔宾家时恳求其保密，他说：“如果总统夫人的信件内容被透露出去，我就完了。”

与此同时，任何一直关注黄金市场的人都知道有人正在企图操纵黄金的价格。9月20日星期一，《太阳报》公开指责“臭名昭著的伊利铁路投机者”——古尔德和菲斯克——参与了“抬高黄金价格的阴谋”，并将他们称为“华尔街有史以来炮制的最不道德、最恶性的阴谋之一”。但这只会增加交易的狂热。美国黄金交易的“官方”地点是一个毗邻纽约证券交易所，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大厅，被称为“金色大厅”。它的主要标志是被圆形铁栏杆围起来的丘比特和海豚的青铜喷泉雕像，其底部是金鱼池。买家和卖家聚集在铁栏杆周围盯着一项新发明：黄金价格电子指示器，它向房间里的每个交易员闪现最新的黄金交易价格。黄金的交易价格也闪现在室外的一个指示牌上，并通过电报传达给城市的各个交易行。指示器由一位22岁的发明家所操作，他已经用自己的名字获得了一些电报方面的专利，他就是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他的工作是转动带有数字的几个轮子，包括一个带有分数的轮子。

“金色大厅”受控于几家华尔街的公司，其中大部分都与古尔德合作，心照不宣地囤积黄金。有关“黄金多头集团”的传闻导致黄金销售飙升；从9月4日到10日，每日的黄金交易额大约翻一番，达到了每天1.6亿美元，接下来的两天达到2亿美元。纽约银行报告说，它们的黄金储备已经开始告急。金价一路走高，9月22日星期三金价收于每金衡盎司(注)141.25美元，星期四收于每金衡盎司144.25美元，是正常交易量的五倍。这些价格是纯粹的炒作，没有任何黄金供应因素或其他经济基本面因素能使之合理化。交易所内传闻，格兰特本人有意让黄金上涨。而这种传闻使人浮想联翩。黄金交易仍处于起步和疏于管理的阶段，所以有非官方的场所也买卖黄金，最出名的是“加拉格尔

晚间交易所”，其交易活动在曼哈顿的酒店房间内进行，尽管理论上此“晚间交易所”已经于1865年关闭了。那天晚上在第五大道酒店的黄金黑市里，黄金交易价超过了每金衡盎司180美元。

对那些拥有黄金的小圈子之外的人而言，这些价格是无法承受之重。因为没有人能够负担外币支付所需的黄金导致进出口停滞。小麦、棉花和玉米价格均下跌。周四，格兰特对财政部长让步了；超过每金衡盎司144美元的黄金价格就是“不正常”，如果情况恶化，美国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第二天早上，金价突破了150美元每金衡盎司。鲍特韦尔和格兰特决定出售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这个消息会通过两条不同的电报线发出去，这表明他们知道巴特菲尔德被收买了。电报于上午11点57分抵达纽约，此时金价已经突破每金衡盎司160美元大关。

在10分钟内，黄金价格下跌了20美元，即12.5%。那一天，古尔德本人一边大肆宣称价格将继续上涨，一边隐秘地出售黄金。交易变得疯狂和复杂，古尔德的经纪人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卖给那些他们知道很快会因对菲斯克和古尔德的负债而破产的经纪人。人们绝望地尖叫着，扬言要用匕首或更凶恶的手段对付黄金经纪人。许多人没有结清前一天的交易，所有他们以为的盈利现在变成了损失。几分钟之内，愤怒的人群涌出了交易所，冲进杰伊·古尔德的办公楼。古尔德和菲斯克把自己锁在了办公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夜幕降临时，他们设法逃到了菲斯克在第23街的歌剧院，在那里每个入口都有警卫。数十名经纪人从华尔街消失，成百上千人破产，然而因为一位友善的法官，菲斯克和古尔德从未被要求偿还他们欠下的数百万美元。

黑色星期五事件具有启发意义，原因有很多。其一，一个以两种货币形式定价的国家会迅速在这两种货币之间创建出一个套利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剧烈波动并影响到政治或社会。对于“稳健货币”的支持者来说，黑色星期五是最有力的教训，那就是将美元的价值与黄金分割会导致灾难。对于格兰特总统及其继任者——主要是来自共和党的总统，也包括来自民主党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

兰——来说，黑色星期五的混乱证明了只有金本位才能维持稳定的美国经济。其二，在19世纪后期及以后，美国金融市场极易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负责监管美国黄金市场的财政部高阶官员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黄金投资——更别说他与最大的黄金市场操纵者勾结，想到这种情况的存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合法投资者都会远离此类市场。对所有宣扬黄金是一种货币工具的自由放任主义言论而言，黑色星期五证明，一个不受监管的市场很快就会出现政治腐败，带来经济上的灾难。总统——即便是与黄金交易没有经济联系的总统——根据市场价格做出买卖决定，这样的观念也理应让那些主张金本位和“小政府”的人迟疑不决。

然而，尽管整个美国从中得出了不同的教训，但这只会加深杰克逊时期的政治紧张局势。对许多人来说，黑色星期五证明了美国的经济极易被美国东海岸精英操纵，其结果是伤害了美国其他地区。“信心受到严重动摇，”一位金融历史学家写道，“市场比以前更容易受到坏消息的影响而下行。”[注]这种不信任推动人们走向与格兰特货币政策完全相反的方向。杰伊·古尔德是一个愤世嫉俗、自私自利、操纵欲强的东海岸铁路大亨，他提倡保持黄金稀缺，同时允许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向市场，帮助铁路和电报等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样的货币政策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他们像古尔德一样，看重的是发展而不是党派的忠诚度。这一拨人的数目将继续增长并重塑美国政治。

如果说黑色星期五还不够混乱的话，那么在几个月内，美国将面临成立以来最离奇的货币法律决策。尽管格兰特打算恢复完全的金本位制，但早在他上任之前有一点就很明显，那就是纸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留在美国经济领域中。对有些地方来说——比如纽约和华盛顿等——让纸币退出流通，收缩经济，似乎是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毕竟，反对者极度讨厌美元贬值是客观事实；19世纪60年代后期，通常要花费1.20美元~1.40美元的纸币才能购买到价值1美元的黄金。但在

美国南方和西部，紧缩将真正伤害到经济，因此要求保留纸币的政治压力很大。关于美元的更大问题在于，它的合宪性从未得到解决，而且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人们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站在哪一边——是支持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1863—1870年，在州法院层面至少受理了16起诉讼，质疑美国《法定货币法案》的合宪性。民主党法官几乎都判定美元违宪，这反映了杰克逊主义者对黄金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持有偏见，而与之对立的共和党法官通常会判定《法定货币法案》符合宪法，因为他们不想干预共和党进行战争资金的筹措。

最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似乎就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合同纠纷。这份合同签于1860年，到期日是1862年2月，也就是美国国会发行第一批纸币的前五天。债务人（赫伯恩夫人）在1864年使用纸币向其债权人（格里斯沃尔德先生）偿还欠款及利息。格里斯沃尔德拒绝接受该付款，经过几轮法律上的来回之后赫伯恩将案件诉讼至最高法院了。

案件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直接、明确。1864年末，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去世，一直打算从林肯内阁辞职的萨蒙·蔡斯被提名接替他。诚然，在美元首次发行时，蔡斯一直是财政部长，并且是支持纸币合宪性的，虽然他的支持勉勉强强。林肯及其继任者很可能以为蔡斯会维持自身的立场，或者会要求撤换掉自己，因为让一个曾推动某条法案生效的人又来决定此法案的合宪性，这明显有冲突。该案件被辩来辩去。一位法律学者说道：“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法庭上考虑得最为彻底的问题。”[注]大法官们最初分为两派，每派四票——首席大法官蔡斯现在反对纸币的合宪性。后来，那位75岁高龄、行动不便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改变了主意，投票结果为5∶3。

虽然投票是在1869年11月进行的，但判决的宣布被推迟到1870年2月7日——在年老的大法官格里尔退休之后。据说蔡斯以“几乎完全听

不见”的声音宣读了判决。[注]他没有直接提到自己的倒戈，而是把责任推给战争。“那不是一个对立法或行政权力的宪法限制进行周到反思的好时机，”蔡斯说，“许多心存疑虑的人不再怀疑了，许多未有疑虑的人都保持沉默。一些强烈反对将美国政府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的人觉得自己不得不默许这项措施拥护者的意见。然而，由于和平的重新到来，不少当时坚持这项措施的必要性或默许这种观点的人，在这更加平稳的当下做出了重新考虑，现在他们同意我们刚刚宣布的那些结论。”[注]

赫伯恩案的判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影响范围有限，法院只不过宣布《法定货币法案》不适用于该法案通过之前发生的债务。不管怎样，这样的案例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蔡斯的决定将这个问题确定为根本的自由问题——这显然就是一个美国国会延伸宪法的含义并用之干涉两个公民之间的私人合同的案例。蔡斯写道，一纸判决“将完全改变美国政府的性质，它将把人民任命的、具有有限权力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对于一个在过去十年内遭受了灾难性的内战、总统被暗杀及继任总统被弹劾的美国，宣称纸币不仅违宪，而且是向暴政迈出了一步，这是一种煽动性的言论。拒绝纸币的所有选票都来自民主党人（蔡斯在南北战争后改变了党派），而支持纸币的所有选票来自共和党人，这一事实加剧了此决定的政治色彩。《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责蔡斯：“如果当时这些观点占上风，那么反叛者就会成功，就会对整个联邦施加自己的权威影响。”许多保守派学者和支持者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时至今日都认为最初的赫伯恩案不承认纸币在宪法上是正确的。[注]

市场对该决定的反应最初平平，但好戏在后头。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之战使得法院伤痕累累、两极分化。18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总人数从十位减少到七位。到约翰逊于1869年离职后，国会将大法官的人数又提高到九位，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当赫伯恩案的判决向公众发布时，大法官格

里尔已经离任，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席位有两个空缺。格兰特提名的一名大法官未获得国会批准，另一名在获得国会批准四天后去世。因此，当赫伯恩案判决宣布时，投赞成票的四票没有达到国会规定的票数——需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全体成员的投票中占大多数。

显然，为了处理在此法律通过后发生的债务，还需要做出另一项决定。这些案件已经在下级法院审理，政府行政部门是做出判决的关键，特别取决于格兰特在赫伯恩案判决宣布当天任命的新的来自共和党的大法官。（尽管格兰特的追随者当时否认格兰特将他熟悉的法官“塞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至足以推翻该判决，但后来的学者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证实他的确这么做了。）[注]蔡斯想方设法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接手新的案件，一名观点与其对立的法官指责蔡斯“采取了所有最不入流的政治伎俩来阻止案件得以审理”。[注]

斯特朗声称，国会拥有的“铸币并规范其价值”的宪法权力显然包括了界定它认为合适的货币的权力。毕竟，1834年的美国《铸币法案》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铸币法案》——由民主党人安德鲁·杰克逊倡导，这也是他为阻挠其对手而用些手段的例证——改变了黄金、白银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斯特朗将其归类为“对货币的共同权力的一部分，这种权力一直是所有其他比美国更文明的国家公认的主权属性”。一名新的大法官补充了一个更为实际的论点，它反映出纸币在更广泛的经济层面带来的价值：“如果不提供疏困的资金，全球破产就会随之而来，工业将会停摆，政府会随着人民陷入困境而瘫痪。”

因此，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72年对“诺克斯和帕克案件”的裁决是法律上关于纸币不可兑换成黄金合法性的最终裁决，但对纸币的政治怨恨及其对政府权力的原始主张从未平息，并将持续到20世纪。双方都可以把法院极不寻常和相互矛盾的行为作为不公正行为的证据。难怪20世纪的首席大法官将《法定货币法案》与“德雷德·斯

科特案”和“1895年征收个税案”一并归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到严重自创的三大值得注意的事件”。[注]

美国政府货币政策与民众舆论之间的政治差距即将扩大。1873年美国《铸币法案》的通过看似无害，但是随着世纪的流逝，人们指责它是造成一切经济弊病的缘由，将之诬蔑为“1873年的罪行”。《铸币法案》的目标貌似明确：令美国的货币回归金本位。该法案令财政部辖下铸币局的地位发生了各种正式变化，并明确规定了金币和银币的面额。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一处被忽略的遗漏是，该法案的文本并未涉及老式银圆的作用，而只涉及面值为50美分、25美分和10美分的银币。[注]国会还规定若支付金额超过5美元，银币就不能再用作法定货币了。

这些措施并非偶然，许多国会领导人和格兰特政府刻意恢复金本位、废止白银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最近在科罗拉多州发现的康斯托克矿脉会使美国货币供给中的白银泛滥。此外，1871年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经济体——尤其是德国——也正在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这项立法并非仓促或暗中通过：美国《铸币法案》的起草、修改并提交广泛征求意见，历经3年才得以通过，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相关立法者或其他各方表达意见。然而鲜有人这样做，而那些后来谴责美国《铸币法案》的人倒是一些曾经坚定投票支持它的多数派；该法案在众议院以110票对13票通过，在参议院以36票对14票通过。[注]

美国《铸币法案》的细节与其文本一样简洁明了，看起来微不足道。1873年的《铸币法案》中没有任何规定称铸造银币是非法的，事实上，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财政部每月都在铸造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银币。大多数美国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老式银圆的消失，自1853年以来老式银圆就没怎么铸造过；正如一位金融记者后来所说的那样，“几乎没有成年人见过一枚老式银圆”。

然而，在某些地方白银的废止产生的影响很显著，例如在银矿和依赖它们的当地经济。《铸币法案》中另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它并

没有像19世纪早期银币仍在流通时常做的那样强制要求财政部给任何带来银锭的人铸币。例如，到1876年，旧金山铸币厂告诉爱达荷州奥瓦依河沿岸的银矿工人，其当前铸币工期已经落后6个月到1年，并且无法保证在何时可以铸币——这对于需要支付生活费的矿工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爱达荷州一家报纸谴责道："美国政府在铸造贵金属币方面采取的拖延政策已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注

当类似的投诉越来越多时，美国西部的立法者及其新闻界的盟友开始将美国《铸币法案》描述为对公众犯下的严重的金融欺诈行为。1876年，一位教条的银本位拥趸、内华达州参议员约翰·P.琼斯宣称，美国《铸币法案》是"严重的错误"。然而，国会议员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以压倒多数的选票通过了如此糟糕的法案。貌似合理的头号借口是，他们不知道投的是什么票。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一个接一个地宣称他们对该法案对白银的影响一无所知。参议员艾伦·瑟曼的说法具有代表性："参议院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有一丁点儿意识到这会跟废止白银扯上关系。"据一些广为流传却缺乏考证的说法，连总统格兰特都声称："我不知道1873年的法案会废止白银。在这件事上我被欺骗了。"

另一个所谓的罪魁祸首是神秘莫测的国外势力。传说有一名叫埃内斯特·塞伊德的英国经济学家兼作家曾从各种欧洲债券利益集团筹集了50万美元后就来到美国贿赂国会议员以废止白银。报纸和杂志（特别是那些站在民主党立场的报纸和杂志，尽管并不仅仅限于它们）纷纷报道这则"假新闻"，有些报道夹杂了被篡改的引文和杜撰的出版物。这些都用来证明是"欧洲的金主""蒙骗了"国会两院废止白银。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尤因指责是他们的谋划"令美国以及其他向他们出售过债券的国家废止白银，用黄金支付债券"。注

尽管在尤因发言时美国实际上是黄金的净进口国，但是估量一下欧洲的经济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有一些根据。然而，塞伊德的贿赂

故事却被改编得滑稽可笑。塞伊德是一位优秀的、细心的作家，他确实曾为《铸币法案》出谋划策过，但他也是金银复本位制的著名倡导者。在1872年给众议院的长信中，塞伊德强烈支持保留银圆。注虽说先前的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但民愤继续沸腾，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各州尤烈。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民主党人和美国西部的共和党人往往将美国多次出现的经济困境归咎于“1873年的罪行”。

白银倡导者的部分论点是简单地基于经济学理论：他们声称黄金供给不足以承担美国的经济负担。在1877年，黄金供给被认为只有1852年的一半，“从黄金的生产方式来看总是那么不稳定、不规律，故黄金最不适合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正如国会报告所说。（当然，此论点的另一面是，1850—1900年全球的白银产量是1800—1850年的4倍，这是白银作为货币造成货币扭曲的潜在原因。

既然人们对《铸币法案》的谴责源自虚假的故事甚至伪造的文件，那么很明显，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狂热的恢复白银货币的运动不仅仅是经济推理所驱动的。在某些方面，白银运动和相关的纸币运动（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绿背美钞党于中西部各州发起）代表了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披着不同的金属外衣再次登台。由于白银产量充足并且与生产它的西部地区息息相关，因此它被视为美国普通农村地区农民的货币。由于当时黄金越来越稀缺并主要用于国际交易，它与财富、美国东部银行业和工业利益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一位矿业管理者所称：“毫无疑问，白银是穷人的货币，因为每有一个持有5美元黄金的人，便有20个持有更少数目白银的人。”注这种阶级差别甚至扩展到理发层面。理查德·本塞尔注意到，支持金本位的东部民主党人通常都会把胡子刮干净，“最多留着小胡子和鬓角来修饰一下脸部”。来自南部和西部的支持白银的民主党人则蓄了“又长又乱”的胡须。注这些个性差异更多是象征意义而不是固化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将会发展并强化为民粹主义运动，且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美

国法定货币以何种金属按什么比例构成或还是以纸币构成这一问题来重塑美国的政治。

尽管在立法上尝试了很多修补措施，但美国政府没能在19世纪最后25年维持稳定的、金属支撑的货币体系。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恢复硬币法案》，它为美国恢复完全金本位奠定了基础。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从1879年开始以“硬币”赎回纸币。于是美国财政部开始储备黄金。然而在同一时期，来自西部各州的政治压力也确保了白银在货币体系中将保持一定的作用。

金银复本位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难以维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购银法案》，这是广义的经济妥协的一部分，同样地美国首部《反托拉斯法》和提高关税等措施也是上述妥协的产物之一。《谢尔曼购银法案》规定财政部购买比过去更大数额的白银——每月4 500万金衡盎司，这基本上是美国国内生产的所有白银的数量——作为交换条件，国会发行可以兑换黄金的法定纸币。在支持银本位或发行纸币，提倡增加货币流动性的人士推动下通过的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保持黄金和白银“同等待遇”。此法案一出立刻就带来了灾难。黄金和白银或许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如果有选择的话，几乎每个人都想要黄金。在美国，基本上所有必须支付关税的人都选择以白银或纸币来支付。1890年，95%的关税以黄金支付；而三年之后，以黄金支付关税的数目缩减到了5%。㊟ 在美国国外，特别是在英国，由于此时英国是实行金本位的，许多持有可以用黄金兑现的美国债券或其他类别的美国证券的人都兑现了黄金；每天都有载着黄金的大轮船从纽约港口驶出。据估计，在美国海外持有的30亿美元证券中，有10%在1890年至1894年被兑取了。㊟

于是，美国财政部在金本位阶段遭受了一个将会反复出现的问题：无法阻止黄金供应流入私人手中。克利夫兰认为，美国财政部将那些用来赎回黄金的纸币重新投入流通的法律规定会造就“无穷无尽的连锁反应”，也会榨干美国的黄金储备。实际上，在19世纪90年

代，美国黄金储备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锐减。在这个年代之初，美国储备了价值约1.9亿美元的黄金；到1895年，近三分之二的黄金已经流失他处。[注]1895年，英格兰银行金库中存储的美国金币比美国财政部所拥有的还要多。法律规定，美国财政部必须保留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以支撑美元（尽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关于这些资金是否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存在一些分歧）。[注]但不管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还是1893年1月再次走马上任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其国会力挺白银），都无力阻止黄金外流以及明显违背了上述法律。

尽管如此，美国经历1890年和1891年的轻微经济衰退之后，1892年是经济扩张的一年。但1893年开始形势不佳，铁路业务恣意扩张，融资不稳定，几家著名的铁路公司于2月宣布破产。然后在5月初，进口大麻和制造麻绳的美国国家绳索公司破产，这造成多家经纪公司倒闭，并导致美国股市暴跌。1893年的“经济大恐慌”已经开始，它将成为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和最持久的经济萧条。在经济最惨淡的时候，多达20%的美国工人失业，超过800家银行于1893年至1897年倒闭。仅在1893年6月，就有25家国民银行倒闭，这是有史以来银行倒闭最多的一个月。银行对自己的黄金储备采取保护措施，并开始在抵押贷款和其他合同中插入条款，要求以黄金偿还。到1894年，超过100条铁路无法运营下去了，美国西部大踏步发展的步伐放缓了。[注]在工会领导人尤金·德布斯的组织之下，近10万人参与了著名的普尔曼罢工，美国大部分的铁路贸易和邮政服务中断，这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影响。美国东海岸的金融危机蔓延到了西部，农场破产、家庭濒临绝望。在全球粮食和食物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农民无法接受超低的报价而宁愿将粮食倾倒于街头。报纸上充斥着各家各户处于饥饿边缘的报道。举个例子来说，在堪萨斯州的西沃德县，几年前刚刚发行了债券以建造价值3万美元的校舍，但现在已经有数十个家庭连续几天吃不上饭了。[注]

这些令人绝望的金融状况在政治上表现为银本位与金本位的对立。克利夫兰坚信，金本位将保护美国的信誉，从而确保美国在国外借贷和开展贸易的能力。这种立场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孤立，因为即使是他自己的党派成员也成了纸币和银圆的拥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西部和南部的立法者与外国金融家站在一起向美国财政部施加压力，希望迫使克利夫兰实施银本位。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采用的是金本位，因而它们不愿接受以白银或纸币付款。然而，法律要求美国政府保持金银平价。每次国会提出向银本位推进一步，克利夫兰都予以否决；每当克利夫兰试图发行有助于保护美国黄金储备的债券时，国会都拒绝批准。由于美国深陷经济衰退且美国政府与国会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完全分裂，民主党在1894年的国会选举中落选了。在众议院，民主党派的人数从占大多数的220∶124，变成93∶254的占少数，在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中期选举中变化最大的一次。

1895年初，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远远低于法律要求的价值1亿美元的水准，金库面临告急的危险。克利夫兰再次尝试通过立法来发行以黄金支付的债券，并停止流通纸币和银券，而尝试再次失败了。克利夫兰及其内阁陷入了绝望之中。1月下旬，甚至在该法案注定落败之前，克利夫兰就派出财政部副部长W. E.柯蒂斯前往纽约与华尔街金融家会面，寻求绕开国会的解决方案。柯蒂斯会见了一位民主党铁路大亨的儿子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此人继承了父亲的生意，还建造了纽约的贝尔蒙特公园赛马场。柯蒂斯还会见了被公认为华尔街最有权势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总统对摩根并不陌生，克利夫兰在担任总统的两个任期之间，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负责处理摩根的大部分业务，而摩根也慷慨地支持克利夫兰的总统竞选活动。

老顽固摩根提出美国政府发行1亿美元债券，但不通过公开出价出售，因为这个策略一年前已经遭到失败。这1亿美元债券将出售给一个由摩根和贝尔蒙特联手的财团。贝尔蒙特代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利益。这笔交易不仅能带来黄金，还能提供保护黄金的手段，这对克利夫兰来说极具诱惑。[注]摩根强调说，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消失殆尽。

他告诉克利夫兰，他听说有人拥有价值1 000万美元需要用黄金支付的汇票。“如果这张汇票拿出来，你就无法兑现它。一切将在3点之前结束。”摩根这么说。于是摩根提出了一项交易，他的财团将向美国政府支付350万金衡盎司黄金，其中至少有一半来自欧洲。他还承诺，他可以阻止任何人兑换证券以换取黄金，这样在可期的未来，这笔黄金会留在财政部。作为回报，摩根集团以104.5美元的价格获得30年期、利率为4%的黄金债券，总价值为6 500万美元。此外，摩根希望他的财团能够在今后美国政府发行的任何此类债券上拥有优先权。总统质疑这种操作是否合法，摩根提醒他，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通过一项鲜为人知的法规，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发行“政府债券”来购买黄金。于是这项奇怪的公私之间的交易就那么定下了，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反向救助”。[注]正如克利夫兰的传记作家阿兰·布罗德斯基所说的那样，这笔交易也“等于是一项临时操纵美国黄金市场的协议”。[注]

黄金操控按计划运作。摩根承诺的黄金大批涌入美国；在纽约，债券在22分钟内售罄。黄金外流立即停止；在签订合同的那一周，从美国财政部提取出来并准备装箱海运流出美国的价值700万美元的黄金在轮船起航之前被卸下并运回财政部。截至6月底，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价值已经超过1亿美元大关（尽管到那年年底数目要远远回落）。[注]虽然在参议院听证会中摩根拒绝透露以多少价位出售债券，但是他显然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美国政府不得不低头依靠华尔街来使其金融得以运转，就算表面看来这并没有让最富有的银行家获取有利的条件，这样的事前所未有，甚至在战争期间也没有过。这使得美国公众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也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便如此，许多克利夫兰的传记作家和其他经济史学家都赞赏克利夫兰找到了挣脱看似绝境的方法。毕竟，此时美国没有中央银行系统或不能诉诸国际上诉手段，而且美国国会对政府想做的任何事情都断然反对。

然而，那个时代对此举的评论极尽恶毒攻击。在猜疑和民族主义之下，对“1873年罪行”的谴责演化为公开仇恨，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纽约世界报》称债券集团的交易为“吸血的犹太人和外国人”的操作。在国会，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要求办事员从国会记录中读出《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讲话的意味。民粹主义者对美国东海岸黄金及其权力的反抗即将达到顶峰。

---

1. 本书关于引起黑色星期五事件的版本探讨立足于几处参考信息，它们都基于The House Inqui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the Gold Panic, 4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report no. 3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0）。其中分析最透彻的单本著作是Kenneth D. Ackerman所著的The Gold Ring: Jim Fisk, Jay Gould, and Black Friday 1869（New York:Dodd, Mead, 1988）。其他的信息搜集自Maury Klein,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y Goul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6） ;W. A. Swanberg, Jim Fisk:The Career of an Improbable Rascal（New York: Scribner's, 1959）；William McFeely,Grant: A Biography（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319－331。

2.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 for the Year 1865（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65）, 4.

3. 格兰特总统1869年的就职演讲，参见http://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grant1.asp。

4.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the Gold Panic, 152－153.

5. 关于南北战争后南方银行体系面临的挑战的详细论述，参见George L. Anderson, “The South and Problems of Post－Civil War Finance,”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9, no. 2（May 1943）:181－195。

6. The Journal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f Fifteen on Reconstruction,ed. Benjamin B. Kendrick（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4）, 283.

7. “Financial Policy of the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869.

8. 格兰特于9月初写给鲍特韦尔的信石沉大海。它貌似已经送达，鲍特韦尔在国会做证说他收到了信件并在9月4日执行了信件中的嘱咐。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记录证

明信的存在。鲍特韦尔告诉国会他认为这封信放在他位于格罗顿的家中，但是，在国会的仔细调查中似乎并未要求查看信件，查阅类似的档案也未有发现。

9. 1金衡制盎司=31.103克。——编者注

10. Robert Sobel, The Big Board: A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93.

11. Joseph M. Cormack, “The Legal Tender Cases: A Drama of American Legal and Financial History,” Virginia Law Review 16,no 2（December 1929）, 140.

12. “Legal Tender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1870.

13. Hepburn v. Griswold, 75 U.S. 603（1869）.

14. 参见：如，Richard Timberlake, Constitutional Money: A Review of the Supreme Court’s Monetary Decis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 12 and 13。

15. 悉尼·拉特纳从鲍特韦尔的回忆录等材料中引出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格兰特“很可能”在任命两名在下级法院中支持纸币的合宪性的法官之前已经知道法庭判决的内容，参见“Wasthe Supreme Court Packed by President Gra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0, no. 3（September 1935）: 343－358。

16. Charles Fairman, Mister Justice Miller and the Supreme Court, 1862－1890（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17.

17. Charles Evans Hughe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50.

18. 此法案的确准许比银圆重的“贸易银圆”在海外市场流通，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学家保罗·M.奥利里声称法案对于银圆规定的遗漏是故意的，虽然他认为责任不在于国会，而在于费城铸币厂的前董事亨利·理查德·林德曼。亨利在起草1873年法案时插了一手。参见“The Scene of the Crime of 1873 Revisited:A No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no. 4（August 1960）:388－392。毫无疑问，林德曼并不赞成铸造银圆。然而，奥利里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即奥利里所指的林德曼参与其中的、1870年财政部最初起草的法案，事实上确实包含了提供普通银圆的规定。几天之后，当该法案实际提交到国会时，这个条款被取消了，后来的修正案还是包括了较重的贸易银圆。参见History of the Coinage Act of 1873（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萨缪尔·迪卡尼奥在其开创性文章“Populism, Paranoia,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Silver,”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5（April 2011）: 1－26也表明林德曼该负责任。迪卡尼奥引用了大量证据证明林德曼实际上收受了加利福尼亚银行行长威廉·罗尔斯顿的贿赂，故精心制作法案并确保其通过。罗尔斯顿显然也贿赂了一些

立法者，包括后来强烈反对这种“罪行”的内华达州参议员威廉·斯图尔特。在其著作Democr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迪卡尼奥进一步描述了此“贿赂门”。

19. 一个多世纪后，《铸币法案》如何变得如此遭人痛恨的谜团继续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兴趣。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有用且发人深省的论文“The Crime of 1873”（Hoover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 No. E-89-12, April 1989），从中能找到一些缘由。铸币局的前任财务主管詹姆斯·罗斯·斯诺登注意到该法案废止了白银，并提出建议反对这样做。他告诉谢尔曼他觉得这种变化“不可取”，尽管他也未能预见到银圆作为货币广为流通。参见History of the Coinage Act of 1873, 85。

20. “How the Silver Question Effects the Working of Silver Mines,” Idaho Statesman, August 31, 1876.

21. 尤因做了题为“关于复苏、收缩及自由银行业”的长篇演讲，演讲内容刊登在The Ohio Democrat, September 6, 1877上面。

22. Ernest Seyd to Samuel Hooper, February 17, 1872, reproduced in History of the Coinage Act of 1873, 131–148.

23. 矿业股票协会致威廉·斯图尔特参议员，发表于The Nevada State Journal, February 8, 1890，引自Paul Barnett, Agricultural History 38, no. 3（July 1964）: 178–179。

24. Richard Bensel, Passion and Preference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the 1896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25. Sobel, The Big Board, 135.

26. Margaret Good Myers et al.,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Origins and Development, 291，引自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07n26。

27. 黄金储备的数据引自Sobel, The Big Board, 138。

28. 参见“Discussion in the Sena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895。此外，关于1亿美元的数字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尚存有争议。此规定被纳入1882年通过的银行章程法规中。参见Alexander D. Noyes, “The Treasury Reserve and the Bond Syndicat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 no. 4（December 1895）:573–602。

29. Charles Hoffmann, “The Depression of the Nineti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6, no. 2（June 1956）: 137–164.

30. “Starving in the Arid Land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893.

31. Grover Cleveland,Presidential Problems（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4）, 152.

32. 参见：如，H. W. Brands, “Upside-Down Bailout,” History Net, June 3, 2010, http://www.historynet.com/upside-down bailout.htm。

33. Alyn Brodsky,Grover Cleveland:A Study in Character（New York: St. Marti n ’s Press, 2000）, 363.

34. 据当时一位金融记者报道，一名咖啡进口商小幅抛售摩根集团债券，并开始从财政部取走价值超过3 000万美元的黄金来成交。参见Alexander D. Noyes, “The Treasury Reserve and the Bond Syndic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 no. 4（December 1895）: 600－601。

第三章

危险金砖路



莱曼·弗兰克·鲍姆的奇幻小说《绿野仙踪》于1900年第一次出版，这本小说被认为是有关19世纪末货币辩论的一个寓言，特别是它有关黄金白银的作用的辩论。

1895年，为了给美国政府解围，格罗弗·克利夫兰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达成了一项紧急协议。那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充其量只能打打零工。对一个只有两个任期的人来说，布赖恩的国会生涯可以说相当有成就了；他参加了1894年的参议员竞选，但由于那一年的反对民主党的浪潮，共和党人得到了这个参议员席位。4月，他原本最大的政治成就——《关税法案》的所得税修正案——也因违宪被否决。他为《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撰写文章，做些编辑工作，赚取微薄的薪水；他也做一些关于支持白银的演讲并获得不菲的收入，这些演讲有时长达3小时。随着“克利夫兰大萧条”强势来袭，布赖恩训练有素的演说才有了听众（通常是失业人员），他们乐于接受他的观点，相信白银无疑比黄金更好，尤其相信按照16∶1的白银黄金比铸造货币可以解决美国的经济困境。

虽然有人认为布赖恩会是1896年的总统候选人，对此他自己也从不缺乏信心，但他远非不二人选。布赖恩36岁，刚刚达到宪法规定的竞选总统的年龄，而且在此之前，内布拉斯加州没有人当选过总统。[注]虽然美国西部拥护白银路线，但是仍然由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艰难地领导着的民主党内主要力量却青睐黄金。然而，随着1896年春天的到来，民主党内对白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共和党也拥有强大的挺银派；当共和党在6月份的会议上采纳了支持黄金的纲领时，一大群支持白银的代表离开了会场）。4月，从俄勒冈开始，各州民主党都举行了会议，宣布自己支持白银或黄金。最大的州代表团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他们青睐黄金。但是，紧随其后的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和密苏里州代表团都支持白银。[注]在6月的俄亥俄州会议上，一位代表呼吁撤走克利夫兰的肖像，发牢骚说“看不起这场会议的就是叛徒，就是民主党的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和格罗弗·克利夫兰”。[注]大多数州都把它们的代表与挺金或挺银捆绑在一起，所以在7月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会有一个或多个挺银派候选人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在这个人数众多且难以管理的群体中，有一位领跑者，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布兰德，绰号“白银迪克”，这个绰号体现了他对平民主义金属的忠诚。布兰德是1878年《布兰德-艾利森法案》的撰写人之一，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月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白银，用来铸造货币并进行流通。布兰德对于走白银路线保持着热情；3月，他把克利夫兰的金本位制称作“普通百姓鼻孔里的臭味”。然而，布兰德当选总统的机会微乎其微；他年龄太大不适合这份工作。出于傲慢或者漠不关心，布兰德选择不参加7月初的芝加哥会议，他留在密苏里州里巴农的农场，通过电报与他组织良好的团队进行沟通。

布赖恩的计划十分明确。他与精力充沛的内华达州民主党人一起乘坐多轨车从林肯出发。车上挂满了横幅，上面写着“内布拉斯加州首先宣布16∶1”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俱乐部”。大会在芝加哥体育馆举行，这个体育馆占地5.5英亩[注]，可以容纳20 000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永久性展览场地。

多年来，挺银派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观众。布赖恩的一位同事编写了一本名为《货币金融学校》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着力渲染了“1873年罪恶”，并把欧洲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成一只章鱼，提出这只章鱼通过拥有世界一半的黄金并采用金本位来统治世界。这本小册子卖出了100多万册，还催生了几部续篇和模仿作品，它让19世纪90年代成为轰动一时的平民主义大众文学的“白银时代”，当时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将美国东部银行家的行为描述为对付农民和工人的阴谋，其中一些作品则陷入反犹主义的窠臼中。[注]

挺银运动方兴未艾，芝加哥喧嚣和激进的氛围让挺金派感到震惊。威廉·C.惠特尼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曾管理过克利夫兰1892年的竞选活动，他被视为1896年挺金派一个有前途的总统候选人。当威廉·C.惠特尼抵达芝加哥时，竞选宣传活动无休无止，银帽子和横幅随处可见。惠特尼蹲守在酒店套房，派了一些人去感受人们的热

情。他派去的一个人回来说：“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场面！”“准雅各宾派”无处不在。即使在选举大会的临时主席时——通常这个选举只是走走形式，候选人也要接受银-金试金石的考验，挺银派赢得了这场战斗。

在这场混战中，布赖恩看到了机会，也许他可以获得提名，又或许可以得到内阁席位或副总统职位。他需要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奥尔特盖尔德的提携，而事实说明这位州长很难被人说服。在会议召开的前几周，布赖恩给奥尔特盖尔德看了他的演讲稿，希望得到奥尔特盖尔德的指点并获得他的支持。像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奥尔特盖尔德给布赖恩的回答是：“你还年轻，这次让布兰德上吧。你会有机会的。”

挺金派似乎知道自己必败无疑。在大会上，他们对黄金的辩护并不是特别有力，而且他们的辩护明显太务实，没有激情，也没有感召力。在大会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9日，纽约州参议员戴维·贝内特·希尔代表美国东海岸的挺金派发言。他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不是革命家”。希尔在理论上支持金银复本位制，但在政治上与克利夫兰结盟。他认为，美国人无法自己解决货币标准这个问题。希尔说：“没有其他大国的配合，我们不应该尝试自由和无限制地进行白银货币实验。这不是爱国主义的问题，不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是忠诚的问题。这是一个金融问题，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这不是人们充满了勇气就能解决的问题。”希尔认为，国际金银复本位制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单一的金本位制是最好的。“我知道，热心的朋友们都说，美国可以自行制定一条路线。我知道这个想法迎合了普通美国人的自尊心，但我想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建议最终得到法律的支持，你们不妨废除我们的国际条约。”[注]姑且不论这个国际主义论点的经济价值，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整个20世纪它都会充满活力，不过，它是作为反对金本位制、支持一些应急的货币制度而存在的。

虽然希尔和同事们的讲话缺乏热情，但比起对白银的辩护之词来说还是更受欢迎，因为后者没能激起大多数支持者的热情。布赖恩设法在主题发言中成为最后一位演讲者。多年来，他一直在练习各种版本的演讲，他甚至在国会大厦使用过一些最著名的比喻。但这一次演讲让台上台下的人都热血沸腾。布赖恩的演讲是美国史料中的一篇杰作，它为包容性辩护，呼吁回归旧时的美好。布赖恩认为，挺金派的麻烦在于，他们过于狭隘地界定了商人的利益。布赖恩说："农民早出晚归，辛勤耕耘，从春到夏，不辞辛苦，他们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利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并不逊色于那些加入贸易委员会、在粮价上押注的商人。"这些话划分了阶级，提到了一个价值理论，它温暖着任何社会主义者的心——统治阶级压迫工人、投机挣钱，农民品德高尚、创造真正的价值，城市居民是投机分子、寄生虫。后者用成堆的黄金赢得胜利，而前者则用白银要求正义。

当各个阶层有冲突时会发生什么？为了避免对此产生疑问，布赖恩像狂热的布道士一样做出了预言："你们告诉大家，伟大的城市支持金本位。我们告诉你们，伟大的城市依赖着广阔而肥沃的草原。烧毁你们的城市，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就会像魔法一样再次拔地而起。但是，如果摧毁我们的农场，全国每个城市的街道上就会长满青草。"值得一提的是，这番慷慨陈词针对的主要人群是布赖恩的民主党同胞。

布赖恩的主题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对进步的定义，后者将进步定义为"努力重建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在美国立国之初曾存在过，现在已经被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摧毁，重建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可以重塑人们业已丧失的道德标准和公民的纯洁性"。[注]布赖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这种见解与货币政策融为一体：黄金是腐败的现代势力，只有正义的白银可以战胜它。

当布赖恩得出自己的结论时，他提到了一位民主党伟人：“我们需要一个像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的人站出来，反对有组织的财富侵占。”杰克逊一直是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布赖恩借用了杰克逊的力量来转而支持银本位。“如果他们胆敢公然捍卫金本位制，认为金本位制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就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群众的支持下，与他们斗争到底。在商业利益、劳动利益和所有劳苦大众的支持下，我们对他们要求金本位制的回应是，你们不应该把这顶荆冠扣在劳动者的头上，你们也不应该把人类钉在十字架上。”

在说最后几句话时，布赖恩用手指抵着太阳穴，比画出了一顶荆冠，然后伸出双臂，与身体构成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姿势他整整保持了五秒钟。在人们因震惊而沉默一阵之后，大厅里，随即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那天早上，布赖恩的政治阵营的每个人都领了一块红头巾，现在他们正欢呼呐喊着，激动地在空中挥舞着红头巾。当布赖恩穿过大厅，经过内布拉斯加州代表团时，他“被疯狂的人群包围，被代表们高高举起在肩膀上”。注

不管代表们最后提名谁，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党连同他们的道德坚持——认为黄金是唯一真正的货币，而所有形式的债务和纸币都是罪恶——似乎都走到了尽头。如果继续向前推进那条路线，那么现在也将由共和党人来继续，而他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一致接受它。布赖恩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伟大的指挥家。布赖恩在回忆录中写道：“观众们整齐划一地起立、坐下。他们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实际上，我想到了唱诗班是因为他们对我所说的每一点都即刻做出了一致的反应。”注

然而，政治现实却不那么和谐。尽管布赖恩的演讲受到好评，他还是通过5次投票才获得提名。民主党内部派系严重；就算他们更加团结，即使是团结一致支持白银，布赖恩也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为了保持平衡，布赖恩又在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了一个身为百万富翁的造船商和一个铁路主管，这对于代表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来说是个奇怪的选

择。在芝加哥会场外面，一些人从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言辞中听到了分裂的骚动；另一些人则认为，对整个民主党派来说，偏离真正的黄金之路是灾难性的。《纽约太阳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颇有影响力，他曾经是格罗弗·克利夫兰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他斥责道："芝加哥大会上的演讲者提出，我们应创建一种货币，使人能够用他现在必须用的一半财产来偿还债务。"《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哀叹道："这个提议是不诚实的。""民主党只是在自取灭亡。"该报预测相当多的民主党人将投票赞成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可以打败针对公共信用、国家信仰和荣誉的最无耻和最危险的阴谋，这种阴谋曾经被组织成一场政治运动"。[注]

《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是正确的，几乎就在布赖恩被提名之后，一群更保守、支持金本位的民主党人匆忙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党"。虽然它选出的总统候选人没有赢得一个州，但是它可以在除7个州以外的其他所有州进行竞选，而且可以在20个州选拔国会候选人。时间非常紧迫，这可是一项非凡的壮举。此外，这个成立不久的政党还吸引了许多民主党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名叫伍德罗·威尔逊的教授。[注]

投票率很高，而且选举已接近尾声。麦金莱比布赖恩多赢得约60万张选票，前者赢得了23个州，后者赢得了22个州，但更重要的是，自从1872年以来，获胜的候选人第一次真正受到欢迎，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有报道称，老板们向工人施压，要求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还有关于舞弊的指控，尽管很难知道这些现象在1896年是否比在"一般"的总统选举中更加明显。挺银派的声音极具说服力，但是仍然没有抓住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在美国党派对立极为严重的时期，这个国家像在战时爱国主义时期那样，团结在黄金周围。

上任伊始，麦金莱总统就明确表示，创建"硬通货"是他的首要任务。在就职典礼上，麦金莱重申了对非金属货币的旧有的偏见："在我看来，几种纸币一直让美国政府感到难堪。"尽管共和党在投

票中以黄金为助力获胜，但并未很快完全接受单金属标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来自商业和金融界的支持。摩根士丹利与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民主党政府的友好关系并没有延伸到该党的布赖恩派。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银行家和企业主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至少说服了布赖恩的一部分潜在听众支持“稳健的货币”。他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了为期数天的货币大会，并为几本杂志和小册子提供资金，与《货币的金融学校》和类似的挺银出版物竞争。这种观念上的冲突首次表明，两个主要政党都承认一个由工人和中产阶级组成的城市工业化国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特征，也是未来竞选活动的战场。注

然而，将美国推向单纯金本位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北美和南非发现了新的黄金宝藏。实际上，第二次淘金热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它比第一次淘金热更不实际、更加危险。布赖恩发表演讲的一个月后，一位美国探矿者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克朗代克河的兔溪支流发现了黄金。从第二年开始，估计有10万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出发前往育空地区，这被称为“克朗代克淘金热”。19世纪末的经济环境变幻莫测、前景暗淡，当时，河里满是黄金这一画面令人不可抗拒，肯定会吸引美洲大陆大量的失业人员和幻想破灭的人士，让他们对金矿抱有无穷无尽的兴趣。注人们在零下50度的低温下工作，食物稀缺，雪橇狗昂贵。那些人居然挺过来了——大多数人未曾到达矿区，到达矿区的大多数人从未找到过黄金。黄金也从南非流入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货币存量从来没有如此快速增长过。在布赖恩发表“黄金十字架”演讲的那天，美国的货币黄金只有5亿多美元；3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8.59亿美元，增长了70%，这个增速让人难以置信。注

特别是在1898年参议院选举之后，共和党拥有了绝大多数席位，变得强大有力。这时，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果断地放弃金银复本位制。当新的国会召开时，它采取了一项货币法案，确认黄金是美国货币的基础，这一立场得到了共和党的大力支持。布赖恩的影响依然存在；几位支持白银的立法者认为，正式将白银非货币化会从农民和劳

动者手中夺走财富。内布拉斯加州平民党(注)参议员威廉·V.艾伦说：“这项议案涉及掠夺和没收，是一项增加和延续国家债务的法案。”参议院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投了票，投票结果是44∶26。

该法案被称为1900年的美国《金本位法》。它正式将白银作为辅助货币，并允许用黄金全部回购剩余的美元。当1879年恢复实物支付时，没有专门的黄金基金来支付这些票据；新法律的一个重要规定是，美国财政部将保留价值1.5亿美元的金币和金条作为基金，用于兑现美国和财政部国债。该法案采用英国央行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做法，规定储备基金将从财政部的普通基金中补充黄金，如果该黄金储备的价值降至1亿美元以下，财政部将被授权使用债券从公众手中回购黄金。麦金莱总统用一支崭新的金笔签署了这项法案，这支金笔是印第安纳州众议员杰西·奥弗斯特里特赠送给他的，正是这位众议员提出了该法案。

当21世纪的倡导者谈到回归金本位制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一种类似于1900年被通过的制度：黄金可以兑换成纸币，并且需要最低数量的黄金来支持货币。对这种体制的信任可以追溯到那些确定无疑的宣言，那些宣言使得共和党在20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麦金莱政府人士和推动稳健货币的金融利益集团的人相信，他们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大多数人类文明都难以逃避的一个问题。在美国《金本位法》成为法律的两个月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埃利斯·罗伯茨在一家银行集团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喜形于色。“我们所有的货币，不管是纸币还是硬币、银币还是金币，我们的债券、工资、贸易、银行、公司都被深深地打上了黄金的烙印。”(注)美国的信用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一直困扰克利夫兰的“一系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除非由黄金来替换，否则黄金不得离开财政部。而且眼前美国内外的矿藏新发现使得美国人实际上如鱼得水。“3年来，这种黄色金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投入我们的市场、我们的金库和人民的口袋。”美国正在以每年约1亿美元的速度增加黄金流通量。“我们的政府控制着无限的宝藏，其增

速不为财政机构所知，令所有从伦敦到柏林和香港的交易所感到震惊。”罗伯茨夸口说，“因此，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比其他任何国家、公司或联合企业都更充足。”

同月，也就是1900年5月，书店开始收藏一位芝加哥作家的一本奇妙新书，这位作家形容自己的书是“专为当今快乐的孩子而写”的。《绿野仙踪》由剧作家兼记者莱曼·弗兰克·鲍姆所著，他密切关注1896年的总统竞选。这本书描写了一位堪萨斯女孩，她的家被龙卷风刮走了，她发现自己降落在一块被称作“奥兹国”的陌生土地上。在那里，她得到了一双银鞋，可以顺着一条用金砖砌成的路走到翡翠城。这本书的销量惊人，到1956年这本书的版权进入公有领域时，已经卖出了300万册。米高梅于1939年公映了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由朱迪·加兰主演。这个故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故事之一。虽然这部电影最初在影院上映时没有轰动一时，但是从1956年开始，它在电视上找到了真正的归宿；许多评论家和学者认为，《绿野仙踪》是电视上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影，观众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亿。

1964年，纽约弗农山一位名叫亨利·利特菲尔德的高中英语教师在《美国季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表明，这个故事是一个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和货币斗争的寓言，其魅力无法抵御。利特菲尔德写道：“鲍姆采用微妙的比喻，勾勒出进入20世纪时一个美国中西部人眼中的国家形象，既充满活力，又富含讽刺。”注

利特菲尔德认为，《绿野仙踪》中的象征意义非常具体，再现了布赖恩和美国中部各州民粹主义者的世界观，即使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讽刺。例如，利特菲尔德注意到，东方女巫对伐木工施了魔法，使得他挥动斧头时会砍断自己的身体部位，最终他由于过度劳累变成了锡。“通过这种方式，东方的巫术使一个朴素的劳动者失去了人性。

他工作得越快、越好，他就越快变成一种机器。”利特菲尔德写道，“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这是邪恶的美国东部金融力量对诚实的劳动者造成的影响。”

利特菲尔德的论文开启了后人不断探讨书中角色的象征意义的序幕，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一步拓展了这本书中各种角色的象征意义和类比。[注]这些解读提出，书中胆小鬼狮子是布赖恩（布赖恩和狮子押韵[注]，布赖恩和平民主义政党在政治漫画中经常被描绘为19世纪90年代的狮子）；飓风代表自由的白银运动；金砖路代表金本位（记住，在书中，多萝茜继承的鞋子不是红宝石拖鞋，而是“尖头银鞋”）；奥兹国（Oz）是盎司的缩写，意思是金属货币；稻草人代表没有文化的农民；东方女巫最有可能代表银行业，西方女巫可能是民粹主义者玛丽·伊丽莎白·莱斯（或者说，东方女巫是格罗弗·克利夫兰，西方女巫是麦金莱）；多萝茜的狗托托（“托托”是一出关于禁酒者的戏剧）代表了禁酒运动；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鲍姆肯定不会认同这些解读，但这无关紧要；正如利特菲尔德自己所说：“当然，上述关系和类比是从理论上提出的。”在《绿野仙踪》出版一个多世纪后，关于书中货币象征的正确性的争论持续不断，这表明民粹主义时期的狂热和政治纷争依然存在。

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金本位似乎可以引领美国走向繁荣昌盛。在此期间，包括农业机械、汽车、石油和钢铁在内的许多主要行业出现了规模宏大的联合与合并。随后，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垄断运动，这导致了北方证券和标准石油等在内的巨头的分拆。在经历最初的恐慌之后，包括摩根和洛克菲勒在内的大型信托公司的所有者与美国政府监管层达成了和解。股市对此反响很好，道琼斯平均指数在1904年第一季度至1906年第一季度翻了一番。由于美国的黄金生产状况良好以及南非的布尔战争结束，世界黄金储备十分丰富。1905年6月，美国财政部长埃利斯·罗伯茨自豪地宣布，现在世界

上大约1/4的黄金都在美国。美国的信用非常好，对于一个10年前必须由摩根施以援手才能脱离困境的国家来说，这可以说是巨大的进步。

然而，几乎每一个仔细观察美国货币体系的人都能看到，这个体系有很大的缺陷。自“黑色星期五”以来，根本问题没有改变，而自农业平民主义者兴起以来，政治上的薄弱环节也没有多大变化。由于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农田播种面积激增，农作物价格下降，农民很难借到钱或支付抵押贷款。美国大部分黄金集中在美国东部的银行或大型国民银行。每年夏天，为了把庄稼从田里运出来并运到各地，需要将大量资金运到美国中西部和西部，通常运送的货币的面额都非常小。如果像往常一样，在这个可预见的过程中存在障碍，那么信贷市场将会收紧；1905年底，银行贷款收取高达125%的利息，原因是资金非常紧张。随着美国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的印制量和兑换货币的数量都受到了严格限制，“非弹性”货币在当时受到广泛批评。对此，农业平民主义者主张用白银和纸币来扩大货币供给；美国东海岸的精英阶层则希望用金本位制和“稳健的货币”来应对。

1906年初，著名的德裔华尔街金融家雅各布·席夫对美国的货币体系发起了攻击，称其为“任何文明国家的耻辱”。这位金融家曾为日本政府提供资金修建铁路和浮动债券以抗击俄罗斯。席夫坚持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正面临困难，恰恰相反，“不管你往哪儿看，看到的都是我们从未有过的繁荣昌盛”；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流通资金来满足合法企业的需求，太多的资金被锁在银行金库里或被投机者非法转移，“如果这种状况无法被改变，甚至无法很快被改变，我们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恐慌。相比之下，之前的三次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孩子式的游戏”。

4月，旧金山的地震和火灾几乎将旧金山夷为了平地，造成数千居民死亡。旧金山大半个城市的私人和商业保单都是由英国公司承保的，几天之内，大量的黄金从伦敦被运往旧金山，4月先是运来价值3 000万美元的黄金，9月则运来了价值3 500万美元的黄金。这意味着英

国银行持有的黄金数量下降了14%，这是1900年以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大跌幅。[注]在美国国内，黄金也流向急需资金的西部，到了冬天，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紧缩。

纽约根本不可能抵御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像半个世纪前的詹姆斯·菲斯克和杰伊·古尔德一样，胸肌发达的弗里茨·海因策通过挑战商界知名的大公司而名利双收。他创造性地利用蒙大拿州的矿业法规，成功地挑战了洛克菲勒铜矿发电厂，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华尔街。他购买了一家银行，与一些精明的纽约金融家结成伙伴关系，把铜业公司的股票销售到四面八方。1907年10月的一个早晨，他发现股票交易比实际存在的交易更多。他和他的同伙企图操纵原铜价格——又一次，就像菲斯克和古尔德于1869年在金矿市场所做的那样，结局同样悲惨。海因策兄弟证券经纪行在10月下旬倒闭了，随之倒闭的是尼克博克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它可以履行许多与银行相同的职能，但美国政府对它的监管不那么严格，因此它能够持有大多数传统银行不能持有的证券。

这种风险在几天内蔓延到小银行，然后蔓延到依赖它们的公司，再蔓延到大银行，最后蔓延到美国金融业的顶端，也就是需要摩根和卡耐基参与的领域。到了月底，纽约市无法支付员工工资，至少需要2 000万美元才能避免破产。奥马哈的一家有轨电车公司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只好用车票箱里的60万枚镍币给员工发薪。

联邦政府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恐慌蔓延开来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狩猎，无力阻止。几乎在10年前，美国还自认为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黄金储备，此时看来，黄金的供给显然远未达到所需要的数量。美国需要再进行一次黄金救助，而这次摩根的资金和控制力是不够的，因为他的利益与那些摇摇欲坠或已经倒闭的银行的联系太过紧密。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摩根把几位银行行长锁在他的书房里，直到他们签署了一项协

议才让他们离开，这项协议要求他们把钱借给美国信托公司，这是一道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防火墙。

与此同时，来自阿根廷、法国和英国的应急黄金也纷纷涌入。11月8日，英国库纳德公司的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停泊在曼哈顿码头，运来了价值1 240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由专列从伦敦被运到利物浦，又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穿越海洋。很显然，这是有史以来单艘货船穿越大西洋运来的最大一笔财富。金子被运走了—— 一共334箱，一次一个集装箱，每个箱子由两个码头工人从船的钢衬船体中搬出来。注

虽然对这代人来说，1907年的大恐慌与大萧条相比相形见绌，但它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灾难之一，在某些方面比1893年的更严重（虽然持续时间更短）。显而易见，无论正式的金本位制有什么优点，它都不足以避开飞速而来的经济灾难。必须采取措施使美国金融体系更加稳定。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商业银行绝对过剩了。1912年，估计美国有8万家银行，其中大约有2.8万家是部分的或完全的商业性银行。这就意味着黄金储备十分分散，在紧急情况下毫无价值，正如在这次大恐慌中表现出的那样；每家银行都想囤积其数量不多的黄金，这使得黄金总量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用处。此外，由于杰克逊时代的美国人不愿将政府管理事务与银行业务混为一谈，美国财政部自身的黄金储备被分配到9个次级国库和多达1 500个国民银行。1907年的这次危机彻底暴露了这些问题，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恐慌“使改革的想法变得更为明确，给改革打下了广阔的基础，使得对货币和银行进行基本改革几乎不可避免”。注

随后，为使这一制度合理化，有必要在银行利益、地区压力、立法特权和激进的反对意见之间达成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由国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对银行业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多达23卷，这些厚厚的资料令人生畏。所有的这些努力很有可能陷入僵局。美国财政部长威廉·麦克阿杜后来回忆道：“当我回顾1913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时，我想知道联邦储备法案是如何在困境中产生的。”

保守的民主党人有他们自己的反对意见和喜爱的项目，弗吉尼亚州的卡特·格拉斯提到了“帝国主义密谋夺取美国银行业务”。[注]共和党人伊莱休·鲁特曾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陆军部长，很少在参议院发表讲话，他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预测联邦储备系统将创造流动资金，将黄金驱逐出境。“当我们还沉浸在货币流动性充裕带来的繁荣梦想中时，我们赖以避免灾难的黄金来源就逐渐枯竭并导致人们丧失信心。这样一来，任何利率都不会带来资金，而高利率只会毁掉美国商业。”[注]最大的潜在障碍依然是平民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对于中央银行的权力集中，尤其是集中在美国东海岸的精英手里，持谨慎态度。然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已不再是19世纪时那个生猛的他了，1912年赢得白宫选举的民主党已设法驯服了他。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强烈反对民主党的布赖恩派，然而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想方设法与他们交上了朋友。例如，在1912年的州政党大会上，直到布赖恩支持威尔逊，代表们才在45次投票表决后选出了候选人。作为回报，威尔逊任命布赖恩为国务卿，尽管这并不能保证后者会支持像建立美国银行体系这样重要的事情。布赖恩仍然象征性地领导着平民主义派别，他坚持要让美元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布赖恩最终写了一封信，敦促挺银派和支持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民主党人“支持总统，并帮助他尽早通过该法案”。

在整个辩论中，美国财政部和银行界的一些人焦急地关注着黄金开始流出美国金库一事。欧洲悬而未决的战争使那些有财力却紧张不安的国家不得不囤积黄金，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在1913年初的前几周内，有大约价值2 300万美元的黄金从美国黄金储备中流失了。

1913年圣诞节之前，美国联邦储备法案成为法律。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美国新的国家货币——联邦储备券（美钞）——被设计成适应交易的需求，解决了货币的“非弹性”问题。美钞反过来又由价值不少于流通货币价值40%的黄金储备来支持。该法案还赋予了联邦储

备银行在公开市场买卖黄金的权力，并设定美联储在维持美国黄金供给方面发挥作用（此前，黄金供给一直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的）。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后文简称“美联储”）没有动摇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但首次为美国提供了一套应对经济衰退的工具。在美联储成立的前几年，它缺乏经验，没有政治影响力，几乎立即受挫于欧洲的战事。尽管如此，美联储董事会认为，它主要通过引入“黄金结算基金”，使银行之间的交易系统化和简单化，大大改善了美国的资本周转。的确，美联储董事会对自己的创新非常满意，它预测若有一个和平的年代，世界可以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基金”。美联储1918年的年度报告承认，除非世界和平稳定，否则几乎不可能达成什么目标。尽管如此，一个国际共享的基金仍可能会带来好处。该报告解释道：“国家银行或其他银行储存的黄金应该属于特别基金或信托基金，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应该存入适当比例的黄金。”[注]此外，这份报告夸张地说：“节省下来的因损耗和运输事故造成的费用和黄金的利息将是巨大的，对世界商业带来的好处将是无法估量的。”

唉，货币天堂不会出现，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会出现。尽管如此，这场战争像从前或以后的许多大规模战争一样，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交战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以支付其巨额的战争费用；由于美国在1917年才正式加入战争，所以尽管它一度限制黄金出口，但金本位制依然存在。战前世界经济所呈现的价格水平相对稳定和比较容易获得的海外投资随着这个制度一起不复存在。回到金本位制是人们的共识，但却很难实现。特别是在英国，战时的生产造成了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而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发现削减其政府开支在政治上很难做到，而消减开支是重返金本位制所必需的。

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已经恢复了金本位制。在这个时期，美国继续增加黄金持有量，这与它的经济增长大致相符。在同一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支，英国、法国

和德国的黄金储备大幅减少（后者急剧下降）。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无可争议的黄金中心。

20世纪20年代末期，现代最热心的挺金派总统之一赫伯特·胡佛上台了。他将金本位制称为“近乎神圣的公式”。赫伯特·胡佛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唯一在白宫任职并对采矿业有深入且直接了解的人。的确，胡佛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和妻子翻译了一本有关金矿的拉丁语巨作——《论矿冶》（*De Re Metallica*），这是一本由乔治·阿格里科拉于16世纪编写的教科书。胡佛在该书的译文中提道：“在通过善良和诚实的手段获得巨大财富的所有方式中，采矿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胡佛的经历无疑导致了他对金本位制坚定的支持。自20世纪初以来，他的政党就已认同金本位制度。但是，这对于他应对冲击美国的经济雪崩几乎毫无帮助。到1929年夏天，美国的产出和就业率开始下降。正如两位经济学家后来所言，当10月份股市崩盘时，“下跌变成了灾难性的溃败”。

陷入大萧条的基本经济状况是令人沮丧的。一连串毁灭性的事件加大了大萧条的影响，胡佛总统或任何政府机构对许多事件都无能为力。1930年，“美国气候史上最严重的干旱”袭击了南部和西部的农业区。美国国家红十字会主席、法官约翰·巴顿·佩恩说：“红十字会经历过上千次紧急情况，但从未遇到过比这更大的灾难。”庄稼在田间死去，从而造成全美国金融体系恶化；正如一个观察员所说：“农民欠商人的债，无法偿还；商人欠小银行的债，无法偿还；小银行则毫不犹豫地说，它们不能履行对城市银行的义务。”

由于物价暴跌和银行倒闭，胡佛的共和党同僚和私营部门的“稳健货币”拥护者被迫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他们的世界观几乎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经济灾难。今天，人们常常认为金本位制是问题所在。正如两位著名的经济历史学

家所写：“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金本位制即使不是世界经济崩溃的根本因素，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注]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情况势不可当，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扭转这一进程：金本位不行，美联储的市场操作不行，清算融资公司也不行。尽管美联储拥有史无前例的权力，但在1931年和1932年它似乎无能为力；它更擅长辩论和行政改革，而不是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注]一位恼怒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告诉董事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伟大的中央银行系统不采取积极措施，却持有70%的黄金储备，这几乎是不可想象、不可原谅的。”美联储的独立性——这对它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成为令人遗憾甚至被人嘲笑的特质。在美联储主席尤金·迈耶出席的听证会上，一位国会议员威胁他说：“你们的谨慎政策也许恰恰可以让国会向财政部下达命令，要求财政部采取措施来取代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不作为。”[注]当然，美联储并不是唯一不作为的机构。国会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当美联储体制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不愿意对方案做出新的改变时，情况更是如此。在第72届代表大会上，有50多项提高货币和物价的法案，但没有一项能成为法律。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最有可能迫使一个恐慌中的制度发生变化，那就是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这件事。对美元的挤兑发生了，那年秋天，美国的黄金急速流失，正如19世纪90年代时那样。在9月的最后两周，美国黄金库存的价值减少了2.75亿美元。10月，又减少了4亿美元。曾经引人注目的黄金橱柜如今变得空空荡荡。在1932年总统选举高峰期，胡佛告诉艾奥瓦州的农民，当年的早些时候，因为无法向需要黄金的人支付黄金，美国被迫在两周内放弃了金本位制。胡佛的一位助手后来宣称：“这几乎只是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的事。”[注]

或许美国的暗淡前景使得白宫在1932年大选中更换主人成为必然。那年夏天，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民主党人几乎没有暗示将要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健的货币，并且召开一次

国际货币会议，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白银及相关问题。”即使这只是向支持银本位的州敷衍了事的致意，它也与共和党人的建议完全一致。在竞选演说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美国黄金供给枯竭是其政府高关税政策的灾难性结果，而不是系统性的货币障碍。可是，即使在罗斯福上任之前，他与少数亲密的顾问也在非常认真地考虑取消金本位制。

---

1. 杰拉尔德·福特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并在那儿生活了几周，但他从未当选总统。
2. 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Passion and Preference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the 1896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第29-30页中绘制了一张有用的州际图表。这一章借鉴了他的著作，以及R.哈尔·威廉斯的Realigning America: McKinley,Bryan and the Remarkable Election of 1896（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迈克尔·卡津的A Godly Hero: The Life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和卡尔·罗夫的The Triumph of William McKinley: Why the Election of 1896 Still Matter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5）。
3. “Ohio Democrats: The State Convention Declares for Free Coinage,”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25, 1896.
4. 1英亩≈4047平方米。——编者注
5. 有关布赖恩的追随者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已经激烈地争论了几十年。奥斯卡·汉德林在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者分发的反罗斯柴尔德和反夏洛克材料之间以及布赖恩在大会演讲中的基督教象征意义上得出了明确的联系，他的演讲题为“American Viewsof the Jew at the Ope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40, no. 4（June 1951）:323-344。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Vintage Books, 1955）一书中关注了进步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黑暗面。在The Tarnished Dream（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79）一书中，迈克尔·多布可夫斯基详细讨论了民粹主义意象是如何将犹太人作为放债人的现有刻板印象融合起来的（第170208页）。诺曼·波洛克在“The Myth of Popular Anti-Semit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 no. 1（October 1962）: 76－80中为布赖恩和其他人进行了辩护。
6. 希尔在“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Public Opinion 21（July 16, 1896）, 70中的引述。

7. Hofstadter,Age of Reform, 5–6.

8. “Republican Comment on the Chicago Convention,”Public Opinion 21（July 16, 1896）, 77.

9. Memoirs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Philadelphia: J. C. Winston,1925）, 115.

10. “The Convention and Candidate,”Minneapolis Tribune, July 11, 1896, 6. 关于自杀的判决没有出现在明尼苏达州历史学会数字化的报纸上。然而，Public Opinion 21（July 16, 1896）: 77中引用了这一观点。可能是此判决出现在此日报每周4份的某一天的报纸上了。

11. A. Scott Berg,Wilson（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13）, 129.

12. 詹姆斯·利文斯顿在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Money, Class and Corporate Capitalism 1890–1913（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详细阐述了“稳健货币运动”的政治意义。

13. Ken Coates,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reprinted edition of E. Tappan Adney,The Klondike Stampede（New York: Harper,1899）, xvi–xvii.

14. 黄金库存数据来自Friedman and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1。

15. 美国平民党（1891—1908）主张货币扩张和铁路由政府控制。

16. 罗伯茨的讲话在“Financial Law’s Results,”New York Times, May 18, 1900中被部分转载。

17. Henry M. Littlefeld, “The Wizard of Oz: Parable on Populism,” American Quarterly 16, no. 1（Spring 1964）: 50.

18. 参见Hugh Rockoff,“The ‘Wizard of Oz’ as a Monetary Alleg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4（August 1990）: 739-760。

19. 布赖恩（Bryan）和狮子（Lion）的英文发音很押韵。——编者注

20. Robert F. Bruner and Sean D. Carr,The Panic of 1907: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ket’s Perfect Storm（Hoboken, NJ: John Wiley& Sons, 2007）, 14.

21. “Biggest Gold Cargo Landed From Liner,”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07.

22. James Parthemos,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 in the Stream of U.S. Monetary Histo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Economic Review, July/August 1988, 25.

23. Carter Glass, quoted in Gerald T. Dunne,A Christmas Present for the President（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1984）, 7.

24. Speech of Hon. Elihu Root, The Banking and Currency Bill, December 13, 1913, 24.

25.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35.

26. Barry Eichengreen and Peter Temin,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9, no. 2（July 2000）: 184－185.

27. 尽管今天很少回顾当时的情况，但美联储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操作，企图通过市场运行改善当时的状况。1932年2月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要与两年后通过的同名法案混淆，该法案拆分了大银行），它赋予了美联储用黄金购买政府证券的权力，从而将黄金释放出来用于商业目的。例如，在4月中旬，美联储以这种方式购买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证券。但几个月后，美联储不再这样做了。它为什么这样做，经济学家已争论了几十年。

28. Stabilization of Commodity Prices: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on H.R. 10517 for Increas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rice Level of Commoditi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arts 1－2, p. 492.

29. Theodore G. Joslin,Hoover Off the Record（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1935）, 170ff. 数“小时”几乎可以肯定是夸大其辞。

第四章

告别金本位

POSTMASTER: PLEASE POST IN A CONSPICUOUS PLACE.—JAMES A. FARLEY, Postmaster General

UNDER EXECUTIVE ORDER OF THE PRESIDENT

issued April 5, 1933

all persons are required to deliver

ON OR BEFORE MAY 1, 1933

all **GOLD COIN, GOLD BULLION, AND GOLD CERTIFICATES** now owned by them to a Federal Reserve Bank, branch or agency, or to any member bank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Executive Order

FORBIDDING THE HOARDING OF GOLD COIN, GOLD BULLION AND GOLD CERTIFICATES.

This order and these regulations may be modified or revoked at any time.

THE WHITE HOUSE
April 5, 1933.

FRANKLIN D ROOSEVEL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sult Your Local Bank

GOLD CERTIFICATES may be identified by the words "GOLD CERTIFICATE" appearing thereon. The serial number and the Treasury seal on the face of a GOLD CERTIFICATE are printed in YELLOW. Be careful not to confuse GOLD CERTIFICATES with other issues which are redeemable in gold but which are not GOLD CERTIFICATES. Federal Reserve Notes and United States Notes are "redeemable in gold" but are not "GOLD CERTIFICATES" and are not required to be surrendered

Special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 the exceptions allowed under Section 2 of the Executive Order

CRIMINAL PENALTIES FOR VIOLATION OF EXECUTIVE ORDER
$10,000 fine or 10 years imprisonment, or both, as provided in Section 9 of the ord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3 2-16064

这张海报悬挂在美国各个邮局，以协助执行富兰克林·罗斯福第610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美国公民上缴他们的黄金和黄金券，每金衡盎司黄金可获得35美元补偿。大多数美国人遵守了规定。
资料来源：美国印刷局。

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在美国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通过之前举行。1932年11月大选之后的近半年时间对即将卸任的胡佛政府而言是一场炼狱，既痛苦又无聊。1932年末至1933年初是美国历史上

经济最为糟糕的一个冬天。美国各地的银行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闭，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在胡佛政府的最后一段时间，经济前景惨淡。尽管胡佛总统疲惫不堪、拼命工作，却几乎无法改变现状。他每晚睡大约三个小时，工作时“几乎不要命”。注

罗斯福的表现明显不同：果断行动，驾轻就熟。从某些方面来看，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制非常简单，以至于罗斯福在就职前，也就是1933年3月4日那个星期六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他在就职典礼上向美国人民承诺“一种充足但稳健的货币”。第二天晚上，罗斯福的密友亨利·摩根索和乔治·沃伦共进晚餐，乔治·沃伦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坐飞机从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来到华盛顿为罗斯福政府提供咨询。以农业为生的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重，在20世纪30年代初，农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将近2/3。农民及其社区像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时代一样绝望，他们迁怒于政治。当银行取消了农场的赎回权时，愤怒的农民经常一起出现在拍卖会上，阻止对资产的竞购，直到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和其他农业州允许农民延期付款。奶农们宁愿把大量的牛奶倾倒在街上，也不愿接受1美分1夸脱注牛奶的价格。沃伦坚信，提高低迷的农作物价格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取消金本位制，使美元增值。几个月来，罗斯福和他的团队一直与专家、拥护者和商人会晤，他们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当然，胡佛政府和几乎所有的美国金融机构都希望保持20世纪初以来共和党一直坚持的金本位制度。

在晚宴上，摩根索告诉沃伦，总统同意他的观点。当沃伦还是纽约州州长时，他就会见过总统。饭后，沃伦与新任命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罗斯福的顾问雷蒙德·莫利以及总统本人会面。罗斯福告诉他们，针对赫尔的前两项法案，首先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其次会发布总统授权，关闭银行，禁止囤积金银。总统在周一凌晨1点签署了一项法律——以免美国宗教界人士抱怨他在星期天签署了一项重要法律，宣布关闭美国1.8万家银行。然而，这并不是法案中

罗斯福及其团队感兴趣的部分，关闭银行和再融资的细节工作几乎完全由留任的胡佛助理处理。罗斯福关注的是黄金。沃伦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告别金本位制了”，在后文他补充说，总统“非常高兴”。[注]当然，在程序上或政治上告别金本位制都不是那么简单。废除长期实施的货币制度极其复杂，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或政治经验可以参考。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就承认了这一点，并在会上跟记者开玩笑说：“只要没有人问我们是金本位制还是以金为本，那就没关系，因为没有人知道金本位制或以金为本到底是什么。”美国取消金本位制，需要执行十多道立法和行政命令，罗斯福的智囊团在总统就职日对这些还不甚了解。罗斯福政府以惊人的速度禁止银行支付或出口黄金，废除私人和公共合同中的黄金条款，将黄金完全国有化并强制兑换黄金。结合其他措施，这些行动帮助美国摆脱了全球大萧条。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赞同本·伯南克的观点，这个蓄着胡须的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成了美联储主席，他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告别金本位制的国家比那些仍执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实现了经济复苏”。[注]

尽管这些行动极具戏剧性，并且看起来很果断，但它们都是临时性的或处置不灵活的，而且政治成本很高。在罗斯福新政关键的第一年，罗斯福政府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涉及商业合同中使用黄金条款的法律案件，他几乎使整个美国陷入宪法危机。他造就了一个永久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强烈反对他关于联邦政府的观点，并以金本位作为其核心象征，偶尔也陷入夹杂阴谋和仇恨的政治争斗中。此外，虽然众所周知，罗斯福成功地废除了白酒禁令，但他在那史无前例的货币行动中颁布了一项关于黄金所有权的禁令，这项禁令持续了40年。

国会在罗斯福执政第一周内通过的金融立法令人惊叹。它有两个重大目标，这两大目标即使在战时也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未经财政

部长许可，禁止开设银行，并建立一个系统，可以检查美国于3月6日星期一上午关闭的1.8万家银行的运营状况，并允许它们重新开业或重组。其次，它授权美国财政部长强制兑换“任何或所有……个人、合伙企业、协会和公司所拥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券”。总统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来维护这两项全面行动的权威。这项法案赋予总统包括管制金银贸易和囤积金银在内的各项权力。

从货币角度来看，禁止私人持有黄金是合乎逻辑的。过去几个月发生的银行挤兑事件表明，美联储不能真正控制美国银行系统。美国政府必须控制货币供给，否则便无人控制。关闭银行，但继续允许用黄金进行商业交易存在多种风险，包括把美国的大部分黄金从银行金库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者将黄金转到国外，而这些黄金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到美国了。后一种担忧真实存在；在此期间，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痴迷于储备黄金，将它在全球所占的黄金份额从1927年的7%提高到1932年的27%。

当然，美国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当时破产蔓延，许多社区只能通过匆忙制造的“临时凭证”或按个人存折总金额的折后金额进行交易才得以运转。选民们已经选举出了罗斯福和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这次选举的投票是472票对59票，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然而，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紧急银行法》应该受到广泛抵制，或者至少受到质疑。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为和平时期银行休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看起来令人生疑；1917年的法案反复提到“战争”和“敌人”，而它们在1933年貌似都不存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如果国会不配合他的计划，“我将向国会要求用最后一种方法来解决这场危机，即赋予我针对紧急情况发动战争的权力，就像我们被敌人入侵时那样”。但是，参照战时情况赋予罗斯福政府这种权力似乎至少值得被仔细审视。

毕竟，对于利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控制美国国家金融的做法，已经有了警告和抵制的记录。早在1932年，胡佛政府时期的财政部就曾考虑在银行休业和打击囤积黄金时援引这项法案，他的一名助手甚至起草了总统公告，这些公告与罗斯福后来发布的公告类似。（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第一任法律总顾问米尔顿·埃利奥特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保罗·沃伯格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中有意增加了一些措辞，授权总统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可以调查、监管或禁止某些金银交易。这正是因为“在未来某个时候，政府可能希望对黄金出口实行禁运”。）然而，胡佛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磋商，发现委员会大多数人不愿意支持这项措施。注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对他们的黄金政策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共同的概念。在罗斯福执政的第一周，他私下向记者们强烈暗示，这个国家现在不再是金本位制国家。然而，同一周，美国财政部长威廉·伍丁公开坚持相反的观点：“说我们放弃了金本位制比说我们放弃了货币本位制还要荒谬和具有误导性，我们采用的绝对是金本位制，只是目前暂时无法得到黄金。”话说回来，一旦确定美国确实取消了金本位制，美国公众也无法知道这种情况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在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罗斯福：“美国是否仍然希望回到国际金本位制？”他回答说：“当然，我们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整个世界重新回到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上。”这句话也是具有误导性的。注

类似地，罗斯福在任期刚开始的日子里，他和他的团队似乎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打算或者是否需要没收美国人的黄金。例如，提交美国国会的《紧急银行法》的最初版本没有要求个人将黄金上缴给美国政府，也没有赋予行政部门收集黄金和监测黄金未来使用的权力。相反，第一份草案允许在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属银行上缴黄金，并接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付款。法案草案规定，即便是这种相对适度的董事会权力，也只能在“五位成员投票赞成之后”行使。注让美联储掌管黄金，这与美联储董事会

3月8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所有联邦储备银行需要列出所有自2月1日起提取黄金而3月13日之前没有存回黄金的人员名单。

但是，当3月9日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时，议案被修改了；显然，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对议案做出的修改集中在关于囤积黄金的保护措施方面。在国会山，很少有人比自学成才的、曾任地方地产新闻记者的格拉斯更有金融头脑和立法经验。早在上一代人之前，他就在通过美联储议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1世纪，人们偶尔提到的由来已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拉斯拒绝了罗斯福让他做财政部长的请求，继续反对新政的大部分内容。几位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向他提出建议。格拉斯改写了该法案，使它适用于个人、合伙企业和公司；此外，新草案使得未来对所有黄金交易的监督成为财政部长的责任，而不是美联储的责任。[注]据沃尔特·怀亚特所说：“那天早上，当我们在格拉斯参议员的办公室时，某人要求我们改变这一规定，把要求向财政部长缴纳黄金的权力交给财政部。”[注]沃尔特·怀亚特当时正在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建议。似乎没有人记录“某人”是谁，以及为什么做出改变。

主要机构参与者之间无法就处理黄金囤积或美元贬值的最有效方法进行沟通，这是极不正常的。当美国财政部向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征求该委员会对黄金囤积立法的意见时，委员会主席乔治·哈里森表示，虽然现在为时已晚，但他更希望金条可以免税，“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囤积的黄金数量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到，现在的限制越少，以后就越容易确定国家的黄金政策”。一个月后，哈里森对美元贬值政策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他私下写信给财政部长伍丁，要求他解释此事。[注]（若要向罗斯福政府询问此事，伍丁可能并非最佳人选。）

这是美国历史上某一项最重要的金融法律匆忙而草率的立法过程的典型代表。罗斯福的顾问莫利在一本回忆录中指出：“在这么短的几天里，华盛顿的决定和行动接踵而至，直接相关人员如此之少，在

当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国会的行动如此迅速、没有经过论证，对这些决定和行动往往只有推测性的、粗略的记录。”[注]如果美国国会中有人认为政府过度扩张权力，或者认为采取另一种方法会更好，那么在官方记录中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与其说国会的行为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不如说国会表现得更像议会系统中的一个机构。众议院没有获得修改议案的权力。委员会没有举行听证会，也没有进行论证，事实上，议案甚至没有经过记名投票就被通过了，况且国会议员们很难讨论他们没有见到的议案。据报道，亚拉巴马州代表亨利·斯蒂高尔是唯一得到议案副本的国会议员，该副本上还有铅笔的标记；而对其他人则是大声朗读这个议案。尽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斯内尔最终支持了这项议案，他还是抱怨说：“据我所知，众议院通过立法时，议案还没有印出来，这实在不同寻常。”[注]根据莫利的说法，该议案“在众议院是用一份折叠的报纸来代表的，因为没有时间打印议案副本”。[注] 3月9日，国会两院在几个小时内批准了该议案，并由总统签署该议案。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提到了美国政府新获得的“对黄金的独裁统治”。

然而，随着禁止私人持有黄金政策的推行，罗斯福对于黄金的控制似乎并不是最有力的。一旦银行法及其各种修正案和扩展法案到位，而且随着春天来临，此前被关闭的银行恢复营业，美国联邦政府和银行就会开始一项巨大的、几乎滑稽的任务，即在几周内将美国私人手中的所有黄金集中起来。有记录表明罗斯福政府试图禁止和没收人们认为有用或令人愉悦的东西，这样的举措不够高明。就在几年前，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使用、制造和进口一切萨克斯，以此作为打击爵士乐——所谓的颓废和颠覆性力量——的部分措施，但这件事没有成功。无论是在胡佛执政后期还是在罗斯福执政的头几个月，都很难评估美国打击囤积黄金的行动是否比苏联政府禁止萨克斯的措施更为有效。

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可以用一个可靠的数字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人手中实际上有多少黄金。当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不具备把黄金作为投资的实力。许多人拥有的金币很可能是最近获得的；1931年9月，英格兰银行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之后黄金提款量急剧上升。1932年1月，胡佛政府估计有价值13亿~14亿美元的“隐性货币”囤积在个人手中，这相当于美国政府储备金额的30%。[注]如果把这些黄金囤积者比作央行，那么他们的储备是英格兰银行的两倍多，并且他们的储备比世界上除法国和美国以外的任何央行都要多。[注]胡佛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追回黄金，这个工作组由弗兰克·诺克斯上校领导，他曾是《芝加哥日报》的出版商。这份报纸警告经济困难的美国人：“囤积的金钱不仅不能再发挥其作为货币的功能，而且会破坏5~10美元的潜在信贷。”[注]至少在联邦政府看来，黄金流向个人的问题非常严重，它几乎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在1932年总统选举高峰期的一次讲话中，胡佛批评19世纪的美钞是民主党的“万灵药”，同时他也透露，他的财政部长告诉他两周内美国就会放弃金本位制，而这会导致混乱。胡佛的一位助理后来说：“这几乎只是几个小时的事。”[注]

几个月来胡佛的反囤积措施一直是温和的，但这个问题肆意蔓延，单靠一个特别小组无法解决，当囤积可能并非美国国内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时，就更是如此。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放弃金本位制；到1933年中期，在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只有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荷兰保持金本位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已经开始行使以黄金而不是美元偿还金融债务的权利。例如，在1932年春天，仅法国就从美国提取了价值约7亿美元的黄金，这相当可观，因为当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所有黄金的价值只略多于25亿美元，而且美国法律要求40%的货币由黄金支撑。胡佛采用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描述此事，即“金块就像散落在风暴中的大船甲板上的炮弹，到处飞来飞去，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注]

然而，现在美国政府有了一些手段来限制“炮弹”的使用，并且似乎许多美国人确实遵守了新法律。黄金的“囤积大户”无疑害怕公众曝光和罚款，而那些藏有少量黄金的人，很可能会被宏伟的美国国家大计吸引，支持罗斯福的复苏计划，不管他们是否同意或理解这个计划。当总统发布第一批命令时，大批人就带着一袋袋黄金出现在银行，等待银行赎回，据说第一周就收回了价值约2亿美元的黄金。3月11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声明：“据报道，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稳定的黄金流回银行。”芝加哥一位7岁的女孩凭着那个时代当红的女演员秀兰·邓波儿的敢想敢干精神，把一枚金币送到了白宫，说她“不想成为囤积者”。[注]

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密切关注着那些大额提取黄金的情况。有官员揭露了一些明显误导美国政府的行为；显然，大约有500人用虚构的名字提取了黄金。然而，对这些行为的起诉并不常见。1933年秋天，一位名叫F. B.坎贝尔的纽约律师被起诉，因为他试图取回他一直违法留在大通国民银行价值约20万美元的金条。坎贝尔在法庭上辩称《紧急银行法》是违宪的，但法官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坎贝尔的案子是个例外。总而言之，到1933年底，总检察长办公室只收到了二十来起投诉或起诉。[注]

很难说从1933年开始的强制兑换黄金的行动是否成功，部分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对内、对外公布的对黄金“没收”计划的描述是相互矛盾的。没有重大起诉可以被解读为美国民众普遍遵守该项计划，然而，美国政府有时又明确表示，依法追捕私藏黄金者是不切实际的，除非是追捕最大的私藏黄金者。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前参议员拥有价值120美元的黄金，该黄金的价值比法定门槛多了20美元，他借此嘲弄美国政府，让美国政府来追捕他。美国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向他保证，这么小的一笔钱不值得花费精力去追回。然而，5月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估计仍有价值约7亿美元的黄金和黄金券在流通，并且一直不清楚是否能够通过追捕最大的黄金囤积户来追回。[注] 6月初，

美国司法部称，它正在调查1万名可能的囤积者，这个数字迅速上升至1.5万人。卡明斯态度强硬："这些人都将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调查。所有的黄金都必须还给财政部，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我不能容忍那些公然藐视政府的人，而且我认为他们都是些无所事事的人。"接着，在8月份的时候，司法部长说，只有40个黄金囤积者无故拒绝交出他们的黄金，并且他们的财产价值只有40万美元。(注)据报道，当有人指责卡明斯虚张声势时，卡明斯回应说："我是在找黄金，不是在找受害者。"(注)

确切记录黄金的数目极其困难，这是美国政府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遇到的一个大问题。许多历史学家为一些狡猾的官方记录所欺骗。看看今天的官方统计数据，流通中的金币数量确实急剧下降，从1933年2月价值2.84亿美元下降到该年底的2 400万美元，下降了91.5%。但这些数字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起初，美国政府在1934年1月的统计数字显示，有价值2.87亿美元的金币仍在流通。但是由于在1934年之前拥有黄金是非法的，所以财政部和美联储决定，把这个数字算进去不再有什么意义。因此，它们把1934年1月的2.87亿美元降到零，并从1913年以前的所有数字中减去2.87亿美元。根据原始数据，流通中金币的总价值从1933年2月的5.71亿美元跌至12月的3.11亿美元，跌幅为45.5%。(注)

为什么要改数据？"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私人持有的金币已经变得非法，"美联储的一份出版物后来解释说，"但也有理由相信，私人手中计入的大部分金币实际上已经不见了或由旅游者带出了美国。"(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过去几年，金币的流通量明显被夸大了。报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为了收集金币而采取的举措以及自1933年3月6日以来为确保从私人手中收回金币而采取的举措表明，这种夸大成分还不小。"所以胡佛和罗斯福可能一直追寻的价值几千万或几亿美元的私藏黄金根本不存在，或者追寻这些黄金的举措可能把黄金赶出了美国，导致黄金"流失"。米尔

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所著的货币历史巨著指出，流失的价值2.87亿美元金币中的大部分“被非法保留在私人手中”。[注]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罗斯福和他的圈子里的人是否打算由美国政府无限期地管理美元的价值，并且由此永远禁止绝大多数美国人持有黄金。罗斯福总统援引《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来禁止黄金交易，宣布进入与战时状态相仿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然而，通常情况下，紧急情况会过去，比如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在休业几天或几周后就重新营业了。

但是，“没收”美国人的黄金是美国政府开始实施一个计划的先决条件，即美国所有的黄金国有化，对美元进行日常管理。在春季和夏季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行政部门几乎绝对控制黄金奠定了基础。没有许可证，黄金出口被明令禁止，美国政府宣布不会颁发新的许可证。现在，用于工业和艺术用途而非用来囤积的黄金需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在国会的一项联合决议中，一些要求用黄金偿付的合同条款被宣布无效，而此举可能造成严重后果。1932年，美国黄金产量约为210万金衡盎司，所有这些黄金现在必须以财政部确定的价格卖给财政部长。最关键的是，针对《农业法修正法案》提出的《托马斯修正案》赋予了总统这样的权力：只要他觉得合适，就可以固定美元兑换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价格调整的幅度最高可达通胀率的50%。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的、如此全面的货币控制。5月12日《托马斯修正案》通过，一位挺金派的罗斯福的高级助手宣布“文明终结”。[注]有些反常的是，这些补充措施比他们计划于3月9日实施的、覆盖面更广的法案引起了国会更多的关注和审议。即便如此，关于从美国货币体系中去除黄金的争论也相对较少，只有一位议员持不同立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路易斯·麦克法登提出了对罗斯福政府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许多成员的弹劾条款，理由是，他们不仅罪行累累，还“剥夺了美国人民的合法交易媒介”。[注]（麦克法登是个顽固的搅局者，他曾试图弹劾胡佛，但未能成功；他还指控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小团体

帮助了苏联革命。）总之，在西部那些鼓吹货币流动性的人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精神犹存；在这些人眼里，从美国的金融生活中去除黄金的措施被视为人类进步的伟大步骤。在针对合同中的黄金条款进行辩论时，民主党国会议员马丁·史密斯说："这项法律是另一个解放宣言，宣告了1.2亿美国人从奴役人类的、残酷的黄金枷锁中解放出来。"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代表了美国货币政策史上一次独特的、高风险的实验。一位经济史学家把从罗斯福就职至1934年1月这一时期称为"美国20世纪货币史上最复杂和最令人困惑的时期之一"。[注]在这一时期，罗斯福几乎没有得到传统人士的支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尤其是尤金·迈耶领导下的美联储，几乎反对罗斯福第一年出台的所有货币政策，尽管美联储并没有破坏这些政策。罗斯福自己的经济团队，包括几个来自胡佛政府的留任者，与总统渐行渐远，尤其是在7月份的世界货币会议上，当罗斯福明确表示他正在抛弃"所谓的国际银行家迷恋的老物件"，并且认为美元与大宗商品的关系比美元与外国货币的关系更重要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更疏远了。

罗斯福的计划重点在"管理货币"上，按照这种计划，美元的黄金价值将随着美国政府设定的价格不时地改变。这个概念不只引起了争议，按照历史学家埃里克·罗威所说，它变成了"罗斯福政府推崇的重要信条"。詹姆斯·沃伯格是罗斯福的长期盟友，他从未正式加入政府，他也无法忍受美元与黄金永远脱钩的想法。他找到一些盟友，希望和他们一起说服总统。其中一位是迪安·艾奇逊，这位才华横溢、任性顽强的律师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国务卿）。8月，艾奇逊告诉沃伯格，总统给了他一张"写有铅笔字的便条"，要求他试着以每金衡盎司28美元的价格购买新铸造的黄金，这意味着美元将大幅贬值。艾奇逊感到震惊，他不能接受《托马斯修正案》赋予总统支配美元价值的权力。艾奇逊认为，财政部只能以19世纪确立的每金衡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购买黄金。

艾奇逊认为他有法律支持，也有司法部长做后盾。他不仅拒绝改变，还担心美元贬值会违反美国对债券持有人的义务，因为财政部即将向公众出售自由债券。然而，对于总统来说，这样做并无用处，正如艾奇逊的传记作家所说："罗斯福想要别人告诉如何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告诉他无法做到。"注事实上，艾奇逊、沃伯格和美联储的反对未能阻止罗斯福行动。8月29日，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购买在美国开采的黄金，然后把它出售给获得授权的用户或卖给国外。出售价格将"等于世界自由黄金市场所能达到的最好价格"。面对媒体，财政部高阶官员坚持认为，逐步地把黄金国有化与降低美元的黄金价值无关，而且，允许黄金生产商获得较高的价格确实可以帮助他们。注随后市场对该政策有了反应，在一个原本不起眼的交易时期，黄金矿业股票猛然上涨。

9月7日，黄金生产商向纽约和旧金山的政府部门送去了约1万金衡盎司的新开采的黄金，政府第二天宣布了购买价：每金衡盎司29.62美元，比财政部支付金币的价格高出近9美元。当然，这并不是回到南北战争时代的黄金市场；只有黄金生产商可以出售黄金，而财政部是唯一的买家，财政部只能再卖给获得授权的工业用户、从事艺术品加工类用户或外国买家。尽管如此，但这是几十年来美国首次出现黄金市场，而且黄金的价格不可能再回到以前官方确定的价格水平，即每金衡盎司20.67美元。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公众心中有些困惑"，不太理解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如果说罗斯福的货币政策有一个不可逆转的时间点，那么这就是了；美国黄金生产商不会轻易接受恢复出口禁令，而且美元贬值的下行轨迹似乎与广受重视的商业好转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这只是黄金购买的第一阶段。到9月下旬，罗斯福和摩根索及其幕僚们已经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有些复杂的计划，通过这个计划，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胡佛政府为帮助陷入困境的银行而设立的机构——将发行短期债券以购买黄金，而美国财政部又反过来购买这

些债券。随着经济开始显示出比过去几年更强劲的增长动力，罗斯福知道他可以把这种新奇的甚至是激进的思想推销给公众了。在10月22日的第四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告诉听众，“可能有必要不时地控制国内美元的黄金价值”。他继续说，“我授权给复兴金融公司，它可以不时地与财政部长和总统协商价格并用该价格购买在美国新开采的黄金”。美国政府原本希望第二天开始购买黄金，但在细节上仍无法达成一致。这个计划故意遮遮掩掩、含糊不清，没有为美元设定目标价值，没有承诺在哪一天购买黄金，也没有宣布购买计划的最终时间点。

虽然罗斯福曾告知全美国，他将和财政部长一起制定黄金购买价格，但实际上健康状况不佳的伍丁并未参与，而且从总体上看，伍丁反对这个计划。这些决定是由摩根索（他将在11月中旬接管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席杰西·琼斯一起做出的，偶尔也有美联储成员参与，定价方法不够科学。“我相信我们是在星期五把价格提高了21美分的，”摩根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说：‘这是一个幸运数字，因为它是7的3倍。’如果有人知道我们通过组合幸运数字等方法来确定黄金价格，我想他们真的会害怕的。”(注)

起初，这项政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美国政府显然不受影响。10月25日，美国政府开始以每金衡盎司31.36美元（约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出27美分）的价格购买美国本土的黄金，这意味着1美元相当于66美分的黄金。但是美元在货币市场上的价值实际上上升了，这与美国政府的计划相反。这个计划的一个失误是最初决定只购买美国本土黄金。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是在国际市场上确定的，这些产品都是用外币购买的。因此，只购买在美国开采的黄金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因为美国财政部的购买不会影响海外的黄金价格。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几乎立刻意识到，只购买国内黄金的政策是无效的，他们也开始寻找购买国外黄金的方法。这项政策遭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抵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警告总统，

让美国政府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黄金可能会在国外制造麻烦。他还告诉总统，这项政策不会达到总统想要的目标。罗斯福坚持己见，10月30日，哈里森给长着络腮胡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打电话，诺曼对这个想法大发雷霆。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冒着使外汇市场混乱的风险，到另一个国家的市场上去购买它不需要的黄金，蓄意造成他国货币贬值，这将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注]双方的分歧很快消除，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将购买国外黄金（最终，美联储购买的国外黄金所占比例比美国国内黄金大得多）。尽管如此，如果白宫事先向真正的专家征求意见，它本来可以避免与美联储和他国央行的大部分或全部分歧，甚至连罗斯福的支持者也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多么不专业。沃尔特·S.萨兰特是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对罗斯福十分忠诚，在二战时期一直在行政部门任职。他在一段口述历史中说道："我认为，黄金政策最有趣的方面是物色懂黄金的人，而总统先生和他身边的人完全没有能力区分对黄金一无所知的人和那些懂黄金的人。"[注]

在黄金购买计划的三个月期限内，美联储在美国购买了69.5万金衡盎司黄金，总成本为2 3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了330万金衡盎司黄金，总成本为1.08亿美元。由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的黄金购买计划的目标十分模糊，所以很难评估它是否达成了目标。在最近的评估中，美联储官员肯尼斯·加贝德声称该计划"执行不当"，他指出了几个缺点。[注]首先，再次提升价格可能需要实际增加货币供给量，但美国复兴金融公司不是中央银行，它必须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购买黄金提供资金。其次，美国政府几乎在每个交易日都不断提高黄金的价格。很少会有只朝一个方向移动的真正市场，这种异常现象首先引起了国际市场投资者的焦虑，国际市场投资者担心美国的通胀会失去控制，接着11月份美国债券市场投资者开始焦虑。阿瑟·施莱辛格总体上对新政初期的情况表示同情，他写道："总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可以通过提高黄金价格来提高商品价格？答案是，不是太大。"[注]

但对罗斯福和他最忠实的顾问来说，货币管理计划中的任何缺陷都比不采取行动的代价要低。那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农业和棉花工人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罢工；在威斯康星州，在乳制品厂和乳酪厂门前集会抗议的工人中发生了爆炸，一名奶农被枪杀。10月29日一个阴沉的下午，罗斯福告诉白宫的一个小组："各位，如果我们继续一两个星期不在黄金问题上采取行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发生土地革命。"注

然而，每天制定新价格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美国政府开始寻找更现实的解决方案。他们突然想到了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然后把它作为"金本位"，这意味着美元可以以固定比率兑换成黄金，但除了极其富有的人以外，其他人都无法囤积黄金。新年到来的时候，这个想法变成了立法。1934年1月下旬，国会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该法案正式确立了前一年实施的各种政策。根据其条款，所有黄金必须以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上缴联邦政府，这比1900年制定的价格高出59%。大多数共和党人和银行家一直反对，但前一年的紧急行动已经使他们束手无策。在领导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整个过程中，罗斯福强有力的工作作风在美国经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色彩。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猛烈抨击了"那些不择手段兑换货币的人的行为，会在公众舆论法庭上受到指责，也会被大众排斥"，他认为他的黄金专政是按照伟大的民主党传统对银行阶级进行的攻击。他在给外交官爱德华·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自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以来，较大中心区的金融力量就掌控了政府。这个国家正在重演杰克逊与美国银行的战斗——只是这种战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注

1933年和1934年的金融改革史无前例，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金融界坚持认为美国人更喜欢"稳健的货币"，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安然无恙地接受了新的黄金秩序。1933年和1934年，那个时代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发表了几篇专栏文章来调侃金本位制，并支持

取消金本位制。罗杰斯写道：“自从后生们从小溪里淘金子，并把金子给他们的爱人，我们就以黄金为基础。然而，我怀疑这个国家20岁以下的青年人是否见过金币。我们的纸币上写着：‘用金子支付。’但是下面应该写上小写字母：‘你开不起玩笑吗？’”[注]执法人员很快意识到禁止黄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全新的工具。1932年，当查尔斯·林德伯格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被绑架时，这个被称为“20世纪美国头号大案”的案件吸引了美国上下的注意力。5万美元的赎金是用黄金券支付，而这些黄金券在墓地里几经转手，几个月后就变得非法了。1934年9月，在列克星敦大道和曼哈顿127街的加油站，绑匪布鲁诺·豪普特曼在用油泵给他的道奇轿车加油后，用一张业已违禁的10美元黄金券付款，警方因此接到了线报。

黄金购买计划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黄金的美元价值上升推动了美国的黄金开采业，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但或许会对此表示欢迎。1934年，美国黄金产量跃升21%，达到近280万金衡盎司，到1937年已超过410万金衡盎司。在整个西部，一些被废弃许久的金银矿区又变得热闹起来，（采矿）有时是有组织的公司行为，有时是个人独自行动。[注]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许多没有更好就业前景的业余矿工会驱车到废弃的金矿碰碰运气，一些矿工给这个时代贴上了“汽车淘金热”的标签。[注]报纸的头条新闻经常会夸大其词地报道发现黄金的离奇事件。受到这些头条新闻的鼓动，许多身强力壮的美国人愿意相信：黄金可能是他们的救星，黄金可以像拯救他们的祖父母那样也拯救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洲等地，仅在1933年就有至少10万美国人涌向曾经高产的矿区，希望这块土地能为他们提供美国经济无法带来的财富。唉，就像19世纪的“淘金热”一样，现实与淘金者的期望值相距甚远。一份政府报告估计，每20个“汽车淘金热”的矿工里才能有一人找到黄金，而且即使是成功者，他们的回报也微不足道。[注]淘金致富的梦想“幻灭很快到来”。报告总结说。

美国政府里的一些人也同样感到期望落空了，罗斯福的黄金行动带来的后果是痛苦的、长期的。大量的高阶官员和顾问与白宫分道扬镳，他们团结在黄金周围，形成了永久反对罗斯福的势力。

这些人组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他们在某些方面是重叠的），每个派别都提出了一个政治主旨，这些政治主旨存在的时间比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更长。第一个派别基本上是按照党派组成的，以反对罗斯福的黄金政策为中心，更广泛地攻击新政，并试图重新选举胡佛或其他共和党人为总统。从1933年秋天开始，胡佛和罗斯福曾经的盟友詹姆斯·沃伯格在芝加哥成立了包括桂格麦片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代表以及曾领导了胡佛的反囤积黄金特别工作组兼《芝加哥每日新闻》出版商的弗兰克·诺克斯在内的商界小圈子。他们积极向国会和公众宣传反通胀、反罗斯福的思想。注

第二个派别代表了经济学的正统派，包括美国银行业的大部分人以及经济学家，他们相信经济在金本位制下运行得最好这个原则。他们是19世纪“硬通货”思想的继承者，但是罗斯福果断地与黄金脱钩，这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和急待研究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立场还与商业周期和通胀理论的发展有关，当时涌现出几个经济学协会，如1933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的美国经济研究所。这些经济学协会把回归金本位制看作范围更大的保守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第三个派别渗入了美国政治更隐秘的角落。在民粹主义时期，一些反对东部银行精英的论点会时常流露出对欧洲人和犹太人的仇恨。虽然罗斯福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部的民粹主义者，但偏执和仇恨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把罗斯福作为目标，经常采用与共和党人和正统经济学家相同的观点，支持回归金本位，反对罗斯福新政。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一个个愤怒的个体，用极端的反罗斯福言论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例如，詹姆斯·特鲁曾经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广告部员工兼自由撰稿人，他在1933年7月开始销售《工业控制报告》周刊。此外，他在1938年出版了共有76页的

《黄金操纵与萧条》一书。注他也是一个邪恶的反犹太主义者，他谈道“罗斯福新政试图在美国强制推行犹太共产主义”，还声称他已经申请了一个警棍的专利，他称之为“犹太人杀手”。

在某种意义上，最后趋势是民粹主义中最卑鄙、最不可取的残余观念，而且它明显没有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样受到大众支持。然而，对黄金的政治认同及极端主义者（尤其是后来的孤立主义者）成为反对罗斯福的同义词，对罗斯福的反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将向反对罗斯福的人提供最强有力的语言武器。

---

1. Theodore G. Joslin, Hoover Off the Record （Garden City, NY: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1935）, 171.
2. 一夸脱=0.946升。——编者注
3. 乔治·沃伦的日记可见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他的论文集。这章参考了里克·罗威的著作The Money Makers: How Roosevelt and Keynes Ended the Depression, Defeated Fascism, and Secured a Prosperous Peace（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该著作第2章清楚地描述了罗斯福就任后的第一个周末，该书部分基于沃伦在华盛顿的访问。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沃伦的影响力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例如，托马斯·弗格森指出了一个代表标准石油和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ack）的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该利益集团被称为美国国家委员会，它支持了罗斯福1932年的竞选活动，并敦促撤销金本位制。参见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149－150。弗格森还指出了雷内·莱昂的影响，雷内是一位与罗斯福保持通信联系的证券交易专家。埃利奥特·A.罗森在他的著作Roosevel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Recovery（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中提出，早在1933年1月，雷内就向雷蒙德·莫利和罗斯福指出利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达到撤销金本位目的的可能性。见246n5。
4. Ben S.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a nd Banking 27, no. 1（February 1995）: 4.
5. 有关胡佛及其顾问关于将《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用于和平时期银行业目的的详细论述，参见雷蒙德·莫利的The First New Deal（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可在第157—160页中找到。其中一些记录见弗朗西斯·格洛伊德·

阿瓦尔特的“Recollections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3,”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3, no. 3（Autumn 1969）: 347－371。

6. 1933年4月19日罗斯福第13次新闻发布会。罗斯福新闻发布会的档案存在FRDL，其网址为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collections/franklin/?p=collections/fndingaid&id=508。

7. 法律草案参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DR Presidency, ed.George McJimsey（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3:33ff第6号文件。

8. 这篇报道来自1966年3月16日的一封信，此信是由美联储前官员沃尔特·怀亚特写给雷蒙德·莫利的，在莫利的著作The First New Deal中被多处引用。

9. Walter Wyatt, oral history,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86.

10. George Harrison to Arthur Ballantine, March 24, 1933; George Harrison to William Woodin, April 17, 1933. George Leslie Harrison Paper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ox 24,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11. Moley, The First New Deal, 154.

12. Congressional Record, 73rd Congress, 1st session, 76.

13. Moley, After Seven Year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9）, 152.

14. 胡佛在1932年2月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了14亿美元现金储备这个数字。目前尚不清楚该金额是如何计算的。美联储1932年1月的官方统计显示，价值1.2亿美元的金币和8.5亿美元的金券在流通（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1914－1941, part 1,p. 412）。其余部分可能是指流通中的3.99亿美元的银币和银券，也可能是以金条和金块形式估计的非货币黄金，又或者是美联储追溯修改了计算黄金价值的方式。

15. 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数字可见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1932, 647。

16. Herbert Hoover, “White House Statement About the Conference on the Hoarding of Currency,” February 6, 1932, onlin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3366.

17. Joslin, Hoover Off the Record, 170ff.

18. Herbert Hoover, “Address at the Lincoln Day Dinner in New York City,” February 13, 1933, onlin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3427.

19. File memorandum of White House letter to Gloria Bedrosian, April 7, 1933,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as President, Gold Hoarding fle, FDRL.

20. Memorandum for the Attorney General , “Gold Hoarding Prosecutions,” December 5, 1933.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as President, Henry Morgenthau Jr. Collection, Box 110, Gold fle, FDRL. 关于坎贝尔案的详细讨论，包括法官的综合裁决，见Henry Mark Holzer, “How Americans Lost Their Right to Own Gold and Became Criminals in the Process,” monograph no. 35,Committee for Moneta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c., December 1981, 12–15。

21. “Small Gold Hoard Will Be Ignored,” New York Times, May 5, 1933. 参议员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人查尔斯·托马斯。他的女儿伊迪丝后来因囤积大量黄金而受到调查。

22. “President’s Order Will Be Quick Means to Reach Hoarders, Declares Cummings,”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33.

23. Selected Papers of Homer Cummings,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1939, ed. Carl Brent Swishe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9）, 101–105.

24. 见表，“Kinds of Money In Circulation,”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August 1934, 517.

25. 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1914–1941, part 1, p. 522;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934, 67n2.

26. Friedman and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64n45.

27. Moley, The First New Deal, 302. 人们认为该引言来自罗斯福的华尔街盟友詹姆斯·沃伯格和预算主任刘易斯·道格拉斯。

28.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3, 1933.

29. Elmus Wicker, “Roosevelt’s 1933 Monetary Experi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7, no. 4（March 1971）: 864.

30. James Chace, Aches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65.

31. “See No Move to Cut Dollar,”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33.

32.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vol. 00（Farm Credit Diary）,November 4, 1933, 96,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collections/franklin/?p=collections/fndingaid&id=535&q=&rootco ntentid=188897#id188897.

33. Minutes of mee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New York Fed,November 2, 1933, George Harrison papers, Box 23,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34. Salant or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Deal: The Insiders Speak, ed. Katie Louchhei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1.

35. Kenneth D. Garbade, Birth of a Market: The U.S. Treasury Securities Market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237－242.

3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1933－1935（vol. 2 of The Age of Roosevelt）, reprint ed.（New York:Houghton Mifin Harcourt, 2003）, 240.

37.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October 29, 1933, 88.

38. Letter to E. M. House, November 21, 1933.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ed. Elliott Roosevelt（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0）, 373.

39. Will Rogers, “Complete Heads or Tails of the Gold Problem,”1934, reprinted in Will Rogers’ Weekly Article, vol. 6, The Roosevelt Years, ed. Steven K. Gragert（Stillwater: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2）, 78－80.

40. 为了简洁起见，作者省略了1934年美国《白银购买法案》的讨论，该法案与美国政府购买黄金的行为类似。有关此法案通过后的政治记录可见Allan Seymour Everest, Morgenthau, The New Deal and Silver: A Story of Pressure Politics（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0）。

41. 特别参见Charles W. Miller, The Automobile Gold Rushes and Depression Era Mining（Moscow: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42. Robinson Newcomb, Charles White Merrill, and O. E. Kiessling, Employment and Income from Gold Placering by Hand Methods, 1935－37（Philadelphia: U.S. Bureau of Mines and U.S. 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June 1940）.

43. 有关胡佛和沃伯格的成果的记载参见Rosen, Roosevel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Recovery, ch. 4。

44. 有关特鲁和他的活动最完整的记录见Donald Strong,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40（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79）, 124－128. 这是1941年美国公共事务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再版。

第五章

黄金弹药库



美国财政部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内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库，用来存放联邦政府自1933年以来“没收”的黄金。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金条和金库周围传奇性的安保措施数十年来激发着美国人的各种想象。
资料来源：国会图书馆。

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的司法部长基本上从未感到过轻松。1935年1月10日晚上，原本只是因为罗斯福最初提名的司法部长去世而临时担任此职务的霍默·卡明斯颇感焦虑。近3天来卡明斯和他的同僚筋疲力尽，他们一直在闹哄哄的最高法院对多个案件进行了辩论，他很在意结果。罗斯福新政对事关美国人民的众多的日常生活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此背景下这些案件——俗称“黄金条款”案件——并不特别为人所熟知或理解。比如说，相比几个月后所有大法官将一致判为违宪的美国《国家复兴法案》，黄金条款案件只是少数富豪的关注点。

但是卡明斯知道，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给他投了反对票，导致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很可能将美国推向另一个严重的经济萎缩期，就像开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到当前美国的经济还只处于缓慢复苏中。出于这个原因，卡明斯自上任以来第一次决定亲自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更糟糕的是，如果在黄金条款案件的判决上失利，无疑会令美国财政部损失史无前例的数十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也将失去用以刺激经济的资源，而这是大萧条后振兴美国经济唯一的希望。根据卡明斯自己的计算，如果法院维持合同中黄金条款的有效性，这将在美国已经担负的巨额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上再增添近700亿美元（此后的一些经济学家估算出的数目比700亿美元还要多）。这是一个几乎难以想象的数字，当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 000亿美元。9名大法官的投票将直接决定美国是否会面临拥有巨额债务的风险，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尽管面临如此高的风险，但美国政府在处理黄金条款的问题上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当美国政府第一次提议将美元与黄金脱钩时，基本上忽略了黄金条款，即便专家们对此进行了多次辩论。现在，卡明斯团队正在为他们的草率付出代价。来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问题不仅是质疑，而且是如一家报纸所说的，“来势汹汹”。

于是，卡明斯那天晚上回到白宫，将进展汇报给罗斯福及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他们正与罗伯特·杰克逊一起讨论税收政策，罗伯特·杰克逊是财政部的一颗新星，几年后他将加盟让眼前这些同事苦恼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克逊后来回忆说，罗斯福对败诉的后果表示深切关注，“同时很确信他无法接受不利的裁决”。注总统公然谈论是否有可能驳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几周之内，罗斯福甚至会起草一篇广播讲话，向民众解释为什么其政府必须罔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于是杰克逊这位法学院肄业但是城府很深、政治经验丰富的律师发表了见解。他说，最近他阅读了经济历史学家西德尼·拉特纳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即格兰特总统曾任命两名法官填补空缺，以推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定货币案中的裁决。两人讨论了增添法官的可能性，并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话题。罗斯福政府雄心勃勃的进步共和党人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赞许地写道：“司法部长甚至说，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反对罗斯福政府，（政府）应该立即增加大法官的数量，以使赞成派占多数。”注至少早在1932年的竞选活动中，罗斯福一直反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向共和党倾斜，而且已经有关于任命更多大法官的说法在流传，但这是第一次真正提出方案以达到上述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斯福将寻求国会批准，直接向美国公众呼吁，甚至在必要时关闭股市。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在可能导致美国陷入破产的黄金条款上以或许与美国宪法相矛盾而生出事端，那么罗斯福及其政府就准备增加大法官的数量。

至于罗斯福政府为什么会对黄金条款所代表的巨大问题后知后觉并没有什么更清楚的解释。至少这类条款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已经被使用。事实上，纸币的使用带来一个问题，即要求以黄金或白银支付的合同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68年裁定这些合同可

执行。[注]道理很简单：若有要求，债务人同意以黄金向债权人支付所欠的金额。这能够防止一切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在19世纪的后30年，农业平民主义、支持增加货币流动性和主张银本位人士的崛起导致许多人和企业寻求一种方法来使自己在特定情况下免受货币币值剧变之苦，比方说，万一类似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样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并履行其改变货币价值的承诺。

到20世纪30年代，黄金条款在住房抵押贷款和大宗生意中已经或多或少成为标准的合同要件。尤其是铁路公司几乎在所发行的债券中都附上了黄金条款；20世纪30年代初，铁路公司所欠的110亿美元债务几乎全部由黄金条款合同担保。许多公司的债券也使用了黄金条款；含有黄金条款的债券被认为风险较小，因此往往以低于无黄金条款的债券的价格发行。在1893年的经济恐慌之后，黄金条款成为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和共和党支持的“稳健货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时期，假如没有黄金条款，就不会有买家愿意购买美国债券。

联邦政府自己也使用过黄金条款。1910年，联邦政府开始要求未来所有发行的政府债券“应以美国金币支付本金和利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的自由债券以黄金支付，加强了黄金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纽带关系。与金本位本身一样，合约中的黄金条款在美国人心理层面占据了一席之地，货币领域与道德心理领域在此交汇。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黄金支撑的货币和合约中的黄金条款所体现的对黄金的青睐，“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思想、商业惯例和大众心理中。人们认为这是神圣的，对商贸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注]

当大萧条袭来时，许多黄金债券持有人和立法者开始担心，如果美国效仿其他国家废除金本位制，那么黄金条款会发生什么变化？回想一下，1932年10月赫伯特·胡佛对一位听众说，当年早些时候，财政部的黄金供给在两周内就耗尽了。一些观察家清楚地看到，如果美元贬值，合约中黄金条款的地位将很快陷入法律困境。要么债权人会

由于被迫接受贬值的美元而蒙受损失，要么债务人会因为必须支付所欠金额的最高黄金溢价而蒙受损失，但在做出最终判决之前，没有人会知道结果如何。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在公司层面，“不可能完全知道是拥有股票更好还是拥有债券更好”。[注]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肯定会减缓商业活动，如果案件需要数年才能得到合法解决，情况就更是如此。

一些时事评论员预见到了更为棘手甚至可怕的后果。虽然很少有人料到会禁止个人拥有黄金，但很明显，如果发生货币贬值，那么黄金就会变得稀缺。早在1931年和1932年，对黄金的需求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黄金正以比罗斯福政府估计的更快的速度从美国消失。因此，如果坚持黄金条款有效，私营公司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黄金来偿还其合同债务，这将引发大规模的止赎潮。想象一下州一级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在世纪之交至少有5个州通过了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个人是否有权要求以特定类型的货币支付合同。还有，国外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中也存在黄金条款问题。如果不支持金本位的国家的外国债券持有人不需要以黄金支付利息，那么怎样才能阻止他们以可能比美元价值更低的当地货币付款？如果美国政府用贬值的美元偿还债券，那么债券持有人是否有权起诉？在哪个国家的法院起诉？

1932年夏天，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梦”一词的首创者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警告说，美国政府不遵守黄金条款代表其“严重失信行为”。在《巴伦周刊》发出的深度访谈中，亚当斯预见到了罗斯福团队在制定有关黄金的早期计划时显然没有预料到的危机。“如果我们取消金本位，无论国会裁定黄金条款有效或无效，有关方面都将提起诉讼，最终将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注]亚当斯继续说，“鉴于所涉财产价值巨大，以及这样的决定会将财产从一群公民手中转移到另一群公民手中这一事实，这一决定可能是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决定。”

一些立法者试图慎重对待黄金条款这个严肃的问题。1933年2月，即罗斯福宣誓就职并且通过《紧急银行法》前一个月，艾奥瓦州的一名议员提出了一项废除黄金条款的法案。[注]然而国会领导人不愿在黄金条款问题上花太多时间，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废除黄金条款不符合宪法。相比之下，罗斯福及其大部分顾问在1933年4月之前似乎都没有讨论过黄金条款的问题，而一个多月前罗斯福宣布——至少是对其内部人士宣布——美国舍弃了金本位，国会已经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唯一关注过上述问题的人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的外部顾问，他出生于立陶宛，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萨克斯于2月份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事关美元贬值可能引发的“严重法律问题”；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阅读或思考过萨克斯的备忘录。[注]

5月份通过了《托马斯修正案》，它赋予了总统调控货币价值的权力，并使美元成为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但该修正案至少有两个漏洞：未能说明美元是否可用于支付当前的黄金条款合约的债务，以及黄金条款合约在未来是否有效。（奇怪的是，《托马斯修正案》可能无意中使菲律宾钱币也成为美国的法定货币。）为了填补这些漏洞，5月26日，国会两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除了现有的黄金条款并防止在未来使用黄金条款。该决议声明黄金条款违反公共政策，并宣布其无效。支持该决议的参议院报告平淡地描述了这个紧迫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拥有控制黄金资源的特定权力。”报告显然也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辩论中表明了立场：“黄金条款义务下的私人债务人有权得到保护，对其法律地位应做出迅速而明确的定义。”[注]

在随后的参议院辩论中，这些主张受到强烈的质询和谴责。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与19世纪的共和党参议员一样，对美国试图通过用纸币取代黄金来摆脱债务的主张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法案“背离”并打击了美国精神。“这是自我进入美国参议院以来最严重的国耻问题，”里德宣称，“我们正在告诉外国人民，美国神圣的承诺仅仅是一纸空文。国家尊严即将沾上我们100年也无法抹

去的污点……当未来几代美国人想到国会所做的事情时，他们都会面红耳赤。”(注)他和几位参议员都认为此法案是违宪的。

该决议得以通过。于是，正如预测的那样，很快就发生了诉讼。其中一些案件于1934年被提交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件分为三类：铁路债券案件——诺曼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公司，美国财政部黄金券的黄金条款案例——诺茨诉美国案，以及关于自由债券中的黄金条款案件——佩里诉美国案。

口头辩论于1935年1月8日开始。卡明斯竭尽全力再次描述1933年3月罗斯福政府执政时的绝望状态，那时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徘徊于混乱和崩溃的边缘。每天都有银行倒闭，价格暴跌、破产事件不断增多，数百万人失业，国际贸易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卡明斯告诉法官，在1933年，“人民的文明水平跌入低谷”。(注)

言及1933年的惨状不仅是为了解释罗斯福政府最初推出此政策是权宜之计，也是为了提醒，如果在一夜之间美国再增加6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将会发生什么。“即便是保守估计，灾难之巨大也超出一般的想象。这不是‘回归宪法’，而是‘回归混乱’。”卡明斯朗声说道。

卡明斯的开场辩论是罗斯福政府公开承认其急剧地改变了美国长期信奉的货币观念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这与总统在温暖的炉边谈话时做出的保证完全不同。“黄金不是普通的商品，”卡明斯透过他的无框眼镜凝视着法庭说道，“它是与众不同的东西，在我们的文明形式下，我们的整个金融结构和人民的福利都有赖于黄金。”卡明斯的观点是，黄金独立于货币，黄金是衡量货币价值的有力工具，而联邦政府拥有监管货币的宪法权力。尽管如此，他对黄金独特的历史性金融作用的渲染，肯定至少令部分听众做出了与他意图相反的抉择。卡明斯还详细阐述了类似诺茨诉美国案中的核心概念：美国有权调控货币价值，这是美国主权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坚持认为，这是美国宪法

制定者的明确意图，他们“煞费苦心地看到这种力量，就像剑的力量。主权的这个重要属性，应该属于国家”。

所有的法官似乎都对这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感到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共和党人哈伦·斯通发誓，他个人再也不会从“对其义务如此不守诚信的”政府那里购买债券了。首席大法官查尔斯·休斯大体上赞成政府监管而不是盲目反对新政，他谈到一个旨在为军队筹集资金的战争债券的案例。该战争债券承诺以规定的重量和成色支付一定数量的黄金。“我们有什么权力修改合同中的约定从而损害债券购买人的利益？”助理检察长安格斯·麦克莱恩回答说，国会有权决定合同中的货币应该是什么。蓄着白色八字胡须的休斯问道：“国会从何处获得的这个权力？”麦克莱恩的回答是：“宪法赋予国会制造货币并调节其价值的权力。”(注)美国政府为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的合宪性辩护时也这么说，但1935年的争议与1869年一样激烈。与前一次一样，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货币价值这一观念被指不仅唐突且有悖道德。

第二天，在一个有6位美国参议员出席的拥挤的法庭前，大法官均对美国政府的说辞报以大声嘲笑，这是罕见的失礼。皮尔斯·巴特勒向美国政府律师斯坦利·里德炮轰了一家报纸称之为“来势汹汹”的问题和声明。巴特勒怒喝道：“根据这一理论，国会可以在一角钱上印上‘一美元’，使它成为法定货币来履行黄金义务。那合同中的条款又有何用？不能有任何含糊。条款的目的是要求支付这么多黄金的。”(注)

自由派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通常是大企业的批评者，在3天的口头辩论中，他一反常态地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此后不久，布兰迪斯的朋友、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斯福的顾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遇见了布兰迪斯，询问布兰迪斯为何保持沉默，布兰迪斯回答说，他已经知道他的法律结论是什么，并且“完全出于对所出台的政策的同情，我认为最好什么也不说”。他补充说，虽然他认为该案在经济学

上“充其量只是令人怀疑”，但是“道德上是明确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恢复黄金条款”。注

出于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担忧，白宫在1月10日和11日考虑扩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不久之后，此想法见诸报端，它被解读为精心谋划的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警告。《纽约时报》于1月13日头版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报道，揭露“国会的一些主张增加货币流动性的人正在研究将最高法院的成员从9个增加到11个或12个的可能性”。虽然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但报道说：“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罗斯福总统必定会尽一切可能废止一项会破坏政府建立的新货币体系的决定。”注《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自上星期二黄金条款案开庭以来，在国会大厦、财政部和其他政府大楼的走廊里都能听到关于政府有意向最高法院塞人的消息。”《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基本上没有人公开发言，因为“显然在案件悬而未决之时，这样的谈论者会因藐视法庭被传唤”。尽管如此，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还是赞同报纸所谓的“无疑将会有一个计划”来增加联邦最高法院成员，以防裁决对美国政府不利。注

罗斯福还考虑了另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扰乱市场。在1月14日与摩根索共进午餐后，总统召集司法部长卡明斯加入他们，开始了摩根索所说的“我在华盛顿以来最不愉快的时光之一”。注罗斯福要求摩根索使用基于1934年《黄金储备法》设立的紧急财政储备——外汇平准基金这一新获得的权力，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决定之前尽可能地扰乱市场。“我希望债券上下波动，”罗斯福说，“唯一可以让出租车乘客对黄金案件感兴趣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故事放在报纸头版上。”总统不断寻求卡明斯的支持，卡明斯则同意他所说的一切。摩根索做出“在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艰难而激烈的抗争”。摩根索不仅从良心上反对总统的建议，他还认为这些建议具有破坏性。摩根索意识到，如果按要求以这种方式操纵市场，那么他必须辞职。他指着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您知道让这个国家摆脱萧条是多么困难，如

果我们让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在下个月受到惊扰，我们可能需要8个月的时间来收复失地。总统先生，请别让我这样做。”罗斯福回答说：“亨利，你只是对这件事的判断过于仓促。再想一想。”摩根索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觉得罗斯福总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我的建议或影响力是否会起作用”。

巧的是，市场已经对黄金条款案的不确定结果感到不安。就在1月14日那一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称“联邦专家”正在讨论联邦最高法院的不利决定是否会导致国会将美元的黄金价值恢复到早期水平。第二天，外汇市场交易活跃，美元意外上涨，而股票和商品价格下跌。交易员焦虑不安，而摩根索跟总统争议了一番后，对银行和联邦最高法院同样恼怒。“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到底与金价有什么关系？”他沮丧地问同僚。外汇平准基金运作的弱点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依靠国际银行买卖黄金及美元以保护美元的价值，但美国财政部无法阻止银行反向操作。“在我看来，这说明，当美国政府陷入困境时，国际投机者沽空美国政府以赚取小利，当有一点疑虑并且他们只是吃不准的时候，他们就恐慌了、胆小了，”摩根索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毫无胆量、毫无骨气、毫无原则。”

几天后，美国财政部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以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恢复黄金条款。(注)对黄金的进出口将立即实施禁运。美国政府可能无法避免联邦最高法院下达可以履行用黄金付款的合同的命令，但它可以通过拿走所有黄金来使黄金支付不可能实现。美国财政部提议“使黄金实际上成为违禁品，因此，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万一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强制履行以黄金支付的黄金条款，支付出去的黄金也可以被即刻扣押并返还给财政部”。

美国股市崩盘显然也是一种考虑。1月21日，摩根索打电话询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兰迪斯：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不利意见，詹姆斯是否会与他合作，关闭所有交易所从而避免造成股市崩盘？(注)兰迪斯同意了，摩根索甚至在内阁房间额外安装了一部电话，

以便在交易所关闭时可以直接打进兰迪斯的办公室。几天之内，匿名的消息提醒媒体，如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总统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依法关闭证券交易所90天，这似乎是传达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直接信息。注

美国政府面临着一项微妙的任务，它想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知道，政府总可以找到这样或那样绕开不利决定的途径。与此同时，太大的压力可能适得其反。在罗斯福政府担任过职务的华尔街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试图劝阻白宫不要使用太过严厉的策略。他写信给一位总统助理说："在我看来，应该阻止'罗斯福政府会力图推翻对其不利的判决'的谣言散播。显然，这对改善当前大法官谨慎探索的气氛没有好处。他们充分意识到最终在围绕法币案的长期、交错变化的斗争中白宫得到了支持，因此他们意识到政府确实有维持其立场的方法。"注

然而，如果罗斯福政府在这些案件中败诉，那么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没有时间采取行动了。罗斯福将不得不直接向公众讲话，解释为什么他的政府宁愿通过无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引起宪法危机。罗斯福的演讲稿非常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在于它展现了罗斯福为了向大众解释复杂、抽象的金融理念的不懈努力。他提出了一个假设的案例，假定一位投资者以1 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铁路债券，现在由于最高法院不同意国会废除黄金条款，这位投资者将能够从铁路收取1 690美元。"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获得意想不到的、不劳而获的利润不仅不合理，而且……这项决定的执法信函将自动使美国的每一条铁路都破产。"注不仅私营公司会受挫，许多镇、县和州也将被迫违约。

罗斯福还进一步指出，大多数抵押贷款都含有黄金条款。如果现在可以执行该条款，那么大多数房主每月的住房抵押贷款还款将立即上涨69%，并且还欠下了近两年的每月69%的逾期费。最后，罗斯福指出了黄金条款最荒谬之处：根本没有办法将1 690亿美元的合同全部用黄金偿还——地球上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美国总共有大约价值8.5

亿美元的黄金，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他地区——有价值不超过12亿美元的黄金。”罗斯福向或许比最高法院更有权的人民大众提出“上诉”，“我希望每个人或每家公司，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实质上偿还他们借来的钱。这似乎是一个更符合黄金律、更符合圣经箴言和常识指引的决定。”

这篇演讲稿最终未被启用，虽然当它被泄露给《纽约时报》时，该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写道：“自安德鲁·杰克逊谈及法庭裁决时说‘约翰·马歇尔做出了这个决定，现在让他来执行’以来，这将是美国宪政史上最具轰动性和历史性的一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月18日做出的裁决并未对经济造成大破坏，但也并不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论点。“佩里诉美国案的判决结果”是对美国国会行动和政府的法律论证的严厉谴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道，如果美国政府可以借钱，然后拒绝债券规定的付款方式，那么它同样可以拒绝还款。休斯的判决指出：“争议必然意味着，国会可以酌情无视政府的义务，并且当政府借钱时，美国的信用是一种虚幻的誓言。”[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裁定国会废除黄金条款“超出了国会的权力范围”。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裁定，原告不应得到损害赔偿，因为如果他持有等价的黄金，他就没有遭受损失，也就不会因债券而有所损失（重要的是，反正他不能再合法地持有黄金）。即使是对结果感到满意的法律学者也不能认可该判决的逻辑。托马斯·里德·鲍威尔说这个判决“几乎难以理解”。备受尊敬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亨利·哈特也宣称它“令人费解”。许多评论员得出的结论是，休斯完全清楚，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试图恢复或执行黄金条款，美国国会和政府将被迫寻找其他可能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来实现必要的目标。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最先提出这种看法，他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与罗斯福的圈子交往很多，但常令他们恼羞成怒。李普曼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意识到自己的合法地位正处于危机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任何其他决定都会造成一种进退维谷

的局面，”李普曼写道，“国会将被迫采取措施以规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会严重损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注

不出所料，对上述裁决持异议者步步紧逼。首席大法官休斯猛烈抨击其“没收财产权和否认国家义务”。他们宣称国会废除黄金条款的目标是非法的，其“真正的目的不是‘确保美国硬币和纸币的统一价值’，而是破坏某些有价值的合同权利”。麦克雷诺兹脱稿做了一篇“充满蔑视和愤慨”的即兴演讲。当他嘲笑裁决的逻辑性时，人们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伟大国家的财政部说道：‘拿着贬值的美元走吧，国会认为你们接受应得的东西是非法的。’因为它是非法的，所以你们得不到损害赔偿。”他引用尼禄的话做总结，“怎么高估今天在这里所做出的裁决的后果都不过分。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宪法已经不复存在了。”注

白宫却是一片欢庆。为了在必要时关闭股市而设立的电话中继系统用不着了。罗斯福向几位亲密的顾问朗读了他的电台广播讲话稿作为模拟庆典。午饭后他宣布要睡上4天。罗斯福写信给乔·肯尼迪说：“多么幸运，交易所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们差点因一个‘J. P. K.’落款的签名而关闭。同样，美国永远不会知道它错过了多么精彩的时刻，那就是，如果判决的结果不同，那么‘总统’准备在星期一晚上发表一场精彩绝伦的广播讲话。”注

几个月之内，黄金条款案件将成为法院所驳回的新政的一部分。在货币政策方面，罗斯福和国会多数派几乎已经实现了他们所期望的所有目标。一些学者指出了美元贬值的不幸后果，例如，它具有自动提高贸易关税的保护主义效应。注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要想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同时不屈服于来自西部的国会议员、激进农民游说团体以及像考夫林神父那样的民粹主义者提出的大力增加流动性和铸造银币等更激进的要求，那么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政策是少数几个可行的选择之一。

然而，在政治上，一堵墙已经被建立起来了，这堵墙不仅将那些主张金本位者与其反对者隔开，也把那些相信黄金在美国私人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和将在20世纪主宰生活的政府和货币机构分离开来。“黄金投资者”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无法行使购买金币或金锭这样看似不错的权利，这使他们在法律和政治领域处于弱势，同时这也表明此时他们在罗斯福政府处处碰壁，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黄金条款案件的声明使他们更加绝望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黄金政策方面也渐行渐远。虽然美国公民无法拥有黄金，但美国政府正在积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黄金储备。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联邦政府黄金持有量的价值；与此同时，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的恐慌使得大量黄金流入美国，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在别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可能认为，在战争中持有黄金是可取的。然而，在失败的前景下，将黄金储存在美国以换取黄金券，一旦战争恐慌平息就可以兑换，这样做似乎更安全。即使法国，这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维持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也放弃了大量的黄金。许多富裕的法国公民担心左翼政府未来的货币政策。仅在1934年和1935年，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价值就增加了60多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的增值是黄金价格上涨至每金衡盎司35美元造成的。到1936年，美国黄金库存价值超过110亿美元，超过全球黄金总量的一半。

虽然增加美国境内的黄金数量有明显的好处，但黄金的流入也造成了一系列经济问题。1940年，两位经济学家出版了《金色雪崩》这一有影响力的书，书中认为黄金过剩损害了美国经济。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资金来获得一种金属，这种金属没有像生产性活动那样创造经济利益，更具体地说，过剩的黄金造成了至少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于黄金再次成为货币的代名词（就算是间接的），货币供应的突然增加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美联储颁布了一项政策，即从1936年底开始，冻结从国外流入的黄金和美国国内

新生产的黄金，或者不让它们进入货币供应市场。然而这样做造成了美国的经济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导致了自1937年春季开始的经济衰退 ——大萧条的第二阶段。注

第二个问题是物流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可能爆发战争，摩根索和其他人都意识到，大量的黄金需要安全存放在某个地方，纽约和旧金山等沿海城市很容易受到攻击。现在就要说到黄金和美国军方之间的另一层关系了：财政部控制了肯塔基州的一个曾经是骑兵驻地的军事基地——诺克斯斯堡，并开始在那里匆忙建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金库。诺克斯斯堡大约在路易斯维尔西边31英里处，坐落在落基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是一处相当安全的地方。1935年，美国政府开始向肯塔基州运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条，这些金条大部分是从旧金山运来的。诺克斯斯堡于1937年启用。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且很难解决。涌入美国的黄金必然是其他地方（主要是西欧）流出的黄金。即使大多数国家不再采用金本位制，但在对德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大时，耗尽这些国家的金库意味着它们的资本越来越少。自1935年起，罗斯福政府在国会通过的各种中立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力支持英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拒绝支持英国，为了安抚他们，罗斯福假意表明要夺取英国资产和清算英国在美国持有的证券。这给关键时刻的英美关系带来了压力。在1940年全年，英国官员一直告诉摩根索主持的财政部，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满足支持其货币的法定要求。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罗斯福警告美国人，说英国的战争也是美国的战争。“我们必须用我们所能控制的能源和物资生产武器和船只，”罗斯福在他最著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宣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弹药库。”

但建立民主国家的弹药库需要资金，而英国不再拥有资金。罗斯福愿意为英国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但后者必须付费。如果英国付不起，就需要临时开出交换条件，例如用美国超期服役的驱逐舰换取

美国军舰进入英国基地的权利。有时美国只需收回英国欠美国的债。在发表“民主国家的巨大弹药库”这个演讲的前一周，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驶往南非，运回价值5 000万美元的英国黄金，摩根索甚至希望英国人支付保险费。这对英国来说是莫大的羞辱。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想告诉罗斯福，后者表现得像“一个收走可怜的债务人最后资产的警长”，不过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说这种话。新年前夕，巡洋舰已经在途中，丘吉尔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信，恳求罗斯福重新考虑。丘吉尔写道，在开普敦的一个码头上，停着一艘装有英国黄金的美国军舰，这“将扰乱这里和整个英国的公众舆论，还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他们会宣称你要派遣军舰来拿走他们最后的储备”。[注]国会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此法案允许美国以实物的形式支援盟国，只要它们以实物偿还。丘吉尔将这项法律称为“史上最道义的法案”，它帮助盟军渡过难关，直到美国在珍珠港被炸后正式加入战争。

这些战时的现实状况——美国黄金供应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以及盟军难以偿还的战争债务——将深刻影响黄金在战争结束后对世界货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变成了世界上的黄金垄断者和警察——谴责其他国家从“错误”的来源地购买黄金。轴心国通常会从它们已经征服的国家手中夺取黄金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随着战争即将结束，黄金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形式。1944年，摩根索宣称美国不会承认被掠夺黄金的所有权转移，并敦促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

1944年7月，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以尽早结束战时的混乱，40多个国家参加了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它们对这个世界有许多愿景，包括美联储在战争结束时提出的建立国际黄金交易所的想法。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根据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实力来对货币进行估价，同时实行集中管理的全球银行将控制信贷并发行被称为“bancor”（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的全球货币。以哈

里·怀特为首的、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谈判团设想了另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仍将发挥核心作用，美元也将发挥作用。(注)虽然在很多方面，凯恩斯的计划可能更优越，但其实施仍然存在两大障碍。首先是这需要世界各国央行将大部分或全部黄金上交给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它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也情有可原（苏联——隐秘的黄金生产大国——特别不愿意同意这一条款）。其次，凯恩斯体系的拥护者不太具有国际影响力来实施它；同盟国破产，它们或多或少对美国负有债务。如果萧条造成了对灵活性和通货膨胀的需求，那么持久而昂贵的战争就会造成对稳定和增长的需求。此时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在货币问题上投靠美国，就像曾在军事上那样。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技术上并不是金本位，它通常被称为黄金交易标准或黄金可兑换标准。其核心是美元可以完全兑换成黄金，价格与1934年相同：每金衡盎司35美元。其他各种主要货币都被分配了一个票面价值，可以有1%浮动，更大的升值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两个主要机构之一（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美国不会干预外汇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出现赤字的成员国出借或出售黄金和货币。该系统存在缺陷，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讨论。但是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有效促进了经济稳定扩张。西欧国家和日本连续多年经济大幅增长，没有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或艰难持久的繁荣-萧条周期。1985年，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40年后（并且其最基本的构建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一位经济学家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实际商品产量增加了4倍，世界上真正的商品贸易增加了6倍。尽管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从1950年的约22亿增加到今天的45亿，但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注)

然而，在美国国内，事关黄金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政策仍然像在19世纪后期那样，并不总是得到广泛认可甚至理解。大多数美国人在战后富裕起来，但是有心怀不满的一小撮人——主要但不全是共和党人

（共和党自1933—1953年都未能入主白宫），他们认为这种增长是虚幻的，是“由战争支出、铺张浪费、有计划的突发事件和战争危机造成的”。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和花销，马歇尔计划、《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以及朝鲜战争中的耗费等令这种情况持续发生。赤字和债务激增至以大萧条前的标准来看绝对是令人震惊的数字。20世纪40年代中期，胡佛所宣传的平衡预算和稳健货币的财政保守主义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许多人担心它会永远消失。在这个群体眼里，让一个无力支配自己资金的国家来替那些更贫穷的国家掌管世界资金，似乎是一个再愚蠢不过的行为。

但是，尽管债务、赤字和政府规模等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对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来说至关重要，但货币的定义已经不再像世纪之交那样举足轻重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考夫林神父继续倡导白银货币，但是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电台节目停止播出，其影响力逐渐减弱。在华盛顿，要求购买规定数量白银的联邦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来自西部的国会议员。至于黄金，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来主张回归金本位制，因为罗斯福已经用贬值了的美元把美国重新置于一种金本位制——这成为保守主义攻击的更大目标。1944年的共和党纲领模糊地承诺“维持美元的价值”，并“废除现行立法赋予总统对货币的不必要权力”，但丝毫没有提及黄金。尽管黄金具有象征性的力量，但黄金本身对美国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1942年10月—1945年7月，美国关闭了所有的金矿——总数超过8 000家。在此期间，一些金矿塌陷或积满了水，采矿设备老化，因此即使恢复生产，产量也远远达不到战前水平。一位矿业官员在二战行将结束时感叹道：“如果公民被剥夺了黄金作为财富的个人保障，如果他只听说国库里或中央银行有黄金，那么他怎能不抛弃目前他认为黄金对人的心理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呢？”注

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麦克雷诺兹大法官所拥护的哲学观点开始演变为一种新形式的民粹主义。正如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一

样，它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农业区。但与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宣扬通货膨胀是一种解决方案；相反，通货膨胀现在被视为敌人。罗斯福通过使美元贬值，使其变得“一文不值”。在这个问题上，华尔街和许多大企业的人，以及为美国中西部农民说话的人，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抽象的全球经济秩序。因此，黄金不像布赖恩认为的那样是邪恶的根源，反而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中一位唱反调的人是连续三届担任内布拉斯加州国会议员的霍华德·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的父亲，后文简称“老巴菲特”），他所在的州与50年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代表的州接壤。滋生于孤立主义土壤的民粹主义者长期以来对欧洲金融大师和战争持怀疑态度，所以老巴菲特认为，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对美国自治的侵犯。在反对1945年的立法时，他和一位同事这样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世界性的机构将篡夺进行国际贸易和商业往来的社会和私人职能，并因此取代在这些领域的现有的权威。”老巴菲特和俄亥俄州的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坚持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国将向其他国家移交“操纵黄金价格的权力”。他们坚称：“这似乎是明显违宪。”[注]这当然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它引起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共鸣，也明显地与美国金融界的观点相吻合，美国金融界有很多人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希望重回美国式的金本位。

老巴菲特说出了让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原因：黄金不再是美国公民可以持有并且可以作为货币的东西了，巨大的黄金产量似乎只是为了取悦外国。在一篇刊登在1948年杂志上的文章中，老巴菲特写道：“尽管在诺克斯堡埋藏了大量黄金，但黄金却不是提供给美国公民的。它们可以全部被运出美国，而没人能够阻止那样做。”来自内华达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乔·麦卡锡的盟友——呼应了老巴菲特对美国囤积黄金的不信任感：“我们不知道财

政部打算用这么多黄金做些什么。它从未表明过意图，据我所知，它从未制定过关于这些黄金的政策。”[注]

正如早期的黄金民粹主义者以他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恐惧为论点，例如，纸币代表了魔鬼，或者说通货膨胀必将是毁灭性的，老巴菲特和他的盟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可怕的冷战为新论点。老巴菲特认为，除非美国恢复经济秩序并恢复金本位，否则它将被敌人吞没。老巴菲特在1949年说道：“实现‘繁荣’的最可靠办法就是让印刷机开始印钱。”[注]在另一场合他宣称，纸币“是比苏联军事力量更令人恐惧的敌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

这些绝非老巴菲特的口头禅，他推崇务实。1948年，老巴菲特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欲将美国重新纳入金本位的法案。它试图“恢复美国人自由拥有黄金和金币的权利，将国库的控制权交还给美国人，抑制美元进一步贬值”。[注]纽约的丹尼尔·A.里德和缅因州的罗伯特·黑尔也在类似时间提交了相关的法案。老巴菲特还支持通过非立法努力重返金本位。国会1934年通过的《黄金储备法》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漏洞，其中一个涉及处于“自然状态”的黄金，也就是说，从自然界中找到的“没有被熔化、熔炼、精炼或通过加热、化学或电气工艺处理过的”黄金。当财政部颁布实施《黄金储备法》的规定时，它允许收购和运输这种天然黄金。[注]不仅以这种形式拥有黄金是合法的，而且财政部不得购买这种形式的黄金，比如说非洲裔美国作家和活动家杜波依斯在1934年试图向财政部出售西非金块就没能成功。[注]这也意味着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法定金价并不适用于此类黄金。天然黄金能够以买方和卖方商定的任何价格进行交易。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家来自里诺市的“美国黄金公司”宣布了一种新颖的、以天然黄金赚钱的、表面合法的方法。该公司在主流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每金衡盎司51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黄金。经过几回此类销售后，黄金价格降至每金衡盎司42美元。但运输金块的业务很烦琐；一位购买了1 000金衡盎司黄金的宾夕法尼亚州买家不得不横穿

整个美国以取得这些黄金。“美国黄金公司”的创始人L.克利夫兰随后设计了一个方案：卖家将黄金放入仓库，然后仓库发行黄金仓单。该收据可以作为由黄金支持的有效货币，但不能兑换为黄金。克利夫兰告诉记者：“收据或许不是法定货币，但任何拒绝它的买卖人都是愚蠢至极。”

老巴菲特对此表示赞同，说到底他是奥马哈杂货商的儿子，而且他曾公开反对罗斯福的第三届任期。[注] 他称赞该公司发现了一个“模糊地带”，黄金支持的纸币可以合法地在这个地带中运作。此外，老巴菲特认为黄金定价的实验也很有价值，因为美元的波动将不可避免地淘汰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老巴菲特于1948年表示：“有很多专家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太严重，因而黄金价格无法维持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水平。我认为我们仍有50%的机会维持这个价格，所以我在草案中加入这样的条款。但这个价格水平将来可能不得不改变，而且美元的黄金含量确实下降了。”[注]

“美国黄金公司”和其他公司似乎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取得了一些成功。美国财政部在1948年和1949年对黄金卖家进行了特别的调查，以确定以这种形式高价出售了多少黄金。估计每年出售了25 000~30 000金衡盎司黄金，而美国每年开采的黄金数目基本在200万金衡盎司左右；大多数天然黄金来自阿拉斯加。[注]尽管看起来克利夫兰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在每次交易中他都收取每金衡盎司1美元的中介费，他也希望恢复美国的黄金市场（这是黄金开采业管理人士共同的立场）。他希望，如果一位共和党人于1948年当选总统，那么他的黄金仓单计划可能会被用来推动美国回归日常的金本位货币体系。

然而，20世纪40年代后期呼吁回归金本位的活动几乎没有得到白宫的任何支持。1948年7月，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杜鲁门总统询问将美国恢复到金本位“作为对抗通货膨胀的手段”的立法情况时，杜鲁门模糊地回答说，美国“一直是金本位”。他接着说：“我们拥有的黄金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政府都多。”记者不依不饶地说：“只不过，

先生，我不能换1美元的黄金。”杜鲁门回答说：“你是不能，但你的美元得到了黄金支撑，这就是好处。”㊟

1949年，麦卡伦参议员提出的黄金合法化法案已经达到听证会阶段。受战争影响关停并处于缓慢恢复期的黄金开采业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对它们来说，新近活跃的“天然黄金”市场代表了一个应该逐步放开的领域。纽蒙特矿业公司总裁小弗雷德·瑟尔斯在证词中指出了天然黄金市场与官方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天然黄金市场，黄金能以任何商定价格成交，而在官方市场，黄金只能以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政府。㊟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瑟尔斯向委员会展示了他花4 100美元购入的“100金衡盎司天然状态的纯金”。他估计自己已经以这种形式出售了大约1万金衡盎司的黄金，但卖不了更多，因为“买家——他们中有很多人——担心财政部会再次改变规则”。㊟

瑟尔斯及其买家无疑是对的。1950年6月，财政部澄清了其规定：天然黄金只能由开采的人出售，任何二次交易都是非法的。这实际上是将“美国黄金公司”和相关公司排除在这一业务之外。

显然，任何恢复私人可以合法持有黄金的努力都需要美国政府的支持。曾经有人尝试过让黄金问题成为总统竞选活动中的一个议题。老巴菲特式的对大政府和军国主义的蔑视并不仅限于民主党人。1952年，老巴菲特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有史以来最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总统提名者”，并表示提名艾森豪威尔“将意味着共和党遭到破坏”。具体来说，老巴菲特指控艾森豪威尔授权建立苏联集中营。老巴菲特在1952年春天写道：“战争刚结束几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已经批准并签署了一项命令，将数十万联邦德国平民送入苏联服苦役。”㊟“只要这项无情的行动一败露，就会让共和党失去足够的常规选票，令共和党在11月选举中失败。这还只是艾森豪威尔不光彩的历史之一。”

老巴菲特参与了艾森豪威尔的竞争对手罗伯特·塔夫脱的竞选工作，当年罗伯特败北，该党保守派中的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威是叛逆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损害了党的价值观”。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塔艾之争及其余波“为1964年保守派正式接管共和党奠定了基础，这样的情况时断时续持续到20世纪末”。(注)

然而，当时黄金未成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奇怪的是，1952年总统竞选中最明确倡导金本位的是相对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史塔生，曾任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在20世纪中期一直是总统候选人。史塔生1952年的竞选纲领倡导“美元坚挺的现代金本位制”，他在演讲中指出，金本位可以用来制约过度的政府支出和通货膨胀。史塔生还说：“如果美国人坚持认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应该有权利将纸币换成金币，或将金币换回纸币，那么他们就能让政府保持纸币的合理状态。”但史塔生的追随者不够多，所以此问题未能成为总统竞选议题。

下一章将讲到艾森豪威尔在经济中对黄金几乎没有起到作用。而塔夫脱对用黄金支撑美元的观点表示支持，并且也知道这会获得部分选民的支持。然而，他意识到若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是得不偿失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风险太大。例如，塔夫脱曾拒绝在1944年共和党纲领中加入金本位的要求——即便华尔街要求这么做。他的经济理由是，“金本位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停下来解释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我们将用什么数字来确定美元的价值”。他的政治结论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注)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20世纪50年代，人们想要赶走老巴菲特和与其持有相似观点的“刺头”，而且这也不那么难。老巴菲特在华盛顿官方圈子中并不受欢迎；当他在1948年失去国会席位时，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称他为“一个经常胡言乱语的顽固保守分子”。老巴菲特知道他提出的黄金改革政策没多少人支持。他经常说：“我

就像个1月份在奥马哈卖割草机的人。”如果承诺恢复金本位可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那么赶走他们还是有理由的。但老巴菲特和其他批评者至少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从中长期来看，布雷顿森林框架是不稳定的，当它开始瓦解时，诺克斯堡的所有黄金都无法支撑它。

---

1. Robert Jackson, That Man: An Insider's Portrait of Franklin D.Roosevel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9. 杰克逊关于1月10日讨论的描述有一处显著不同。他说那天晚上他跟总统说起了西德尼·拉特纳的文章《格兰特总统填塞了最高法院吗？》［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5, no. 3（September 1935）:343-358］。然而，考虑到该文章的发表日期以及文章第一段中提到了1月之后发生的几个事件的事实，有两种可能：杰克逊已经看过了拉特纳文章之前的草稿，或者更可能是杰克逊搞错了日期，以为文章在谈话之前就发表了。然而，杰克逊似乎不太可能完全杜撰这一事件，特别是因为哈罗德·伊克斯的日记也指出，罗斯福在1月10日也与他讨论了法院填塞计划。

2.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53）, 273－274. 又见威廉·洛克滕堡“The Origins of Franklin D.Roosevelt's 'Court-Packing' Plan”一文［The Supreme Court Review（1966）: 347－400］。洛克滕堡没有提及杰克逊和拉特纳扮演的角色，但他的文章是在杰克逊遗失了的回忆录之前几十年发表的，洛克滕堡为该回忆录写了一篇序言。

3. Bronson v. Rodes 74 U.S. 229（1868）.

4. Marian McKenna, 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e Great Constitutional War: The Court-Packing Crisis of 1937（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49.

5. Roy L. Garis, "The Gold Clau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January 1933）: 221.

6.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Gold Clause Would Probably Be Upheld by the Supreme Court," Barron's, August 22, 1932.

7. H.R. 14604, 7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introduced by Rep. Ed Campbell.

8. "Fourth Section of Analysis of Proposal for Devaluation of the Dollar（draft）," February 8, 1933. Papers of Alexander Sachs,Container 98, Gold Clause file, FDRL.

9. Senate report no. 99, 73rd Cong., 1st sess., reprinted in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vol. 6（June 1933）.

10. “Senate Repeals the Gold Claus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33.

11. 卡明斯口头辩论的摘录参见Selected Papers of Homer Cummings,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1939, ed. Carl Brent Swisher（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9）,112－120。

12. “Hughes Assails Repudiation of Gold Payment,” Chicago Daily Tribune, January 11, 1935.

13. “Justices Quiz Lawyers on Gold Clause,” Chicago Daily Tribune, January 10, 1935.

14. Melvin I. Urofsky, “The Brandeis-Frankfurter Conversations,”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 1985（1985） : 337.

15. “Capital Debates Gold Issue; Justices Confer for 5 Hours,”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1935.

16. “Talk of Packing the High Court if Gold Case Loses,” Chicago Tribune, January 13, 1935.

17.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January 14, 1935, 3:98.

18. Memorandum prepared by Parker Gilbert, January 17, 1935, reproduced in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3:146-151.

19.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January 21, 1935, 3:190.

20. 例如，《纽约时报》写道：“昨天纽约金融界人士了解到，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尚未正式考虑一旦最高法院对黄金条款做出不利决定就关闭证券交易所，但它已做好这样做的准备。”“SEC,With Power to Close Stock Exchanges, Is Ready to Do So on Adverse Gold Decision,” February 2, 1935。

21. Alexander Sachs to Marvin H. McIntyre, January 31, 1935, Alexander Sachs collection, Box 98, Gold Clause file, FDRL.

22. Franklin Roosevelt, “Proposed Statement: Gold Clauses,”February 18, 1935, Speech file microfilm, FDRL.

23. Perry v. United States, 294 U.S. 330（1935）.

24. Walter Lippman, “Today and Tomorrow,”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0, 1935.又见David Glick,“Conditional Strategic Retreat: The Court’s Concession in the 1935 Gold Clause Cas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 no. 3（July 2009）: 800-816. 关于美国政府与黄金条款案件纠纷的精彩记录可见Jeff Shesol, Supreme Power（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ch. 6。

25. 麦克雷诺兹的长篇大论未在任何地方记录在案。报纸的记述略有不同。“Constitution Gone, Says M’Reynold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9, 1935.

26. Roosevelt to Joseph P. Kennedy, February 19, 1935, in F.D.R.:His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 ed. Elliott Roosevelt（New York: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8-1950）, 1:455.

27. “罗斯福时期过于充裕的流动性带来了苦果。在没人想要借贷时，它增加了信贷；在极少人想要美国产品时，它改善美国的外贸形势。充其量只是让国内价格稳定不上涨。债务人和小生产者并未受益。大财团也没有受到惩罚，只是受到了惊吓。相反，价值几乎减半的美元将关税提高了近50%（通过汇率的变化），从而加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壁垒。”Paul K. Conkin, FDR and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1967）, 44-45。

28. Allan H. Meltze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Volume 1,1913-1951（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504ff.

29. Winston Churchill, Their Finest Hour（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 2:573-574.

30. 关于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形成有一些详细的记载，可见Rauchway的The Money Makers，相关内容从第10章起始。还可见Benn Steil, 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John Maynard Keynes, Harry Dexter White,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 Robert W. Oliver, Bretton Woods: A Retrospective Essay（Santa Monica, CA: California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85）.

32. 1952年美国共和党纲领。

33. Francis H. Brownell, Hard Money（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4）, 13.

34. 7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R. 629, May 30, 1945.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to Accompany H.R.3314, Minority Views of Hon. Frederick C. Smith and Hon. Howard H. Buffett, 111-120.

35. “McCarran Asks Free Market Again in Gold,” Reno Evening Gazette, May 6, 1949.

36. “Fort Knox Gold Hoard Can Lead to Ruin, Says Buffett,”Omaha World-Herald, March 24, 1949.

37. 8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H.R. 5031.

38. United States Treasury Department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Issued Under the Gold Reserve Act of 1934, January 30 and 31, 1934,section 19.

39. US Treasury Department Mint Service to Lillie Mae Hubbard, October 16, 1934, http://credo.library.umass.edu/view/pageturn/mums312-b072-i237/#page/1/mode/1up.

40. 欧内斯特·巴菲特制作了数以千计的贴纸，上面写着“我反对第三届”，而且以成本价卖给1940年订购这些贴纸的个人和组织。关于该运动的回忆见Bill Buffett, Foods You Will Enjoy: The Story of Buffett’s Store（self-published book, 2008），119-121。

41. “‘Goldbacks’ Back,” Sunday (Omaha) World-Herald Magazine, August 29, 1948.

42. 美国财政部关于自然状态黄金的估算来自Minerals Yearbook1950（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Mines），561。

43. Truman press conference, July 22, 1948,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index.php?pid=12965.

44. “Searls Unites With M’Carran in Gold Fight,” Nevada Mining Journal, May 20, 1949.

45. 8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on S. 13 and S. 286, May 5th and 6th,1949. Searls’s testimony is on 79-94.

46. Howard Buffett, Washington Report, May 8, 1952, Nebrask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47. Michael Bowen, The Roots of Modern Conservatism: Dewey,Taft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Republican Party（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6.

48. Robert A. Taft to Winthrop Aldrich, July 5, 1944, The Papers of Robert A. Taft: 1939–1944（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7.

第六章

失去平衡



这件金鸡摆件重14磅，由艺术家弗兰克·波尔克设计并于1958年用纯金铸造而成，人们用它来宣传内华达州的一家赌场。在出现国际收支危机后，联邦政府不顾一切地实施了黄金禁令。联邦政府收缴、查封并最终归还了这件金鸡摆件。
资料来源：科达伦艺术品拍卖行。

1960年初夏，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紧张局势升级，伦敦黄金市场却始终风平浪静。自17世纪初以来，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交易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没有显著变化（二战迫使伦敦黄金市场关闭，但1954年3月又开始运作）。交易员们大声嚷嚷或是用手指比画，这是很多发达国

家首都黄金市场的境况，有些市场已经推出了电子股票，但伦敦的黄金市场仍然具有庄严的私人绅士俱乐部的感觉。这个地方是一间里外都镶嵌了木板的房间，房间里挂着油画，是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定价室”。它位于在中世纪伦敦就有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以9世纪撒克逊主教的名字命名，离英格兰银行只有一栋大楼的距离。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30分整，来自不同银行和矿业公司的5个人将在这间小屋确定当天世界大多数合法市场的黄金价格。

鉴于全球最大的黄金持有者——美国政府——以每金衡盎司34.9125美元买入黄金，并以35.0875美元卖出，黄金价格波动很小，日常波动通常以便士或更小的单位来衡量：“交易所理事长报出以先令和便士甚至1/4便士为单位……选择交易双方可能成交的价格。”[注]5位代表随后宣布他们是否打算交易，并在当天的剩余时间开展业务。在“定价”的时候，某些日子当天90%的交易很可能马上就能完成，而其他的日子可能只有10%的交易能立即完成。这是一种最典型的英国绅士式的交易方式，交易所的气氛如此融洽以至让人感觉像是交易对手事前已经相互协商好了的；它甚至缺少一种必要的方法来处理买卖双方的不平衡。例如，如果有人想买100根金条，但某一天只有50根金条要卖，那么50根金条会在买家之间平均分配，否则价格可能会提高——这完全取决于坐在房间里的人想要什么。英国本土及国外的商家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和电报接订单，但金条和金币确实是在罗斯柴尔德的办公室里直接换手的；伦敦市场引以为傲的是，5个参与者中有两个真正参与了黄金的熔炼和提纯。

这种有序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仪式自1954年以来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乎没有中断过。这种连续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多少资金直接参与到伦敦黄金交易市场。每天的大部分交易都涉及各国央行或大型商业银行，它们把金价推高、压低；私人持有黄金的市场正在增长，但增长态势温和。尽管伦敦黄金市场比其他黄金市场都要大，但与大的股票或债券市场相比，实际换手的数量仍然非常少。事实上，在1960年上半年，伦敦黄金市场的每日交易额约为几百万美元。

但是，1960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想买黄金的人非常多，从而打破了一个几百年来盛行的老式体系。8月24日，伦敦黄金市场的金价达到35.13美元每金衡盎司，交易量创下1954年黄金市场重新开盘以来的最高水平。上行趋势继续，到9月中旬，价格达到35.24美元。打个比方，按照这个价格，位于苏黎世的人可能会认为，以法定的35.0875美元从美国购买黄金并支付运费，要比在伦敦购买黄金好。仅仅几美分的差异对美国政府和世界经济秩序而言都是危险的。

是什么导致黄金价格突然上涨？价格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为所有的玩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创建了透明度。然而，在战后的伦敦黄金市场，几乎没有参与者可以知道谁买谁卖，或者为什么买卖。有些增加的需求是结构性的，反映了欧洲各国政府日益繁荣昌盛，这些政府利用日益增长的部分外汇储备来购买黄金（通常是依法购买）。瑞士银行法规的最新变化可能也鼓励了一些买家在伦敦购买黄金，以节省佣金。从供应方来看，苏联和南非的举措可能加剧了这次的黄金价格攀升，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市场上出售黄金，但在1960年夏末停止了出售。不过，很明显有些黄金买家对美国经济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经济在艾森豪威尔任期最后一年的春天已经正式进入了衰退期。美国人在美国持有黄金是非法的，但他们并没有被禁止在国外购买和拥有黄金。华盛顿忧心忡忡，据估计，多达70%的黄金市场活跃度的提高是由美国人引起的，无论这些人是在国外生活，还是在美国生活却在海外购买黄金。注

与这一观察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市场波动源自政治，尤其是与前路茫茫的美国有关。在竞争激烈的美国总统竞选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波动迅速呈现出与竞选相关的特点。人们担心，新总统希望刺激低迷的经济，他可能会因此采取激烈的举措来重新评估美元与黄金价格的关系，这样一来，1960年夏天购买的1金衡盎司黄金可能会在1年之后变得更有价值。目前虽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当时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或他的竞选班子打算采取这样的政策，但是民主党人已经对高利率表现出不满。理论上，肯尼迪有关刺激经济的言论意味着

美国政府将增加支出，这反过来会迫使黄金重新定价。在市场引发的因果循环中，不管这种想法是真是假，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黄金价格继续上涨。肯尼迪私下告诉同僚，他认为敌对的银行势力在故意散布有关黄金的谣言，阻挠他的竞选活动。注

一根金条在伦敦的交易桌上换手，其价格会提高几美元，为什么这对数千英里之外的美国总统竞选很重要？这是因为，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实体都多，但它现在并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价格上涨得越高，美国用完现有黄金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在1960年夏天之前，白宫没有密切关注伦敦黄金价格的起伏，但它非常清楚高风险的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早在1956年就明确了“国际收支赤字”。20世纪中叶的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实际损失了大量黄金。在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期内，美国的黄金库存的价值为200亿~220亿美元，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战后的繁荣时期，随着美国进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其他国家和境外公司迅速增持美元和美国证券，这些资产代表了潜在的、应立即兑现的黄金兑换凭证。黄金兑换凭证的总金额从1949年约80亿美元增加到1953年底127亿美元，再到1956年底接近165亿美元。因为联邦法律要求大约一半的黄金储备用以支撑美元，这意味着如果所有的外国债权都被同时兑换成黄金，美国将无力支付所有的款项。通常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经济末日。

然而，现在由于黄金市场价格上涨且显然无人能够阻止其价格攀升，原本虽令人担忧但是仍可控的、如涓涓细流般从美国流失的黄金，如今看来宛如一场洪水。1958年，实际流出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20亿美元，这一数字震惊了华盛顿。但是，伦敦市场的需求激增使得1958年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1960年9月中旬，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库存的价值在一周之内下降了超过1.8亿美元，这是自大萧条初期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注 11月的黄金流出量价值略低于5亿美元；12月初的一天，英国提出赎回价值5 000万美元的黄金。

美国官员眼睁睁看着金价不断上涨，却无能为力、焦虑不安。10月19日，离总统大选只有3周的时间，当时的交易非常疯狂，一位交易商称之为“非常疯狂的市场”，没有人能确定最高价是多少，有人估计是35.60美元。第二天，伦敦的黄金交易额猛增至2 000万~2 500万美元，是夏末本已高企的黄金交易量的4~5倍。那一天的价格创下前所未有的每金衡盎司40.60美元，为投机性购买推波助澜。那天早上，当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大部分货币黄金都存放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办公室时，“所有的警钟都响了”。[注]疯狂的华尔街银行家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要求加大支持美元的力度。英格兰银行一般不愿意干涉私人市场，现在也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英格兰银行出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包括从南非新开采的黄金，及其储备资源中的黄金，以期压低价格。美国政府可能也想这么做，但是显然，即使抛售了金库里的黄金、稳定了市场价格，美国的情况也会因为黄金流失变得更为糟糕。至少一开始，美国官员甚至无法获得关于英格兰银行黄金销售的基本信息（包括销售量以及如果打算销售，目前还储备了多少南非黄金等）。英格兰银行礼貌地告知美联储官员，它和它的竞争对手——众所周知的、神秘的瑞士银行一样，对这些信息严格保密；即使是议会也无权知晓。甚至几个月后，在美国正式认可英格兰银行干预黄金市场措施之后，美联储从英格兰银行的一名官员那里收到了关于伦敦黄金市场的数据，这个通风报信者在进行日常的电话交谈时用暗语透露了信息。[注]

10月25日，金价仍高于37美元每金衡盎司，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与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艾森豪威尔在简要介绍市场情况时提出，既然联邦德国欠美国一个人情，或许可以劝说联邦德国在伦敦出售黄金。他要求两名美国财政部高阶官员于当年秋天访问联邦德国时着手处理此事（尽管这个提议会带来各种糟糕的牵连）。[注]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大家的担心，即金价不断上涨的“心理因素”将迫使美国支付大量黄金。

然而，在他们忧心忡忡的时候，共和党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黄金挤兑可能会帮助他们在这场看起来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参加了黄金战略会议，并积极为尼克松副总统的竞选阵营提供咨询。(注)因此，这个问题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冒了出来。就在金价飙升至每金衡盎司40美元以上的那一天，尼克松警告一些经济学家说："在我看来，崇尚低息贷款的教条主义者上任高官职位，可能会引起一场愚蠢透顶的、不必要的黄金危机。"对此，肯尼迪开玩笑说，尼克松"指责我，说我提高了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价格。尼克松先生，如果你在听的话，我向你保证那不是我干的"。(注)

就连对尼克松的竞选团队毫无热情的总统，也试图把黄金危机变成共和党的选票。艾森豪威尔出席了10月下旬为增加尼克松的选票而举行的竞选活动，他对费城的民众说，欧洲媒体将金价上涨归咎于"对低息贷款和激增的支出越来越害怕的心理"，而低息贷款和激增的支出是民主党派提出的政策。(注) "如果这些承诺得以兑现，"艾森豪威尔继续说，"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地位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和他们的政党不仅要对目前危险的黄金投机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而且要为人们对美元未来价值的日益担忧承担全部责任。"

11月9日，也就是在肯尼迪获胜的第二天，安德森给艾森豪威尔看了一些数字，情形不容乐观：美国持有的黄金的价值多年来首次跌破180亿美元，其中价值120亿美元的黄金需要用作准备金以保证货币可信及正常流通，价值95亿美元的黄金用于外部需求，理论上这些需求随时可能出现。在看了20个国家要求兑换黄金的清单之后，安德森直截了当地告诉艾森豪威尔："我们几乎陷入了'谈金色变'的境地。"(注)

事实上，尽管许多金融界人士对黄金和收支危机感到真正的焦虑，但选举结果不太可能发生太大变化。毕竟，肯尼迪发表了一项坚定的声明：“如果当选总统，我不会让美元贬值。”这项声明安抚了市场，并将政治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十分具有影响力，选举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些人仍用党派政治术语解释这一局面，唤起人们对胡佛在罗斯福面前相形见绌的回忆。国防部长盖茨表示“担心总统的个人立场。如果这项指令成为重大议题，肯尼迪参议员会认为这个议题对他自己有很大的好处”。盖茨将这种情况与1933年银行歇业进行了比较，并表示：“民主党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里用上这剂兴奋剂。他们将指出民主党如何不得不纠正本届美国政府的错误。”[注]

就艾森豪威尔而言，政治上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与他无关。关于黄金的话题已经被讨论了很久，看上去他对任何可能的前景都感到厌烦。例如，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一次美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回忆说，1953年他上任后不久，就召集了一些经济专家就黄金的可兑换性提出建议，但他发现他们给出的答案并非他所需要的。艾森豪威尔回忆道：“他们只会说，总统应该为此祈祷，因为没有人真正意识到黄金在本质上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吃，不能用它建造什么东西，也不能用作子弹。”[注]现在，在剩下的任期里，他似乎对乌托邦式的修正更感兴趣。1960年11月，他向一群顾问表示，美国拥有价值约210亿美元的精炼铀和钚，或许这些有价值的元素可以用作黄金的替代品。[注]这项提议遭到了礼貌的驳回。

尽管使用放射性材料作为货币储备的想法似乎很奇怪，但美国政府确实觉得有必要采取大胆的行动。在选举之前，对于黄金市场的动荡，美国政府没有公开回应或许是有道理的，但金价维持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以上的时间越长，其无所作为的风险就越大；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黄金挤兑。美国政府必须做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什么并不重要。1960年12月，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一

次从未公开过的秘密会议上对同僚们说：“6个月前，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谈这件事，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现在这件事是头条新闻，唯一能让人们对当今世界恢复信心的举措就是让他们坚定地感觉到，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问题。无论做什么都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正面影响。”[注]

然而，许多正在被考虑的短期补救措施要么已经试过，要么可能加剧危机，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例如，防止这类灾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20世纪50年代时仍在扩展业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正是用于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悄悄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申请了大量的黄金“贷款”。1956年初，美国财政部曾安排从该基金购买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注]国会、新闻界或金融市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笔交易，它很容易引发一场风暴，使金融市场上的美元贬值。在1959年9月和10月，财政部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那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增加每个成员国对基金组织贡献的配额，6月份的时候，它曾要求美国从其黄金储备中提交价值3.44亿美元的黄金，这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财政部对于拿出这些黄金持谨慎态度，因此它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买回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并小心翼翼地使这笔交易看起来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的想法，目的是增加其投资基金。现在，也就是1960年底，总统竞选结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密安排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

采取长期政策可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减少或取消25%的货币由黄金支持的要求，这个办法得到了华尔街的声援，尤其得到了摩根担保信托董事长亨利·C.亚历山大的支持，华盛顿十分关注他的观点。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减少大规模的海外（特别是驻守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部署海外军事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传统。在国外部署数十万军队及其家属带来了

很大的国际收支问题，因为它涉及在国外花费数十亿美元。当然，更广泛的经济战略，像吸引更多的游客到美国（让他们在这里消费）和增加出口，也会有所帮助。但是，这些重要项目都要假以时日，也需要与国会合作，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然而，当1960年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两个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是在美国和其他大型经济体之间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君子协议”，以阻止伦敦市场的剧烈波动继续蔓延。起初，英美之间于10月下旬采取了协定的形式，英格兰银行根据需要干预伦敦黄金市场、压低价格，而美国则用自己的黄金予以偿还。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些国家的央行同意不在伦敦市场购买高于一定价格（即美元卖出价格加上运费，约35.25美元）的黄金，这样就不会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投机现象推波助澜。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伦敦市场，伦敦一家黄金市场公司在196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央行在当年年底“几乎停止”购买黄金。[注]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美国黄金库存的流出问题，毕竟，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各国央行优先购买黄金的动机。充其量，它只是把购买黄金的地方从伦敦市场转移到美国财政部所谓的黄金窗口。1961年初，当联邦德国和荷兰都重新估价本国货币时，一场货币战争催生了购买黄金的热潮，美国黄金库存在一周内流失了价值约5亿美元的黄金。[注]

有必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1961年末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多边协定，另外6个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同意加入英美协定。它们承诺向英格兰银行提供价值1 000万至3 000万美元的黄金支持，向市场出售黄金，使黄金价格保持在35.25美元每金衡盎司这个危险点以下。

“黄金总库”的建立非常成功，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所指出的，它改变了伦敦市场的假定性质。过去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持有黄金的交易场所，现在成了一个由英格兰

银行有效控制的市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该银行也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第二，（黄金总库）从未有过书面协议，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黄金总库没有正式的签约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签署——没有条约，没有执行协议，什么都没有。的确，同意黄金总库协议的央行行长最初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保密。毫无疑问，这种彻底的非正式形式反映出各国政府难以对黄金总库的条款迅速达成政治共识。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一把双刃剑，非正式的协议使人们加入协议容易，退出协议也很容易。实际上，黄金总库建立后不久，它的“精神”就受到了威胁。

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解决国际收支危机采取了许多短期策略，在这些短期策略中，最容易或最具有说服力的策略就是堵住黄金禁令留下的最大漏洞，即美国公民可以在国外购买和持有黄金。正如1933年最初的黄金禁令并非罗斯福政府的一个特别目标一样，也没有迹象表明迫使美国人出售在美国境外持有的黄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在1960年底，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阶官员（包括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就这一措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们意见不一、明显缺乏可靠的信息。他们无法回答有关政策制定的基本问题——有多少美国人在美国以外持有黄金？在这个群体中，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而非海外？伦敦市场波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些群体造成的？他们持有的黄金总价值是多少？

例如，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一位财政部官员声称，伦敦黄金市场的一位参与者估计，有30%~40%的交易来自美国人，尤其是密尔沃基市、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他的一位同僚反驳说，通过研究，他怀疑美国对黄金市场的参与“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参与”，尽管他闪烁其词，认为如果30%~40%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它肯定是来自瑞士银行的不透明的订单。第三位官员说，伦敦黄金市场70%的交易量流向了居住在美国以外的美国人（这个数字似乎让他的上司、财政部长安德森感到惊讶）。另一些人则担心美国人在加拿大借入巨额资金，然后在加拿大购买并持有黄金，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右翼得克萨

斯州通讯作家丹·斯穆特为了个人利益而推行的。斯穆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几年来他的活动都是由哈罗德森·拉斐特·亨特[注]资助的，因此他可能引起了白宫官员的极大关注。

艾森豪威尔财政部、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层官员都无法提供一个可信的数字，说明美国人在国外拥有多少黄金，这种现象凸显了一个潜在的重大政策问题——可执行性。美国政府如何制定允许私人可以拥有黄金的政策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共和党政府走上一条连罗斯福政府都认为不明智的道路似乎特别奇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弗兰克·索瑟德曾在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财政部工作，并参与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谈判，他恳求美国政府否决禁止在国外持有黄金的提议："如果找不到证据，就不能提起诉讼，也不能执行法律。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即使在最大胆的新政时期，都没有提到必须这么做。"

与此有关的担忧是，相对而言，美国这样的国家几乎不会有意对公民如何投资或非公民如何在美国投资加以控制。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挑出一种资产并对其施行海外禁令的做法似乎过于随心所欲，并且存在道德风险。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或一家美国公司想用美元在伦敦股票市场购买股票、在瑞士银行开一个账户或者投资南美洲的房地产，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把同样的资金用于购买那些国家持有的金条则是非法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设想毫无意义。

这项政策的制定者主要关心的是国际货币的稳定，所以相对而言，他们很少考虑侵犯人权的问题。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又一次限制。"但他接着又说："也许只涉及得克萨斯州的富人。"即使《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反对扩大黄金禁令，它也只是从金融纪律和国际市场的信号两个角度阐述了相关论点，而不是把扩大禁令作为侵犯美国公民黄金所有权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注]

1961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自6月1日以后，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美国国内或国外持有黄金用作投资是非法的。每个人，包括那些支持行政命令的人，都认识到有更多、更广泛的问题需要新政府来解决。“我们希望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把这个问题放在他的议事日程的首位。”《纽约时报》的社论如此记载。它称赞艾森豪威尔“堵住了黄金外流”。注

然而，并非每一位即将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官员都认为黄金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头等大事。新当选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一位顾问抱怨说，艾森豪威尔的官员仍在干预一些事务，这些事务最好留待权力移交之后解决。他特别指出，财政部长安德森曾经“看起来对金价暴跌的情况感到非常困扰”。注但是在几周之内，肯尼迪政府将陷入同样的困扰之中，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困扰。

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大部分地区似乎都沉迷于黄金。可以说，美国政府越是公开表示担心黄金供给，并采取措施延长黄金禁令，公众就越是对黄金着迷。1958年秋天，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为了庆祝公司成立50周年，打算制作一个实物大小的、纯金的牙轮钻头，仿造的是老霍华德·休斯用来钻探石油的第一个牙轮钻头。这件雕塑需要2 400金衡盎司黄金，他们通过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的办公室向财政部提出了申请，但遭到了拒绝。

黄金在市场营销和大众文化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1954年，一家为桂格燕麦公司提供服务的广告公司偶然发现了促销大米和小麦的一种不寻常的方法。为了把一个有关育空探险的广播节目成功地转播为电视节目，该公司用1 000美元在育空地区购买了19英亩土地，那里靠近世纪之交的“克朗代克淘金热所在”区域，该地吸引了数万名准矿工。每购买一盒大米或麦片，顾客就会得到1平方英寸注土地的“契据”以及这块土地下可能埋藏的黄金。桂格燕麦公司没有预料到需求如此巨大，也没有预估出登记2 100万份契据的实际费用；“克朗代克

大地”公司破产了，土地被加拿大收回。20世纪60年代初，A&P连锁杂货店在新泽西州试开了两家金钥匙自助餐厅，每家餐厅都建造了金瓦屋顶，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1960年春天，当弗洛伊德·帕特森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重量级拳击冠军时，他的教练库斯·达马托把一个镶有珠宝的金制王冠奖给了他，据说这顶王冠价值35 000美元。帕特森的王冠似乎启发了美国铸币局的两位代表，他们对曼哈顿最豪华的珠宝店进行了调查。珠宝商蒂芙尼和梵克雅宝的管理人员可以不假思索地一一列举他们根据特殊要求制作的、昂贵的黄金咖啡器皿和烟盒。卡地亚的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制作过一个含有40金衡盎司黄金的女性手提包，但一直未被买走。[注]

对黄金的迷恋不仅仅是趣事逸闻。正如伦敦市场上不断增长的需求一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民间的黄金消费也急剧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一则官方消息指出，国际私人持有的黄金的价值在100亿~12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西欧，近1/3为法国所持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这些数字嗤之以鼻，说“只有从魔术师的帽子里，才能拽出这样的数据”。）[注]黄金持有量增长最快的是美国。据估计，这一时期美国私人购买黄金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5%，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业生产——新兴的电子和航天工业使用了大量的黄金，但是用于收藏的黄金和黄金首饰也越来越受欢迎。

私人黄金消费的快速增长为联邦执法和禁金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私人购买、出售、持有或使用的黄金越多，非法活动就越明目张胆，这一点不言而喻。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普遍的做法是，个人或公司获得合法处理黄金的许可证，通过美国财政部或其他途径购买黄金，然后找到将黄金转移到黑市（通常涉及将黄金走私出境，因为美国规定其本土不得存在黄金市场）。萨尔瓦托雷·索拉佐案就是一个既有名又有趣的例子。索拉佐是一名获准经营黄金业务的珠宝制造商，因为操纵大学篮球比赛而被判有罪。1951年，他还被指控走私黄金。他的一个同伙试图把一辆双门别克车运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货

轮，这时一位官员注意到别克车身后部已经垂到地上，车身内塞满了价值20万美元的黄金。20世纪50年代，一些检察官指控说，每年有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流出美国，尽管美国财政部从未证实这一数字。

虽然很少有美国人会公开支持走私，但在20世纪50年代，有些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公然无视金融法律。从来没有人认为1933年颁布的禁止美国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是一项长期政策，在战后相对繁荣的时期，这项禁令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当然，能够拥有黄金意味着有致富的可能性，这是对法律屏障视而不见的一种额外激励。出版商兼财务顾问弗兰兹·皮克是一位备受欢迎的人物，他被《星期六晚报》戏称为“黑市商人最好的朋友”。20世纪50年代有关货币的文章经常援引皮克的话。他的权威性来自他出版的月历和年历，这些历书细致入微地列出了数十种货币的交易价值，包括许多价格不透明的货币，比如“铁幕”另一边的货币。他对全球黄金持有量的数据大加抨击，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确认这些数据，或者这些数据令人生疑。一份财政部备忘录警告说，“皮克的消息来源通常不可靠”，而皮克宣称他能知道全球知名银行家和商人的信息。

皮克营造了一种命中注定、古怪可笑的氛围。他在曼哈顿下城区有个两间房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纸币，这些纸币已经一文不值，他用这些纸币暗示所有纸币的最终命运都是一文不值。他声称他已经说服了曼哈顿上东区公寓的房东接受他用可收藏的金币支付租金。皮克把黄金当作一种道德的货币运动，他将某个版次的《黑市年鉴》献给“60个国家的立法者，他们为了维持纸币、政府债券和黄金的虚构价值，成为黑市的真正推动者”。注

一些美国人显然为这些信息所诱惑，而且由于国际商业交易变得日益容易，他们能够找到绕过法律的办法。虽然无法知道伦敦市场上卖给美国人或从美国人手中卖出了多少黄金，但艾森豪威尔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加拿大并没有错，这个近邻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黄金产量仅次于南非。1956年，加拿大的黄金买卖合法化，银行开展了一项副

业，开始帮助客户买卖黄金。到1958年，加拿大实行了两项市场创新，这引起了一些富有的美国人的注意。一项创新来自新斯科舍银行，它开始销售“纸黄金”，即银行金库中存放金条的可转让凭证，对于非加拿大人来说，它比黄金本身更容易持有。此外，多尔蒂-罗德豪斯公司（后文简称“多尔蒂公司”）还策划了一项更为诱人的计划，允许客户分期付款购买黄金。首付只需34美元，加上年付款63美元，买家就可以购买1千克价值1 100美元的黄金，这些黄金可以免费存放在多尔蒂公司的金库中。尽管只要黄金价值保持不变，投资者实际上就会亏钱（需要支付利息），但分期付款计划立即受到热捧。多尔蒂公司在第一天就接到了4 000金衡盎司黄金的订单，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这一消息随着《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报道传播开来，更多的美国公民抢购了金条。据估计，到1959年中期，价值300万~400万美元的加拿大金条被卖给了美国公民。（两年后，美国公民将按照法律要求出售这些资产。）

大量美国人会在国外购买和持有黄金，这个主意如此新颖，以至于一些专门负责此事的加拿大人会绕过法律条文去谋利。例如，多尔蒂公司是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重要公司，公司的负责人之一达西·M.多尔蒂在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过交易所总裁，此后担任了董事会成员。尽管如此，该公司与加拿大矿业的利益关系还是引起了加拿大监管机构的愤怒。1957年，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发现多尔蒂没有披露：在阿科尼克矿业公司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前，他已经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期权。此公司拥有黄金以及其他几类矿业开采权和项目，上市几个月后，由于交易频繁，其股价暴跌，执行董事宣布公司破产。证券交易所董事会宣布多尔蒂的“所作所为损害证券交易所利益、不符合会员身份”，并暂停交易3个月。[注]

然而，很有可能大多数以3%的保证金从多尔蒂公司购买金条的美国人，既不知道也不太关心该公司的其他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押注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价格迟早会改变，变成有利于他们的价格；另一些人希望进行极端保守的投资，比如通过持有大量黄金

来平衡投资组合；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把黄金当作一种保险手段，以防美国政府和金融进入准末日般的崩溃局面。从罗斯福时代以来，一些右倾的内部通讯就对美国政府和金融的发展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不管动机如何，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黄金买家是那些投机者，他们夸大拥有黄金的好处，并且确实鼓吹私人可以持有黄金。大萧条时期的紧迫氛围造就了罗斯福时期的黄金禁售以及愿意合作的民众，而新一代美国人把黄金所有权视为公民权的基石，认为它是人们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的重要性胜过类似收支平衡这样的政府抽象概念。

就连美国财政部和执法部门的官员似乎也在怀疑，是否每一个私自持有黄金的例子都会真的让全球金融市场的天塌下来。追捕黄金小贩是为了国际货币，这种解释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执行成文法律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例如，1962年，为美国财政部卧底的特工和纽约市警察在曼哈顿的一间公寓里逮捕了两名男子，这两人以每金衡盎司45美元的价格卖出多达200金衡盎司的黄金（他们还透露，若他们在菲尼克斯的家乡周边，有办法拿到更多的黄金）。在宣布这次逮捕最终缘于3根金条时，一名助理检察官宣称：“政府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国家在黄金问题上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局面。”[注]而3根金条只是伦敦每个工作日合法出售的黄金的一小部分。

在其他案例中，美国财政部官员公开承认他们的任务近乎荒谬。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修女团体卡梅尔修女会进行博弈。这些修女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曾提议从信徒手中收集废弃的金戒指、手镯、旧硬币，并将其熔化，用于制造一种被称作“圣体匣”的圣器。财政部官员阻止了她们的行动，但修女们一直希望美国政府有朝一日会改变主意，她们一边收集少量的黄金，一边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970年，当她们最终让步时，财政部授权一家公司购买她们收集的6磅黄金。一位恼怒的部门资深职员跟他的新上司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徒劳无益甚至以近乎荒谬的努力来劝说修女放弃计划，而财政部的总法律顾问随随便便就把此事

撇开了。最早的有关涉案人员早就去世了。鉴于财政部过去的拖沓行为，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这些人进行1 200美元的罚款既不公正也不明智。她们的损失已经超过了预期的利息。”[注]

迄今为止，打击私人持有黄金的最极端的例子来自内华达沙漠，这个案件耗费了财政部和司法部数万工时。1960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三名全副武装的美国执法官突然检查赌场大厅，带走了一件金鸡摆件。在旁观者的嘲笑声和嘘声中，执法人员没收了摆件，律师谴责这起案件为“严重的误判”。

有违法嫌疑的这件金鸡摆件高9.5英寸半[注]、重14磅，由18K黄金制成。在被没收之前，它于1958年被陈列在位于内华达州斯帕克斯市的“珍宝赌场”内一个透明的玻璃陈列柜里，这是“金鸡餐厅”的促销手段，这家新开的餐厅是处于快速发展中的“珍宝赌场”里的一家餐厅，其招牌菜是炸鸡。

这只金鸡是理查德·L.格雷夫斯“孵化”出来的，他是内华达州的一位精明企业家，喜欢噱头、炒作。格雷夫斯的职业生涯是从爱达荷州的餐馆开始的，那里的餐馆都配有投币式的老虎机，但是当爱达荷州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禁止老虎机时，格雷夫斯把他的业务搬到了内华达州南部。1955年，当他的“珍宝赌场”开业时，他设立了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只要谁能在赌场对面的旗杆上坐一年，谁就可以获得该奖金。格雷夫斯修建了一个65英尺[注]高的旗杆，顶部有一个7英尺见方的平台，像一个金方块。一个自称“快乐比尔”的职业坐杆人霍华德接受了赌场的挑战，他设法在高空停留了204天，赌场为他无限量供应招牌菜——“非常美味的汉堡”。

这个噱头是为了吸引游客驶离内华达州40号公路，来这家赌场消费一把。现在的“珍宝赌场”是一个拥有1 500间客房的综合性度假胜地，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用约翰·阿斯库加的话说，“它不过是一家有老虎机的餐馆”。约翰·阿斯库加曾和格雷夫斯一起工作，并最终买下了这个赌场。有了这只金鸡，格雷夫斯和他的“掘金团

队”始料未及地得到更大的知名度。在制作金鸡摆件之前，其合法性就是堪忧的。最初，格雷夫斯和他的律师联系了内华达州雷诺市的珠宝商纽曼银店来制造这件金鸡摆件。他们制作了一个公鸡的木质模型，并决定联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铸币局局长，因为这个摆件要用的黄金远远超过纽曼获使用的黄金限额——50金衡盎司。

然而，铸币局局长制止了制作金鸡摆件的计划。铸币局的理由很直接，并且与许多先前的决定一致：无论是做成金鸡的形状还是其他更传统的样式，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拥有那么多黄金是非法的。制作这个摆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例外情形主要指工艺价值超过所含黄金价值的产品以及黄金被用于“常规工业、专业或艺术用途”。在考虑“珍宝赌场”制作摆件的申请时，铸币局认为把黄金做成公鸡的形状或许有艺术性，但不符合惯例。此外，铸币局表示，批准制作摆件只会开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会被不择手段的人利用，作为囤积黄金的一种方法”。[注]格雷夫斯的团队联系到内华达州的两位参议员，希望能对此提出申诉。可是，即使向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提出申诉，也无法改变铸币局的立场。相比其他人，安德森更能感觉到美国的黄金供给处于动荡的危机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联邦政府部门说“不”时，项目就结束了。但理查德·格雷夫斯与众不同，他另寻他人来制作那只闪闪发亮的金鸡。他看到有艺术用途的作品可以得到法外施恩，于是委托眉毛浓密的牛仔艺术家弗兰克·波尔克来为金鸡做模型。波尔克以制作腾空跃起的野马青铜雕像和其他西方场景而闻名，但他在赌场圈内却是因为设计俗气的老虎机而闻名，他塑造的老虎机俗称“单臂强盗”：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像，戴着黑帽子，一只手拿着手枪的亡命之徒。赌徒只要把雕像拿枪的手往下拉，轮子就会在强盗的胸前转起来。[注]波尔克对金鸡摆件项目不太热心，他开玩笑说：“我对鸡所做的一切就是吃掉‘它们’。”波尔克只收了50美元的设计费，几天就完成了工作。格雷夫斯没有告诉他最后的摆件是纯金的。

为了铸造摆件，格雷夫斯找到了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商——斯拉夫公司，这家公司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成立的，19世纪的淘金者常到这里用新开采到的金块来换现金或钻石订婚戒指。与内华达州的同行不同，斯拉夫公司告诉格雷夫斯摆件的制作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所持有的许可证允许他使用多达300金衡盎司的黄金。实际情况是，一位精明的高级职员想办法得到了旧金山铸币局局长的许可，可以铸造赌场值钱的金鸡。

金鸡摆件在1958年5月被搬到“珍宝赌场”，受到了公众的称赞。但在这一年年底之前，特勤局联系了格雷夫斯，说他的金鸡摆件违犯了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他们要求格雷夫斯当天到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去，并建议他带上律师。格雷夫斯选择了保罗·拉克索尔特，后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律师，他的父母出生在法国巴斯克地区，他娶了卡森市一位著名的律师兼共和党活动家的女儿。拉克索尔特的政治生涯业已开始成形，4年前，他被选为卡森市周边县城的区检察官，而在金鸡的传奇故事结束时，他平步青云即将顺利当选为内华达州副州长。从早期开始，拉克索尔特的政治认同就反映了西部各州对黄金的迷恋。他的一个竞选电视广告拍的是一位矿工在河边淘金，矿工转向摄像机，“选拉克索尔特做州长”的字样在他用来淘金的刨船底部闪闪发光。注

拉克索尔特和格雷夫斯向财政部官员解释说，斯拉夫公司已经获得了制造这个金鸡摆件的许可，并认为此事就此结束。但18个月后，也就是1960年7月，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谴责。那时，内华达州政府正在一边与本州的博彩业激烈斗争，一边密切关注着黄金的流失问题。美国财政部向卡森市的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控诉书，题为《美国诉一件公鸡形状的纯金物品》。他们签发了没收金鸡摆件的执行令，也就是在那时，美国执法官到达了“珍宝赌场”。金鸡摆件被没收并转移到加利福尼亚的联邦银行保险库。拉克索尔特迅速申请归还这件摆件，但遭到了拒绝，金鸡摆件被扣押到审判之日。格雷夫斯这个人从

来不会错过宣传的机会，他把这只公鸡的青铜复制品放在餐厅外面，青铜鸡穿着条纹监狱服。

这件金鸡摆件被扣押了将近两年，直到1962年3月开始审判。如果美国政府获胜，金鸡摆件将被处理：它将被熔化并与联邦政府的其他黄金储备一起被储藏。大部分的庭审证词都围绕着金鸡是否具有艺术品资格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一般不是财政部的管辖领域。从工艺上讲，政府承认它是艺术品，但又坚持认为金鸡用于广告目的，主要是一种商业工具。来自丹佛和纽约的艺术评论家来到卡森市，对摆件的性质进行判断，讨论摆件的黄金成分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摆件的传统艺术价值。在审讯期间，一位评论家认为这个金鸡摆件“非常精美”，而美国政府的律师托马斯·威尔逊则与法官就摆件通常是实心铸造还是空心铸造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注]

威尔逊还认为，这种金鸡摆件对美国经济乃至法律和秩序构成了威胁。他告诉陪审团，格雷夫斯在联邦政府明确拒绝他最初的摆件计划之后还东奔西跑，“这是对法律以及美国控制黄金问题、维护货币基础的举措的讥讽和嘲笑”。为了避免陪审团低估金鸡案件这个作为首例判决将产生的示范效应，威尔逊在结案陈词时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数字（在审判的这一阶段，这些数字难以得到证实）来阐明这一点。他警告说：“要让我们的货币保持稳定，黄金储备必须占到未偿付金额的25%。如果180人中有一人有权制作这样的黄金制品，那么黄金储备就会跌至这个数字以下，其结果就是经济混乱。”

数百万只金鸡在美国各地闪闪发光，这种情形不太可能出现。拉克索尔特没有对此进行反驳，而是将金鸡的故事说成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重现，而庞大且混乱的联邦政府扮演了歌利亚的角色。是的，这个金鸡摆件是一件花费了相当大的代价创作而成的艺术品，但他坚持认为，它具有“象征价值”，他明确指出：“人们感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地位高或者低、重要或者不重要，仍然有权根据美国宪法、法律否决政府官员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的法庭

陈词听起来好像向公众表明拥有黄金和从事与黄金有关的工作是内华达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恭维了当地陪审员的智慧以及他们向美国东部地区投射影响的能力。拉克索尔特说：“看到像理查德·格雷夫斯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勉励自己，‘根据美国宪法我仍然拥有权利，而且官员可能有失误，我可以通过陪审团，而不是通过华盛顿的某个团体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团体不认识我，不了解我的一切，不了解我的生活方式，也不了解内华达人的生活方式，我不依靠那个团体，而是依靠像你们这样的12个人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住在我们这个地区，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你们一定会做出一个好的决定。想到这儿就让我精神振奋’。”为了彰显联邦政府的冷酷无情，拉克索尔特鼓励陪审团想象一下，如果陪审团维护他的对手，那么这个无辜的摆件的命运会是什么，“看到这件金鸡摆件被没收、熔化并投入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库，那将是奇耻大辱”。

拉克索尔特强大的说服力使他和内华达人赢得了这一天的胜利。从当天下午直至深夜，陪审团都在仔细商议如何判决。第二天再次开庭时，他们一致做出有利于金鸡摆件的裁决，7个月后，拉克索尔特当选为内华达州副州长，此后不久，又当选为州长、美国参议员。拉克索尔特的成功崛起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的特征——更加保守、更偏向美国西部地区，并且把恢复黄金市场作为其首要议程。

---

1. “The London Gold Market,” Quarterly Bulletin, Bank of England, March 1964.

2. Minutes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Anderson’s Office at 2 p.m. Wednesday, December 7, 1960, Julian Baird Papers,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Box 1.

3. Theodore G. Sorensen, Kennedy（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408.

4. “Week’s Gold Loss Biggest Since ’31,”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1960, 41. 1947年和1959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支付使黄金流出更多，但1960年9月是自1931年以来在“正常”周内黄金流出量最大的一次。此外，正如本章后面所讨论的那样，1959年有效地逆转了流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量。

5. Charles A. Coombs,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6）, 54.

6. Ibid., 59.

7.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ondon Gold Market, October 25, 1960, FRUS, 1958–1960,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 4, document 56.

8. 参见各种备忘录，例如，memoranda from Julian Baird and Robert Anderson to the Nixon campaign, October 1960, Julian Baird Papers,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Box 1。

9. Remarks of Senator John F. Kennedy, New Fieldhouse, Moline, IL, October 24, 1960.

10. “Text of Eisenhower ’s Address to Republican Leaders in Philadelph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960.

11. Anderson to president, 11/9/60, DDE Diary Series, Box 54, DDEL.

12.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November 15, 1960, FRUS, 1958–1960, Foreign Economic Policy,vol. 4, document 58.

13. 33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2, 1957, Box 9, NSC Series, 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s as President, DDEL.

14. FRUS, 1958–1960, vol. 4, document 57.

15. Minutes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Anderson’s Office at 2 p.m. Wednesday, December 7, 1960, Julian Baird Papers,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Box 1.

16. 有关艾森豪威尔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美国出售黄金的确切原因仍存在争议。195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表示有必要加强其内部财政资源；该基金组织早期反复出现经营赤字。因此，它向美国出售了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并享有回购权，它将这些资金投资于美元债券。进一步解释请参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Factors Relating to Burden-Sharing in the Fund,” EBS/85/126,May 14, 1985, 8–9。当然，这个目标本可以以任何方式完成。此外，没有迹象表明1956年交易最初发生时需要追加销售；1959年，当发生第二次销售时，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承认，该基金有盈余，因此“该基金在法律上不可能向美国出售黄金，以补充其美元供应”。（见FRUS Foreign Relations，1958-1960，vol.4，document 47。）1960年11月IMF出售黄金的操作显然是由美国财政部官员发起的，他们对美国国际收支危机感到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初回购了黄金。

17. 笔者有关“黄金总库”早期形成的讨论部分参考了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9-1971, vol. 2, ch. 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部分参考了Coombs,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18. Coombs,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32.

19. 美国声名狼藉的白银投机者。

20. “Impatience at a Stern Voic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 1960.

21. “Plugging a Gold Lea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1961.

22. Background Memo for Anderson-Dillon Conference, undated,from Horace Busby to Senator Johnson, LBJL, Vice 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s, Box 9, Notebook on NATO 1960, document 39.

23. 1平方英寸≈6.45平方厘米。——编者注

24. Report on Survey of Items of Jewelry and Other Objects Containing Large Amounts of Gold, August 22, 1961,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fice of Gold and Silver Operations, Gold Subject File, 1933–1974, Box 12, NARA.

25. Robert Trifn,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52.

26. 有关弗兰兹·皮克的生活和哲学思想的许多细节都来自John Kobler, “The Black Marketeers’ Best Friend,”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 1953. See also Tom Bethell, “Crazy as a Gold Bug,”New York, February 4, 1980。

27. “Ex-Chief of Toronto Exchange Suspended in Mining Stock Dea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57.

28. 美国助理检察官格伦维尔·加赛德，摘自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story, May 24, 1962。

29. Thomas Wolfe to Bruce MacLaury, September 14, 1970,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fice of Gold and Silver Operations, Gold Subject File, 1933–1974, Box 28, NARA.

30.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32. William H. Brett, Director of the Mint, to John M. Laxalt, April 9,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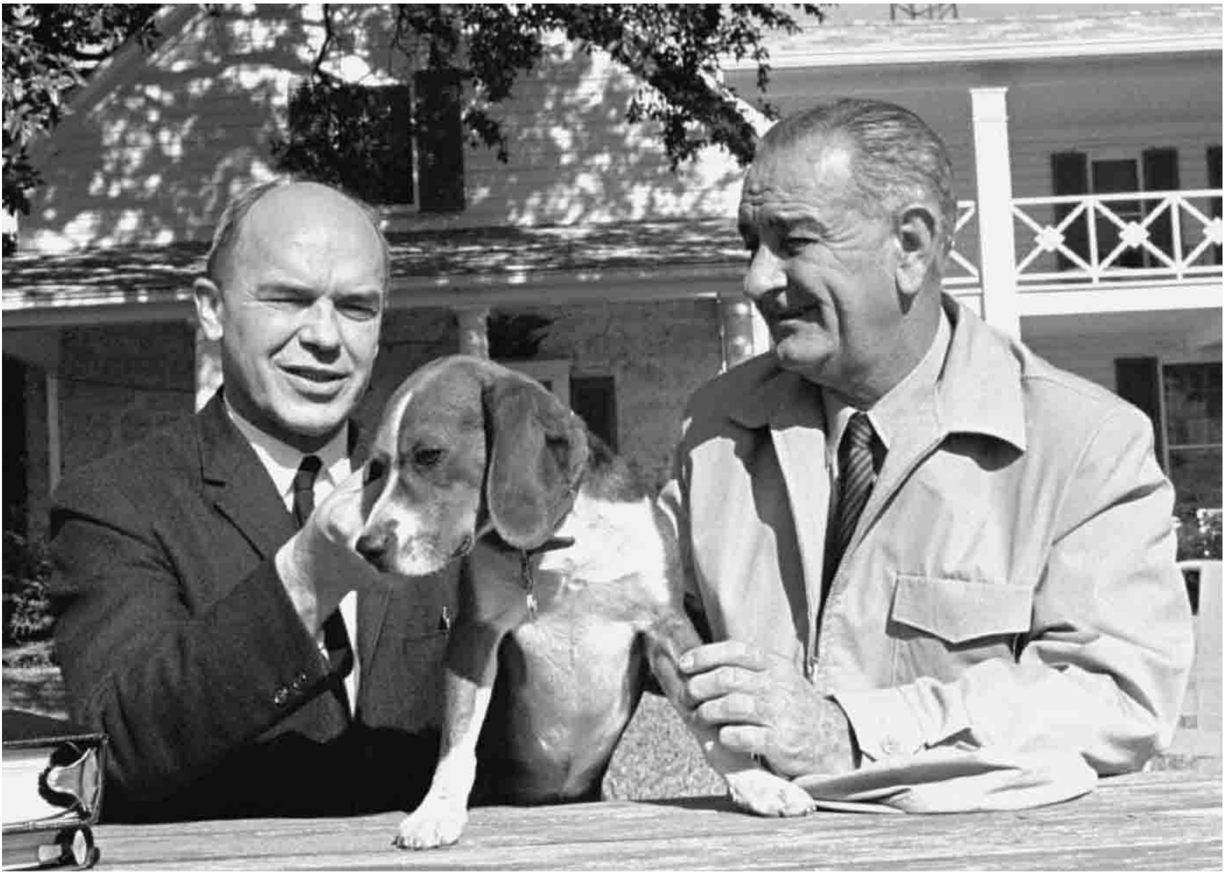
33. 波尔克的传记和艺术作品详情见F-F-F-Frank Polk: An Uncommonly Frank Autobiography（Flagstaff, AZ: Northland Press, 1978）。

34. 拉克索尔特的生平细节来自Richard L. Spees, “Paul Laxalt: Man of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n The Maverick Spirit: Building the New Nevada（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9）, 166－193。

35.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vada, Civil no. 1502,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One Solid Object In Form of a Rooster,Reporter’s 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 2:220, 225－226.

第七章

金手指行动



1964年12月，约翰逊总统及其科技顾问唐纳德·霍尼格（左）在他位于得克萨斯的牧场。1965年伊始，霍尼格和财政部的盟友说服总统支持“金手指行动”，这个行动计划试图从常人想象不到的地方提取黄金，以期显著增加美国的黄金供应。
资料来源：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冈本洋一摄。

1965年春，财政部官员乔·巴尔同意去见以阿拉斯加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为首的西部各州议员，他知道这些人所求为何。巴尔对

国会山颇为熟悉；这位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独享荣耀，他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经济学学位的议员。虽然巴尔仅任职了一个任期，但在1961年初离任后不久，肯尼迪总统就任命他为国会和财政部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为此他的时间都花在费劲地说服国会议员，以及倾听他们的牢骚之上。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总裁之后，巴尔很快又被约翰逊政府召回财政部，再次负责与议员们的交涉。

格里宁的家乡阿拉斯加州立州的时间并不长，但该州的议员们并不羞于提出要求。议员们呼声最高的请求是联邦政府应采取措施——任何措施都行——复兴美国停滞不前的黄金开采业。全球对黄金的需求正在激增，然而美国金矿——曾经的全球黄金产地中心——基本上错过了这波行情。即使在黄金需求飙升的情况下，黄金价格仍维持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这一情形持续了长达1/4个世纪，折射出美国采矿业的低迷。在过去几年中，易开采的金矿已经枯竭，而鉴于止步不前的金价，较难开采的金矿难以有利可图。到了1960年，美国以外的竞争——主要来自加拿大和南非——变得比在罗斯福当初设定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时更为激烈。许多金矿甚至没有参与竞争就直接关闭了。自从美国黄金产量在二战期间放缓之后，黄金产量从未有过强劲复苏；在此期间，南非生产的黄金占世界黄金总量的四分之三。美国的黄金产量被排名靠前的两个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位居第三（如果对苏联的秘密黄金产量的估计准确的话，那么美国应该位居第四）。[注]格里宁的家乡处于最糟的境地：19世纪后期，当地似乎遍地黄金，阿拉斯加州因此在国际上声名显赫；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黄金产业消失殆尽。与1940年黄金产量达到70万金衡盎司的峰值相比，阿拉斯加州的黄金产量下降了大约95%。1966年，阿拉斯加州开采的黄金量创下1886年以来的新低，其市值下降到100万美元以下。[注]黄金业开始将自己描绘成落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1962年，阿拉斯加州的首席建筑师和第一位参议员爱德华·巴特利特说：“我未见其他行业受到如此歧视。”[注]

业内人士认为，黄金价格需要上扬，再不济也应该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以刺激生产；西部的参议员正在为此起草立法。毕竟，美国的白银产业都得到了补贴，一些黄金生产国——特别是加拿大——也补贴了它们的黄金产业。对巴尔来说，这个提议不可能实现。多年来，财政部一直强烈反对任何相关提议，它担心只要政策暗示黄金价格会有变化，不管这种暗示会对美国黄金产量带来什么益处，它都会对美元或美国的黄金储备，甚至两者同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种讨论是美国国会山的一种惯常做法，双方都假装参与辩论，双方也都知道对方不会让步。但是，巴尔试图找到一个切入点以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提高黄金价格或直接补贴黄金产业已然不可行，但是巴尔认为，如果通过美国政府提供资助来帮助黄金产业做研究，那么应该不会扰乱黄金国际货币领域的微妙作用。

这一让步并没有安抚西部议员，就算有的话，也只是刺激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是年8月，格里宁和17位同僚，包括颇有威望的民主党人弗兰克·丘奇、亨利·杰克逊（绰号“独家新闻”）、沃伦·马格努森和乔治·麦戈文，向约翰逊总统递交了一封签名信，指控他扼杀了美国的黄金产业发展。他们声称：“黄金是唯一一个价格被压低到31年前设定的标准，而且只能由签署这一限制令的联邦政府收购的商品。”他们补充说，财政部的“消极态度”阻挠了迫切需要的改革。(注)信里只差威胁说，不管有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参议员都将采取行动。前一届国会曾经考虑通过立法来资助黄金行业，虽然没有通过，但1964年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国会两院取得“绝对多数”，而约翰逊政府不可能疏远那些西部民主党人，因为在其他立法投票时需要他们的票数。因此，9月，巴尔和他的财政部同事弗雷德·戴明回到美国国会山，再次与西部国会议员会面，巴尔称此次会面的氛围“比以往更为热烈”。由于害怕陷入同样的困局，巴尔“突发灵感，他建议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科技研发来挖掘金矿以及炼金”。国会议员们对此感到满意，巴尔和戴明承诺到1966年初向他们汇报进展。

巴尔和一位来自美国铸币厂的同事前去拜访约翰逊的科学技术顾问唐纳德·霍尼格。霍尼格是美国历史上从政人员中最有成就的美国科学家之一。他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在一间100英尺高的塔顶小屋里维护第一次测试时安装的炸弹；他指导过太空探索计划，是海水淡化技术专家，他还差点成为布朗大学的校长。在回应财政部关于开展黄金研究的调查时，霍尼格要求地质调查局和矿业局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是，没错，“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价格之内确保黄金大幅度增产确有可能”。解决方法很简单：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检测并提炼黄金。巴尔形容自己“醍醐灌顶”，开始起草所需的预算以及深远的政策和经济问题，其中不乏对于现代科学可能太过有效而表示的担忧：“产量达到什么水平将导致黄金价格崩溃？”

于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拉开了序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即将从内部崩塌，约翰逊政府的几位官员、一些支持此项目的国会议员以及成百上千拿着美国政府经费的科学家开始了对核时代的炼金术的探索。当然，20世纪60年代的绝密项目需要取一个代号，巴尔将它命名为“金手指行动”，在这个计划的支持下，美国政府会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从海水、陨石甚至植物中寻找黄金。在这个时代，人们极愿相信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他们制订了严肃的计划，使用核武器从地球深处提取黄金，甚至试图使用粒子加速器“点石成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黄金储备不足而饱受困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手指行动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约翰·肯尼迪那样对黄金和国际收支问题感到担忧，在他的许多同事眼中，他的担忧甚至有点儿过头，尤其是鉴于这一时期更核心的问题是地缘政治发展态势——古巴革命和猪湾入侵古巴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的初步升级、柏林危机以及柏林墙的修建。肯尼迪的许多顾问认为，他对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担忧太过极端。（据他人转述）肯尼迪不断告诉周围的人，美国面临的最危险和最棘手的问题是古巴或核战争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肯尼迪的亲密顾问希奥多·索伦森

写道："肯尼迪政府中的同僚认为他过度关注收支平衡问题。"肯尼迪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称他"绝对痴迷于国际收支问题"。[注]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说肯尼迪"几乎对黄金心怀忧惧"。[注]狄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名共和党人，肯尼迪任命他为第一财政部长。

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飙升（见前一章）。当时，肯尼迪在公众面前试图对所处的困境表现出毫无压力。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对全球经济秩序至关重要。上任不到一个月，肯尼迪就黄金和国际收支问题发表了特别讲话。他对国会说："黄金的流失对我们来说固然重要，但它更关系到整个自由世界。我们是自由世界最重要的银行家，美元的任何潜在弱点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不仅给我们，而且也会给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带来麻烦，他们依靠美元为贸易提供大量资金。"1962年，在与美联储主席的私下谈话中，肯尼迪急切地直奔主题："这个时候……如果每个人都想挤兑黄金，我们就完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供使用。"[注]肯尼迪是第一个提出美元"应该像黄金一样货真价实"的总统。这句话被继任的美国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反复引用。肯尼迪身边的人认为，肯尼迪之所以对黄金和收支平衡过分关注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尽管如此，肯尼迪的继任者很快形成了和他类似的观点。约翰逊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说："除了越南以外，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际收支。"[注]

虽然他身边的人可能发现肯尼迪过度关注上述问题，但国际收支问题与那10年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越南战争，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肯尼迪明确地将黄金与美国安全支出挂钩，并用这种方式建立了预算监督。肯尼迪政府的目标是让美国的财富遍及全世界，设立这个目标有两个原因：一是它相信如果让朋友富起来，它们就可以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二是为了建立一个壁垒，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肯尼迪称援外"是一种方法，通过援外，美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它的影响力和控制地

位；同时，通过援外可以支持许多国家，（否则）这些国家肯定会分崩离析或投入共产主义阵营”。[注]因此，美国政府在国际开发署、进步联盟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项目计划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然而，即使美国拥有足够的财富，也能让它的财富惠及世界，而不需要任何有形商品作为回报，并且在面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影响日益加大的时刻，这些计划对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至关重要，这种援助也会在本质上让其国际收支问题变得十分紧张。美国国外拥有这么多的美元，这会威胁美元的稳定，进而威胁到国际经济秩序。肯尼迪希望用两种方法达成目标。1961年8月，他向财政部长递交了一份《美国安全行动备忘录》，要求定期提供《美国黄金市场最新研究报告》。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第二年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黄金预算”，每项支出计划的效果必须根据该计划如何影响美国黄金供应来进行评估。这个计划使财政预算办公室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看起来像是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从而使肯尼迪内阁产生分化。这个计划还具有这样的效果，即假定美国黄金储备能为政治决定提供客观依据；毕竟，除了总统，谁可以评判一个抽象的目标（创造全球军事和经济安全来抵抗共产主义的影响）比另一个（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防止美元危机）更重要呢？

黄金与美国安全之间的第二个联系是，即使仅直接采纳美国官员的观点，美国在面对黄金市场的温和波动时也毫无防备。虽然只有少数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1960年的黄金价格大幅飙升预示了美国和全球经济的真正危机。而根据所有可靠的报告，危机是市场自发发生的。因此不难想象，一个或多个外国政府仅仅通过操纵黄金价格或立即要求改变美元储备就能威胁全球经济秩序。苏联（一个重要的黄金生产商，虽然它的黄金产量数据是秘密的、充满争议的）很明显会是这样一个对手。尽管它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上，但这并不牵强。1968年出任财政部长的巴尔后来回忆说：“我们认为唯一会遭到莫斯科干预的业务可能就在黄金业务上。在我们看来，它确实像是在操纵黄金市场……我不能说我们确实考虑了这些国

家正在做的事情。”[注]但这种威胁也可能来自战略盟友，也许是一个选择左翼政府或是憎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毕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特意持有美元作为大部分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在美国财政部窗口将它们兑换成黄金。这是它们出于对美国及其核保护伞的尊重。1969年，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明确地解释了美国真正的美元兑换黄金政策：“当有人需要黄金时，我们不会正式拒绝任何人，但我们明确表示，如果有人提出要求，我们会感到不高兴。”[注]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些政府改变主意。

事实上，即使是为了应对美国无法控制的事件，比如突然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英镑或其他主要货币的意外升值，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的热潮也可能会出现。以德国为例，这个国家是美国长期关注国际收支问题的源头。美国越来越难以证明它每年在联邦德国维持数十万驻军的开销是合理的。让联邦德国偿还战后的债务，并同意支付款项来“补偿”美国的驻军，这样做有所帮助。但当对联邦德国施加过大压力时，这些措施可能会迫使联邦德国人重新对其马克进行估值。1961年他们正是这么做的，并在市场上和外交方面制造了混乱。20世纪60年代，美国需要控制联邦德国经济以缓和美国的收支平衡；同时，美国和联邦德国要保持北约盟友关系并阻止苏联扩张，这两种需求显然互相冲突。

各国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要求兑换黄金，这种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多年来，白宫一直担心看似随意的兑换黄金可能会破坏全球均势。例如，1960年，当美国安全委员会讨论难以让北约国家分担军费的问题时，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抱怨说，两年前，意大利议会下令其中央银行从美国兑换价值25亿美元的黄金，这对美国的外汇储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1965年初，夏尔·戴高乐政府在法国恢复国际金本位制，正式实现了法国长期以来的偏好，还宣布将从美国兑回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每月继续从美国财政部购买黄金。其他国家仿效法国赎回黄金的风险真实存在，特别是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暴露无遗的时

候，这样做很容易使得跨大西洋联盟解散。黄金和美国安全联系紧密，因此一些关于黄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讨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是机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这么容易受到黄金危机的影响，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美国在战后初期开始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项目非常成功，它帮助了盟国，却威胁到美国在这个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执行的国际货币游戏规则主要是在美国的敦促下制定的，现在许多人认为这些规则限制了美国的行动。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对这些规则的局限性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批评意见。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下了开创性的批判著作《黄金和美元危机》，那时他还是一个局外人，后来肯尼迪政府邀请他担任顾问。特里芬困境指的是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元越来越多，在美国境外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利息也越来越多。理论上这些都可以用来赎回黄金，但是，即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肯尼迪所说的“黄金储备不足”早晚也会到来。这些情况是可能会发生的：全球增长需要减速，全球货币需要贬值，黄金美元兑换危机即将爆发，或者规则需要改变（这可能会涉及它自身的危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国际黄金体系正在形成，它增强了人们对政府黄金短缺的认识。尽管世界每年仍在生产更多的黄金，但世界最大经济体可供与货币挂钩的黄金数量却并未增长很多。相反，20世纪60年代用于支持货币和中央银行之外的黄金数量快速增长。随着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放宽了战时对私人持有黄金的限制，越来越多的黄金落入私人手中。到了1967年，南非矿业商会已经开始铸造克鲁格金币，这是一种易于流通的1金衡盎司金币；几年内，它将推动更多的人持有黄金，使持有黄金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用于工业和艺术领域的黄金也随之增多。[注]由于人为固定黄金购入价格为每金衡盎司35美元，这对于工业应用领域来说特别具有吸引

力，工业镀金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显著特征。第一块晶体管是1947年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发明的，裹着楔子，楔入锗晶体下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生产的晶体管数以千万计，这个数字还将爆炸性地增长并持续数十年。贝尔实验室的另一个创新是激光，1960年它率先使用镀金反射镜发明了激光。最具代表性的是太空计划，人们给火箭发动机装上涂金防热罩，而第一批美国宇航员佩戴的面罩镶了一层黄金衬里，用来保护他们的眼睛免受太阳光照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在太空、军事和电子领域每年使用成吨的黄金，远远超过了用于制作假牙的黄金的数量。黄金首饰、金币和金质奖章也越来越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都有所上升，金价不能超过每金衡盎司35美元，这使得黄金制品拥有相对便宜的价格。1966年某机构估计，国际范围内个人的黄金消费量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两倍。[注]

总的来说，黄金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已经对全球的货币黄金造成了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仅在1965年，私人持有以及工业和艺术用途就消耗了价值16亿美元的黄金，比1964年增加了约5亿美元。[注]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货币存量中没有增加任何黄金；相反，世界货币存量损失了价值4 000万美元的黄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银市场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这并非巧合。这种情况促使约翰逊政府铸造面值为25美分和10美分的硬币时不再使用白银，并减少面值为五角硬币的银含量。[注]

与黄金和国际收支问题紧密相连的是美国预算赤字（1964年，赤字达到28亿美元，这一数字令人担忧）和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服务于约翰逊政府的经济学家看不出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化解这些难题。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人赞成增税，这将抑制消费，并向外国的央行发出财政纪律信号，尽可能让它们不要把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然而，至少在1967年，人们认为增税在政治上不切实际。美元一度贬值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除了扰乱全球资本市场和损害消费者之外，它

似乎必然会促使其他国家做出相应的反应。约翰逊成立了一个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它发现许多问题——限制美国银行在国外的贷款、加快偿还外国债务、刺激出口——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政策转移来管理的，尽管其效果通常是缓慢的。

但是问题似乎越来越不是美国行政部门所能控制住的。总统的顾问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即使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领域。例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国外度假、做生意、用美元消费。不仅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技术也得到了改进。横跨大西洋的喷气式飞机于1958年首次亮相，这样数百万的美国人每年带着美元到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旅行就变得更加方便（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是两个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一位约翰逊政府的白宫官员声称，美国人每年出国旅行的人数增加了10%，而在1964年到1966年，这一人数很少。1960年，美国游客在国外花费了大约23亿美元，到1967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亿美元。旅游业的逆向发展，也就是赴美旅游，缓解了这个局面。但即便如此，1967年白宫所谓的“旅游逆差”仍超过20亿美元。多年来，约翰逊政府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增加护照费、减少海关免税额，甚至征收一项彻底的旅行税。然而，美国政府官员也知道，这些措施将受到美国国务院、旅游行业和公民的反对。

当然，此时越南战争正在升级而不是收缩，这场战争从多方面打破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除了美国国产军火的生产成本外，战争的大部分开销直接用于购买物资和服务，几乎可以说是把美元运往东南亚。战争还需要进口制造军用产品和提供服务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货物，而不是出口。战争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如战时供给和人力短缺、交货时间延长、竞争力降低，也影响了国际收支平衡。1968年，两位经济学家估计，越南战争每年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贡献了35亿~40亿美元，如果没有战争，美国可能会有经常账户盈余。国防部一位官员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但他承认“越南战争对美国贸易平衡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注]

关键在于找到一些方法来消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束缚，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想寻找创新的方法来降低非美央行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以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鲁萨命名的“鲁萨债券”以美元出售，但以外币计价，从而鼓励外国政府持有它们，而不是将它们兑换成黄金。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想要创立一种为央行设计的国家中性货币，即“特别提款权”。但是，这些温和的措施只会减缓而不会阻止黄金流失。黄金和美元全面脱钩至少会使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央行之间的黄金销售得到严格控制或暂停。这种曾经令人不安却对大多数国家（除了法国之外）友好的体系可以很快地导致一场具有破坏性的货币战争，在这个体系中，西欧国家和日本心怀默契，同意不破坏美元的中心地位。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不可能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另一派认为二者脱钩是可取的，但却不去倡导这种方法。对约翰逊的顾问弗朗西斯·巴托尔来说，国际力量的背叛这个可能性只是打牌时的虚张声势，美国仍然可以藐视它、打败它。巴托尔给总统写信说：“事实是，国际货币游戏的现行规则对我们不利。如果欧洲人推动一场危机，那么所有有关的人很快就会对我们的经济实力和讨价还价的实际力量一清二楚。”注但是，可能的后果太可怕了，令人不敢去想象。巴托尔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的一位同事把这个后果称为“核战争”选择。注

那么，提供一个能够确保黄金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方案是否受欢迎呢？就在约翰逊的顾问还在批评为了提高黄金储备引发核战时，他的财政部与国会负责人正在秘密合作，研究最新的技术——其中一些确实是核技术，以期彻底改变黄金的开采方式。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提交了一些内容新颖的简报，有了这些简报，乔·巴尔在1966年前往美国国会山时比他前一年去的时候轻松多了。他不仅拥有取悦西部国会议员的东西，而且与他们一起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巴尔知道哪些成员最有可能支持这项倡议，并且确信他们不会泄密。尽

管约翰逊政府在通过税收法案这种基本的问题上与国会发生争执，但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还是达成了共识，将金手指行动伪装成覆盖各类贵金属的开采计划。正如巴尔在写给他的老板、财政部长亨利·福勒的信中说的："我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内部小组的玛洪以及斯库普·杰克逊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把这项计划包装成对所有矿产的搜寻计划。他们建议我们（财政部和国会）否认或拒绝评论任何可能泄露的消息，并坚持以在美国寻找短缺矿产为托词。"[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也提出了保密措施。他担心"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国央行会如何解读这一举动"。[注]

毕竟，人们预计金手指行动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1966年的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几年内，这个几百万美元的初始投资看起来就不值得一提。1966年2月霍尼格在给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目前看来，如果以现价计，每年投资1 000万~2 000万美元，我们很有可能会增加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如果足够幸运，黄金储备可能增加更多。"财政部的总法律顾问声称："总统的科学顾问对该项目的成功充满信心，并且估计在5年内有望新增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注]100亿美元这个金额是当时全球每年所产黄金价值的两倍多。因此，金手指行动不像是发现新金矿，而更像是发现一颗新行星。过度的乐观主义情绪使他们认为，如果金手指行动能开创科学的、革命性的金矿开采技术，他们应该将其公布于众，来极大地推动全球黄金供应——美国或许可以再次成为热门的国际淘金热中心。他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说："如果这项计划到1967年进展顺利，我们计划召集来自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一些主要黄金产区）的地质学家，并将我们已知的全部告诉他们。"

得益于巴尔的游说和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及财政部长福勒的协调，金手指行动悄无声息地筹齐了资金。尤德尔于4月提交了一份申请，这份申请与（金手指行动的）托词一致，请求在1967的财政年度预算中增加1 030万美元，"以推进地质调查局和矿业局的计划，用

于研究发现、勘探和生产短缺重金属的技术”。此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内部小组委员会没有开任何听证会就批准了这批资金。然而，如果等到1967年才开始该计划，则意味着会浪费一年。出于天气原因，以及需要调用大学人员，大部分的野外作业最好在当年夏季完成。美国政府希望立即启动该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会当然不会为金手指这个大胆的冒险计划挪用1966年的资金。鉴于国会和约翰逊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为一个原本应该保密的美国内政部项目寻求立即可用的资金要承担国会审查的风险，而且无论如何这是存在政治争议的。

为了马上启动这个项目，白宫官员出人意料地动用了一笔资金：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外汇稳定基金是在1934年《黄金储备法》中设立的，旨在允许美国政府干预市场以稳定美元汇率。使用外汇稳定基金来寻找隐蔽的黄金是超出基金运用范围的，总统班底的官员都知道这一点。财政部总顾问弗雷德·B.史密斯指出：“旨在增加美国黄金产量的计划当然有些超出了基金资助的传统活动范围。”更重要的是要保守金手指行动的秘密。虽然史密斯宣称：“确信我们可以合法地证明向美国内政部转移资金用于黄金研究是正当的。”但是他也承认：“总会计办公室和外汇稳定基金的其他批评者可能会质疑转移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并不是无谓的担忧。1964年，财政部使用外汇稳定基金为一位美国外交官在东京购买了一栋价值15万美元的房子，这遭到了总会计办公室的猛烈抨击，[注]正因如此，史密斯不露声色地指出：“此时在新的和未曾尝试过的领域使用该项基金不是一个好时机。”史密斯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财政部会要求部门间合作，即要求矿业局和地质勘探局“增加我们的各种资源以维持美元的稳定”，并为他们的工作偿付费用。因此，联邦预算允许花费将近100万美元的国库资金用于寻找黄金，而美国政府内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细节。

在实践中，“金手指行动”组织了数百个研究项目，采集了数万个样本，旨在于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找到黄金。像大多数公共或私人

大型项目一样，金手指行动并非从零开始，它优先考虑以前做过的研究和尚待完善的想法。位于内华达州中北部的罗伯茨山脉似乎一直是一个有潜力的金矿来源地，因此美国地质勘探局的重金属项目组从几十个地区采集了矿样，寻找已知与金矿有关的地面矿物（如石灰岩）。其他研究似乎更像是一些长远目标。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在煤炭中发现了黄金的痕迹，因此美国地质勘探局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中西部地区的几十个地方用筛子筛煤来寻找黄金。美国政府甚至从粉煤灰和“各个工厂收到的洗煤废品”中取样。这些做法都没有使他们找到大的金矿。无独有偶，在20世纪4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们报告在草本植物犬问荆和沼泽马尾草中发现了黄金。美国政府派出的科学家们从美国各地采集了22个样品，可是，他们发现金含量远低于百万分之一，于是得出结论：“犬问荆对寻找金矿用处不大。”[注]

金手指行动的早期项目主要集中在研究技术最为先进的设备上。美国地质勘探局开发了车载中子激活系统，一个用于探测白银，一个用于探测黄金。“我们甚至不再需要采集样品，只要卡车开过需要分析的地方就够了。”一份美国政府报告吹嘘道。[注]矿业局还致力于研究“一种便携式X射线探测器，这种探测器可以放入直径很小的钻孔中”，用于寻找金矿。詹姆斯·邦德也会以此为荣耀。

金手指行动不放过任何一个科学计划：撞击地球的陨石中有金子吗？科罗拉多的泥炭中有黄金吗？植物和树木中有黄金吗？鹿角里有金子吗？[注]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科学家们都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在这些发现中，几乎都没有找到具有商业价值的黄金含量。

大海似乎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勘探区。就像石油既储存于地下，也储存于海底一样，同样的地质作用也使得金矿既分布在加州境内，也分布于海底。在20世纪早期，一位名叫弗里茨·哈贝尔的联邦德国科学家证实，海水本身含有微量的黄金。海洋是霍尼格的研究重点，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海水淡化厂和修建水下隧道等项目。在这段

时间里，他在政府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同僚对深海采矿越来越乐观。1962年，一艘南非开普敦海洋钻石公司的“钻石驳船”在奥兰治河河口下水，一年后在它沉没之前，最终从水下沙砾中提取了51 000克拉的宝石级原料金刚石。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家公司已经使用驳船收集了150万克拉的金刚石。并非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机械层面的进步；海军甚至建议，通过外科手术在潜水员的气管上开一个洞，并用一种特殊的液体填充肺部，这种液体可以让他在不需要减压的情况下到达深12 000英尺的海底并待上两个小时。[注]“海洋现在是个大买卖，”霍尼格在60年代中期宣称，“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计，在未来几年它将成为一个更大的买卖。”[注]

人们认为既然能从海里开采钻石，那么也同样可以开采金子，这并非纯属幻想。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斯加海岸发现了金矿床。金手指行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在海底初步开采黄金，这也是在不引起轰动的情况下公众可以参与的生产性活动。这并不容易：在越南战争期间，动用政府船只作为20世纪的“阿尔戈斯”[注]就是一个挑战。金手指行动伊始，财政部试图从海岸警卫队那里弄到一艘船，但遭到了拒绝。[注]美国地质勘探局倒是在1967年与俄勒冈大学签订了合同，批准“雅奎娜”号下水，这是一艘180英尺长、900吨重的研究船，原本用于疏浚俄勒冈州的库斯湾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尤里卡之间大陆架下的沉积物。[注]然而，这个项目只发现了极少量的黄金。

金手指行动并没有止步于美国海岸。圭亚那中北部普尔尼河沿岸“非常有希望找到金矿的前景”，让财政部和地质勘探局的官员感到十分兴奋。20世纪早期，那里的一个金矿开采了大约4万金衡盎司黄金，但是，这个金矿在1916年以后就被废弃了。一位为国际开发署开展研究的地质勘测科学家发现，这个金矿矿脉极富开采价值，“每吨矿石中可以产出几金衡盎司黄金……可采矿体量巨大，含金矿床深达700英尺”。圭亚那的区域竞争对手——委内瑞拉——也有希望发现金

矿。这是亚历山大·萨克斯最喜欢的项目。有点古怪的亚历山大·萨克斯是资深的政府外部顾问，他曾是罗斯福的顾问，几十年来一直是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萨克斯当年70多岁，住在曼哈顿。多年来，他几乎一直独自执行着金手指行动。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萨克斯在采矿行业和技术领域搜集了信息，集结了联络人，向财政部和美联储官员提出了许多详细而周密的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开发圭亚那、委内瑞拉、南非等地的黄金资源。

看过萨克斯冗长而周密的备忘录的大多数美国官员，认为他们的专业程度不足以支持萨克斯那些充满乌托邦式幻想的计划。尽管如此，萨克斯还是设法说服了约翰逊的最高顾问采纳他的建议。美国财政部长福勒和国务院政治事务部副部长尤金·罗斯托都认为萨克斯的计划非常好，不容放弃。“我无法知道正在讨论的委内瑞拉项目是否像萨克斯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希望，”罗斯托写道，“但有证据表明，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具有美好的前景……我建议委内瑞拉和美国通过条约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或管理机构。”[注]

罗斯托关于国际合作的建议十分引人注目，因为萨克斯不仅建议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黄金开采，而且建议使用核技术炸开委内瑞拉的大地、撬出黄金。“犁铧计划”许可和平使用核技术。在这个计划的赞助下，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许多类似的地下核爆炸实验，有些确实得以实施。这些实验主要用于采矿、钻井和平整土地。氢弹先驱爱德华·特勒对犁铧计划特别感兴趣。在执行曼哈顿计划建造原子弹期间，霍尼格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与他共事。特勒提倡核能的非军事化应用，这既是为了他们的伟大技术成就，也是为了宣传，以缓和公众对核能的反对。公众对核能的反对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些人坚持认为犁铧计划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而故意设计的）。[注]1960年，特勒在《大众机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武器试验项目中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险被大大夸大了”。他主张用核爆炸来获取石油，并在阿拉斯加北部的希望角等地迅速建造港口。[注]从1957年犁铧

计划启动到20年后它最终被放弃，人们计划进行几十次非军事用途的原子能爆炸，其中许多计划得以实施。1962年7月，北美洲当时最大的核爆炸就发生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一个1kt（1kt为1千吨TNT炸药的威力）的核爆装置被引爆后，大约1 200万吨泥土被炸飞了，造成一个足球场那么深、四个足球场那么宽的坑。该实验没有马上投入实际应用，但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次实验验证了他们对于核动力辅助陆地移动所需爆炸威力的大小和范围的假设，而认为放射性沉降物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不是那么可信。在距离爆炸点12~40英里的铁丝笼中有30只被胶带封住嘴巴的比格犬，用于测试吸入的放射性剂量的威力。爆炸发生后72小时内，10只比格犬死亡了。注

想到利用这种大规模爆炸来开采矿产的并非只有亚历山大·萨克斯一人。早在金手指行动提出来之前，为了弥补战后美国铜产量急剧下降，这种想法就已经萌芽。20世纪50年代末，总部位于犹他州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购买了亚利桑那州萨尔奥德附近的一个大型的低品位铜矿。注这家公司的试验钻探表明，在厚达500英尺的火山岩板块下蕴藏着20亿吨的矿藏，铜含量为0.4%。但是，常规炸药的威力无法到达矿石，因此肯尼科特公司考虑用核炸药来开采。这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合作，肯尼科特公司在1963年开始与原子能委员会讨论此类爆炸计划（其他参与采矿的有阿纳康达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它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到1965年，肯尼科特公司、原子能委员会和矿务局的一项可行性研究获得批准，被命名为“斯洛普计划”。这个计划是先在地下1 200英尺处引爆一个2万吨TNT当量的核装置，然后用硫酸把铜浸出。斯洛普计划的经费为1 300万美元，由联邦政府和肯尼科特公司共同承担。最初，这项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不过，1967年10月，原子能委员会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试图说服一些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的民众。

斯洛普计划引起了矿业贸易杂志、亚利桑那州当地报纸，甚至《时代周刊》的关注，这给肯尼科特公司带来了极大阻碍。1967年下

半年是二战以来全球铜业最动荡的时期，矿业局称之为“罢工之年”。年中，美国大量的铜矿劳动合同到期，两个主要的工会代表数以万计的矿工要求就全部合同与公司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受铜业工会影响的矿井数量激增了。但资方坚决抵制工会提出的条件，到了仲夏，罢工在全美蔓延，并持续数月；到了9月，美国只有一个铜冶炼厂在作业，其产量不到美国铜产能的2%。[注]肯尼科特公司成为罢工的焦点所在。工会领导人把斯洛普计划看作一个突破口，他们认为利用美国政府的核技术来让一家私营公司中饱私囊是错误的。

1968年初，一名国会议员公开了斯洛普计划的细节，他说他是从利弗莫尔得到的内情。克雷格·霍斯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在众议院任职20年，后来成为核工业贸易集团的负责人。霍斯默肯定是犁铧计划最热心的官方倡导者，他一次次地想引入立法，与私人公司共享犁铧技术，又一次次地失败。他还认为，约翰逊政府大多数甚至全部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各种自由主义盟友都在故意阻碍犁铧计划的实施。霍斯默谴责预算局、国务院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指控“这些人似乎对犁铧计划带有偏执狂式的怀疑和憎恶，他们无法将武器计划从他们的脑海中去除”。[注]

鉴于这种观点，霍斯默不太可能提前告诉美国政府他要透露的消息。他说，与金手指行动一样，犁铧计划的铜矿开采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掩盖寻找黄金的计划。“参与犁铧计划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认真地调查重获金矿的前景，其方式与以前研究过的重新找到另一种目前短缺的金属铜的方法类似。”而且早期的研究结果比较乐观；按照霍斯默所说，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发现存在任何技术障碍。霍斯默宣称：“在美国以每金衡盎司不超过10美元的价格生产黄金，甚至可能还要低得多……这不是在21世纪或更久远的未来，而是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到。”他这样略带挖苦地回应国会中他的反对者，他们在两年前对金手指行动表现出了类似的热情。[注]

最初，霍斯默扔出的爆炸性消息和国会每天数十个的消息一样，得到的关注不多。但一周后，《纽约时报》商业专栏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研究原子能爆炸，增加美国黄金产量》，这篇文章引起了华盛顿和利弗莫尔的关注。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立即往利弗莫尔发送一份电传，指出所有涉及利用原子能开采金矿的工作都应该与矿业局协调；如果此前斯洛普计划并不在金手指行动之内，那么很快就会了。然而，一些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个是关于原地浸出法将金矿震到地表的细节，另一个是关于辐射是否会造成产出的黄金不能使用。毕竟，对斯洛普项目中铜的应用的一项研究指出，所生产的金属会受到钌-106的污染；鉴于同位素的半衰期为一年，这样的铜不适用于许多工业用途，如医疗设备。此外，由于铜易被回收利用，一份政府报告警告说："具有轻微放射性的铜将会散布全美。"注

亚历山大·萨克斯热衷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用亚原子反应炼金，这与用核爆炸挖金矿的想法类似。萨克斯组织了一群对此炼金方法感兴趣的人和一些自由职业的科学家，他们非常渴望利用美国政府的技术进行最终的炼金实验：利用核能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他设法说服了美国财政部长赞同他的行动。福勒写信给尤德尔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吹嘘"萨克斯对利用核装置提炼金属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富有创造性的想法"。他继续说，"由于萨克斯博士的提议对当前令人烦恼的国际货币形势的影响，我非常渴望尽快做出评估"。注

从技术上说，萨克斯所提议的科学设想是合理的。几百年来，炼金术士一直猜测其他金属的结构与金足够接近，可以通过某种难以捉摸的外部过程转化而成。一些科学家意识到，核时代的到来从理论上提供了工具。1968年，西博格在一封试图劝阻这一系列实验的信中承认："元素周期表中与金相近的其他元素确实可以通过核反应转变成金。"这可以在核反应堆或粒子加速器中进行。1980年，西博格在劳伦斯伯克利美国国家实验室进行一项实验，在该实验中意外提炼出黄

金。他和同事用含有碳原子核和氖原子核的高速光束轰击由铋制成的箔，从铋中剥离出几个中子，结果出现了含有数十亿个迥异的金同位素的原子。然而，正如金手指行动的众多发现一样，问题在于原子数量有限。西博格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总结了这个问题：“用这个实验方法，生产每金衡盎司黄金需要的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注]约翰逊总统班底内部和外部那些头脑更加清醒的科学家的意见占了上风；尽管财政部急于用析出亚原子的方法解决黄金储备短缺问题，但这些建议从未付诸实施。

金手指行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大部分金手指行动的内容都未被公开，甚至没有得到国会的监督，那些已披露的内容也很少被当作大范围寻金实验中的一部分而呈现出来。因此，该计划的衰落同样是逐步发生的，最后不了了之。大部分最早的实验都是一次性的，结果出来后没有再获得资助。在个别黄金开采前景令人心动的地方获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在内华达州的科特兹重新开矿。其他项目从长远来看似乎是有效的，例如，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如今的黄金产量比起20世纪60年代末金手指行动注意它们的时候要高得多（尽管这两个地方的黄金产量都不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它们都只是使用常规的爆炸法来开采黄金）。

利用核爆炸进行金矿开采的计划从未成为现实。尽管有私营业主加入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斯洛普计划中有关原铜合理性的实验具有商业可行性。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聘用的大多数科学家已经减少了使用核爆进行土方工程或采矿作业，特别是随着放射性尘埃的实验细节被公开，来自激进的科学家和民众的反对变得越发强烈。特别令人担忧的是1973年在科罗拉多州里约布兰科进行的实验，这个实验设计通过核爆炸来促进天然气生产。将有放射性的水输送到处理井的一根管道突然发生泄漏，环境保护局从事发地拿到了气体样本，它的放射水平是正常情况下的1 000倍。几年后，科罗拉多州的选民们修改了州宪法，禁止在未经选民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在该州进行任何核爆

炸。[注]此后犁铧计划仍在缓慢推进，直到美国能源部于1977年成立之后才被撤销。

约翰逊政府对待金手指行动有多认真？后世应该如何认真看待它？可惜！大多数主要参与者都已在21世纪之交去世。2014年，当弗朗西斯·巴托尔被问及他对金手指行动的看法时，这位在约翰逊政府工作并为总统就国际货币政策提供咨询的经济学家暗示，他的大多数同事不相信这是解决货币黄金供应匮乏问题的严肃方法。他回忆说：“这是一个骗局，一个插曲。”[注]巴托尔认为，金手指行动充其量只是为了展示力量，是一种从心理上安抚世界市场的尝试，它暗示着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开发出新的黄金资源。这些举措或许可以为美国政府的经济学家和外交官赢得一些时间，找到一种可接受的方式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巴托尔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截至1968年，金手指行动确实起到了一种宣传作用。例如，美国矿业局在1968年3月公开宣布了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声称它将大大增加美国生产的黄金数量。这项水性化学处理技术可以从含碳矿石中提取更多金子，它当然大有前景，但是，这项技术仅在雷诺研究实验室中实现过。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仍需好多年才能具有商业价值。[注]

然而，巴托尔的观点必须与金手指行动一开始严格保密的这个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那么它在彰显力量方面就没有多少意义。此外，1968年黄金市场被关闭，那时，任何有关金手指行动的宣传活动基本上都已经无关紧要。即使这样，美国财政部、美国内政部和国会中仍有人主张采用金手指行动中更为极端的核技术。

当时，最终决定对金手指行动弃之不顾的不是其有效性（或缺乏有效性），而是全球事件的进程。1967年末，英镑的贬值引发了一系列黄金供给危机，严重威胁着全球经济秩序，因此，约翰逊身边的人都无法花时间去考虑鹿角能提取多少黄金。到了1967年底，乔·巴尔再也不愿苦苦执行金手指行动，他宁愿回到原来的日子，忍受黄金生

产州的国会议员喋喋不休的说服。巴尔后来回忆说："1967年英国人陷入困境时，全世界的人都说，'我不想持有纸币，我想持有黄金'。我们必须履行这些承诺，我们正以极快的速度流失黄金。我们所有的伙伴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的时候市场都是惊慌失措的。在美国，我们无法通过税收法案。英国人的货币已经贬值了。每个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注]一直让人担心的货币危机已经开始。

---

1. 冷战期间，美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资源来估算苏联的黄金产量和黄金储备水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估计苏联黄金的产量价值在3亿~7亿美元不等。苏联定期在西方市场出售大量黄金，美国据此做出估计。然而，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出了远低于上述估计的数字，即低于2亿美元，这导致其他一些机构修改了它们的预测。详见Keith Bush, "Soviet Gold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 17, no. 4（April 1966）:490－493。
2. Minerals Yearbook 1966（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Mines）, 80.
3. 1962年3月15日，巴特利特在参议院内政部岛屿事务办公室的矿物、材料和燃料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表了这一评论。
4. Ernest Gruening et al.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30, 1965,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 Subject Files on Finance, Box 54, LBJL.
5. Sorenson, Kennedy, 408; Bal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2（July 9, 1971）, LBJL, 19.
6.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C. Douglas Dillon, AC 74-12, Interview 1, p. 7, LBJL.
7.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odore Sorensen—August 16, 1962, 5:50-6:32 p.m., tape 13, President's Ofce Files, JFKL.
8. Johnson quote to Dirksen, March 1965, cited in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117.
9. John F. Kennedy, "Address and Question and Answer Period at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December 14, 1962, onlin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057.

10. Joseph W. Bar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2, January 16, 1970, p. 23, LBJL.

11. William B. Dale, Memorandum to Paul Volcker, March 10, 1969, Volcker fles, NARA.

12. 456th Meeting of the NSC, October 31, 1960, Whitman File, NSC Records, DDEL, FRUS 1958–1960, vol. 4, document 266. 我无法证实安德森的说法，但如果他谎称意大利政府用完了美国的黄金供给，这只会凸显白宫的恐惧程度。

13. 有关黄金的新兴工业用途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雷·维克的The Realms of Gold（London: Robert Hale, 1975）, ch.14, 223-225。

14. Thirty-Sixth Annual Report,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asle, 1966）, 33-34.

1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nual Report, 1966, 114.

16. “First Major Change Made in Coin System,” in CQ Almanac 1965, 21st ed.（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66）,882–886, http://library.cqpress.com/cqalmanac/cqal65-1258091.

17. 该交流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进行，参见L. Dudley and Peter Passell, “The War i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November 1968，随后道格拉斯·博希于1969年11月对此进行了回应。

1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ator）to President Johnson, July 6, 1966, LBJL,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alance of Payments, vol. 3 [1 of 2], Box 2.

19. 巴托尔的文章是针对理查德·N.库珀所做的一篇评论，“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60s: An Enduring Legacy,”in Economic Events, Ideas, and Policies: The 1960s and After（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139-176。

20. 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 April 4, 1966, Subject: Operation Goldfnger,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21.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April 6, 1966, from Henry Fowler and Charles L. Schultze,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22. 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 March 24, 1966, from Fred B. Smith,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23. 这位接受问讯的外交官是罗伯特·佩里坎，他是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财务专员。1965年美国审计总署的报告让财政部和约翰逊政府备感尴尬；报告指出，东京的馆舍有“镀金的卫浴设备和玻璃做的珠宝展示柜”。参见“Special Treasury Fund Challenged by GAO,”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65。

24. U.S. Geological Survey Heavy Metals Program Progress Report 1968—Field Studies,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621（Washington,DC, 1969）, 106.

25. The Investment in Natural Resour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Special Repor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83.

26. 金手指行动摘要可见U.S. Geological Survey Heavy Metals Program Progress Report 1968—Topical Studies,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622（Washington, DC, 1969）。也可参阅Gold in Meteorites and in the Earth’s Crust,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603（Washington, DC, 1968）。

27. John E. Bardach, Harvest of the Sea（New York: Harper &Row, 1968）, 77.

28. Hornig quoted in Robert Rienow, “Manifesto for the Se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1, no. 6（July–August 1968）.

29. 阿尔戈斯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寻找金羊毛时乘坐的船只名。——译者注

30. Memorandum from J. P. Hendrick to Fred B. Smith, March 28, 1966,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31. “Vessel to Explore Floor of the Pacifc for Precious Metal,”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67.

32. Memorandum to the Treasury Secretary from Eugene V. Rostow, “Reflections on our recent talks with Alexander Sachs,”March 12, 1968,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33. 犁铧计划的传播起源可参见Trevor Findlay, Nuclear Dynamite:The 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s Fiasco（Sydney: Brassey’s Australia, 1990）。

34. Edward Teller, “We’re Going to Work Miracles,” Popular Mechanics, March 1960, 100.

35. 关于核爆引爆装置及之后关于放射性尘埃的争论，可以在斯科特·基尔希的Proving Grounds: Project Plowshare and the Unrealized Dream of Nuclear

Earthmoving（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4章中找到全面的解释。也可参阅Philip L. Fradkin, Fallout（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135–136。

36.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利弗莫尔制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Sloop: A Study of the Feasibility of Fracturing Copper Ore Bodies with Nuclear Explosives（Springfield, VA, 1967），但该册子没有提到该项目与金矿开采有关联。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有关该计划最全面的间接记录是为美国能源部所做的一项研究，The Off-Site Plowshare and Vela Uniform Programs: Assessing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Proposed Nuclear Projects, High Explosive Experiments, and High Explosiv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vol. 2 of 3），Desert Research Institute,Las Vegas, 2011, section 4.37。

37. Minerals Yearbook 1967, U.S. Bureau of Mines, 446.

38. Remarks of Rep. Craig Hosmer, Symposium on the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Peaceful Nuclear Explosives, Las Vegas,Nevada, April 8, 1969.

39.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 February 21, 1968, 3690–3691.

40. Nuclear Dynamite, 184. See also Gulf Universities Research Consortium, 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 Activity Projections for Arms Control Planning（Galveston: The Consortium, 1975），129.

41. 福勒寄给西博格和尤德尔的信内容是相同的，日期是1968年3月25日，收在福勒的文件中，Box 88, Operation Goldfinger file, LBJL。

42. 西博格和他同事的技术发现可见“Energy Dependence of ^{209}Bi Fragmentation in Relativistic Nuclear Collisions,” Physical Review C（March 1981）：1044–1046。用非专业人士能看懂的语言对实验所做的极有价值的总结可见“Fact or Fiction? Lead Can Be Turned Into Gold,” 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31, 2014.Seaborg ’s comment was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2, 1980。

43. 关于里约布兰科爆炸的详细报告可见Frank Kreith ’s and Catherine Wrenn ’s The Nuclear Impact（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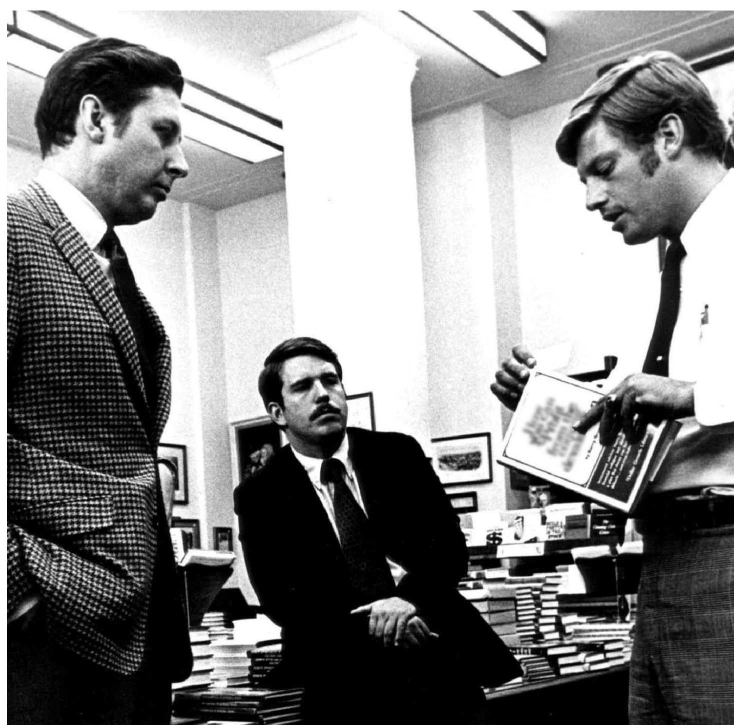
44. 与作者的电话访谈，2014年12月15日。

45. 例如，可参见“New Gold Recovery Process Tested,” Washington Post, March 28, 1968。

46. Joseph W. Bar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I, 1/16/70, by Joe B. Frantz, LBJL, 8.

第八章

决战启示录



1970年，哈里·布朗的畅销书出版，大获成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为此书相信经济崩溃近在眼前。尽管此时美国人持有黄金并不合法，这本书依然向人们推荐黄金，把持有黄金作为自己的财务保障手段。

C-141运输机因其绰号“运输星”广为人知。20世纪60年代，运输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能够承载27吨以上的重量。1967年，但凡出动运输星极有可能是向越南运送军队或补给品；但是在11月29日，几架运输星执行了一项秘密的纯粹商业任务，这项任务始于诺克

斯堡，30年前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在这儿建立了有军队驻守的黄金保险库。

当月的早些时候，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濒临失控的英国政府宣布英镑贬值，这个决定令人目瞪口呆，它掀起了全球购买黄金的热潮。1961年为伦敦市场设定的“黄金总库”规则曾经缓和了局势，现在它却再也不能满足全世界对黄金无穷无尽的需求。英镑贬值后4天，黄金销售量巨大，英格兰银行无法维持每天对私人市场的供应。在感恩节这天，即11月23日星期四，英格兰银行秘密地“耗尽”了它的黄金储备。[注]第二天早上8点，一位财政部官员写信给福勒部长：“毫不夸张地说，英国黄金市场处于恐慌状态。”[注]几天之内，英格兰银行被迫拿出“富有创意”、具有官僚作风的掉期交易来满足市场对黄金的需求，而美国财政部则急于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别的，正是借助运输星将黄金运送到英国。在美国空降指挥部的安排下，美国财政部从诺克斯堡运走了大量黄金，重达214吨。美国空降指挥部有时是“昂贵的信使”，为美国政府运送各种武器。这批货物非常紧急，财政部长福勒命令“黄金从诺克斯堡运出之前无须称重”。每架运输星运送的黄金价值1亿美元，执行费用为15 000美元；相关费用由美国财政部支付，这是外汇稳定基金的另一个新用途。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是从美国单次运出黄金数量最大的一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两批差不多数量的黄金也运往了英国。

这些飞机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的皇家空军基地。在法国退出北约（本质上就是一场戴高乐行动）之后，米尔登霍尔成为美国在欧洲开展军事活动的枢纽。把黄金运往米尔登霍尔再合适不过了，20世纪40年代，这里发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贵金属物品。一批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卡车和一队护卫警车等待着飞机降落（英国警察全副武装，这在当时很不寻常）。这支车队带着数百吨黄金行驶了71英里到达伦敦，黄金被堆放在伦敦针线街英格兰银行的后院里。

与金手指行动孤注一掷的炼金术相比，1967年末和1968年初疯狂而庞大的黄金运输数量更能说明全球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乱成一团的疯狂状态。因为黄金私人市场过热，它威胁到世界的黄金供给，所以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持有国，美国不得不动用空军将数百吨黄金运往大洋彼岸，在那里，这些黄金立即被私人市场的投机者抢购，而正是这些投机者首先挑起了危机。这项艰巨的任务旨在支撑美元的理论价值，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这种状况不仅表明病急乱投医，而且实际上正是药物致使系统出错。

危机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预见到了危机。多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知道英镑十分脆弱。正如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所说："可以这么说，每年秋天英镑下跌的时候，都会出现对英镑的重大信任危机，1964年、1965年、1966年都出现过，并在1967年达到顶点。"[注]英国政府经常要求私下会见约翰逊总统，寻求经济援助。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财政纪律。1965年，在与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电话交谈中，他用得克萨斯口音将英国人比作"一个任性鲁莽的男孩，他喝醉之后以父亲的名义开出支票，父亲可以帮他支付两次、三次、四次，最后父亲终于打电话告诉他，'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是时候拒绝他了"。[注]

人们一直担心，如果英镑面临的问题太大，它的影响就会扩散，让人无法阻挡——它的贬值有可能会危害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1966年，美联储准备了一份应急研究报告，警告人们注意"英镑贬值10%~20%后，英镑对国际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对这项研究进行了广泛讨论。他们将美国的政策选择分为三种：①维持现状；②结束当前美元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惯例，通过区分公共和私人黄金市场来维持美元的价值；③化危机为机会，治愈对"黄金和国际收支逆差成瘾"。

由于英国经济遭到了三次冲击，到了1967年春夏之际，英镑贬值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注]首先，英国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

市场——的这个决定有可能带来国际收支赤字，并引起对英镑的投机性押注。其次，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六日战争之后，局势紧张，苏伊士运河停运了，这严重延误了英国的进口贸易。最后，9月份，英国码头罢工导致出口贸易推迟。大英帝国的时代真的行将结束，而世界其他地方能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10月至11月初，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向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地区寻求援助，但他们获得的数十亿美元援助仍不足以遏制这次危机。

到了11月中上旬，约翰逊政府开始认为英镑的弱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12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福勒向总统讲述了他与一位英国外交官的会晤："除非他们能确保很快获得大量长期信贷，否则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就在一周之内，他们就要强行让英镑贬值。"[注]当英国大使于11月17日星期五要求面见总统时，约翰逊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英国政府被迫将从1英镑兑换2.80美元贬值至1英镑兑换2.40美元。"这就像是听到一位生病的老朋友必须接受一次严重的手术，"约翰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管你做了多少心理准备，这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注]约翰逊可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不过提前一个小时才收到（英镑）贬值的消息"。[注]

那年秋天，美联储官员查尔斯·库姆斯把英镑贬值和黄金市场形容为"一对定时炸弹"——如果一颗爆炸，必定会引爆另一颗。事实上它们都爆炸了。在宣布英镑贬值后，约翰逊立即发表了必要的声明："我再次明确申明，美国承诺以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现有价格向外国官方持有人购买和出售黄金。"但这种努力对市场没有任何作用。在英国宣布货币贬值之后的周末，多个国家和地区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宣布了本国或本地区货币的贬值——巴巴多斯、塞浦路斯、丹麦、以色列、牙买加、西班牙和新西兰。在当时仍被英国控制的香港地区，由于货币贬值，一夜之间小商店的商品价格提高了25%。在随后的一个工作日，即11月20日星期一，日本股市经历

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带来的后果，英国的银行、股票交易所和伦敦黄金市场一样，处于关闭状态。尽管如此，投机者还是迅速购买黄金，他们确信英国和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命运会在华盛顿重现。即使是在平时规模很小的私人黄金市场——主要是苏黎世和巴黎的切伊黄金市场，也有价值大约2 700万美元的黄金易手，而这样的交易量在正常交易时，需要多日才能达到。到了星期三，随着伦敦黄金市场重新开市，黄金交易量几乎翻了两番，交易额达到1.06亿美元。第二天，交易额达到了1.42亿美元。这时候，英格兰银行告诉美国财政部它再也不能支撑市场的日常交易了。

即使运输星运来了大量黄金，黄金总库似乎也无法维持原样。1966年已然是令人焦虑的一年，而1967年的头10个月更是雪上加霜。在此期间，联储局成员曾7次分别向该系统注入价值5 000万美元的黄金。更糟糕的是，11月下旬法国将退出黄金总库的消息公布于众；事实上，它几个月前就放弃了，但它选择公在于众的时机仿佛是为了蓄意削弱美国的地位。法国退出该组织，意味着黄金总库每支付价值5 000万美元的黄金，美国就要支付其中约3 000万美元的金额。英镑贬值使这个摇摇欲坠的系统崩溃了。在英镑贬值前一周，黄金总库损失达6 800万美元，也就是说，几天之内黄金总库损失的金额超过了1961年金库建立时任何国家（除了美国）投入的金额。在英镑贬值后的一周，损失更是惊人，达5.78亿美元。(注)伦敦金库的储藏柜里一无所有——在拥挤的私人市场上出售的每一金衡盎司黄金都直接来自美国政府以及西欧大国政府的金库。

即便是那种可怕的情况也不能代表美国黄金面临的全部风险。英镑贬值造成的国际恐慌让其他国家更有动力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黄金。而在11月下旬，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下了一笔异常庞大的黄金订单，它不是别的国家，正是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几乎无法运转，它在经历与法国的长期且残酷的独立战争之后才刚刚独立。它由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它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说近乎敌对，也是冷冰冰的”。当然，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任

何国家一样，都有权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但价值1.5亿美元的订单却让美国的政府官员们惊慌失措。注约翰逊政府的官员们担心，法国在暗中推动非洲法语国家加入它的行列，以美元兑换美国黄金。

在12月初短暂的平静之后，伦敦黄金市场在当月中旬再次沸腾起来；12月11日—15日，黄金总库成员国损失超过5亿美元。几乎所有黄金总库成员国的央行行长都告知美联储他们即将放弃黄金总库。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到了。美国政府组建了一个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1967年12月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令人越来越担忧。

此外，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准备与国会就取消黄金准备金展开斗争，黄金准备金是指政府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以支撑其货币价值。国会对预算持有敌意，它是否会给予约翰逊总统想要的结果，他自己也表示怀疑，尤其是当他还在努力推动一项“急需的税收法案”时，结果就更无法预知了。谨慎的财政部长福勒相信国会在看过不同部分的解决方案之后会予以合作（比如说，将黄金准备金从25%降低到10%）。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坚持认为，无论国会是否喜欢，都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它建议全方位、史无前例地减少从美国流出的资金，特别是收紧对外国贷款、限制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减少对外国援助。这些举措肯定不受欢迎。正如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文所说：“对于一个全力备战选举年的总统来说，这个计划无异于政治自杀。”注

果不其然，沮丧的约翰逊竭尽全力反对这个计划。越南战争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支付炸弹和汽油弹的费用加重了收支危机，但约翰逊认为打仗是势在必行的。截至12月底，约翰逊仍然把黄金和国际收支平衡看作有待他的下属解决的问题。此外，尽管美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支持众多国家，但它得到的回馈却是它的货币将被压垮、黄金储备将被消耗殆尽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约翰逊对此十分痛恨。到了12月，约翰逊的经济顾问越发焦虑，但是约翰逊并没有打算在圣诞节假期与他们待在一起处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他答

应参加12月22日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的葬礼，哈罗德·霍尔特是他的好朋友、越南问题上的盟友，因溺水而身亡。约翰逊将这一安排拓展成为期四五天、长达27 000英里的行程，该行程包括与教皇保罗六世举行圣诞会晤。外界鲜有人知，在此期间他还在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国家就越南的和平问题进行了谈判，却未能达成协议。注

12月22日他的内政高级助手约瑟夫·卡利法诺给约翰逊发了一份电报，这封电报最终让他的行踪进入公众视野。收到电报时，他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泰国科拉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尽管贸易有所改善，但美国国际收支差额在1967年的头9个月还是有所扩大；造成上述差额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国外净军事开支增加了5亿多美元。然而，第四季度“有可能使今年变成一场灾难”。国际美元投机者成为美国政府需要应对的威胁力量。在美国财政部长福勒的领导下，约翰逊的顾问正在推动几项补救措施：开征“边境调节税”，即对进口产品征税、对出口产品补贴2%或更多；对出国旅游征收每天6美元的旅游税；采取措施强烈抑制美国公司到国外投资。

第二天，激动而烦躁不安的约翰逊回复了一段很长的文字。他哀叹英国对英镑贬值“处理不当”。他讨厌进口税，并预言对美国人出国旅行征税的措施“肯定会在选举年被共和党人利用，从而对自己造成损害”。他让委员会研究各种可能的措施，比如如何有效防止海外投资增速过快，并让欧洲国家为国防支出更多。这个圣诞礼物不那么受到下属欢迎。

12月30日，美国商务部与财政部部长以及几位高级顾问、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一起前往得克萨斯州约翰逊市的总统私人庄园。他们向总统简要介绍了他需要向公众提供的“良药”。许多人怀疑国会是否会通过该计划，但在元旦那天，约翰逊在自己的庄园发表讲话，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任何总统都未曾提出过的最为奇怪的请求。演讲内容既全面又充满矛盾。约翰逊总统首先强调了全球经济的

相互依存性："你的工作、你的农场或你的企业能否繁荣昌盛，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或非洲的情况。"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告诫美国人民要切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联系。

那天早上，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一般由总统管理对外投资的权力移交给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后者将用这些权力减缓和限制大多数美国对外投资。约翰逊总统特别指出，"1968年将停止新的对西欧大陆国家和其他并不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特罗布里奇承认，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对海外私人投资实行强制性管制。(注)银行和金融机构也被要求削减5亿美元的对外贷款。

但是，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要求是，除非万不得已，美国公民在1970年之前不得离开西半球。他说："每位公民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旅行计划，除非是在最重要、最紧急、最必要的情况下，否则不要离开这个半球去旅行，这对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在这个方面，约翰逊的声明也显得相互矛盾。一方面，他认为限制旅行是自愿行为："我们认为，最为有效的……是让公民自己意识到，他们出国旅游和花钱出国正在危害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只做必要的旅行，如果他们能在这个半球旅行或者只游览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将对国家大有裨益。"(注)另一方面，他明确表示他需要国会授权："我们确实认为有必要对现行旅游政策做出某些调整，我们会要求国会这么做。"

如果曾经有人把对越战争看成小型的、临时性的交战行动，只需要美国平民做出很少的牺牲，那么这一观点在新年那天被总统的恳求去除了。不出所料，旅游业和那些依赖国际旅游的企业批评这些措施是"灾难性的"和"歇斯底里的"。(注)其他人则嘲笑这些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提议看起来太小题大做。在《新闻周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揶揄美国政府无能，并嘲笑其补救措施滑稽可笑。弗里德曼主张采取"浮动"货币价值，其价值根据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市场关系而定。"美国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啊！美国这

片自由的土地居然禁止商人到国外投资，并要求公民不要在外国港口露面或打开钱包……我们真的在国外旅行中浪费了那么多东西，以至于比我们更有才智的人必须哄骗我们留在家里吗？1967年，国外旅游的总支出不到消费总支出的1%。”注

然而，步调一致的美国政府游说团有效地安抚了国外盟友。3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带着财政部官员和经济学家先后前往一些亚洲国家、加拿大和西欧，解释美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计划。尽管它们对美国的一些补救措施感到不安，但是这些盟国普遍接受了他们的计划，至少美国政府最终似乎承诺要采取某些行动。然而，不管这些代表飞到哪里，那里的央行行长和政府都纷纷要求取消黄金准备金，并坚称“成功的计划需要我们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注虽然国会不打算两周内重新开始处理事务，但主要立法者对总统的声明表示欢迎，并承诺迅速采取行动。

新年当天宣布的措施不太可能扭转长期的国际收支问题，为此，约翰逊需要国会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正如他在1月17日当天的国情咨文中阐述的那样。与此同时，约翰逊的顾问开始尽其所能，仅仅采取行政措施来完成任务。几个星期以来，白宫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士就一些晦涩的问题展开辩论，例如如何界定正常的商务开支以便实施国际旅行禁令（尽管无论如何都不会颁布这个禁令）。注然而，几周以来总统的声明似乎起了作用。国外对美国黄金的需求下降，美元在外汇市场走强。私有黄金市场似乎恢复至正常的状况了，在一月份的头几天，黄金总库还真的进账了几百万美元。

白宫对能够争取到时间非常感激。但是，新的稳定局面几乎无法减少白宫的阴霾，尤其是在1月下旬，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灾难性的“新春攻势”，袭击了众多的越南共和国城镇。2月初，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访问了华盛顿，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向心存疑虑的民众表明他可以公开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白宫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约翰逊向威尔逊展示了由芭芭拉·沃德为他准备的简要分析。芭芭拉·沃

德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经济作家，也是大西洋两岸知名的记者。她出生在英国，后来被封爵，并成为杰克逊夫人。她的作品大多涉及发展中国家，对约翰逊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总统曾经说过，沃德的书是他唯一读的书。在谈到她的一本书时，他说：“我读这本书就像读《圣经》一样。”

然而，如果约翰逊给威尔逊看的沃德备忘录类似于圣经，那一定是《旧约》。随着英镑贬值、美元继续受到冲击，沃德警告说，全球性萧条可能毁灭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 不容乐观的世界经济形势正在酝酿之中，一些危险的迹象暗示类似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灾难即将发生。如果发生危机，那么其经济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世界贸易也许会严重错位，这将导致欧洲出现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反过来它又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苏联人可能会嗅到他们长期以来期待的资本主义失败的迹象，重新采取强硬的冒险主义、持有敌意的态度。落后国家会陷入绝望。这个世界可能会倾覆，脱离目前这种并非完全失效的“共存”状态，形势十分危险。

1968年初，美国内外混乱状况似乎证实了沃德的预言：越南的“新春攻势”；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朝鲜扣押了美军军舰“普韦布洛”号以及83名水兵，其中许多人遭到殴打和酷刑。2月8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货币黄金库存价值上周已下跌1亿美元，目前还有118.84亿美元，创下30年来最低点。

2月28日，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向白宫计划投掷了一枚炸弹，新年宣言和国情咨文带来的任何一点点的和平气氛都烟消云散了。贾维茨是一位纽约自由共和党人，他表示自己代表许多华尔街银行家的观点，呼吁美国停止向其他国家支付黄金。他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将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会严重损失

剩余的黄金储备，严重损害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也严重削弱美元作为世界标准国际货币单位的能力”。贾维茨抨击说，美国政府对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的反应“完全不符合现实主义，也没有任何想象力”。这位秃顶的长者质问参议院：当黄金储备耗尽时会发生什么？几乎没有知情人士愿意公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条款已经从一种稳定战后世界的手段自行走向结束——但是由于每个月或每个星期都有数亿美元从财政部手中流出，眼前的结果会是什么？美国推迟终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时间越长，最后可以用于救急的黄金将越少。贾维茨认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可能避免美元需要采取终止可兑换为黄金的措施”。

当市场和外国政府有所警觉、做出反应时，美国政府似乎有些措手不及。然而，贾维茨可能帮了约翰逊的顾问一个大忙。此时，许多白宫成员都同意，把美国的黄金运到国外这种愚蠢行为必须停止，但他们仍然被吓坏了，不敢采取行动来加深危机感。不过贾维茨的发言不容忽视。正确与否，它都被当作美国政府未来政策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促使美国人购买黄金和白银股票，促使海外投资者以与11月份差不多的速度抢购黄金。3月1日星期五，黄金总库的黄金交易损失了9 000万美元，随后的星期一损失了5 300万美元。黄金总库成员国表示，它们不能再继续参与了。意大利一月份不得不从美国购买黄金，以弥补在交易中损失的金额；比利时和荷兰也不像此前那样坚定参与美元总库的行动了。未来的专家正在悄悄地谈论各种灾难性的场景，其中一些场景呼应了芭芭拉·沃德的悲观预警：南非已经减少了向私人市场提供的黄金数量，它原本是伦敦的主要黄金供应国，现在转向了巴黎；美国正准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抽走大量黄金以弥补英镑贬值造成的黄金损失。任何人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影响市场的所有传闻，更不用说核实或驳斥这些传闻了。有人在《经济学人》的文章里评论道：“世界仍在不断地受到每一个谣言的影响。”(注)

西方发达国家希望美国能解决它们共同的问题，但美国国会在选举年陷入僵局，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财政改革，必须采取其他的解决办

法，比如重新调整黄金与世界货币的关系。3月8日，美国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在备忘录中对总统说：“我自己的感觉是，水落石出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不到一周后，也就是3月13日，黄金总库损失了大约2亿美元，美联储主席马丁给欧洲央行行长打了电话，告诉他美国可能不得不关闭黄金市场。那天，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我们真的必须告诉人们这些令人遗憾的事实——有关美元的危险、严重削减预算的可能性、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必要性和通胀的危险。尽管这会让民众惊慌失措。”[注]

这为现代金融史上最动荡的一天埋下了伏笔。3月14日上午，财政部长福勒出现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面前。他做证说，黄金持续失血“威胁到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存，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他还透露，美联储将提高贴现率，这会导致纽约股市立即抛售；在这个已经阴霾密布、股市低迷的季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当年单日最大跌幅。

几小时后，参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取消美元的黄金准备金，从而释放出价值约100亿美元的黄金。如果法案未能通过，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打击全球市场，而国会和白宫之间激烈的关系意味着投票结果仍充满了不确定性。2月，众议院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取消黄金准备金的法案。那天早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打电话给财政部，他警告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有足够的票数让法案通过；此外，该法案有可能会被推迟，甚至在修改流程中被搁置。在参议院投票表决白宫法案的前一天，另一项法案几乎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保留12.5%的黄金准备金。西部地区强烈要求采取这项措施，它们自这个年代伊始就一直向财政部和白宫施压，要求对黄金采取一些措施。科罗拉多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警告说，如果取消黄金准备金，将会有“严重危险”。财政部长福勒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拜访，希望说服他推动众议院法案的通过，并不做任何修改。

约翰逊一定很向往罗斯福的时代，那时几乎以全票通过了金融立法。虽然约翰逊的法案是作为一项紧急措施被提出来的，但它在参议院仅仅勉强通过——39票对37票，比白宫原本预期的支持率小得多。[注]约翰逊政府的经济策略依次被孤立和排斥，这比投票本身更能说明问题。在议案通过前的最后几天，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出现了：来自两党的保守派与反对越南战争的自由主义批评者联合起来，他们认为黄金准备金提案对解决多年来无法解决的优先支出权问题不会起任何作用。许多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附和了贾维茨两周前提出的批评[注]，他们认为，取消黄金准备金只会使私人投机者得到更多黄金。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将成为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黄金采矿业在他所在的州举足轻重。他是表明国会自由主义者对黄金准备金法案和越南开支法案的关联产生过影响的见证人。2010年首次解密的议院秘密会议记录显示，到了1968年3月，许多参议员在回顾东京湾事件时，非常质疑越南战争的可行性，并怀疑约翰逊政府有关战争的说法是否真实。对他们来说，黄金准备金提案是对约翰逊在国外的鲁莽冒险行为的默许。“要求国会取消黄金准备金，这并非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良方，它只是暂时性的手段，只会进一步向外国的黄金申购者放开我们日渐减少的黄金储备。”麦戈文说，“为了恢复对美国政策进行更好的常识性评估，美国国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手段之一是，拒绝让我们的黄金继续流失，并拒绝增加税收的愚蠢政策，而这些正被要求用来推动全球化。”[注]

大多数发声的共和党人都同意这个观点，麦金利时代的共和党人与黄金之间存在的类似心灵纽带那样的联系几乎一去不复返。令人惊讶的是，1968年几乎没有什么共和党人宣称愿固守于金本位货币仅存的一些残余影响。相反，大多数人认为，约翰逊政府在解决一些损害美元的财政和经济问题方面做得太少，比如通货膨胀、预算失衡和越南支出失控这些问题。斯特罗姆·瑟蒙德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位直到1964年才成为民主党人的共和党人：“我不相信取消黄金准备金会恢复信心。依我看，国外将会把这种举措解读为美元即将走

弱，认为我们试图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而不是做出更艰难的决定，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美元购买力的下降。”

不管瑟蒙德的解释是否正确，不可否认的是，取消黄金准备金在几个月后成为芝加哥流行的热词，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在参议院辩论期间，瑞士各大银行的业务窗口堆满了订单。一位苏黎世商人告诉记者：“黄金购买量已经如此之大，我们不再接受任何订单。我的银行职员的体力消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极限。”[注]瑞士各大银行为了优先处理黄金购买订单，提前两个小时关闭了黄金交易。在巴黎，一位美国官员电告华盛顿，称“暴徒”占领了交易所，当天在巴黎交易了40吨黄金，是平均日交易量的50多倍。在布鲁塞尔，黄金交易商售光了黄金。潜在的黄金买家被告知他们需要等待3个月，并且没有交货保证。

美国东海岸时间下午5点30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该委员会的卓越领导者查尔斯·库姆斯告诉与会银行家，“国际金融体系正陷入一场自1931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该委员会随后授权对其货币互换约定进行一系列修改，希望能够防止第二天外汇市场发生美元挤兑。

在大西洋彼岸，英国首相威尔逊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弄懂央行接二连三地传递的信号，这加剧了他的担忧，担心新的全球萧条即将来临。英国时间午夜时分，他向约翰逊发去了一封绝望的电报，而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忽视了这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援引了约翰逊与他分享的沃德的可怕预言：“我们都必须明白，今晚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你们预见的情况。上个月你们在白宫给我看了一份短短的文件，那份文件预见了事态将会无情地发展，致使我们回到1931年的灾难时刻。那时候，你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源于英镑。而事实上，它的出现是为了抢购黄金。”[注]尽管此时已是深夜，但威尔逊和他的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去白金汉宫拜见女王，并于凌晨1点宣布第二天银行紧急休业。凌晨1点45分，威尔逊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高级经济部长会

议。他们必须控制几个小时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伦敦黄金市场将无限期关闭。

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美国政府与所有欧洲政府进行了接触，召集各国央行行长到华盛顿参加周末紧急谈判。当各国驻美大使馆报告无法联系到人时，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些人。”除了法国之外，其他所有重要的欧洲经济体都派代表参加了在宪法大道联邦储备大楼匆忙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代表。参与谈判的10个人控制着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也就是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四分之三。在大楼外面，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把美钞和苹果递给记者，并大喊：“美国正在每秒花费1 000美元摧毁越南。”注

时不时的危机气氛可以有所裨益：一种迫在眉睫的厄运感让争吵不休的各位部长集中注意力，减少其他次要问题对他们的干扰。这一次，10个人聚集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这个会议室有两层楼高，像银行金库一样被封得严严实实。这些人设法结束了多年的争吵，亲口解除了自1961年以来统治着黄金市场的黄金总库约定，同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尽管最终协议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形成文字，鉴于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能达成协议仍然非比寻常，黄金总库将被解散，但令人惊讶的是，各大央行一致认为，它们拥有的黄金足以满足世界货币需求。在未来，也就是在危机解除的时候，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没有必要在私人市场上买卖黄金。如果各国央行需要在它们之间转移财富，那么它们仍然可以以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汇率使用它们拥有的黄金；如果世界需要整个系统中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么它可以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的特别提款权，各方现在都同意加快该提款权的完善。这项约定还意味着，未来生产的黄金将不需要用于支撑世界货币，它们全部可以流向私人投资者并用于艺术和工业领域。美国财政部将不再从私人那里购买黄金，也不再将黄金出售给有

黄金使用许可证的艺术或工业类用户；这些交易将私下进行。私人市场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因为它的日常波动将不再威胁各国货币。

尽管对结果表示怀疑，但美国政府对紧张不安的欧洲人如此合作感到惊讶。几个月后即将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约瑟夫·巴尔回忆道：“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么糟的事情会成功。”[注]两个星期后的愚人节那天，伦敦黄金市场重新开放，并且黄金价格没有丝毫悬念地小幅上涨。到当年年中，黄金的交易价格通常超过40美元每金衡盎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买进黄金、期望黄金与美元重估的那些人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他们得到的回报并不惊人，但至少他们不用等到1971年就能拿到回报了。

但是，由于这份有关黄金体系的协议是匆忙而就的，从长期来看，它的前景并不乐观。正如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文所称，这个两级金价计划是“虚构”和“明显的噱头”。[注]认为黄金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具有一种价值，而在另一环境中具有另一种价值的观点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而且可能因为投机造成不稳定。如果黄金在私人市场的价格涨得足够高，就连欧洲的央行行长也会被诱惑去挖掘金库的价值。此外，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对维持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南非从一开始就不是黄金总库的成员国，因此它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而且这个双重金价市场背后也没有法律的支持。因此，在双重金价市场存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南非要求购买价值约3 500万美元的英镑以换取黄金，并请求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美国财政部官员认识到两级金价体系中存在一个“漏洞”，南非正成为这个他们在危机中建立的两级金价体系的主要威胁。[注]

全球货币政策未能更加连贯一致，这并非因为约翰逊政府内部缺乏想法或决心，也不是由于来自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阻力；如果说有什么原因，那就是1967年末和1968年弥漫在人们四周的经济危机气氛，使得黄金总库成员国央行的银行家和政府产生了共同的使

命感，这些央行和政府的财富对世界而言十分重要。尽管问题显而易见，但是大多数主要参与者愿意去遵守两级金价这个噱头（虽然法国有违反它的动机，但是1968年初它已经在国际货币市场失去了影响力）。

约翰逊无法得到美国国会的真正首肯，甚至无法在他自己的党内得到支持，也无法在议案审议过程中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从而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黄金准备金法案艰难地挣扎到了终点，没有享受到罗斯福曾经享受过的道义上的支持。任何更为全面的建议都不值一提。到了1968年，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开支和政治局面偏离正轨，金融选择的范围已经缩小到几乎无关紧要的地步。在这个月结束之前，约翰逊将宣布退出连任竞选。众所周知，他对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这样描述他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果我离开我爱的女人——这个伟大的社会——去与那场战争做斗争，那么我就会失去一切，我所有的计划、我所有的希望、我所有的梦想。”这也适用于任何希望拥有理性的、可理解的并得到普遍支撑的黄金和美国货币政策。约翰逊铤而走险的黄金战略再次证明，当美国需要在战争、国际霸权、经济福祉和黄金支撑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时，黄金总是会退居次要地位。

对这个世界而言，两级金价体系意味着现在美元是汇率机制，而黄金不是。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自18世纪以来，黄金和美元之间首次脱钩。它们之间没有固定的互换价格，黄金在伦敦市场的价格几乎不会直接影响任何一个遵守法律的人。对市民而言，黄金兑换成美元没有任何保证，这种情况仍将继续。即使当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取消美国的金本位制时，仍然强制要求用一定数量的黄金来支撑美元。而随着黄金准备金的取消，就连这种抽象的关系也消失了。

对美国人和他们的财产来说，黄金与货币脱钩使得许多人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以防美元贬值。1968年，报纸的金融版面上充斥

着对于手稿、新艺术风格艺术品等各种另类的投资工具的分析，这些分析充满焦虑。由于盲目的追捧，这些投资工具越来越有市场，但事实证明，很少有万无一失的投资方法。对贵金属的投资相对来说有保障，但除了春季伊始金价相对温和地上涨之外，人们尚不清楚金价将如何变化——1969年和1970年黄金年终收盘价每年都将下降5%以上，也不清楚黄金有多么重要，因为美国人在其国内外拥有黄金依然是违法的。金价对于建立两级黄金体系的反应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对于黄金投资者来说，取消拥有黄金的禁令就是没有掉下来的那只靴子。一位黄金爱好者认为，一旦25%的黄金准备金被取消，“禁止美国公民拥有黄金的法律禁令将同时取消，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的财政部认为黄金的价值低于纸币，也就不太在乎谁拥有它了”。[注]然而，禁令并没有取消，也没有证据表明约翰逊政府认真考虑过这件事。

想方设法保护资产的投资者进退两难。投资贵金属的传统做法仍然具有吸引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持有甚至热衷囤积1966年以前的银圆。随着1968年白银交易价格超过每金衡盎司2美元，旧银圆、五角硬币、一角硬币和25美分硬币的价值也远远超过面值。有一段时间，银行把白银的市值作为贷款的抵押品，但到1968年年中它们停止了这种做法。囤积银币的人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持有一种货币，但他们既不能按其价值来使用这种货币，也不能合法地把银币熔化。并不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1968年4月，特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附近的飞机修理库逮捕了3名男子，他们有两吨银币和硬币，还有一个熔炉。然而，针对他们的指控被驳回了。

没有人能完全自信地预测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就连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也无能为力。正如19世纪70年代白银的非货币化引发了愤怒和对“阴谋”的指控一样，不需金属支撑的货币观念也引发了一轮焦虑甚至可怕的预测。自从罗斯福政府禁止私人拥有黄金以来，就有评论员认为美元的持续贬值是治愈经济危机的药方，1968年的黄金危机使这种观点更是广为人知。例如，固执的纸

币灾难预言家弗兰兹·皮克在黄金危机之后又重新大受欢迎——1969年8月，他在一本非主流杂志发表了有关黄金的长篇文章，这本杂志通常不刊登与货币政策有关的文章。但是，金本位的倡导者也开始另辟蹊径。在一些情况下，支持黄金货币的观点特意表明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关，以增加它们的学术分量。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观点与20世纪30年代的詹姆斯·特鲁协会和20世纪50年代末的约翰·伯奇协会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它们批判美国社会的激进保守主义及阴谋论。正如19世纪末期出现了支持和反对金属货币的小册子运动一样，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硬通货”学派在政治和商业主流中蓬勃发展。硬通货运动的许多主要人物为威廉·F.巴克利的保守党杂志美国《国家评论》工作或撰稿。这些学术研究、宣传和投资建议一起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基本框架——不管时形势有多么吓人，都让他们去理解身边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一篇名为《论黄金与经济自由》的简短文章是硬通货流派最著名的奠基性著作，它出现在1966年的《客观主义者》简报中，这个杂志是由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小说家和哲学家艾恩·兰德出版的。作者是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他会演奏单簧管，并已经成为兰德公司的核心人物。后来，格林斯潘的一位传记作家称这篇文章“可能是他最具煽动性的文章”，是对美国政府超支的自然倾向的全面抨击。“国债仅仅是一种没收财富的计划，”格林斯潘坚持说，“黄金阻碍了这个阴险的过程。”这些观点在当时获得了支持，但在20年后，当格林斯潘接管美联储（美联储维持着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纸币供应）时，这些观点将变得难以为继。

这个时代最富于智慧的作品是一本60页的小册子，《为什么钱变少了？》这本小册子于1964年由知名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默里·罗斯巴德出版。在书中他全面论述了美元的历史，认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破坏和有害的侵占，而且任何自由-保守主义的愿景都会受到限制，除非它试图消除政府对货币的束缚。罗斯巴德的部分观点来自他对19世纪“野猫银行”(注)时期银行业的研究，这一时

期出现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以及后续的经济损失。虽然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银行业看作银行需要严格监管的证据，但罗斯巴德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这是对因政府干预而运作不良的金融体系进行的一次清洗，从而助其再度高效运转。

罗斯巴德认为，政府的货币垄断地位可以被黄金（可能还有其他金属）的货币制度取代，在这种制度下，钱币可以私下铸造和交易。在不可能采用实物黄金的情况下，金库收据可用于贸易。自由市场可处理出现的任何欺诈和钱币贬值问题。虽然罗斯巴德的论点符合逻辑、证据充分，但他的言辞却很犀利。“政府一步一步地侵入自由市场，完全控制了货币体系，”罗斯巴德写道，“缓慢而确定地控制货币，用于（一）以政府决定的速度使经济扩张，（二）使整个经济偏离原有发展方向。”[注]罗斯巴德把安德鲁·杰克逊绝对抵制纸币和中央银行的这种学术观点移植到冷战背景下，向美国保守派发起猛烈的挑战——如果不提倡废除政府支撑的货币，就是跑偏了。他的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马克·史库森所写：“罗斯巴德的《为什么钱变少了？》对硬通货运动有着重要意义！。”[注]

对于罗斯巴德的革命者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处都能看到确凿的证据。其中一位是尼尔·麦卡弗里，他是美国《国家评论》的撰稿人，1964年辞去了中规中矩的图书出版工作，转而通过阿灵顿出版社和保守党图书俱乐部出版书籍。许多作品都是体现保守主义思想的短文——其中一部成功的作品是《比尔语录：小威廉·F.巴克利的最佳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书，而那些书名迎合了麦卡弗里对爵士乐和经典电影的热爱。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分币和角币中不再使用白银，麦卡弗里开始出版书籍，提倡“硬通货”。开始的两本是由投资顾问威廉·F.里肯巴克写的，他也是美国《国家评论》的高阶编辑。里肯巴克的父亲是一名被授予勋章的战地飞行员，他创办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里肯巴克在1960年因拒绝填写人口普查表并宣布这是非法搜查他的家园而被起诉，他也因此声名狼藉。他于1966年出

版了《美国银币史》一书。里肯巴克认为“未来的作家……毫无疑问会同意这一事件（面值为25美分的硬币和1角的硬币不再使用白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里肯巴克看来，美国政府对钱币的干预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经将美国货币推向了一个悬崖：“自从1792年以来，我们的货币第一次完全依靠政治家的承诺。”[注]接着在1968年的黄金危机之前，他写了一本类似的书——《美元之死》。

这10年来，阿灵顿出版社热衷于出版倡导小政府理念的书，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计算机应用公司于1968年收购了阿灵顿出版社，偏偏这家公司是从与美国军方和美国宇航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中积累了财富的。但是阿灵顿出版社及其硬通货理论的拥护者只是略为冒险，就在设法将硬通货运动的抽象观点转化成日常的金融实践时赚了大钱。具体操作的人是田纳西州的投资顾问哈里·布朗；如果说罗斯巴德提出了硬通货，那么布朗可以说把它发扬光大了。布朗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集大成者和说客，他出生于纽约市，在洛杉矶长大，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音乐家兼电影作曲家和播音员的儿子。他的父母在纽约市WABC广播电台相识，布朗的父亲撰写并表演了20世纪20年代的节目，比如《地下室骑士》，这个节目里面有两位美国黑人看门人；又如《流浪汉》，这个节目记录了流浪汉的生活。后来，布朗的父亲成为电台音乐喜剧节目《斯派克·琼斯秀》的创始人。哈里·布朗在大学上了两周课后就退了学，他后来说：“我不能在课堂上保持清醒。”他尝试着编辑保守派杂志，每周写一篇联合报纸专栏，专栏在数十家较小的西部和中西部报纸上刊登（刊载布朗专栏文章的报纸包括《圣马力诺论坛报》、《利马新闻》和《潘帕每日新闻》）。

布朗花费了大量时间吸收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首先是罗斯巴德的思想。他说罗斯巴德对他的有关货币的写作提供了“最重要的帮助”。布朗借用罗斯巴德的概念并将它推广开来，例如，无论是“美元”或“法郎”还是其他货币，所有的纸币都应该被正确地称为“货币替代品”，因为它取代了规定的黄金等值，即黄金是唯一的“真实”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在任何一年中世界上的

可用黄金都只会少量增加，所以任何以每年2%以上的速度增长的经济体都肯定会通货膨胀。布朗吸收了作家亨利·黑兹利特的观点，认为美国官员经常在货币和货币贬值等关键问题上撒谎或加以掩饰。

布朗对于知识的兴趣使他走得更远。他深受一群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加利福尼亚航空航天工程师的影响，这些工程师参与了保险和经纪业务，还建立了一所致力于推广自由放任思想的学校。尽管他们深受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奥地利理论家的影响，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赞成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是安德鲁·高隆博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观点甚至在自由主义圈子里也受到了质疑。高隆博什是匈牙利移民，后来成为天体物理学家，为核导弹规划飞行路径；他还以出售证券和保险为副业，后来在惠蒂尔学院教授物理。20世纪60年代初，高隆博什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企业研究所”的私人研究和教学组织，他在那里教授“意志科学”，一种政治哲学。[注]高隆博什非常赞成保护知识产权的观点，甚至禁止学生传播他的思想；据说他每次使用“自由”这个词时，都会把五分钱放进一个罐子里，作为版税给托马斯·潘恩的后代，因为他认为是托马斯·潘恩创造了这个词。[注]布朗写道，高隆博什“对上过他课程的成千上万的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高隆博什激励他写出了所有的书。

与哈里·布朗保持亲密关系的不止这些怪人。像高隆博什一样，布朗重视对个人的直接授课，认为这比他日常的报纸写作更重要。从1966年开始，布朗为好莱坞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富裕客户举办了多天的深入专题研讨会，题目是“自由经济学”和“有益生活的艺术”。通过这些研讨会，布朗了解了什么会吸引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还深入探讨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前卫思想。比如，布朗深受简单的、自力更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种生活方式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普及，之后它与环境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未来》等作品中）。

但是也有更深层次的压力。布朗带着些像他父亲那样对于演艺事业的热情，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尝到了世界末日的滋味。在很多方面，布朗在这个时期对投资的见解虽然保守，但却很普通：因为股票和房地产与不靠谱的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因此最好投资于黄金和白银，并将资产存入瑞士银行保值。布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坚持认为现状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认为经济崩溃迫在眉睫，犹如几天之内将要发生似的。

1970年8月，《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周六可能会发生两场货币危机（其中一场可能更早发生）！"尽管《危机下的投资Ⅰ》一书（该书由布朗撰写、阿灵顿出版社出版）此时已经畅销，但许多主流读者接触这本书是通过这类广告，广告上承诺，布朗"告诉你即将到来的贬值对你、你的工作或你的生意、你的个人财务状况和你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告诉你在每次危机中应该有什么计划，而计划总是根据目前不可避免的贬值而确定的"。布朗的投资计划基本上是切实可行的：他指导读者如何将钱兑换成瑞士法郎，他们应该在现金中拥有多少银币，如何以及为什么购买黄金矿业公司的股票以及类似的投资建议。但是，他认为货币贬值及其后果会非常严重，这迫使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告诉人们不仅要购买黄金，而且要把黄金埋在地下，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此外，布朗一再主张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避难所"——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最好位于农村地区，那里储备着金银和足够维持一年的物资。（布朗从来没有确切地解释过为什么经济灾难的幸存者会发现以物易物时金银更有利。）在他的研讨会上，布朗经常与唐·斯蒂芬斯合作，唐·斯蒂芬斯是未来主义生态住宅设计师，也是《隐居者目录》的作者，这本书是一个全面而不断更新的资源指南，是为那些对低成本和低调的"隐居"生活感兴趣的人准备的。《隐居者目录》设想了一场比大萧条更深层的、更猛烈的经济危机。它指出，由于严重的燃料短缺，农业和交通运输重新回到用马匹作为动力来源的时代，成群的抢劫者全副武装，他们会占领城市街道并带来致命的后

果。唐·斯蒂芬斯和他的妻子芭比写道："我们已经多次指出，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85%的城市人口可能死亡，约10%的人逃离城市，只有5%的人留在原地并存活下来。"注

对布朗来说，隐居是防御性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瑞士银行账户同样重要。例如，布朗告诉他的读者，如果发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们的社会将变得面目全非。"没有货币，美国政府就不能让学校、警察机关或收税部门运转，"布朗解释说，"最有可能的是，美国的所有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崩溃。"那么，要想在那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关键就是隐居。"应该远离任何大都市地区，"布朗建议，"只有当地居民基本上自给自足并奉行个人主义，农村地区才会安全。该计划包括任何你可能做的事情，它可以给你保护、方便你出行、给你自由、使你免受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带来的混乱和骚乱的影响。"他发誓，如果读者们准备采纳布朗的建议，他们会坚持不懈并"找到获取新的财富的机会"。

当然，布朗有点过于偏执。如果美元与黄金兑换体系崩溃，那么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芭芭拉·沃德、哈罗德·威尔逊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担心的美国政府货币危机就会发生，而布朗对社会经济的预言和启示仅仅只是对该危机在程度和细节方面有所不同。在他们预见的两种情况下，拥有更多的黄金似乎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谁能持有黄金。美国出现了城市骚乱、货币危机和股市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69年下跌了约15%，这使得股市投资者特别焦虑，布朗将天塌地陷的情景和投资硬通货的建议结合在一起显然非常有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蜂拥而上，竞相了解他传达的信息。1970年11月，布朗的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这意味着作者和出版业新贵阿灵顿出版社获得了巨大财富。

布朗的书在阿灵顿出版社至少被印刷了13个版次。现在，这位黄金福音传播者不再只是出现在由打字机打出来的时事通讯和在酒店会

议室召开的研讨会上。各种各样的黄金爱好者都小有名气了，布朗出现在电视和电台脱口秀节目上，主流杂志纷纷介绍那些主张金本位制的人士。

大小出版社都竞相出版与布朗著作类似的书，各大书店争着购买。唐·斯蒂芬斯和芭比·斯蒂芬斯夫妇说，随着布朗的成功——他在一本简短的文献目录中提到了他们，“对（《隐居者目录》）的订单需求激增”。《防通胀，保未来》这本1971年出版的书几乎没怎么提到黄金，它只是汇集了几十件在收集手稿、邮票和钱币，购买佛罗里达的房产、斯蒂芬·克兰的首版书和高增长的股票方面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同年，另一本书名更长的书出版，即《黄金—美元、贸易—经济和税收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970年末，在布朗的畅销书《如何打败通胀》出版之后，阿灵顿出版社紧接着又在1972年出版了一本《你需要知道的有关金银的一切》。这本书的特色是，它的每一章都是专家专访——哈里·布朗、弗兰兹·皮克、默里·罗斯巴德和其他专家。这本书的版权不属于任何作者，而由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拥有。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交易机构，其创始人路易斯·卡拉比尼撰写了这本书的引言部分（大概也是由他进行了采访）。这本书出版了多次，从建议读者购买黄金演变为完完全全地向他们兜售黄金。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黄金爱好者数量众多、相互关联，堪称可掀起一场运动了，它会为未来10年带来更大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投资客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有些人持有阴谋论或者偏执的世界观，而那些只对投资感兴趣的人则回避这样的观点。有些人相信可以利用美国的选举制度来推进他们的想法——特别是哈里·布朗，后来他在1996年和2000年代表自由意志党参加总统候选，而其他人则拒绝与美国政府建立任何联系。尽管倡导金本位的人士越来越受欢迎，但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远离美国主流政治。罗斯巴德和他的许多助手认为，试图改革像美联储或美国铸币局这样的机构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政府的货币管制本

质上会带来通胀，它是腐败的、具有破坏性的。同样，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布朗和罗斯巴德并不关心美国政府是否用黄金来定义货币，因为在他们看来，黄金是唯一真正的货币，其他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创造的虚无。（布朗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离开了美国；他到了加拿大“隐居”，并于1977年移居瑞士，直到2006年去世。）然而，所有倡导金本位的人士都认为黄金禁令应该结束。他们赞成大量持有黄金的投资策略，认为如果不是将黄金交易局限于黑市或者将黄金藏于后院地下室和秘密账户中，这种策略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并且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民众。很快，他们的愿望就会实现了。

---

1.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November 27,1967, 6.
2. T. P. Nelson to Secretary Fowler, “Gold and Exchange Market Developments, November 23-24,” November 24, 1967. Fowler papers, Box 83, Gold: September 1967 file, LBJL.
3. Frederick Deming Oral History, tape 2, p. 18, LBJL.
4. Johnson phone call with William McChesney Martin，August 5, 1965, conversation WH6508.02，音频可在http://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presidentialrecordings/johnson/1965/08_1965获取。
5. 该记录来自哈罗德·威尔逊和其他人以及艾伦·汉密尔顿的回忆录，“Beyond the Sterling Devaluation: The Gold Crisis of March 1968,”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7, no. 1（February 2008）:73-95。
6.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wler to President Johnson, November 12, 1967, LBJL, National Security File, NSC History, Gold Crisis, November ’67-March ’68, Box 54.
7. Lyndon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315.
8. Sir Alec Cairncross, Sterling in Decline: The Devaluations of 1931,1949 and 1967, 2nd. ed.（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191.
9. 有关黄金总库的损失的数据来自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 minutes，November 27, 1967, 3。

10. 媒体对阿尔及利亚的黄金销售量的报道数据是“金额超过1亿美元”，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67。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显示，这一数字为1.5亿美元。

11.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3.有关引起委员会提出资本管制建议的激烈辩论的详细描述可见James E. Anderson and Jared E.Hazleton, Manag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 Johnson Presidency（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197ff。

12. 有关约翰逊1967年12月出访行程的精彩回顾可见Sid David,“When LBJ Took a Flying Leap at Peac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4, 2007。

13. 特罗布里奇的话可见“No ‘Basic Change’ — Controls First for U.S. — No Time Limit Set for Their Dura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68。

14. The President ’s News Conference at the LBJ Ranch, January 1, 1968, The Johnson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New York: Earl M. Coleman Enterprises: 1978），2:881-888.

15. “Travelers and Agents Dismayed by Johnson ’s Call for Cutback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68.

16. Milton Friedman, “The Price of the Dollar,” Newsweek, January 29, 1968, 72.

17. Report on Our European Balance of Payments Trip, January 7, 1968, Papers of Francis M. Bator, “B/P—Katzenbach & Deming, January 1968,” Box 17, LBJL.

18. 例子可参见Benjamin Read, “Memorandum for Mr. Walt W. Rostow,” January 29, 1968, in Papers of Anthony Solomon, Box 22, Folder 4（Balance of Payments Program 1），LBJL。

19. “The Latest Gold Rush,” The Economist, March 9, 1968, 58.

20. Humphrey to Barefoot Sanders, March 13, 1968, Papers of Barefoot Sanders, Box 29, Tax Bill 1/68－3/68 fle, LBJL. Cited in Julian E. Zelizer,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Lyndon Johnson,Congres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Great Society（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5），287－288.

21. 近四分之一的参议员没有就黄金准备金议案进行投票。几位参议员“成对”投票——同意一次反对一次，并同意不去正式投票，九位民主党人（包括泰德、鲍比·肯尼

迪和沃尔特·蒙代尔）表明支持该议案，但他们没有投票。

22. 然而，贾维茨投票支持美国政府的黄金准备金议案。

23.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March 12, 1968, 6162-6163.

24. “Swiss Bankers Close Counters Early, But Say Gold Orders Continue Ris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68.

25. Cable from Harold Wilson to President Johnson, March 14, 1968, Papers of Francis M. Bator, “Gold Crisis, March 13－16,1968, FMB Washington Trip,” Box 10, LBJL.

26. “10 at Washington Parley Seek to Solve Gold Crisis,”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68.

27. Joseph W. Bar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I, 1/16/70, by Joe B. Frantz, LBJL, 11.

28. 弗朗西斯·加文在1968年3月所做的有关黄金危机的档案工作不会少于其他学者。这些引语来自 《黄金、美元和权力》第七章。在本章中我一直把他的著作作为我自己档案研究的补充。另一个颇有价值的来源是Robert M. Collins, “The Economic Crisisof 1968 and the Waning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no. 2（April 1996）: 396－422；然而，自柯林斯（Collins）的文章发表以来，约翰逊的一些重要材料已经曝光。

29. T. P. Nelson,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June 14, 1968,Papers of Henry Fowler, Box 83, “Domestic Economy: Gold”Folder, LBJL.

30. Robert A. Gilbert, Gold Mining Shares: An Institutional Study（New York: Investors’ Press, 1968）, 16.

31. 野猫银行指为逃避顾客用其自身发行的银行券兑换铸币或黄金的业务而故意在偏远地区开设的银行。

32. Murray Rothbard, 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4th ed.（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88－89.

33. See Skousen ’s essay “Murray Rothbard as Investment Advisor” in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Essays in Honor of Murray N. Rothbard, ed. Walter Block and Llewellyn H. Rockwell Jr.（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34. William F. Rickenbacker, Wooden Nickels o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ilver Coins（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66）,9, 156－157.

35. 截至本文撰写之日，自由企业研究所依然存在，汇集了大量的“意志科学”在线学习的材料。它的网站是http://www.fei-ajg.com/index.html#aboutFEI。

36. 布赖恩·多尔蒂在Radicals for Capitalism: A Freewheeling History of the Modern American Libertarian Movement（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7）一书的第323—326页中简要介绍了高隆博什的影响力和怪癖。第一手资料来自他亲密的同事小阿尔文·洛维，参见Walter Block, I Chose Liberty: Autobi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Libertarians（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200－205，有关高隆博什每次说“自由”这个词时就把钱放进罐子里的故事，来自Jerome Tuccille, It Usually Begins With Ayn Rand（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71）, 62。1997年11月，《自由》杂志刊登了“Andrew Galambos — the Unknown Libertarian”，这是哈里·布朗撰写的关于高隆博什的真实故事，包括他的缺点。

37. Don and Barbie Stephens, The Survivor’s Primer & Updated Retreater’s Bibliography（Glendale, CA: Stephens Printing, 1976）,11.

第九章

要动真格了



1971年8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终止了美元可兑换成黄金的规定，关闭了美元黄金兑换窗口。他的行动阻止了挤兑美元的行为，但导致了多年的经济动荡。
资料来源：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提供者：拜伦·舒马克。

1971年7月10日星期六，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面对一大堆令人不安的数字发愁。沃尔克负责国际货币事务，在他看来，所有地方都出现了麻烦。约翰逊政府在1968年将美元

与货币黄金脱钩时，希望这一举措能够阻止或大幅减缓美国货币储备中的黄金流失。这未能成功——相反，美国黄金储备继续减少。例如，在5月的第二周，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流向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从而导致美国黄金供应量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黄金的非货币化充其量只是对症下了药，却并没有治愈疾病的根源：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就沃尔克所知，这一年的国际收支逆差可能达到40亿美元甚至50亿美元。

整个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官方美元持有量保持在130亿~150亿美元；当沃尔克坐上这个位置时，该数字飙升至超过240亿美元。仅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就持有价值比诺克斯堡的黄金还多的美元。即便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再能够轻易地将它们的美元兑换为黄金，它们也被迫通过在货币兑换市场进行交易来解决这种不平衡。从5月初开始，当联邦德国发出信号表示它正在考虑让联邦德国马克的价值在公开市场上浮动时，其他国家也开始陆续效仿。大量美元开始兑换为联邦德国马克、荷兰盾和瑞士法郎——国际市场认为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比美国政府执行了更好的财政纪律。

美元灾难由此产生。1971年1月至6月，美元兑联邦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的价值下跌约4%。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后来写道："从未见过这样大幅抛售一种世界主要货币。"[注]由于无法支撑进入德国联邦银行的大量美元，到了5月5日早上——已经在40分钟内收进10亿美元，联邦德国停止了货币交易。联邦德国马克现在被默认为是浮动货币了——它不再以黄金定价，而背后支持它的德国中央银行不再购买或出售美元。与联邦德国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奥地利、比利时、瑞士和荷兰——很快也紧随其后，这加速了美元的疲软，其影响广泛而具体：一些美国公民很快得知酒店和航空公司都不再接受美元支付，在瑞士等地，他们也无法再用美元兑换当地货币。

沃尔克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身高6英尺7英寸（约2米），经常穿着皱皱巴巴的西装。沃尔克与尼克松政府中的其他人一样了解国际金

融，这几个月来他基本预料到了这一切。然而，他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通过减少美国的军费开支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但他知道，与美国前几届政府一样，此类削减措施无法实现。另一种补救措施是放开允许货币相互交易的相当狭窄的区间，但这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在两年内不可能完全生效。由于缺乏其他选择，沃尔克力主一劳永逸地“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事实上，自1971年春天以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秘密制订取消黄金可兑换性的应急计划。沃尔克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将美元价值与黄金价值分开可能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好处很多。然而，沃尔克的新上司——2月份接受财政部任命的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是否愿意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目前还不明了。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康纳利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实话实说，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贬值，不会改变黄金的价格，而且我们将控制通货膨胀。”态度似乎斩钉截铁，但是面对沃尔克的询问时，康纳利却隐晦地回答：“这是我现在不可改变的立场。我不知道今年夏季我会站在什么立场。”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态度可能就更为勉强了，毕竟仅仅15个月后就要进行连任竞选投票了。越战还在激烈进行，看不到尽头，美国公众对此感到厌倦极了。那年春天，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入华盛顿，其中包括数百名越战老兵，他们将勋章扔在国会山的围栏上。如果大多数或所有主要货币都以灵活的汇率浮动，那么没人能真正预测世界经济会发生什么。此外，沃尔克认为，“一旦我们暂停黄金支付”，就会出现“巨大的压力来抬高黄金的价格”，正如当年罗斯福遇到的一样，确切的结果也将无法预测。

星期六早上，6月份贸易逆差的数据让沃尔克亮出了底牌。尽管美国在1970年享有大量贸易顺差，但1971年6月的数字显示出近6亿美元的赤字。这恰是货币市场对美国的惯常财政方式惩罚。虽然一个月或一个季度的赤字可能会逆转，但美国正面临着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整年的贸易逆差，最早的一次还是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担任总统的时候

出现过。沃尔克打电话到他的财政部同事威廉·戴尔家里，让他来办公室。威廉也是一位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美国财政部官员，他熟知在某些时候美元需与黄金脱钩这个观念。早在1969年3月，他就给沃尔克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开头是："我开始确信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注当戴尔到达沃尔克办公室时，沃尔克问他贸易逆差到什么地步会撼动交易市场。戴尔完全了解5月份的动荡，他估计了一个数目，沃尔克回答说："你已经懂了。"（事实上，后来在当月贸易逆差数据公布后，本已疲软的美元进入多日下滑。）戴尔回忆说："于是他指示我做一个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计划，他说：'这回动真格了。'"注

当然，所有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的计划都需要得到康纳利和尼克松的批准，他们很可能会反对一项彻底改变所有战后国际货币行为的计划（此计划理论上也许违背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的意愿，他肯定会事先知道，并会强烈反对）。尼克松总统既不像肯尼迪总统那样迷恋黄金，也不像约翰逊总统那样对黄金越来越反感，大部分时间里尼克松总统甚至对黄金与美元的关系问题置若罔闻。1971年白宫春末和夏初的记录显示，尼克松总统对黄金或外汇市场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关注。5月至7月尼克松反而都在讨论与中国建交的提议、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中东谈判、美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和劳工问题）、他的连任竞选活动以及如何影响选民，当然，还有如何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的"阴谋行为"进行报复，这导致了"水门事件"丑闻，3年后他因此而下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沃尔克告诉戴尔"这回动真格了"之后36天，美国总统身着深蓝色夏季西装出现在星期日晚上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上，宣称他曾要求美国财政部"暂停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尼克松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接受在货币政策方面迈出如此重大的一步呢？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特里芬等人已经预见了它的结局。尽管如此，但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关系的决定出现在尼克松任期，特别是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这颇为奇怪。据艾伦·梅尔策的《美联储历史》记载，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初始，美元浮动受到“有限的支持和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的高级经济顾问保罗·麦克拉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就经济问题为尼克松提供咨询，该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教授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尔主持，戈特弗里德教授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专攻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问题。虽然此委员会探讨了国际货币改革的可能性，但它认为最先考虑的事项应该是解决美国的通胀问题。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会更容易说服其他国家维持货币稳定，防止国际收支危机。

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早期货币政策的基石，被称为“善意的忽视”。与尼克松保持直接联系的顾问更倾向于“按部就班”这一术语，但由于几个原因，“忽视”是一种恰当的描述。其一是1968年制定的政策——限制国际投资、建立两级黄金市场，以及通过附加税来帮助减缓通胀和为越战买单——实际上确实一度改善了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确实，在1968年，美国出现了16亿美元的罕见顺差，并在1969年再次出现了27亿美元的顺差。如果现有系统看上去有效，那么就没什么动力去改变它，相反，哈伯勒尔顾问团队敦促结束约翰逊建立的资本管制，并将重点放在提高货币汇率的灵活性上。

之所以称之为“善意的忽视”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尼克松及其最信任的顾问对于国际货币事务不太重视，虽说这个难以精确界定。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下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倾向于创造西方货币共识：他们将西欧各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视为共同创造增长并使经济危机最小化的项目合作伙伴，虽然有时与它们合作是困难的。尼克松的主要精力在执行外交政策上，当然也是由于他接手了令美国元气大伤的越战的缘故。如果说尼克松及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国际货币政策有什么目的，那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实现外交政策的干扰。例如，一位曾在尼克松任期内任职的官员告诉政治学

家乔安娜·戈瓦，尼克松“甚至不批准向联邦德国继续施加压力以获取外汇让利，因为他更重视德美关系，而不是国际收支”。[注]毫不奇怪，越南更是禁区了。一名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告诉戈瓦：“我们不喜欢类似于让我们的士兵回家这样的念头。”

因此，尼克松政府对处理与全球货币管理相关的机构兴趣有限，这些机构既复杂又劳神费力。从约翰·康纳利身上可以看出尼克松政府的态度，康纳利是尼克松在1971年2月安插到财政部的。他是一位狂傲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其形象是在会议中叼着未点燃的雪茄。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那天，他与总统同坐在亮锃锃的黑色轿车内。与他的前任戴维·肯尼迪不同，康纳利并不一味坚持保守的经济理念。正如他的一位助手所说的那样，康纳利“并没有为任何理论教条或20年前写的意见书所困”。[注]他独断到近乎冒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管的说法，在康纳利第一次访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他称之为“一个博物馆，任何尚未制成标本的东西都应当制成标本”。[注] 5月，他更是公开地制造纠纷，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银行业会议上发表演讲，指责外国政府在自己的防御上投入的资金不够多。“美国经济不再主宰自由世界，”康纳利告诉该组织，“美国没有理由出于友谊、需要或能力的考虑承担如此沉重的共同负担。”[注]他似乎热衷于这种全球性的挑衅，称自己是“精致的国际金融运动场上的霸道男孩”。

当然，这并不是说康纳利在1971年坐上美国财政部长的位置是为了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有证据表明他在进入美国财政部的早期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乍一看，这样一个激进的提议可能会吓退像康纳利这样的政客。民主党在1970年大选中获得众议院席位后，尼克松获得了康纳利的支持，康纳利跨党派加入其内阁。康纳利的任命被认为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考虑，他对一位能够连任的激进主义总统感兴趣。一位传记作者指出，当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时，总统的顾问吹嘘说，康纳利是一个能够实现共和党重要目标的人：1972年他为共和党

拿下了得克萨斯州（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赢得了得克萨斯州——当时第六大州——大选举团的25张选票，但在得克萨斯州的总选票只有超过共和党不到4万票的微弱优势，得克萨斯州显然是共和党人的天下）。同样有价值的是康纳利与国会中民主党人的接触。康纳利很快就会领导政治组织“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并且在1971年夏天，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与康纳利讨论了他们可能会在1972年选举中抛弃副总统候选人斯皮罗·阿格纽，让康纳利取代他。[注]

实际上，如果不理解当时激烈且时不时令人绝望透顶的政治背景，就无法理解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夏天在经济上所做出的举措。1972年尼克松以绝对优势战胜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这或许让后来的观察者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在前一年，尼克松的连任机会还不稳固——或许更重要的是，内部认为其是不稳固的。让康诺利做副总统的戏言显示出一个与自身弱点作战的政府。尼克松对他的副总统失去了信心，很少与他单独见面，甚至认为是他拖累了1972年的选举。在尼克松离职后不久，他的一位顾问评述道：“如果1971年有一次选举，那么尼克松几乎肯定会落选。”[注]在1971年上半年，哈里斯调查显示，尼克松将会在4月以39∶47败给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其中11%的选民支持亚拉巴马州前州长、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注]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尼克松总统不仅未能兑现他在1968年的竞选承诺“光荣地结束越南战争”，他还加大了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战争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损耗似乎无穷无尽。

但如果让白宫内部的任何人指出尼克松政府最大的弱点，他们都会说是经济。[注]虽然持续通胀的主要原因可归于约翰逊政府突如其来大规模地发起了越南战争，然而让选民回顾过去却无济于事。1970年经济陷入衰退，即便是这剂药方也未能让尼克松的团队，包括他亲自挑选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阻止通胀的恶化。1971年春天，美国通货膨胀率20年来首次突破6%。1970年到1971年华盛顿大多时候都在辩论是否应该冻结工资和物价。提倡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对这项政策

深恶痛绝，华盛顿的经济决策人士曾经为此争论得不可开交。尼克松尤其反对控制物价，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曾于二战期间在价格管理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认为控制物价不切实际。乔治·舒尔茨和保罗·麦克拉肯也赞成这个观点。一直到1970年底以前，尼克松政府都很厌恶控制物价这个想法。

然而，很快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就觉得别无选择。对康纳利而言，他不受教条的束缚，将控制工资与物价的观点视为执行力的理想化延伸。（“如果立法机关想要给你一个新的力量，你就要接受它，把它当作一把旧猎枪那样放在角落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它。”）[注]1971年初美国储蓄达到战后的最高位，美国消费者拼命想要避免通货膨胀，国会在5月赋予总统实施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权力。6月，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已经认定有必要冻结工资和物价。

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美元是否要浮动的争论。沃尔克对此举的后果感到担忧和害怕。1971年3月，沃尔克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阐述了四种拟采用的不同货币方案的优缺点。在谈到暂停美元兑换黄金时，他担心其他国家会通过限制或禁止来自美国的投资、建立更高的贸易壁垒以及通过提高黄金价格来促使美元贬值以进行报复。没有办法能够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美国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令它们感到“无能为力”。[注]沃尔克仍然认为，如果提前几个月商议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并将此作为连贯、合作的国际协作的一部分提出，那么或许能够减轻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

到了春天，不管世界的反应如何严重，有两个因素开始迫使沃尔克接受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其一是联邦德国马克开始浮动，此举不仅增加了美国的压力，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表明浮动美元是可行的（联邦德国经济在实行浮动汇率后立即有所改善）。其二是美国国会意外地开了一个口子。众议员亨利·罗伊斯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曾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任职，并经常与沃尔克和美国政府就黄金政策

进行争吵。罗伊斯特别反对美国从南非购买商品，认为美国正在支持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权。6月3日，罗伊斯提出了“国会意见”，呼吁美国政府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罗伊斯批评其是一种“毫无必要地自我削弱”的货币体系，认为“只有关闭黄金窗口并让美元与日元和其他被低估的货币建立更新、更稳健的联系，才能避免贸易形势的恶化以及重新主导世界贸易格局”。[注]国会对罗伊斯提出的决议好像没有进行投票。然而，它的副本被递送给沃尔克，他认识到该决议代表了美国国会的新动向。3月的时候，他还在担心“反对党主控的国会已准备好，它愿意并且能够挫败所有让美元贬值的计划并把结果变成政治资本”。[注]现在，这是国会中民主党领导者的提议——可能是不经意中提出的，但对沃尔克认为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某个立场提供了潜在的政治掩护。

无论沃尔克对其上级接受这项高风险经济政策改革的意愿曾抱有什么疑虑，这种疑虑都渐渐消退了。实际上，政治怀柔是康纳利的专长。说到底，康纳利已经试图说服总统接受强有力的新经济政策——包括尼克松在6月底仍然抵制的工资和物价冻结——以改善失业和通货膨胀。而在某种程度上，康纳利正在与尼克松政府内部的经济顾问伯恩斯进行一场势力争夺战。6月初，当国际货币市场的压力有所缓解时，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给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谴责现行制度的不可行性，但认为浮动货币“太不确定、风险太大”，因为它“破坏了迄今为止普遍存在的货币秩序”。[注]麦克拉肯希望召集一大群人来跟进货币问题。但康纳利时不时威胁说要在春天辞职，他反驳道，根据法律和传统，这些决定应该由财政部长做出。尼克松支持康纳利并让他负责。6月28日，尼克松与他的经济团队会晤，整个团队吵得不可开交，总统因厌倦了无休止的辩论和无法追踪的新闻泄密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总统声称将不再会有“这种废话……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尼克松说经济政策只有让一个人负责才能发挥作用，那个人就是康纳利。

这实际上意味着沃尔克可以继续执行他在当年早些时候起草的应急计划。但对康纳利而言，决定性的理由并非出于经济考量。7月中旬，就在贸易赤字令沃尔克转而赞同关闭黄金窗口的想法时，康纳利看到了财政部顾问爱德华·伯恩斯坦做的一份分析报告，伯恩斯坦是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的美国代表之一，他计算出美元贬值（约在15%附近）可能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削减0.5%的政治破坏性失业率。这主要可以通过出口来实现：美元贬值会使美国汽车和其他制成品在国外更具竞争力，并且迅速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使尼克松在1972年大选中获得强大的优势。一位尼克松政府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说，伯恩斯坦的分析“使康纳利相信贬值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康纳利总是关注经济学的政治性”。[注]

康纳利的确更有远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只是他为总统打造的一整套经济措施的一部分——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就短期经济影响和政治支持的可能性而言，冻结工资物价和增加进口附加费可能更具吸引力。但康纳利认为，暂停美元兑换黄金窗口会让尼克松的决策看起来坚决果断，影响深远。

假设他可以以此为理由让尼克松接受他的建议，那么尼克松的顾问就会与他保持一致，即使他们个人反对康纳利打造的全套或部分提案。只有一个障碍：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伯恩斯在尼克松就任期间地位特殊。首先，伯恩斯在离开学术界之后的职业生涯与尼克松有交集，他们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一起共事过。尼克松在一份回忆录中写道，伯恩斯提醒过他经济趋势将会对1960年的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注]尼克松于1970年任命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显然很珍惜他与尼克松的关系，视之为一位难得的朋友。尼克松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尼克松有一次拙劣地斥责犹太人占据了美国劳工统计局，他说：“你知道，自始至终是犹太人策划的这场阴谋，与伯恩斯之流一起。而他们所有人都只与犹太人交谈。”[注]与此同时，伯恩斯表面上声称美联储需要维持其独立性和忠于事实。1970年12月，伯恩斯在洛

杉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很不情愿地支持了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工资和价格的建议。[注]这些言论被解释为是受到尼克松支持的（尼克松及其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在伯恩斯演讲前确实与其谈过话），但事实恰恰相反，尼克松对伯恩斯提出他自己的政策建议大为光火。出于报复，白宫有一阵子不再邀请伯恩斯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仪式。[注]

说尼克松政府不重视美联储的独立性那不免有些轻描淡写了，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伯恩斯描述为尼克松总统连任中相当可靠的经济盟友。[注]然而，在“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这个关键性的决定做出前不到一个月，伯恩斯就已成为除水门事件的“管道工”活动之外尼克松政府首要的政治攻击目标之一。7月23日，伯恩斯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做证，对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体表示沮丧。“经济学规则的运作方式与以往不同，”伯恩斯感叹道，“尽管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工资增长率并未缓和；尽管有许多工业闲置产能，但商品价格依旧迅速上涨。”伯恩斯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美国政府无法减缓工资和物价的增长。只要消费者和企业认为价格将继续大幅上涨，他们就会抑制支出和投资，从而对经济复苏造成“严重障碍”。[注]

美联储主席公开声称美国政府无法改善经济，这令尼克松及其顾问极为不悦。在第二天的总统办公室会议上，尼克松与助手H. R.霍尔德曼及约翰·埃利希曼讨论以最有效的方式报复这个自负、一心想出风头、忘恩负义的伯恩斯。他们基本赞同应该在伯恩斯周围的经济圈子放出风声，说伯恩斯与总统发生了冲突（恰好那天尼克松痛斥犹太人占据了美国政府经济圈）。尼克松随后提出了一个利用媒体攻击他的想法：“你能通过查尔斯·科尔森机构走漏一个关于阿瑟的故事吗？”[注]他立即提出两个版本：一个是总统正在考虑像“填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填塞美联储，也就是说，总统的顾问建议扩大美联储的组成人员。另一个是总统希望结束美联储的独立性并将其纳入行

政部门。尼克松解释说，一篇质疑美联储独立是否明智的报纸专栏文章可能会“让阿瑟有点担心”。他补充说，这个想法来自康纳利。

根据科尔森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砝码：对伯恩斯在推进控制工资和物价的同时还提出给美联储主席加薪予以攻击。[注]科尔森说，他指示一名下属将伯恩斯赤裸裸的虚伪透露给《华尔街日报》，虽然他非常清楚伯恩斯只提出为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为自己加薪。果然，此事很快见诸报端，该报道称“愤怒”的总统正在考虑通过立法将美联储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并借一位不知名的助手之口指责“虚伪”的伯恩斯试图将自己的薪水提高50%。[注] 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明显因给予伯恩斯一击而感到高兴。在7月28日的几个电话中尼克松提到了这个话题，“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霍尔德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小道消息“让阿瑟非常沮丧，目的达到了”。[注]

对伯恩斯的攻击力度不大，因为这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提出的一项政策，而美国政府几天之后就要批准这项政策了。经济衰退对金属采矿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打击，而美国采矿业的产量下降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整个1971年，钢铁工人工会一直用罢工及罢工威胁来赢得巨大的优势，这使铜矿和铝矿工的工资大幅增加。8月2日，在罢工截止日期过后，钢铁业宣布了一项解决方案，在3年内将工资提高30%。为了支付这笔费用，钢铁公司宣布将产品价格提高8%。

这为康纳利推销其经济计划提供了极佳的机会。钢铁公司协议的潜在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康纳利对总统说：“钢铁公司的做法对于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极为不利。”总统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找出如何应对通胀以及如何传达他的信息的办法。“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手段。”他告诉舒尔茨和康纳利。除了90~120天的工资和物价控制外，康纳利还重新设立了投资税收优惠、坚持限制联邦支出以及实施10%的进口配额。他强调，重要的是大胆采取行动，让尼克松看起来能掌控局面而不是被局面控制。康纳利告诉尼克松，美元兑换黄金是“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停止的做法。大多数人认为价值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是需要

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拐点，本周我们将损失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我认为你在明年的选举过程中要取消‘美元可兑换黄金’”。他补充说，美国“或许应该浮动美元”，正如联邦德国和加拿大已经浮动了它们的货币。总而言之，康纳利坚持认为，这一系列计划将“极大地刺激”经济，他建议总统“在被迫明确立场之前先主动明确立场”。康纳利说，这将“与你采取的对华策略一样重大”。他们讨论了不同的时间表，从国会休会前那一周直到11月和12月。霍尔德曼在当天的日记中称，康纳利的计划“是巨大的经济突破”，并推测虽然舒尔茨可能会设法放慢计划，但他不太可能阻止它。注在两天后的类似总统办公室会议上，康纳利激情澎湃，从白宫的录音带里都能听到他把总统的桌子捶得砰砰响。当舒尔茨加入时，他很快意识到辩论已经结束了。“总统先生，您已经决定了采用这一大套措施，包括终止美元兑换黄金以及其他一切？”他半是询问半是陈述地说。

此时此刻，尼克松总统的主要目标是：找到恰当的时机宣布他的大胆新计划并杜绝向媒体走漏消息的一切可能。有关美国政府计划的任何暗示都可能轻而易举地扰乱市场。沃尔克很清楚他的计划是爆炸性的。他为康纳利准备的简报包括了整个“第一部分”的虚假计划，以防记者或其他外人截获它。简报还包含了“第三部分”，但没有“第二部分”，这样可以进一步混淆视听。注

实际上，该计划确实被走漏给了媒体。8月初，报业集团的专栏作家保罗·斯科特写道：“尼克松总统和他的经济和金融顾问正在就美国经济状况进行闭门讨论，其重要性不可估量。”该专栏提到了沃尔克的美元应急计划，该计划“着重通过让美国财政部关闭所谓的‘美元兑换黄金窗口’来实现可控的贬值”。注消息过早透露使康纳利感到“非常不安”，尼克松让霍尔德曼追查是谁走漏了风声——也就是在这个夏天，他首次召集了后来对水门事件负有责任的“管道工”。

8月12日总统办公室的讨论几乎没有提及经济计划中的哪些部分是必要的，只要能够显示正在进行重大行动就行。无须国会批准就可采

取的步骤具有明显的优势：国会处于夏季休会期间，当它重新召开和安排听证会时，美国政府将已有数周的优势。例如，进口税成为最重要的议题，因为舒尔茨和康纳利已经找到了至少两种合法方式能够在没有立法行动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包括借助罗斯福启用过的《对敌贸易法》。[注]至于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尼克松及其团队不确定这应该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或者到底是否应该包含此举。市场和外国政府是否如同沃尔克所担心的那样受到惊吓？或者正如舒尔茨所说，会一直怀疑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而早就消化了这个消息？尼克松对此做了总结："没有人知道公众对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反应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坦率地说，就连专家们都不知道它究竟应该是什么！"[注]同样尚不清楚的是康纳利的每一项提案是否同样紧迫。"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实施整个计划，特别是冻结工资、物价以及征收进口附加费，"尼克松对康纳利说，"但是如果你认为必须立即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那么你可以自己宣布……让它听起来像是一个临时措施，一个完整计划的前奏。"他们讨论了伯恩斯的立场以及他反对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可能性，但也预测他或许会同意这个决定。

康纳利进一步阐明，比经济计划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展现出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做出了在他任期之前的美国总统所不能做出的大胆决定。下面这个对话特别说明问题：

> 康纳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国内的问题。若国内问题得到了解决，国际问题也迎刃而解。你所说的国际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因为它只是一种联动反应，反映出国内的经济实力，就是这样……
>
> 你想要这个背景的原因，详细地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要说明美国的处境已经恶化了25年。
>
> 尼克松：对。

康纳利：并且你是第一位有胆量的总统！

尼克松：嗯。

康纳利：采取这种全面的——

尼克松：妙。

康纳利：——行动。

就在那天下午，英国政府要求为它所有的美元资产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黄金准备金。虽然英国的要求本身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放弃美元可兑换黄金，但它肯定印证了问题的急迫性和广泛性。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不足100亿美元——自1938年以来的最低额，履行要求将是非常危险的，不履行要求则会向重要的盟友发出恐慌信号。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周末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们赶往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他们被要求收拾好行李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妻子——他们去哪里或去干什么。在前往戴维营的路上，来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赫布·斯坦对尼克松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说："这可能是自1933年3月4日以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周末。"那天罗斯福决定关闭美国的银行。萨菲尔不明白关闭黄金窗口的意思，但当他在直升机上向一位财政部官员重复这个疑问时，那人向前倾身，双手抱头，低声说："天哪！"注

许多历史学家记录了8月13日至15日在戴维营进行的辩论，并将其描述为关闭黄金窗口的决定性时刻。原因之一是，萨菲尔写了一篇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周末。事实上，该计划几乎全部获得提前批准，只需要在细节和语言上敲定。尼克松在计划这次出行时说："反正我个人已经决定了我想要做什么。"戴维营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舞台剧，一次已成定局的会议，旨在让参与者——主要是伯恩斯——感觉就像咨询了他们似的（这种策略是尼克松政府的惯用伎俩）。或许伯恩斯的确一直认为他有机会赢得辩论。尽

管如此，几周之前——甚至在白宫向媒体诋毁他之前——他自己已经无奈接受了尼克松表面与己无关的手段。在7月初的日记中，他写道：“我经常注意到总统的独裁做派及其采用的政治手段，但现在我知道，只有当我压抑自己的意志并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时，将来我才会被接受 ——即使在法律和道义上这样做是错误的。”注

出于保密的需要，尼克松命令所有人不得与营地外的任何人交谈。“任何泄密都会构成叛国罪。”阿瑟·伯恩斯回忆道。沃尔克可能比其他任何与会者都更清楚泄密可能产生的严重的市场后果。“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发财致富，”霍尔德曼打趣道，“究竟怎样做呢？”

伯恩斯愿意接受一些经济计划，认为这可能有效。但他拒绝结束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的计划：“如果我们关闭窗口……我们正在释放我们不需要释放的力量。”这相当于“扼杀了国际货币体系而不提出任何取而代之的东西”。他担心的是其他国家会立即通过黄金溢价来报复，这也是沃尔克害怕的。康纳利则强调了岌岌可危的现状：“任何人都可以推倒我们——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当星期五晚上的讨论结束时，他们没有达成正式的结论。但是在星期六早上4点30分，尼克松致电霍尔德曼，并告诉他已决定关闭黄金窗口。剩下的就是确定时间了。最初，他们计划让尼克松总统于16日星期一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但沃尔克认为，应该尽可能提前通知国际市场，这至关重要。如果星期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就意味着要打断《伯南扎》的播出，这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美国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尽管此时是这一节目夏季档重播。他们认为值得冒一下险。

尼克松主要担心如何组织讲话稿论点。所有关于关闭黄金窗口的恐惧和争论都假定观众理解这个非常复杂的主题。然而，正如尼克松在星期四指出的那样，就连专家们也无法就影响是什么达成一致结论，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解释呢？沃尔克可以去到欧洲安抚他的国外

同行；对尼克松来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观众会怎样对待这个消息。正如舒尔茨几年后所说的那样：“尼克松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关闭黄金窗口的含义，也不关心它。尼克松知道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戴维营的人不要为他写演讲稿，他想要自己写。”（这不完全准确，总统也让萨菲尔起草了一份演讲稿，不过2500字的演讲稿大部分都是尼克松自己执笔的。）在返回华盛顿的直升机上，尼克松忍不住透露给萨菲尔：“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何时策划的吗？康纳利和我，我们60天前就定下了。”注

尼克松面对镜头坐在蓝色窗帘前，他身着蓝色西装，系着同色领带，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子，显得非常随意。他的18分钟讲话几乎没有提及即将取消二战结束以来即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反，尼克松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唯一公平的行动就是反击。“在过去7年中，每年平均发生一次国际货币危机，”尼克松说，“那么谁从这些危机中获益？不是工人，不是投资者，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获利者是国际货币投机者。因为他们在危机中兴旺发达，他们助长了危机。”然后他列举了这些投机者当前的议程：“最近几周，投机者一直在对美元发动全面攻击。一个国家的货币实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而美国的经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因此，我也告诉财政部长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美元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我已指示财政部长康纳利，除非是确定有利于货币稳定和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金额和情形，否则将暂停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注

为了否认他称之为“妖怪”的贬值，尼克松向美国民众提出了一个直白的爱国诉求。的确，如果你出国旅行或购买一辆外国汽车，你的美元可能会贬值。但如果你是“在美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中的一位，明天你的美元将和今天一样值钱”。尼克松向观众表达的要点是，美国是强大的，它的竞争能力取决于美国公民。“两百年前，有人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美国最美好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这是在1775年写的，就在美国革命

前夕——这是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曙光。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些声音的回声，同样的论调散播出沮丧、失败的气息。同胞们，让我们做出回应：‘我们最好的日子就在眼前。’”尼克松认为，如果让美国人在以黄金来衡量美元价值和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后者。

尼克松的计划中蕴藏的政治智慧在演讲后数小时内就显现了。大多数民主党领导人对尼克松的上述决定完全没有提防。特别是在8月份的休会期间，没什么人准备对付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这种复杂的问题，尽管下一年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确实对这一讲话进行了谴责，认为它是“彻底的废话，离题、故弄玄虚……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以这种方式结束美元兑换黄金是一种耻辱”。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党人有一种获胜的感觉：他们很高兴尼克松终于采取了他们长期以来所提倡的冻结工资物价措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蒙大拿州的迈克·曼斯菲尔德说：“我很高兴（尼克松）耐心终于耗尽。”正如预测的那样，国际货币市场存在一些混乱，其中许多市场关闭，以便应对这些变化。美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将继续下滑，但至少在1971年，新政策不见得使事情变得更糟。对白宫来说，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市场对该政策的接受度很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星期一的时候将近收涨33点，涨幅3.8%——这是道琼斯工业指数自美国成立以来截至当时最好的单日表现。即便那些最猛烈抨击尼克松政府的人也没有任何其他切实的选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采取猛烈的单方面行动，这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暂时的满足感，”美国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在《纽约时报》一篇措辞激烈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如果货币贬值是合理的，那么我们本可以通过协议而不是强行贬值来降低风险。”[注]几年前，罗斯托这个人几乎会毫不犹豫地考虑将核弹埋在国外来炸出黄金。他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一点合理性。然而，在对上述政策实施细节进行诡辩时，他实际上忽略了一点：以黄金（无论多少数量）来定义美元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美元浮动，但任何有权威的人都没有真正地提倡回归金本位。

当罗斯福于1933年发布黄金禁令时，部分原因是他的政府（以及他之前的胡佛政府）公开表示对个人囤积黄金的担忧。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也分别在不同的阶段担心过个人黄金交易，通常他们担心的是海外黄金交易。相比之下，1971年尼克松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闭黄金窗口的决定与美国人是否拥有或投资黄金毫无关系。尼克松政府既非有意抑制也不鼓励任何特定的消费者行为。事实上，浮动货币是相当陌生的体验，国际金融界最有经验的政府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例如，长期担任美联储官员的查尔斯·库姆斯在1967年与浮动汇率拥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论中表示，如果美元完全浮动，他根本不相信会有美元的汇率市场。注关于创建私人黄金投资市场，甚至是美元浮动将会如何影响现有的私人黄金市场的讨论，在备忘录和副本中都无处可寻。它不仅不是一种动机，甚至白宫、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的高阶官员都没有关注过。

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贵金属投资热，很快将发展成现代的黄金投资爱好者运动。它的合法立足点是采取银币交易的形式。1965年，当去除10美分币、25美分币和50美分币中的白银时，出口或熔化1965年以前的美国银币成为非法行为。几年来，这项政策使收集或囤积银币的人感到沮丧；白银价格上涨——1968年白银交易价远高于每金衡盎司2美元，这些银币的金属价值远高于面值。然而，到1969年，很少有银币仍在流通，银价开始下跌。那年春天，尼克松的财政部取消了禁止熔化硬币的禁令。

此举开启了买卖银币的市场。需求变得普遍而复杂，1971年4月，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银币期货合约。但由于银币交易的民间产业蓬勃发展，银币爱好者并不需要“官方”市场。1972—1973年，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约20家钱币交易所开业。交易所的标准产品是一袋1965年以前的硬币，面值总计1 000美元，但其银含量的总价值超过了这一数值。钱币交易的始祖是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Pacific Coast Coin Exchange,PCCE），1970—1974年，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向约25 000名投资者出售了合同金额达到10亿美元的银币。该公司后来被

命名为莫尼克斯国际（Monex International）公司，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新港的钱币经销商路易斯·卡拉比尼创立。卡拉比尼和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与许多作家和思想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阿灵顿出版社出书，发表有关黄金和白银的政策和投资理念。例如，哈里·布朗的畅销书，给读者提供了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的地址，并称该公司“熟悉美国白银市场和美国当下的通货膨胀问题”。布朗特别向那些想要进军白银商品市场的读者推荐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说该交易所将会向投资者出借部分资金用于购买银币。1972年，卡拉比尼在阿灵顿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你需要知道的有关金银的一切》，书中有对哈里·布朗、弗兰兹·皮克、默里·罗斯巴德等人的采访。

事实证明，卡拉比尼与迅速发展的黄金投资热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他们在阿灵顿出版社出版的书很明显地用于为他的公司招徕业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布朗实际上拥有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营销总监的头衔，并在1970年至1974年从该公司获得了大约10万美元的佣金。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说法，具体来说，该公司因为“布朗出版的书为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吸引了投资者而支付他佣金”。布朗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告知他的众多读者（尽管美国证交会的诉讼摘要中没有提到皮克，但弗兰兹·皮克也为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打了不少广告）。

但是，如果说美国证交会对阿灵顿出版社的控诉是因为该出版社把推销广告包装成独立分析来欺骗读者，那么它对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和硬币市场的态度就更加严厉了。首先，美国证交会称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诱骗”那些没有做出正确判断的消费者。该控诉批评了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老奸巨猾、强行推销的欺诈促销和营销活动……旨在吸引资金较少和不成熟的投资者，他们对这些投资缺乏了解和经验”。注

其次，美国证交会断定，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对其提供的服务有所隐瞒。证交会表示，该交易所几乎从未真正向投资者出售实物钱

币。在交易所的广告中，列出了其存储库（“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犹他州和加拿大”），投资者的银币据称存储于其中。事实上，美国证交会声称，该交易所没有存储库，基本上从未购买过它向投资者兜售的银币。该交易所通过这种方式向投资者出售的“银币”总数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地方能获得的银币数目。1974年，一位货币市场主管告诉《纽约时报》：“我认为他们售出的银币比产量都多。”当时纽约州总检察长获得了对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下达的强制令，因为该交易所对纽约居民做出了“巨额欺诈行为”。(注)美国证交会没有指控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出售硬币，而是指控它将自己用于一般运营和投资的基金与投资者的基金混同使用。该交易所或许已在白银市场购买了期货和期权，但投资者对这些投资没有任何权利或所有权。

该交易所的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以保证金配资的方式购买了子虚乌有的钱币，也就是说，他们先按钱币面值（加上佣金和费用）的一定比例支付了款项，然后在一段时间内支付其余部分或者投资获得的利润支付。美国证交会表示，后一种情况实际上从未发生。如果客户要求出售他们自己的硬币，那么他们通常被迫仅以该交易所决定的价格出售。控诉指出，有时该交易所“拒绝接受卖单”。此外，美国证交会指控该交易所管理人员利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从未披露的可疑采购行为，包括采购私人飞机、金矿和畜牧场，公司管理人员还被控用投资者的资金获得个人贷款。美国证交会没有将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的行为称为庞氏骗局，但一位法律学者得出结论：“指控的言外之意表明庞氏骗局可能存在。”(注)卡拉比尼与美国证交会达成了和解，他并未承认不法行为，只承诺了将来会避免违反证券法（他很难履行这个承诺）。

然而，很难看出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否降低了黄金爱好者的热情或减缓该势头。如果它向布朗支付了数万美元推荐费，那是因为布朗出版的新作《危机下的投资Ⅱ》成为1974年的

畅销书。书中布朗谈论他熟悉的主题，虽然减少了一点世界末日的论调。他指出，虽说他在1970年出版的书中所说的灾难性预言还没有应验，但那些接受他建议的投资者所获的盈利仍然比那些将资金投入蓝筹股的投资者要好得多。他推荐去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购买金银币："我在那边有过多次交易，它无可挑剔，我一直都很满意。"

布朗并未承诺轻松时光的到来。他继续预测了"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困难的萧条时期"。他仍然主张万一美国大部分地方的人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则需要井然有序地撤离，尽管他承认这些观点"带有一种偏执和迷信的意味"，但是他还是为那些希望合法购买金币的人提供了实用的指南和价格图表——显然这些人的数目不断增长，他声称他们的投资具有"钱币目的"。不知是出于对布朗提出的严峻情况，还是对他的投资建议做出响应，美国人对书中的信息津津乐道。这本书登上了1974年2月《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0周之后再次于4月荣登榜首，一直到11月该书仍然榜上有名——总共持续了39周，布朗在个人理财类畅销书作家中的排名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圈子的作家包括西尔维亚·波特、亚当·斯密以及为数不多的另外几个作家），他们的影响范围可以与美国最知名的小说家和知名人士相媲美。布朗能够在大多数美国人无法合法购买黄金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吸引如此庞大的读者，这一点值得注意。当然，布朗、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以及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期待美国人终能合法投资黄金的那个时刻的来临。

---

1. Onno de Beaufort Wijnholds, Gold, the Dollar and Watergat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88－89.

2. Memorandum, "Limited Gold Convertibility in a Cooperative Framework," William B. Dale to Paul Volcker, March 10,1969, Record Group 56,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ffice for the undersecretary of monetary affairs, Box 11, Folder "Gold,"NARA.

3. 戴尔接受了托马斯·福堡的采访，后者在1980年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第244页引用了戴尔的访谈。

4. 乔安娜·戈瓦采访了这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写下了有价值的报道：Closing the Gold Wind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69。

5. Charles Ashman, Connally: The Adventures of Big Bad John（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 207-208.

6. Charles A. Coombs,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6）, 219. 库姆斯与康纳利的冲突使他或许带有偏见；不过，康纳利在很多场合也确实表现出不愿对国际货币问题给以恰当的关注。

7. 康纳利的演讲“维持稳定货币体系的相互责任”发表于1971年7月12日的《美国国务院公报》上。

8. 大约在1971年7月19日，尼克松与康纳利第一次讨论了让康纳利作为副总统参与1972年总统大选的事宜。参见Haldeman’sentry for that day in The Haldeman Diaries: Inside the Nixon White House（New York: Putnam, 1994）。

9. Hendrik Houthakker, “The Breakdown of Bretton Woods,” in Economic Advice and Execu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Pas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d. Werner Sichel（New York: Praeger, 1978）.

10. Louis Harris, “Muskie Still Leading Nixon,” Chicago Tribune, July 19, 1971.

11. 本章均参照了艾伦·马图索内容详细的著作Nixon’s Economy:Booms, Busts, Dollars and Votes（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12. James Reston Jr., The Lone Star: The Life of John Connally（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396. 雷斯顿的信息来自吉姆·史密斯，后者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美国国会为财政部游说。

13. “Contingency Planning: Op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oblem,” March 14, 1971. Papers of Paul Volcker,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ox 0108477, 57–58.

14. “Shift on Monetary Set-Up Is Proposed in the Hous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71.

15. Volcker, “Contingency Planning,” 52.

16. FRUS, 1969–1976, vol. 3, document 157.

17. Thomas Forbord, “The Abandonment of Bretton Woo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249.

18. Richard Nixon, Six Crises（New York: Touchstone, 1990）, 309－310.

19. Nixon conversation 545-1, July 24, 1971.

20. “持久繁荣的基础”，1970年12月7日在洛杉矶贝弗利希尔顿酒店举行的佩珀丁学院重大问题系列会议上的讲话。https://fraser.stlouisfed.org/title/?id=449#!7961 , accessed on September6, 2015。

21. Bob Woodward, The Last of the President’s Me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2015）, 74.

22. 参见，如：Burton A. Abrams, “How Richard Nixon Pressured Arthur Burns: Evidence from the Nixon Tap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no. 4（Fall 2006）: 177－188. 艾布拉姆斯直言：“理查德·尼克松提出要求，于是阿瑟·伯恩斯在1972年选举前提供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23. 美联储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对联合经济委员所做的声明，1971年7月23日，第2-3页。

24. Nixon conversation 545-3.

25. Charles Colson, Born Again（Old Tappan, NJ: Chosen Books, 1976）, 62－63. 科尔森对其1971年春季和夏季议会会期的参会情况的描述似乎充其量只是含混不清的叙述。例如，他说自己参加了7月24日的会议，在会上尼克松建议科尔森负责关于伯恩斯的负面报道，但是，白宫的录音则显示了与其论述相反的信息。伯恩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74年，科尔森把有关在总统的游艇“红杉”号上策划诋毁伯恩斯的详情告诉他，当时科尔森、霍尔德曼，卡斯帕·温亨格等人出席了会议。然而，科尔森的书中却称“红杉”号之旅发生在5月，那么，说此举是为了报复伯恩斯7月所做的证词就未免太早了。不过科尔森关于将这个故事泄露给报刊的说法是可信的。

26. “White House Hints It Plans Attack on Reserve Board’s Independ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9, 1971.

27. Haldeman Diaries, 332.

28. 同上：335－336.

29. 关于沃尔克计划的细节参见William Silber, Volcker: The Triumph of Persistence（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2）, 82。

30. Paul Scott, “Devaluation of Dollar Seen As a Possibility,”Lebanon Daily News, August 6, 1971, 17.

31. Haldeman Diaries, August 9, 1971. 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认为总统候选人皮特·彼得森是泄密事件的幕后主使。

32. 1971年8月12日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录制的录音带的脚本，in The Nixon Tapes: 1971－1972, ed. Douglas Brinkley and Luke Nichter（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conversations 562-6。

33. 由萨菲尔撰写的、第一批报道戴维营周末会议的一则新闻参见Before the Fall: An Inside View of the Pre-Watergate White House（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509－528. 霍尔德曼的回忆发表在他的日记中。另一篇极有价值的间接会议记录是亨利·布兰登的The Retreat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Doubleday, 1973）。

34. Insid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Secret Diary of Arthur Burns, 1969－1974, ed. Robert Ferrell（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entry for July 8, 1971, 47－48.

35. Before the Fall, 527.

36. Richard Nixo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utlining a New Economic Policy: “The Challenge of Peace,” August 15, 1971.

37. Eugene Rostow, “Devaluation by Agreement, Not Fi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71.

38. 库姆斯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论中发表了评论，再版于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ixed Exchange Rates（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67），185。

39.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Litigation Release No. 6638, December 12, 1974.

40. “‘Colossal’ Fraud in Coins Reported,” 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74.

41. James C. Treadway Jr., “SEC Enforcement Techniques:Expanding and Exotic Forms of Ancillary Relief,” Washington & Lee Law Review 32（1975）: 649.

第十章

名正言顺



1974年，尼克松辞职之后没几天，新上任的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再次允许美国人购买和出售黄金进行投资。当时，他的行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项法案最终将打造美国强劲的黄金投资市场。
资料来源：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图书馆。

这一惯例由来已久：开议日当天，有一位国会议员提出一系列议案，开始新的立法议程，但结局往往是不了了之。尤其是当议员所在政党是少数党时，议案成为法律的真正机会取决于无关紧要的、令人

乐观而微妙的那一天。依循这一惯例，1973年1月3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菲利普·克兰提出了一项只有两句话的议案H.R. 435，旨在“允许美国公民持有黄金”。[注] 在同一天，克兰满怀相同的希望和热情提出了另外两个议案，希望为私立学校的学费提供税收减免以及增加对某些毒品犯罪行为的处罚。

按理说，克兰提出的黄金议案本应与之前提出的许多议案一样，就此悄无声息。自1933年的黄金禁令开始以来，国会议员多次——或多或少具有象征意义地——提议制定法律，以恢复美国人合法拥有黄金的权利。例如，哈罗德·约翰逊于1958年在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历史悠久的萨特磨坊遗址就位于该地区，在此遗址曾发现黄金）当选为国会议员，到众议院任职的第一天，他就提出了一项个人拥有黄金合法化议案。老巴菲特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黄金议案可以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他更关注恢复金本位制，而不是恢复个人拥有黄金的权利，把购买黄金作为一项投资。克兰本人进入国会后不久，于1970年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但他未能说服银行委员会主席赖特·帕特曼安排一次听证会，因此该议案被否决。

这些努力一直难以成功，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备的时候，它们的成功率无异于在肯塔基州的德比以50：1的赔率押注一匹不被看好的马能赢。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财政部为维持个人不得持有黄金的禁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且它从未打算批准一项它认为会损害美国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法律。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界限日益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私人可以持有黄金与可用定值美元兑换固定数量黄金的制度不可共存。例如，如果美国能够在1960年秋自由地参与私人黄金市场，使得黄金价格上涨（详见第六章），那么美国政府几乎肯定已经耗尽了那些支撑美元的法定黄金准备金。美国投资者也已在伦敦和其他私人市场抢购黄金，从而抬高价格，造成恐慌性购入黄金，同时造成美元流至美国以外的地区，而这些美元可以要求从日益减少的美国黄金储备中兑换黄金。（当然美国政府本可以简

单地向美国个人和组织打开“黄金窗口”，但这就会更快地造成同样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1971年8月之后，与克兰一样的国会议员看到了机遇。当黄金窗口关闭时，尼克松政府依然未打算创建美国私人黄金市场。尽管如此，1971年的政策带来的符合逻辑的、相对直接的结果就是建立某种市场。由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1美元都不再能够自动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因此，只要处于合理的范围内，私人黄金市场的波动就不会明显损害美国经济。毫不奇怪，黄金与美元的不可兑换性导致黄金价格飙升，远高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价格。在尼克松宣布他的声明后不久，私人市场上的黄金价格就上涨到了每金衡盎司43.40美元；一年后，也就是1972年，黄金价格飙升到每金衡盎司70美元。

这样的价格使得私人可以拥有黄金的条件成熟了。1973年初，除了克兰提出的议案外，至少还有五项议案在国会上被提出，目的是允许美国人购买、持有和出售黄金作为投资。其他一些议案则旨在提振美国的黄金开采业。尽管有些议案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支持，但它们主要是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如哈罗德·约翰逊，他们所在的州与采矿业的兴衰利害攸关。

尽管持有黄金合法化的呼声明显高涨，但总的来说，国会试图回避这个问题，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提起。众议院本身没有安排关于持有黄金合法化的听证会；参议院无意带头处理黄金问题；白宫对签署这项立法不太上心，看起来几乎是在试图保守秘密。这使得新闻界对此很漠然，华盛顿的许多机构似乎认为，在公民真正开始买卖金条和金币之前，他们可以阻止这类提案。

克兰是一位共和党极右翼的人物。1964年，他参与过巴里·戈德华特堂吉诃德式的总统竞选，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之前，他将开始自己的总统竞选。像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自由市场保守派一样，克兰将持有黄金简单视为代表个人自由的事情，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自己可以改变法律。通过将少量的语词悄悄地塞进官方法律，克兰多年来

一直在不断说服众议院领导层和尼克松政府改变禁止个人持有黄金的立场。[注] 1972年春，在黄金窗口关闭后，国会通过了面值修改法案，美元正式贬值约8.5%。尽管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但该法案将美元的价值从原来的1/35金衡盎司重新定义为1/38金衡盎司，这和1971年12月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达成的《史密森协定》所规定的一样。通过他的坚持，克兰设法把允许私人持有黄金的条款加进了议案，尽管后来银行委员会主席赖特·帕特曼又将它从议案中剥离出去了。1973年春出现了另一个立法机会，当时美元再次贬值（每金衡盎司黄金的价格上涨至42.22美元）。克兰与爱达荷州新当选的参议员詹姆斯·麦克卢尔联合起来，支持此次票面价值修正议案，并真的让一些条款成了法案的一部分，这些条款推翻了已经持续40年的黄金禁令——但是只有当总统认为“取消禁止私人拥有黄金的规定不会对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时，这些条款才会生效。这是克兰及其盟友在立法上的胜利，不过它几乎全是理论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一胜利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点信心，让人们相信，只要国会有足够的意愿，它就能在自己认为可以的时候将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而不需要等待行政部门做出决定。

当时，行政部门更有优先权，毕竟还有许多关于重建美国黄金投资市场的问题很棘手。美国人会急于购买长期被禁止使用的黄金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大量涌入市场吗？这会给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又会对美国内外产生什么影响？就克兰而言，他低估了这对普通投资者的影响。他对一名报纸记者说：“我认为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大量购买黄金。”“许多人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对这种类型的投资缺乏了解。”[注]这种观点很有意思，因为克兰本人是金币的投资者，他既拥有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美国金币，也拥有奥地利克朗和墨西哥比索钱币。[注]

也许克兰是想减少对他所提法案的反对意见。但是，克兰和他在国会山及其他地方的许多盟友并没有把个人可以持有黄金看作是选择

哪种投资方式的问题。它是对美国个人基本权利的肯定，个人基本权利优先于美国政府的任何目标。克兰的办公室借鉴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的来源和哈里·布朗最畅销的书中的思想来源一样，即认为黄金是实现人类自由的真正工具。为了表明他们的观点，克兰手下的工作人员试图把艾伦·格林斯潘的文章《黄金和经济自由》放进国会记录中，这篇文章于1966年发表在艾恩·兰德给会员寄送的简报《客观主义者》上，它将禁止个人持有黄金与福利国家支出的“无法隐藏的秘密”联系起来。艾恩·兰德亲自点头同意克兰的一位工作人员复制一份格林斯潘的文章，这位工作人员向来是支持她的。注

然而，建立一个新的美国黄金市场引发了一些有趣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用抽象的自由主义理想来解决。首先，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黄金供给一直在萎缩，但迄今为止，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持有国。让美国政府和试图购买一些金币作为长期投资或对冲的民众在同一个黄金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是否公平？虽然美国政府不一定能通过买卖来控制黄金市场，但它肯定会影响黄金的价格，当它与其他国家的央行这样的大型黄金持有者合作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一般投资者显然没有这样的优势。同时，如果美国不将它所持有的部分黄金投入私人市场，那么它很容易被视为试图破坏私人市场。克兰的最终法案相当复杂，包括了美国政府参与的规则。但是，只要财政部全盘反对公共黄金市场，这些条款很有可能毫无意义。

黄金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仍然动荡的世界经济让美国建立私人黄金市场的设想更加复杂。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暂时分离美元和黄金，使它们不可兑换，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美国国内外都有一些重要人士渴望回到采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类似的金本位制时那种令人神往的稳定状态。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似乎从未真正认为脱离金本位制是可取的或持久的。1971年9月，他把8月15日宣布脱离金本位制以来各国对美国采取的所有报复措施列了一个清单。他将清单提交给尼克

松和财政部长康纳利，并警告说："推迟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很可能会导致各种保护主义和限制措施，而且（尼克松总统）正在冒险将美国引入一个限制主义、贸易战、货币战争等日益严重的时代。"注当年年底签订的《史密森协定》使得美元贬值并规定了新的汇率波动幅度，部分解除了这种威胁。

然而，即使在那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并未受到围攻。毕竟，不能因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想要一个基于美元以外的全球货币秩序就去指责它们——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低迷时期，美元就是一场灾难。1971年底，美元贬值8.5%，这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变化，1973年初，尼克松政府被迫再次将美元贬值10%。这种举措招来了《时代周刊》的严厉斥责："不久前，只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的货币会在14个月内连续贬值两次。"注

美元的最终疲软使得华盛顿无法对西欧各国的货币政策发号施令，西欧有自己的一系列问题和当务之急。尽管联邦德国和英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灰心丧气且束手无策，但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仍然像他的偶像戴高乐一样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度。1973年夏末和秋季，欧洲各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讨论以接近私人市场的价格（当时接近每金衡盎司100美元）进行黄金交易。欧洲多位央行行长很可能为此奇迹般地增持了黄金，他们"似乎急于在当前黄金的官方价格上增加黄金储备的价值，目前黄金的价格为每金衡盎司42.22美元"注。当时已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乔治·舒尔茨警告说，欧洲官员"认为这一提议提高了黄金重返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法欧新货币政策的构想，他们（的这种想法）会带来重大威胁"。舒尔茨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是，让货币管理机构以现行价格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但只允许以官方价格从其他来源购买黄金。

华盛顿金融部门的主要官员仍然认为黄金供给充满了风险，他们甚至反对那些将黄金引入美国市场的、看似毫无恶意的行为。在整个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都在为建国200周年的官方和非官方庆祝活动做准备（正式日期是1976年7月4日，这一天是签署《独立宣言》200周年的纪念日）。许多国会议员赞成采用特别铸造的金币作为纪念。美联储和财政部不得不扮演令人扫兴的角色。保罗·沃尔克，这位经常脾气暴躁的财政部副部长认为，即使是（发行）纪念金币也会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国会要求铸造金币的行动将会非常糟糕。”沃尔克在给国会的信中说，“国外将会认为美国政府发行金币是企图重新强调黄金在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注]沃尔克和美联储得偿所愿，他们在这类问题上一贯如此。法律通过并授权设计了200周年特别纪念币，1976年发行了面值分别为1美元、50美分、25美分的硬币，以及一些特殊纪念银币，但是显然没有金币。

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几十名国会议员与尼克松政府和联邦储备局的对峙可能会永远僵持下去。“水门事件”就像一股黑色飓风，笼罩在华盛顿上空两年多。如果“水门事件”的阴影在1973年底或1974年初突然消散，那么尼克松政府是否会同意将所有类似于让个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事务排上日程还不得而知。毕竟，美联储主席伯恩斯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他希望恢复1971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度。的确，国会中要求个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但尼克松政府总能找到阻止立法的方法。尼克松本人从来没有对个人持有黄金问题表现出任何兴趣，如果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他很可能会被说服，相信采取这种措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从而危及他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经济成就，更不用说会危及国际关系了。

有所改变的是财政部长的职位。到1974年初，舒尔茨在工作上已经磕磕绊绊，显然有点无所适从、痛苦不堪。他告诉朋友他曾两次提出辞职，其中一次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一封亲笔写的辞职信，结果遭到了总统的断然拒绝，白宫内的这些人小心翼翼地管理着四面楚歌的白宫，他们说舒尔茨这个时候辞职时机太不恰当、不可接受。[注]当他最终获准离开时，他选择了他的副手威廉·西蒙来接替自己的位置，

威廉·西蒙不是尼克松的首选，但是其他人都委婉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此时没有多少杰出的人物愿意加入注定要遭受挫折的尼克松政府。西蒙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第一位有华尔街背景的财政部长，曾在所罗门兄弟的政府债券部门工作。与实用主义者康纳利和舒尔茨不同，西蒙是自由市场的狂热信徒，他于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作序，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撰写了前言。

在西蒙看来，个人对黄金投资的需求与国会中不断加大的压力意味着，财政部应该放弃长期坚持的反对私人持有黄金的立场。那年春天，西蒙宣称美国对私人持有黄金的限制“令人反感”。他请求国会对总统选择时机取消黄金私人持有禁令“有足够的信心”，而不要由国会立法决定具体的日期，他还暗示，仅仅几个月后就会做出取消禁令的决定。注

与此同时，国会正在寻找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私人持有黄金问题，尽管方式非常迂回。如果不是因为政策领域的一个不可预见的小问题，克兰和麦克卢尔关于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提案很可能会默默无闻、毫无进展，大多数人不会把私人持有黄金问题与这个领域——外国援助——联系在一起。世界银行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创建的主要全球机构之一，旨在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在世界银行成立几年后，一些原本理想的贷款却让接受国出现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因此，世界银行于1960年成立了国际开发协会（IDA），它被称为世界银行的“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发放的贷款类似于世界银行为交通、发电厂、水坝和教育等项目提供的贷款，但它们专门针对最贫穷的国家，并且只收取名义上的利息。

10多年来，国际开发协会获得了国会山的支持，虽然后者的态度不温不火，但却是明确无疑的。而到了1974年初，形势突变，发生了全球石油危机（特别是1973年开始的欧佩克禁运）和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当时，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占印度每年获得援助

总额的30%左右。再加上看似没完没了的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疯狂通胀，这些事态的发展让许多美国人及其议会代表感到，美国最好把发展资金花在疲软的经济上。（1973年中期至1974年初，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下降了5%，这是美国现代史上下降速度最快的一次。）[注]一位颇有影响的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总结了许多同僚的观点：“在我们无法照顾国内同胞时，当美元面临巨大压力时，当国家债务在过去的4年里增加了20%左右时，当我们今年的债务又增加了150亿美元时，我不打算投票增加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注]

1974年1月，由于尼克松政府被“水门事件”困扰，众议院以248对155的票数优势否决了国际开发协会的资助议案。尽管白宫支持这项议案，但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许多自由的民主党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厌倦了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花费钱财，这些国家不管多么缺钱，都似乎总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战争。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谴责众议院的投票“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数亿人来说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注]。

尼克松政府对投票结果既感到不快又十分惊讶。外国援助是“国际博弈”的一部分，白宫不愿意出人意料地输掉一场战争，特别是因为众议院对议案的否决破坏了政府几个月前完成的一项多国协议。舒尔茨和基辛格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此次投票“对我们开展合作的努力和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构成了很大障碍，在这个世界上，各国越来越相信自己最大的利益来自单打独斗”。他们想方设法来提高对国际开发协会议案的支持率，并愿意通过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合作来达成目的。其解决方法是，为了赢得一些反对议案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将国际开发协会的议案与克兰和麦克卢尔的反对黄金禁令措施合二为一。

随后，在白宫的支持下，麦克卢尔关于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修正案被附加到了国际开发协会的议案上，希望以此让那些对外国援助持怀疑态度的参议员在参议院支持该议案。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休

会前后的两次国会会议上，会场辩论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在众议院否决国际开发协会议案期间，印度试爆了核武器，这使得国际开发协会对印度的援助更加难以让人接受。参议员哈里·伯德认为，外国援助只会“放任印度这样的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开发一种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武器”。

此外，参议员们显然被恢复美国私人持有黄金的权利的想法吸引。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皮特·多米尼克称美国是“唯一一个公民无权拥有黄金的国家”。（这并不准确，尽管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对私人持有黄金的限制正在放宽。）“当美元不可以兑换成黄金时，用不同于对待其他任何原材料的态度来对待黄金毫无意义。”

通过记名投票，该议案以55票对27票通过。票数的差距不小，这给了财政部长西蒙足够的筹码向伯恩斯施压。他在第二天给伯恩斯的信中写道：“我依然认为，本周必须就美国在黄金问题上的立场做出综合决定。”[注]伯恩斯表示担心，他认为由于欧洲仍在设法恢复黄金的官方价格，如果向美国公民开放私人市场，会损害美国的地位。西蒙警告伯恩斯说，众议院里的情绪“极不可能”让私人持有黄金问题推迟到年底，并敦促他找到一种方法来和平解决即将到来的问题。

国际开发协会授权的这项议案勉强获得支持，而很少有人积极期待；允许私人持有黄金的议案则有许多人翘首以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自有它战术上的高明之处，愤世嫉俗的观察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外国援助支出与一项支持私人持有黄金重新合法化的议案相联系也有虚伪的一面，可以说，外国援助支出正是私人持有黄金倡导者反对的那种大规模政府开支。在国会的议员席，很少有人真正关心私人持有黄金对经济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托马斯·里斯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外：“关于私人持有黄金问题，我担心的是，很多无辜的人会购买黄金，我认为他们会输掉衬衫。投机者会让他们一贫如洗。”在国会的议员席上，更常见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谴责这种把

问题笨拙地捆绑在一起的方法。得克萨斯州的亨利·冈萨雷斯提出了最初的国际开发协会授权议案，这项议案被美国众议院否决。他大声疾呼："这个议案的提议者希望每个人都用黄金遮住双眼，把黄金作为辩论的主题，而且没有人会停下来问其他的问题，也就是国际开发协会的那10.5亿美元。"他继续说："这两个问题毫不相干，有着天壤之别，绝无理由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注]

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也难以接受把不可能合并的问题捆绑在一起。那些在1月份反对国际开发协会授权的人，在7月份对外国援助的问题同样感到不满。马里兰州的罗伯特·鲍曼是保守派校园组织"美国争取自由"的创始人，他直接对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说："你们用自己的原则什么也换不到。你们正在犯一个大错。如果这个议案和其他类似的议案通过了，我们都会需要黄金，因为我们的钱将会一文不值。"[注]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尔·凯彻姆直截了当地问克兰："您会不会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存在贿赂的风险？"克兰回答说："我不会称之为贿赂。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

不管是贿赂还是妥协，众议院以225票对140票通过了该决议。唱名投票和众议院投票一样混乱。通常支持对外援助的自由的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而保守派共和党人杰克·肯普也投了反对票，他很快就成为黄金政治的代言人。由于参众两院的议案版本在用词上存在微小差异，而意义大相径庭，整个投票过程几乎中止。7月25日，参议院似乎通过一次口头投票通过了议案，并未讨论该议案与众议院议案的不同之处。可以说，在众议院的议案是否留下了漏洞、总统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恢复对私人持有黄金的禁令问题上，这个议案有些模棱两可。随后，在麦克卢尔的运作下，参议院先前的投票无效，并增加了一项修正案。7月下旬，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试图延迟通过该议案。议案的细节已经敲定，最后两院通过了这项议案。但是，这场好戏还没有结束：议案还需要得到总统的签署，而总统在哪里？

8月2日，白宫首席行政长官收到了递交总统批准的S2665号文件，并向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索取各部门关于总统应该签署或否决该议案的“报告和建议”。（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管罗伊·阿什可能没有参与；因为他是黄金股的投资者，所以他主动退出，不再参与制定黄金政策。）[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报告逐渐流传开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一贯倡导慢慢来，害怕继续推进。伯恩斯警告说：“此时允许私人拥有黄金存在重大风险——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元在外汇市场上面临的压力等。”“因此，我认为该议案中涉及黄金监管的部分是令人遗憾的。”伯恩斯写道。他建议密切监测市场反应，并废除该议案中的这一部分。[注]财政部长西蒙表达了一种独特而相当可怕的观点，他认为该议案中的措辞可能“被解释为禁止对黄金交易的所有监管，即使这条规定也适用于其他商品，并没有把黄金单列出来”。西蒙坚持说：“对于监管黄金交易，总统必须拥有与监管其他商品交易相同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在紧急情况下尤其重要。”虽然如此，西蒙并没有正式反对签署该议案。

美国政府内部的抱怨不仅仅来自那些被正式征询意见的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赫布·斯坦责备一位财政部官员，认为后者没有召开会议来讨论悬而未决的黄金立法。赫布·斯坦为总统没有表达更为悲观的观点而感到震惊。比如，他说：“有人会认为，售卖黄金意味着我们最后一笔遗产的消散。”[注]他还指出：“对于美国公民还想要多少黄金，我们毫无概念。”

所有这些都是空话、废话，因为很难说尼克松总统是否曾注意过这些评论。8月8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与亲信几天来一直在讨论的事情，那就是他将辞去总统一职，第二天生效。这让《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感到困惑：尼克松是否在宣布他下台之前签署了该法案？白宫一片混乱，让人疑窦丛生，国会中一度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最终，他没有签署该法案。”[注]

8月14日，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签署了《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将它纳入93-373号公共法案。福特是迄今为止唯一不是由美国选民选举上台的美国总统。事实上，这是福特第一次签署法案并将议案纳入法律。这件事办得既不正式也不隆重。因为尼克松起草的签字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到该法案的黄金条款。也许是被尼克松及其助手和国会的一连串事件分散了注意力，也许是担心法案涉及的微妙政治，白宫新闻办公室没有大肆宣扬美国人民恢复了买卖黄金的权利。在当天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杰里·特霍斯特宣布，总统会见了他的安全小组，会见了苏联大使，还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会见埃及外交部长以及美国各市市长和州长。他没有提到福特已经签署了一项法案并将其纳入了法律，这项法案允许美国人自罗斯福总统执政以来再次持有黄金，而且也没有任何记者提及此事。注因此，第二天对这条新闻的报道也是平淡无奇。例如，《纽约时报》第二天没有发表一篇关于福特批准该法案的新闻，而是采用了路透社的一篇新闻通稿。三大电视网各播出了一个小短片，ABC（美国广播公司）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长度为10秒，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长度为20秒。市场的反应大多是模棱两可的，鉴于当时世界上的动乱局面——尼克松及其高级助手有可能被起诉；石油危机迫在眉睫；美国陷入困境；塞浦路斯发生政变，随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几乎很难明确指出黄金禁令结束后的确切反应。唯一的例外是股票市场：在福特签署《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连续第5天下跌，创下4年来的新低，这使得黄金矿业公司的反弹更加突出。

在国会的剧烈变动过程中，美国私人黄金市场正在为自己的繁荣做准备。1974年上半年，由于黄金继续以每金衡盎司100美元以上的价格交易，美国公民前往加拿大购买25克的金饼。注每个买家都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声明“不会以任何方式违反美国财政部的黄金法规”，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按部就班地对小额黄金采购执法。到8月初，甚至在福特签署该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条文之前，四家

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就已经宣布，一旦禁令正式解除，它们将开始交易黄金期货合约。在此之前，世界上唯一的黄金期货市场位于加拿大温尼伯。至少，华尔街经纪人塞缪尔·韦斯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申请并获得了许可，可以进行各种规模的金条交易，他将对一天的现货交易收取6%的加价，这大大低于金币交易商收取的加价。“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不用进入货币市场，不用支付更高的价格就能大量购买黄金。”韦斯这样告诉媒体。[注]

当然，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假定12月31日将依法开始黄金交易。这种假设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早在1974年11月，离美国国会批准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还有一个月时，福特政府就在考虑采取刹车措施。[注]这么做非常勉强，有些原因并不明确，但主要是担心“由于私人投资所需的黄金都来自进口，美元在外汇市场上会面临下行压力”[注]。这种想法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如果允许美国人用黄金作为投资，就会实际上放弃尼克松3年前取消金本位时的一个假定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瑟·伯恩斯持有的观点），国际贸易的便利性创造了黄金自由市场，这反过来意味着，无论美元与黄金的关系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美元的价值都将受到威胁。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一观点，它都明确地提醒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理念——从赤字支出到对外援助，如果被振振有词地描述为助长通货膨胀，就都可能遭到明确的攻击。

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最终版本没有明确美国政府在黄金市场中的作用，对此官员十分恼火。伯恩斯的部分反对意见来自哲学理念上的一致性：“此时，我反对任何通过出售或拍卖国债来维持‘有序市场’的措施。那些支持私人可持有黄金的人士的主要论点是，禁止美国公民购买和销售黄金是对他们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财政部销售黄金可被视为破坏了这一哲学理念。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旦国库参与市场，就可能很难脱身。此外，一旦财政部完成销售，就可能很难抵御未来进一步干预市场的压力，不管是支撑还是防止黄金价格上涨。

总而言之，最好让市场找到自己的平衡，并承担可能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任何过度投机行为的成本。”(注)

如果专家在幕后反复讨论仍然难以厘清美国政府与黄金的关系，那么对于美国公众而言，它绝对非同寻常。自从20世纪30年代黄金禁令开始实行以来，公众就对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着迷。虽然它不是美国政府最大的黄金储备库，但它周围的军事设施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打开这个金库的密码组合需要两个人，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密码；如果一个喷灯碰到金库的主要部分，那么房间里就会释放有毒气体，据说任何防毒面具都无法隔绝这些有毒气体；等等。1964年，007电影《金手指》将诺克斯堡的传闻推向高潮。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构思精巧的故事，故事中诺克斯堡的安防设施被突破、黄金遭受辐射（这和伊恩·弗莱明的原小说情节不同，在小说中，金手指和他的同伙企图窃取所有黄金）。1964年，《金手指》是美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一些影院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而昼夜上映。

也许是巧合，在国会允许个人买卖黄金的同时，有传言说诺克斯堡的黄金全部或部分消失了。20世纪60年代初，约翰·伯奇协会和其他边缘组织推动了美国这些传言的流传。但到了1974年，至少部分边缘组织进入了政治主流阶层。1973年，一位名叫彼得·戴维·贝特的人出版了《反对美元的阴谋》一书，这本书在很多方面与当时的哈里·布朗的书以及其他书名中带有“钱币”二字的书相似，但它更具阴谋论色彩，对洛克菲勒家族有着针对性敌意。1974年，贝特指控美国政府将诺克斯堡的大部分黄金抽出，卖给了戴维·洛克菲勒。负责诺克斯堡金矿的公务员维克托·哈金驳斥了贝特的指控，称其为“疯言疯语”。(注)

贝特的指控模棱两可，难以证明也不易反驳。例如，1967年底至1968年初，数百吨黄金被从诺克斯堡运往英国，这是事实（见第八章）。但是，人们无法知道贝特所指的是不是这些黄金，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黄金没有被计入美国财政部的账目中（当然，财政部并

没打算让人们关注大量黄金流失这件事）。虽然没有任何主流媒体对诺克斯堡的故事给予足够的关注，但这个故事却通过美国《闲话报》这家小报和一位受欢迎的达拉斯电台主持人在内的一些非正规渠道广为传播。

正是国会把贝特的零星指控进行了官方记录。那年夏天，克兰直接向财政部长西蒙指出，诺克斯堡的金库已经枯竭。由于“水门事件”将美国政府的信誉拖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西蒙的回应相当明确，他指出国会和福特政府即将对金库进行巡视和审计。9月，克兰和几位保守派同事，包括曾经的约翰·伯奇协会官员约翰·罗赛洛，第一次参观了诺克斯堡。美国铸币局局长玛丽·布鲁克斯打开了一扇金库大门，引起啧啧惊叹，国会议员用卷尺测量了金条的尺寸。财政部坚称3年内没有从金库运走任何黄金，国会议员们声称谣言毫无根据，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不管怎样，谣言持续了一段时间。通常很难了解这些谣言从何而起，更难知道传播谣言的动机。当然，在黄金禁令日渐式微的几个月里，似乎有些人在混淆视听的过程中觉察到了经济利益。例如，即使在9月份的检查之后，众议院的保守派也没有放弃诺克斯堡的黄金并非完整如初的想法。1975年1月，在财政部第一次计划销售黄金的前3天，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约翰·康伦（他曾是9月代表团中的一员）给西蒙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呼吁“立即将美国政府销售黄金的日期推迟30天”。康伦解释说，这么做的原因是“金融专家”向他建议，诺克斯堡的审计“可能表明政府持有的纯金交割量远远低于财务主管官员最初宣布的2 400万金衡盎司的库存”[注]（电文原文）。而2月份公布的审计结果并非如此，尽管对诺克斯堡持有多少黄金的怀疑从未完全消失。[注]

最终，福特总统和财政部长西蒙拒绝了延迟黄金销售的想法，美国政府也承诺出售200万金衡盎司的库存黄金。合法黄金交易开始，福特总统对黄金所有权发表了公开评论，或许这是他唯一一次公开评

论。12月31日，也就是美国黄金市场重新开放的那一天，福特在科罗拉多州的韦尔滑雪（几年前，他和妻子在那里买了一套公寓，当时韦尔并不是非科罗拉多州人喜欢前往的度假胜地）。那天早上，总统穿着蓝色滑雪外套和蓝色裤子，肩上扛着滑雪板。在去乘缆车的路上，媒体向他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总统先生，您打算购买黄金吗？”一位记者问。福特的回答十分简短：“不，我不是投机者。”注

在私人持有黄金合法之后的早期，许多人似乎都与福特一样对此漠不关心。尽管舆论造势层出不穷，尽管有人主张拥有黄金是美国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有数万美国人抢购了哈里·布朗的书，但是人们对金条和黄金期货市场反应冷淡。在交易的第一天，华尔街美林公司只接到一份黄金订单——只有20金衡盎司。塞缪尔·韦斯在法律签署之前就与纽约证交所安排了黄金交易。当天，他告诉《纽约时报》：“没有淘金热。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一颗哑弹。”注

美国人可以合法地持有黄金的过程很复杂，其后果是国会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税收问题，而各州对税收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税法特别规定，对销售价值超过1 000美元的金币或金条免税。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则采取了与加利福尼亚州相反的做法，而在佛罗里达州，这件事经过多年的诉讼才得以解决。注在恢复黄金交易的早期，许多美国人无法得到可靠的建议，以了解投资黄金需缴纳多少税金。

随着1975年慢慢过去，美国人对黄金的需求形势几乎没人预料到。人们对购买和储存实物黄金没什么胃口，美国投资者尤其对金条没什么兴趣。但是，私人可以持有黄金确实为黄金期货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市场，黄金期货是指在未来某个日期以商定的价格购买黄金的合同。自1975年年初到7月底，约500吨黄金（价值25亿美元）已通过期货合约进行交易，美国黄金期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注（到1977年，黄金期货合约的金额飙升至150亿美元以上。）美国人似乎发

现，这种黄金投资方法风险较小、更为方便，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防范通胀，那么许多投资者到年中都会失望。自1月份第一批期货交易开始以来，黄金价格已下跌约10%，而通胀继续上升，直至危险水平。黄金作为保值品具有神秘性和历史性，而这些特性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作为商品被交易的东西，价值都会有升有降。

当然，1975年的黄金市场也可以说并不完全是开放的和公平的。美国政府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黄金市场中的作用，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让人普遍感到满意。福特签署的法律没有规定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将在黄金市场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它们真的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虽然理论上，美国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价格，但实际上，它仍有重要理由确保黄金价格稳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广义层面来讲，美国政府仍然力图减少黄金的全球货币作用，而更高的价格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偏离这一目标。尽管如此，这种立场仍令人捉摸不透，即使对一些金融专家来说也是如此。1974年12月，法国和美国的高层官员在马提尼克岛会晤时，曾两次担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问福特及其助手：“你们财政部强烈反对黄金货币化，为什么？5年前，它是在保护美元，但现在它是浮动的。”威廉·西蒙的回答含糊其词：“我们担心，如果每个人都提高黄金价格并将黄金价格作为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会使货币体系更加脆弱。”(注)

具体而言，美国担心更高的黄金价格会有利于南非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造成市场扭曲，最好能够避免这种状况。(注)这样，为了使黄金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美国政府开始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黄金销售也起到了缓解贸易逆差的作用，因为对国外的黄金销售被算作出口。）美国政府起先承诺在1975年1月美国黄金市场开始启动时出售200万金衡盎司黄金；然而，美国政府却无法控制黄金市场，得到它想要的出售价格（高于每金衡盎司

153美元），最终卖出的价格还不到拍卖价格的一半。注其中的讽刺意味既深刻又令人痛苦。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谨慎地保护它的黄金供给，以防止任何市场发展导致它不得不将黄金运往海外。现在，当美国政府终于准备好出售黄金时，它却找不到足够的买家以合适的价格卖出黄金。从1975年中期开始，美国又陆续拍卖了小批量的黄金。但是，阿瑟·伯恩斯的预测成真了，一旦美国政府参与黄金市场，就难再脱身。

当供求极其一致时，一旦有一种完美的黄金投资工具——克鲁格金币，市场就会迅速扩大。克鲁格金币是人类历史上流通最广的金币，到写作这本书为止，已经铸造了大约5 000万枚克鲁格金币。它代表了南非政府和黄金开采行业的世界级营销活动的胜利。克鲁格金币的正面是保罗·克鲁格的头像，他是一位波尔民族主义者，19世纪末4次担任南非共和国总统；背面则是一只跳羚，它是南非的国家象征。每一枚克鲁格金币只含有1金衡盎司的纯金（黄金和铜的比例为11：1，这增加了金属的耐用性），无论何时，它的价值都非常容易计算。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产克鲁格金币以来，这种金币在南非一直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但它没有货币价值，也从未被用于商业贸易。注相反，因为它是法定货币，其他国家无须付税就可以进口这些金币，而不用像进口其他纪念币或纪念章那样支付进口税。

当黄金交易在美国合法化时，克鲁格金币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流通金币了，英国是它最大的海外市场。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1975年秋天，南非矿业商会营销部门Intergold聘请纽约恒美广告公司打造一场营销活动，以将克鲁格金币卖给美国人。广告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概念上：选择黄金作为整体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是明智之举，拥有克鲁格金币是拥有纯金的最佳方式。营销活动于10月开始，试销期为11周，营销手段包括在洛杉矶和费城的报纸投放广告，以及在休斯敦的报纸和电视投放广告。目标受众是25~54岁的男性。注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是，一个人向一个边长只有18码的立方体走去，这个立方体

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开采过的所有黄金。“它很稀少，”一个画外音说道，“它很珍贵。新开采的黄金在逐年减少。拥有1枚南非克鲁格金币，就拥有了1金衡盎司的黄金。”为了方便顾客购买，该广告提供了一个免费电话号码，观众可以打电话获取更多信息，并可以将电话转接到所在地区的黄金交易商那里。

结果令人吃惊。在广告宣传之前，美国人对克鲁格金币的熟悉程度接近于零。在广告投放期间，在美国销售的克鲁格金币中，有一半均通过这三个市场售出。仅休斯敦一家银行就在试销期间卖出了1 600枚克鲁格金币。1976年，营销活动扩大，在25个市场投放了耗费400万美元的广告。1978年1月，南非售出66.9万枚克鲁格金币，是1977年1月的3倍多，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售出。到1978年末，售出600多万枚金币，几乎是1977年销售额的2倍。这时，美国政府决定参与1金衡盎司金币活动。众议院的吉姆·里奇和参议院的杰西·赫尔姆斯让财政部铸造和发行1金衡盎司纪念金币，纪念美国名人马克·吐温和维拉·凯瑟。1979年初，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每金衡盎司300美元，美国许多最早的克鲁格金币买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然而，随着美国人对南非黄金的认识越深刻，他们对它的黑暗面也越了解。自1948年以来，南非一直采取种族隔离制度，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统治阶层反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拥有投票权和其他基本权利。没有一个国家的种族差距如此露骨，早在1950年，联合国就连续严厉地指责南非政府，并企图孤立南非政府。例如，1968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所有国家暂停与南非开展任何文化、教育或体育交往。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政府对黑人的压迫似乎更加严重。1976年6月，索韦托镇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活动，警察开枪打死了数百名抗议者，受害者几乎都是高中生。

尽管美国人购买克鲁格金币时可能没有重点关注种族隔离的罪恶，但是南非的黄金行业却直接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有关。[注]索韦托和约翰内斯堡周边的其他城镇都把它们的存在归功于附近的金矿。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采矿业雇用了大约38万名工人，其中约90%是黑人。这些工人平均每月得到124美元的工资，大约是南非白人工资的20%。黄金出口对南非政府至关重要：1976年，黄金出口为南非赢得了27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至少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就已经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黄金出口，南非将经历“大规模的衰退和产业混乱”。[注]事实上，南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国曾在过去引发了政治问题。例如，当尼克松政府在1970年达成一项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南非购买黄金的协议时，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罗伊斯就批评这项协议“把南非作为黄金供应国制度化”。

尽管如此，美国官方对南非进口黄金的指责大多发生在美国人不能购买黄金的时代，这些指责更多地集中在南非黄金市场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上，而不是集中于它与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上。1977年，美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规模相对较小，但开始显示出相当大的组织力量。克鲁格金币成为一个高度可见的目标，卖出的金币越多，越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参与该运动的积极分子采用的一个明显、有力的证据就是保罗·克鲁格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必须教导黑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二等公民，属于必须服从的下层阶级。”

面对地方压力，美国最大的地方电视台——纽约市的三个电视频道，主要由电视网（WABC-TV、WCBS-TV和WNBC-TV）拥有和运营——停止播放克鲁格金币的广告。1977年10月13日，马萨诸塞州众议院正式谴责这些广告以及克鲁格金币的销售。芝加哥、代顿、丹佛和圣安东尼奥的市议会通过了谴责这些广告的决议。在一些城市，活动家利用电视台的电话号码表达反对意见，他们打电话获取当地的黄金商贩地址，然后在外面发起抗议。这些抗议活动产生了实际的影响：1977年底，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美林公司宣布停止出售克鲁格金币，理由是它正成为洛杉矶和其他地方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目标。在数百万人看来，购买克鲁格金币意味着支持一个不公正的种族主义政府，这个政府通过残暴对待自己的公民来支撑政府的运行。《伯克希尔之鹰》杂志上的一篇社论严厉地指责道：“投资南非黄金的人寻求的保障是以

牺牲大多数南非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而后者唯一的安全地就是坟墓。在任何情况下，由于世界黄金价格的波动，黄金保障的安全性可能比想象的要低得多。”㊟

克鲁格金币在美国的狂欢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就在克兰的黄金所有权法案以最不可能的方式成为法律的3年后，在国会山走廊的另一边，几个民主党人开始引入他们雄心勃勃的法案，其关注重点是与南非的贸易，克鲁格金币首当其冲。早在1977年10月，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就提出了《南非贸易限制法》，该法令将“禁止进口那些因为种族不同而领取不同工资的劳工生产的物品”。纽约布鲁克林的国会议员斯蒂芬·索拉兹说，在1980年提出禁止克鲁格金币在美国销售之前，他认真地考虑了禁令可能最终伤害南非矿工的情况。索拉兹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他曾咨询过反种族隔离的知名律师西里尔·拉马福萨，后者创建了一个矿工工会。㊟索拉兹称，拉马福萨“明确表示，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种族隔离是必要的，即使这意味着他的工会中有一些成员会失业”。

数十年来，向美国公民开放世界黄金市场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然而，伴随着它的是世界上纷繁复杂、充满敌意的政治问题；克鲁格金币在短短几年内再次变得非法。在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之后的几年里，经济并没有繁荣昌盛。不管放开黄金买卖权可能达到什么效果，它并没有重振美元，没有减少通胀，没实现尼克松和福特的承诺，也没有创造就业机会。1975年，自大萧条以来失业率首次飙升至8%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菲利普·克兰、杰西·赫尔姆斯、罗纳德·里根以及众多的经纪人和交易商都试图向美国人灌输这样的观点，即只要再次把黄金作为货币的基础，它就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

1. 93rd Congress, 1st session, H.R. 435.

2. Edwin J. Feulner Jr., “How the Gold Bill Was Passed,” Euromoney, November 1974, pp. 47－48提供了简要而详细的总结，对此，我非常感激。

3. “Bill Seeks Legal Gold Ownership,” Chicago Tribune, June 7, 1971.

4. 克兰的金币收藏可参阅Jack Anderson ’s Washington Post column“Washington Merry-Go-Round,” January 6, 1975。

5. 克兰的前助手肯·麦肯齐的访谈请参阅100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yn Rand（New York: Penguin, 2010）, “1970s” section。

6. Insid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Secret Diary of Arthur Burns,1969－1974, ed. Robert Ferrell（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September 10, 1971 entry, 55.

7.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Devaluation,” Time, February 26, 1973.

8.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G 56, George Shultz papers, Box 6, file “Gold Sales,” NARA.

9. Treasury Undersecretary Paul Volcker to Wright Patman, chairman, Hous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 July 13,1973.

10. 可参阅Secret Diary of Arthur Burns, March 17, 1974 entry, 121－122。

11.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News Release, WS-27, June 11, 1974.

12.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January 20－21, 1975.

13. George Mahon, quoted in “Congress Rejects, then Approves IDA Funds,” CQ Almanac 1974, 30th ed., 517－519.

14. “House Curb on Aid ‘Disaster’ for Poor, McNamara Says,”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1974.

15. Treasury Secretary William Simon to Federal Reserve chair Arthur Burns, FRUS, vol. 31, document 65. 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但它称参议院的投票发生在“昨天”，这表明它是在5月30日被寄出的。

16.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 July 2, 1974, 22008.

17.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 July 2, 1974, 22003.

18. 参阅FRUS, vol. 31, Document 68。此外，伯恩斯在1974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舒尔茨曾告诉他，阿什“与黄金板块的证券很有关联”。阿什和一个商业伙伴在内华达州拥有一个牧场，后来出售给纽蒙特矿业，帮助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提高黄金产量。可参阅Water Guzzardi Jr., “The Huge Find in Roy Ash ’s Backyard,” Fortune, December 27, 1982, 48－65。

19. Arthur Burns to William Skidmore, August 9, 1974. White House Records Office: Legislation Case Files, Box 1, “8/14/74S2665 U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ile, GRFL.

20. FRUS, vol. 31, document 71.

21. Feulner, “How the Gold Bill Was Passed,” 48.

22. 特霍斯特的新闻简报记录脚本在Box 1, the Ron Nessen file, GFL。8月14日新闻简报记录脚本可见http://www.fordlibrarymuseum.gov/library/document/0151/1671247.pdf。特霍斯特只担任了1个月的新闻秘书，他后来辞职以示对福特赦免尼克松的抗议。

23. “Gold Rush Beginning at Canadian Banks,”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74.

24. “Big Board Approves Gold-Bar Sales Pl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74.

25. 福特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对私人是否能够购买和持有黄金这类问题几乎没有兴趣。他的助手显然在推行这项政策。11月中旬，福特给财政部长西蒙送去了一封手写的便条：“我们在做什么？什么时候可以买卖黄金？”这促使西蒙再次向总统简要汇报这件事。President’s Handwriting File, Subject File, Box 19, Finance—Gold, GRFL。

26.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imon to President Ford, November 18, 1974. FRUS, 1969－1976, vol. 31,document 77.

27. FR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73－1976, vol. 31, document 76.

28. Harkin comment in “There’s Gold in Fort Knox,”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4, 1974.

29. 康伦的电报副本可参阅the William Simon papers at Lafayette College in Easton, Pennsylvania, Series 3B, Drawer 23, Folder 1,“Gold.”，上面盖有邮戳，表明西蒙读过此电报。

30. Accountability and Physical Controls of the Gold Bullion Reserves, FOD-75-10,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February 10, 1975. 一直到21世纪，有一些黄金投资者依然坚持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上当受骗了，把假金条误认为是真金条，或者认为金条的实际重量没有报道的那么重。

31. Pool Report on Ford’s Morning Skiing, December 31, 1974,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s, Box 6, GFL.

32. “Gold Sales Find Scant Response from U.S. Buyer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75.

33. 各州做法冲突的情况可参阅Neal S. Solomon and Linda D. Healy, “State Attempts to Tax Sales of Gold Coin and Bu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1982）, 297－344。

34. “The Biggest Gold Market: Futur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1975.

35. FRUS, vol. 31, document 80.

36. 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金价上涨依然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诱使苏联出售其黄金储备，这可以被视为美国的战略收益。

37. See “Big Boom in a Barbarous Relic,” Time, February 26, 1979; and “U.S. Finds Few Gold Buyers; Accepts Bids of $153 to$185,”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75.

38. 有关南非克鲁格金币的详情可参阅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Krugerrand，这是由金条销售组织GoldCore于201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39. “Business Briefly,” Broadcasting, July 12, 1976, 9.

40. 反种族隔离人士对克鲁格金币营销的概述可参阅BarbaraDemick, “An Ounce of Love?” More, December 1977, 25。

41. “The Pedigreed Gold System: A Good System — Why Spoil It?” Report on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ayments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969, 5.

42. “An ounce of apartheid,” Berkshire Eagle, December 10, 1977.

43. Stephen J. Solarz, Journeys to War and Peace（Waltham, MA: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82－83. 索拉兹提供的时间表很难厘清。他说他在1980年引入了这项法案；国会记录显示，他在1978年引入了对南非投资的限制（尽管这与克鲁格金币无关）。他说，在1980年提出这项法案之前，他曾与拉马福萨讨论过这项法案，但直到1982年，拉马福萨才真正成立了矿工工会。这些差异似乎并没有与索拉兹的总体主张矛盾，他宣称他非常关注美国从南非购买黄金与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和南非矿工的生计之间的关系。

第十一章

脱颖而出



受到南非克鲁格金币旺销的鼓舞，美国于1986年开始铸造并出售自己的金币。它们很快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金币，并促进了美国金矿业的强势复苏。

1976年10月1日星期五，这是第94届美国国会参议院会议的最后一天。这一年是总统大选年，那天在与法国外交部长以及几位苏联高阶官员会面后，福特总统很快就开始了为期6天的竞选活动。众议院已经结束了会期，许多议员离开了驻地。

参议院也希望可以结束会期，但至少有一项议案，就算不是注定要被否决，也貌似陷入了僵局。这让参议员和工作人员直至午夜之后才能离去。自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采用浮动货币体系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在一套过时的规则下运作，特别是涉及在国际交易中仍使用黄金的规则。摆在参议院面前的议案将更新规则，使之与当年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举行的会议上其最大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相匹配。(注)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且相当受欢迎的计划；福特政府正在努力推动该议案，众议院在7月以超过二比一的优势通过了该议案。

但在参议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案几乎被否决。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都为了表达更广泛的政治观点而欲将之搁置。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信奉自由主义的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希望增加一些条款，以让美国公司参与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的活动成为违法行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杰西·赫尔姆斯希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黄金施加额外的限制，并恢复那些在40多年前险些让罗斯福实施的黄金政策安排落空的旧条款：合同中的黄金条款。在长期的黄金禁令期间，支付金额与黄金挂钩的合同曾经很常见，但却不切实际，而且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由于如今美国人能够合法拥有黄金，并且黄金与美元脱钩，赫尔姆斯和许多其他人认为，不再有任何正当理由阻止人们制定黄金条款合同了（包括在债券发行或租赁/贷款协议中使用黄金条款）。此类合同对债权人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债权人可以放心，他们得到的还款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远远低于签订合同时的价值。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通货膨胀率有时会达到两位数，如何不因此受损是美国民众切实的担忧。

赫尔姆斯的经济顾问霍华德·塞格马克在参议院的时候，有位青年助理来找塞格马克。有一个来自财政部的电话打到了衣帽间，想与参议员赫尔姆斯通话。塞格马克要接听电话吗？塞格马克只为赫尔姆斯工作了几个月，他不确定程序是怎样的，但他决定接电话。当他拿

起电话时，另一端是气冲冲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注]“他的语言非常粗鲁，”塞格马克回忆道，“满口脏话。”西蒙处境艰难，他计划在几天后前往马尼拉，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董事会的年度会议，他并不愿意两手空空赴会。西蒙试图施加压力：他表示他个人会感到尴尬，而美国参议院搁置这份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案会令美国感到尴尬。塞格马克列出了想要获取赫尔姆斯支持的条件。“他（西蒙）说‘向我解释黄金条款是什么’。”塞格马克这样做了，西蒙说他不会阻止恢复黄金条款。这是赫尔姆斯的胜利，但却毫无用处：由于众议院会期已经结束，修改众议院议案、加上黄金条款为时已晚；任何关于黄金条款的立法都必须等到第95届国会。此外，福特有可能在未来一个月内的选举中落败，在这种情况下，西蒙将不再是财政部长，理论上，胜利将会消失。快速思考一番后，塞格马克告诉西蒙，如果吉米·卡特当选，西蒙应该在传达给继任者的提示中包括这一条：财政部应该支持恢复合同中的黄金条款。西蒙同意了，根据塞格马克的说法，“显然他信守了诺言”。

这是杰西·赫尔姆斯政治生涯的代表性故事。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30年来一直被称为“正义战士”，他为社会保守派所倡导的事业而战：反对堕胎、平权运动、妇女权利和同性恋权利。他的立法策略——以阻挠立法相威胁，拖延看似常规的司法和外交任命以达到政治目的——让几位总统感到头疼，特别是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他被封为“总会说‘不’的参议员”。赫尔姆斯顽固的政治观点有时甚至让那些通常与他意见一致的人感到尴尬，例如，他一直阻止联邦政府以马丁·路德·金之名设立一个纪念日。

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姆斯在争取法律支持以提高黄金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方面卓有成效。直到今天，即使赫尔姆斯的传记作家和官方网站，也基本上忽略了他曾大力倡导金本位。[注]这值得注意，因为经济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代表

了美国罗斯福政府之后金本位运动的巅峰，至少就其改变货币政策的实际可行性而言是如此（这与之政治上受欢迎程度相反）。由于通货膨胀和失业肆虐美国，再加上年度预算赤字开始经常超过1 000亿美元，共和党右翼的许多政客继续推动黄金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现在拥有了黄金，而此前那些认为持有黄金属于个人自由的言论转为支持金本位（即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完全是另一码事）。鼓吹黄金有巨大作用的政治家不再处于边缘化地位。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与西海岸地区以共和党为主的政治家浪潮相呼应——比如金鸡摆件案件的辩护律师保罗·拉克索尔特已成为内华达州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特意将金本位与适用范围更宽泛的低税率、小政府议程捆绑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立法者与矿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如爱达荷州的史蒂文·西姆斯。西姆斯在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众议院分委会任职期间购买了白银期货，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利益冲突（他自己予以否认），他后来还在一家金矿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赫尔姆斯鼓动国会通过了建立黄金委员会的提案，这是自罗斯福政府以来联邦政府在评估黄金的货币作用方面进行得最持久、最严肃和公众熟知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艾恩·兰德的门徒艾伦·格林斯潘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有如此多的高阶官员大力支持恢复黄金货币体系。

当然，赫尔姆斯为此现象的出现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虽然他对黄金的依恋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赫尔姆斯在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长大，这是19世纪“卡罗来纳淘金热”的中心。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经济大萧条，他目睹绝望的人们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矿井，希望能够从地下挖出金子来谋生。赫尔姆斯1973年上任后即开始致力于倡导金本位，尽管是在一些看似不太可能的领域。他推动黄金条款的立法是沿袭了国会中盟友的志愿：一位法学教授1975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论述了为何要恢复黄金条款。[注]该文章以个人的终极自由为立论点：“如果占主导地位的

政治哲学认为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或根本无理由地赋予、扣留或取消其公民的权利，它可以在宣告或未经宣告的战争中消灭不情愿参战的年轻人，或强迫生产者支持贫困者，那么它就有权取缔黄金条款。此外，如果主流政治哲学认为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其公民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其正常的功能是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那么，也只有这样，黄金条款才能得到保障。”

众议员菲利普·克兰前一年就发现了支持民众可以持有黄金的立法价值。几周之内，他提出了一项“消除使用黄金条款的所有障碍”的议案。与许多这样有广泛影响的议案一样，它被提交给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后并未引起重视。1976年初，赫尔姆斯在塞格马克的指导下写信给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询问后两者对黄金条款的看法。西蒙下意识地全盘反对，财政部总体上反对所有会增加黄金货币作用的举动。伯恩斯表示，他本人可能不会反对黄金条款，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在此问题上有“分歧”。

赫尔姆斯是典型的无所畏惧的人。1976年6月14日，他提出了与克兰类似的参议院决议。他的理由很明确：“当国会恢复美国人持有黄金的自由时，它疏忽了恢复要求以黄金或以黄金衡量的美元签订合同的自由。现在是时候纠正这一疏忽了。”

尽管看似简单，但赫尔姆斯倡导的法案提出了至少两个实际问题。第一，真的有人想要使用黄金条款合同吗？在国会否定黄金条款合同或法院维持废除黄金条款合同之后，商业运转并没有完全停止，美国内外的企业都找到了应变的方法。然而，对于一些试图应对美元持续疲软的美国企业而言，黄金条款合约似乎具有吸引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出口物品的航运和粮食公司。在商品的价值变化和波动的货币汇率之间，即使只是按照条款履行合同，这些公司也可能受到重创。另一些可能使用该法案的是发行黄金投资债券的公司；在对利率变化特别敏感的行业，例如公用事业中，黄金条款可能是有用的。即便如此，美国商界并没有嚷着要恢复黄金条款合同；塞格马克表示，对黄

金条款合同的需求“主要是传闻”。赫尔姆斯却将黄金条款法案视为美国可以采取的重返金本位的步骤之一。

第二个更难解的问题是，法律能否追溯适用？也就是说，如果正式消除对黄金条款合同的法律障碍，那么在1934年之前签署的、已被美国国会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无效的黄金条款合同的当事人现在是否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强制执行合同呢？这是一个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没人愿意插手的麻烦事，即使一些黄金爱好者也不想碰，更不用说国会议员了。正如第五章所述，在美国国会发布禁令时，附加黄金条款的美国债券（包括担保债券、美国国债和市政债券以及公司和房地产债券）的价值估计超过了1 000亿美元，但显然其因美元贬值抹去了400亿美元。虽然没多少人真正对赫尔姆斯提案进行辩论，但它原则上提出了罗斯福政府和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同样困境，只不过是反过来的。赫尔姆斯希望他的提案得到通过，但不想疏远绝对支持金本位的议员，在提出议案两个月后，他对议案增加了一项回避修订，大意是，此提案“在涉及过去签订的黄金条款义务的可执行性方面保持中立”。

赫尔姆斯努力让几乎没有摆上其他任何人议程的提案得到支持。他获得了堪称经济学权威的著名自由市场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支持。这位当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表示：“对你的措施予以大力支持，希望你的议案今年成功获得通过。”弗里德曼还说：“我认为禁止在合同中使用黄金条款是不合理的，1934年不应当禁止黄金条款；此外，由于黄金不再与我们的货币体系有任何重大关系，现在禁止黄金条款肯定毫无理由。”[注]对于赫尔姆斯来说，他看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议程，这吹响了限制政府支出的号角，这是有助于遏制“大政府”开销的武器。20世纪70年代，许多保守派都在抱怨美国政府的开销，但往往无力阻止。“依我看，使用黄金条款合同将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表明人们厌倦了不负责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赫

尔姆斯说，“如果黄金条款开始得以广泛使用，那么该是美国政府恢复美元完整性的时刻了。”(注)

然而，听起来再好的论点也不足以推动一项大多数立法者说不上来他们是否知道的议案——即使财政部遵守其不反对这项议案的约定。因此，正如克兰在1974年对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议案所做的那样，赫尔姆斯找到了一个立法手段，这样他的提议可以顺便得到讨论。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议案，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内务管理的小问题。自安德鲁·杰克逊的时代以来，美国一直不愿意让联邦政府管理银行，甚至不允许其使用银行系统来营利。到1977年，联邦政府在美国12家联邦储备银行和约14 000家商业银行中设有账户，商业银行既没有向其支付利息，也没有向其收取维持账户的费用。这样的系统有多种作用，其中之一是存储雇主从员工薪水中代扣的所得税。美国财政部无权收取这些资金的利息（银行可以免息使用这笔资金长达10天），为此每年损失2.6亿~3亿美元。

在1977年堵上这个漏洞，这是国会有史以来争议最少的行动之一。4月，该议案以384∶0的全票在众议院通过。精明的赫尔姆斯预料到参议院也很希望通过此议案，因此他设法附上了一些修正案，尽管它们与主要的议案没有直接关系。两项修正案对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对外援助计划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另一项修正案使得以黄金为基础的合同再次合法化。(注)金融界对黄金条款的回归有些兴奋：一位商品市场分析师告诉《纽约时报》，该法案代表“一个迅速地走上前来的沉睡的巨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其含义”。唉，这个巨人基本上一直在打瞌睡。虽然美国财政部坚持承诺，不反对该法案，但它的规定使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使用黄金合约。财政部对黄金合约的解释是，如果由于美元价值的变化，债权人以超过合同美元价值的金额支付黄金，则该差额构成资本收益，要对此征税。因此，尽管美国人现在可以像在1977年那样合法地使用合同中的黄金条款，但是不管当时或现在，都几乎没有人这样做。

赫尔姆斯在黄金合约方面的胜利只是一个前奏，后面的工作更广为人知：他成立了一个黄金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1年开始审议工作。虽然里根政府中那些更实用主义的顾问不让他就金本位发表过多的公开声明，但他们在幕后起了很大作用。除了1964年的巴里·戈德华特之外，有理由说，战后的共和党纲领在经济问题上越来越偏向中左翼。但到了198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里根的经济团队包括一支强大的拥护黄金的队伍：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密歇根州的议员戴维·斯托克曼和供给经济学顾问祖德·万尼斯基。就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之前，里根录制了一则电视广告，主张恢复金本位（尽管他显然是听取过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要求不播放该广告）。即便如此，里根的竞选团队里支持黄金的成员仍然在1980年的共和党纲领中成功地插入了这么一条："未来一段时期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可靠的货币标准，即结束通货膨胀。"(注)这段文章读起来像是不敢直呼其名的货币改革，但是那些关注者认为它意味着金本位，因而它将黄金的拥趸团结到了里根周围。在里根总统任期前几周宣布成立黄金委员会，感觉就像是奖励黄金的拥趸给予的支持，并使他们的观点合法化。

然而，不管里根和黄金之间有什么交集，创建黄金委员会的法律实际上是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并于1980年10月由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他失去连任机会前的1个月签署的。当然，法律的通过并不像该法案中的措辞所描述的那样，这是因为民主党人热衷于评估"美国政府关于黄金在美国和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的政策"。此法律得以通过的方式与1974年恢复私人持有黄金的议案的通过方式基本相同——一位坚持不懈的共和党立法者（赫尔姆斯）与一些支持者将建立黄金委员会的议案纳入民主党希望通过的议案，以此作为赫尔姆斯支持民主党议案的条件。

正如1974年《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将私人持有黄金的权利归还给美国人一样，重申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是华盛顿官方

的重要目标——赫尔姆斯知道这一点。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批准需要美国承担更多的经费的议案于1980年提交国会时，国会已经变得右倾，甚至一些自由的民主党人也开始质疑这笔钱是否值得支付。毕竟，1980年是总统选举年，过多的政府支出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大难题；此外，即使美国财政部和白宫认为它至关重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公众中几乎没有支持者。保守派游说团体——美国全国纳税人联盟为了重整旗鼓而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的法案。赫尔姆斯意识到以阻止该法案为要挟能够获得政治权利。同年6月，他在该法案中增加了一项修正案，欲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黄金在美国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民主党人认为，获取赫尔姆斯及其政治盟友的支持更重要，为此值得承担可能出现的任何政治风险以建立一个黄金委员会。因此，美国黄金委员会诞生了，尽管直到1981年夏天它才开始运行。

说美国黄金委员会无章可循还是说得太轻了。一开始，委员会的主席唐纳德·里甘宣布委员会听证会将秘密进行。“我不想看到我的话在报纸上传播。”这位精力充沛的美林证券前董事长抱怨道。显然，关于黄金委员会7月16日的第一次会议没有任何记录。(注) 黄金委员会的这项保密决定让那些希望宣传黄金事业的委员尤其不悦，面对诸多抱怨以及新闻出版集团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的辛辣攻击，里甘同意打开了黄金委员会的大门，让听证会公开进行。尽管如此，金本位的倡导者总觉得，从一开始形势对他们就是不利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为了通过立法，黄金委员会必须包含两党成员；所有民主党人都反对金本位，大多数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货币主义而非金本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重要合著者安娜·施瓦茨暗示，黄金委员会不存在真正改革的蓝图，基本上只是为了政治表演。这不仅仅是因为黄金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不会接受回归金本位。施瓦茨后来说：“里根政府从未表示它有兴趣让黄金委员会真正地调查金本位有什么作用，我认为这是对回归金本位的一个严重障碍。”施瓦茨指出，里根指派给委员会的他自己的经济顾问——曾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工作的杰瑞·乔丹和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穆雷·韦登鲍姆——“从未真正表达过任何支持或者反对金本位的观点”。因此，对美国是否回归金本位这一看似核心的问题达成共识或许注定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黄金委员会的听证会和最终报告成为宣传里甘在20世纪80年代所热衷的事业的论坛，其中一些观点甚至对经济学家来说都很难理解，带有公开表演的性质。委员会搜集的许多观点均来自一贯是金本位倡导者的言论，其中包括亨利·霍尔和穆雷·罗斯巴德。有些是来自经济学家的深思熟虑的评论，他们虽然赞同金本位试图达到的目标，但却严厉地警告说这剂药方是错误的。以保守派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致黄金委员会的一封信》为例，信的开头说：“金本位是一个早已过时的概念，老早以前就过时了。”梅尔策继续写道：“主张将重返金本位作为稳定价格的手段的人提供了所谓的灵丹妙药，但却没有提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我们通常被告知的是，金本位是一种‘供给侧’的解决方案，一种彻底改变，能够降低利率、稳定价格和消除夏季西葫芦的过剩供应。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注]其他人更是花样百出。林登·拉鲁什也是向黄金委员会提交报告的人之一，这个招人烦的政治人物在表达他的货币政策观时，充斥着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萎靡不振如同进入世界末日般的语气。“自1981年10月左右开始，”拉鲁什写道，“美国的经济已开始进入新的世界萧条阶段。”[注]在黄金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里，委员会成员之一、共和党议员查莫斯·怀利在引言第一页将黄金委员会称为“失控的”委员会，并哀叹“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与国会任务无关的问题”。[注]

毫无疑问，由于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和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黄金热、美国和全球经济长期不稳定，以及大量的克鲁格金币的销售，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恢复金本位的兴趣增加了。但对恢复金本位日益增长的兴趣并不能保证其有效落地。在黄金委员会听证会的聚光灯下，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对于“金

本位”的定义是什么有多种想法，并且对是否真的有金本位存在分歧。在该委员会第一次四小时听证会后，里甘宣称：“我们甚至无法就历史事实达成一致。”注

黄金委员会中一位极端的委员是得克萨斯州的医生罗恩·保罗，其政治生涯起步于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时期。1978年，保罗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保罗的立场是，美国货币体系以金币为基础是唯一真正的金本位。这等于是将时代倒退到差不多19世纪30年代而不是20世纪30年代。保罗效仿穆雷·罗斯巴德的1964年宣言（见第八章），希望通过取消纸币法、取消纸币、允许所有想要铸造金币的人来铸造成为日常商业唯一基础的金币以“废除银行创造货币的特权”。这种制度通常被称为“金币标准”，其他委员都不像保罗那样热衷于此。注

与保罗观点最接近的是来自私营部门的两名委员刘易斯·莱尔曼和亚瑟·科斯塔马尼亚。莱尔曼是一家同时销售化妆品的药店的管理人员，后来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州州长。他是法国经济学家、戴高乐的顾问雅克·吕夫的紧密追随者。莱尔曼不像保罗那样从意识形态出发，希望美元可兑换成黄金。莱尔曼认为，有必要使用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来稳定那个时代的破坏性通货膨胀，并迫使利率达到最有效的水平。他呼吁“在美国的领导下”召开一次新的国际货币会议，“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废除官方储备货币的特权，从而弥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严重的缺陷”。注让莱尔曼遗憾的是，1981年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主要经济体的金融领导者需要这样一个体系，甚至长期以来期盼国际金本位的法国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降温。在加利福尼亚曾与里甘合作过的律师科斯塔马尼亚和担任黄金委员会执行董事的经济学家安娜·施瓦茨后来写道：“他目前唯一关注的是，向市场提供美国铸造的金币。”

这个权威性不足的三人组合并没有说动黄金委员会接受以黄金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改革。黄金委员会甚至没有一群真正主张全面恢复金

本位制的专家证人。在专门讨论黄金在美国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的两次听证会中，有23名证人做证——只有两位证人赞成恢复传统的金本位制。其中一人本应是很有分量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他是里根供给侧改革顾问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他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要求美国恢复金本位制，但有一项条款是，要来保护美国黄金储备不会被耗尽或积累太多，黄金最大储备量要保持在规定储备目标总量的175%以上。如果黄金储量即将触及这一指标，拉弗的计划是要求“黄金市场休市”，在此期间，将重新计算黄金的官方价格。拉弗指出，黄金市场可能会突然发生变化，如发现新的黄金。“当黄金市场受到干扰时，我不希望看到整个经济因为市场的某些变化而遭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但正如在黄金委员会存续过程中一再发生的那样，那些对金本位这个话题最为热情、在此方面知识最渊博的人最难达成共识。罗恩·保罗不接受拉弗的计划，认为这将保留美联储和国会“滥用货币体系”的能力。保罗对拉弗说：“这实际上可能比我们以前的体系更糟。”

黄金委员会深入研究了各种提案，最终觉得它们实施起来非常不切实际。首先，应该以什么价格恢复美元兑换黄金呢？风险很高，正如黄金委员会的报告总结的那样：“如果定价太高，可能导致黄金的大量流入和通货膨胀，如果定价太低，则会导致巨大的黄金外流和经济收缩。”（几十年前英国和法国在其货币“重新获得”黄金可兑换性时都经历了这些问题。）但是，如何确定“正确”的价格呢？经济学家可能会试图重新计算出美元购买力的损失，因为美元最近一次贬值按照每金衡盎司黄金兑换42.22美元；或者在恢复可兑换性之前，取一定时期内市场交易价格的平均值；或者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美元价值除以世界上的黄金总量——所有这些建议，以及更多的建议都被讨论过了。依据不同的计算方式，黄金的价值可能是每金衡盎司50美元或每金衡盎司3 500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到1981年，美国人能够用黄金来投资已经对黄金的价格产生了政治压力，至少有些委员必须考虑这个价格。也就是

说，提供的许多计划似乎极有可能导致黄金市场价值下跌，在黄金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黄金市场价格已经高于每金衡盎司400美元，至1980年，黄金价格更高。例如，1980年莱尔曼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不仅暗示了这种下行效应，而且将其作为目标。数十万美国人当时购买了克鲁格金币或类似的黄金投资工具，在政治上，他们要么赞成，要么不赞成金本位。但没有人会拥护使他们的黄金投资贬值的政策。

另外还有别国的问题。由于不可能让世界其他国家参与金本位合作，恢复美元可兑换黄金在执行方面存在很大困难。有什么能够阻止国外的个人或机构通过美国的代理人以美元兑换黄金呢？据说购买黄金的美国公民必须签署誓言，发誓他们不代表外国实体购买黄金。该措施或许得与恢复进出口黄金的法律限制相结合。而且，正如黄金委员会的报告所承认的那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都需要一支检查执行的队伍”。[注]对于那些希望将黄金作为自由市场工具和人类自由的人来说，资本管制和监管黄金事务的财政部工作人员代表着不受欢迎的倒退。

大多数黄金委员会委员能接受的最接近货币黄金的是，赞同美国重新开始铸造金币。但他们在铸造金币的最终目标方面还是存在分歧。美国尝试铸造的金币是否可以作为与克鲁格金币相竞争的投资工具？或者铸造金币的目标是让美国人习惯将金币作为日常货币吗？在何种情况下，金币应该被用于商业交易并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以便让美国恢复19世纪的金属货币基础？或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目标是要通过金币将美元的价值锚定在特定数量的黄金上吗？

赫尔姆斯作为重返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对自己所创立的委员会没有坚决支持重返金本位感到失望。赫尔姆斯在致《华尔街日报》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里根总统的老朋友和长期的支持者，我很遗憾他的顾问和黄金委员会不太关注1980年有关货币改革的共和党纲领。美国人民不应该遭受持续的货币混乱带来的影响。”[注]然而，货币混

乱并不是仅仅由那些不同意赫尔姆斯的人造成的。黄金委员会暴露了由保守派、民粹主义者、华尔街巨头和独立金融专家组成的“里根经济”联盟中的确存在分歧。在金本位的既定目标、黄金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日常运作中的作用以及美国的政治状况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里根政府及其许多顶级经济顾问都敏锐地意识到，对金本位的完美憧憬对当前的共和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人类而言，黄金所呈现的诱惑力不仅是与生俱来的和难以摆脱的，它还是能传达共和党当前的政治纲领中许多要点，并使之一目了然的强有力的符号。金本位已成为降低政府支出、平衡预算和依赖市场力量的政治纲领的简约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认为其表达了对美国政府及其机构的不信任。

但是，黄金的象征主义力量远胜过它实际可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象征主义和政治现实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和时代。现代保守派人士非常尊重罗纳德·里根总统，里根试图对金本位赋予象征性的政策倾斜，这令他们中的许多人更为崇敬里根。尽管如此，实际上里根的重要内阁成员唐纳德·里甘和乔治·舒尔茨却从来没有真正倾向于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改革。里根的经济顾问也并不是很赞成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改革。在1981年6月的日记中，里根记录下了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阿瑟·拉弗说，如果不恢复美元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机制，那么我们不可能解决当前的财政困境。这番话在他的同事那里炸开了锅。我倒是想听听在我离任之后那些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注]在黄金委员会拒绝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的几十年里，里根的经济顾问韦登鲍姆表示，他认为自己在委员会中的角色是“限制损失或者避免经济损失”。[注]

即使是艾伦·格林斯潘，也无法将就他曾经热衷金本位的理论信念与因位高权重带来的责任之间存在的冲突，这令黄金热爱者大失所望。毕竟，他曾是艾恩·兰德的真正朋友和信徒。格林斯潘于1966年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兰德给议员发送的简报中，他在文章中坚定支持金本位的立场及对美国政府过度支出的抨击让众多追随者为之动容。

但1987年，在参议院为批准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而举行的听证会上，他不得不放弃兰德式理想主义，转向更适合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管家的立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威廉·普罗克斯迈尔问道，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是否会将回归金本位作为“重中之重”，格林斯潘的回应非常符合黄金委员会关于不可行性的结论。“在19世纪的条件下，金本位可能比今天的评论家所宣称的更有效，如果关键条件可以复制，那么金本位可能对我们很有用，”格林斯潘说，“然而，考虑到世界市场目前尚待偿还的巨额美元债权，通过央行干预来修复黄金价格似乎是不可能的。”注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仍然不应该抹杀黄金委员会的成绩。黄金委员会成功地支持了美国政府铸造金质徽章和金币的计划。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似乎只是事关钱币收藏家的问题。但美国的金币计划至少发挥了两项重要的政治作用：它为美国政界的金本位倡导者——主要是共和党人——提供了合法性，并有助于美国黄金行业重新自我定位以对抗黄金巨头南非。美国财政部已于1980年开始通过美国邮政局出售金质徽章，但对它们的需求远低于美国财政部设定的每年完成100万金衡盎司的目标销售额。1983年春天，距离黄金委员会发布报告后不到一年，美国财政部将金质徽章和金币的营销工作转给一家在黄金市场拥有丰富经验的私营公司——J.阿伦公司（J. Aron & Company），它是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一个子公司（方便之处在于J.阿伦公司的董事长赫布·科因曾是黄金小组的委员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黄金行业的动机是从投资金币的需求中获利，这一点南非克鲁格金币已经证明了。在1979年，加拿大政府推出了1金衡盎司的枫叶金币，它在几年内取代了南非克鲁格金币，成为北美最畅销的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成为美国亲金力量的一个宝贵的盟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运动在应对克鲁格金币方面非常有效。它由各所大学和各地教会发起，其背后的经

济目的得到了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来自布鲁克林的斯蒂芬·索拉兹的支持，他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时曾向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施加压力。1983年，索拉兹对美国国务院预算的授权议案增加了一项措施，要求在南非运营的美国公司遵守机会平等的劳工惯例，并禁止进口克鲁格金币。但由于受到更广泛的黄金市场波动的影响，南非金币在美国的销售仍然相当强劲。

里根政府反对国会发起的大多数针对南非实行种族隔离而采取的措施，原因之一是，它认为南非黄金的稳定供应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另一原因是，南非总统彼得·威廉·波塔威胁以切断对美国出口铬来进行报复。他说，这将威胁到美国的100万个工作岗位。但整个美国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氛围也越来越强烈。1984年底在波士顿，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激进分子专门对美国最大的贵金属贸易商迪克·佩雷拉采取了行动，并要求该公司在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之前，不得销售克鲁格金币。一些人占据了其办公室，直至这些人被警方逮捕。到1985年，力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立法舆情太强大了，里根政府无力制止。那年夏天，美国国会两院以绝大多数议员赞同通过了其无法否决的议案，并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的［美（参）995号］法案中，该法案的版本措辞较为柔和，并且对任何禁止南非克鲁格金币进口的审议都会推迟两年进行。

很显然，美国和南非的经济关系将会发生重大破裂——问题是何时发生以及影响有多深。随着美国国内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行动为美国人所接受，美国国会和政府中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至少在涉及黄金的问题上，南非可能会从盟友转变为竞争对手。例如，附加在美国参议院法案之后的是一项修正案，它授权美国政府铸造自己的金币，与克鲁格金币抗衡。与此同时，里根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因为“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不同寻常的特殊威胁”。[注]里根特意挑出南非的代表性钱币作为例子说：“克鲁格金币在国会被视为南非种族隔离的重要象

征。这种观点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广泛赞同。我下达这一禁令是顺应公众和国会情绪的需要。”除其他措施外，该命令授权美国政府征求其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关于禁止克鲁格金币进口的意见，并指示美国财政部“在60天内完成关于铸造和发行金币的可行性研究，以期尽快寻求立法授权来达到发行金币的目标”。

同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财政部铸造面值5~50美元的金币——这是距离1934年罗斯福政府禁止美国人持有黄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批普通流通金币，并要求铸造该金币的黄金均来源于美国本土。这些金币被称为“美国鹰元”，于1986年上市，一开始的销售数量与美国早期克鲁格金币的销售数量相当。

南非的黄金问题继续困扰着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甚至让著名的共和党人开始提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根本不予考虑的观点。例如，在1986年夏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一项法案，对南非实施各种制裁，包括拒绝南非的飞机在美国着陆，以及禁止进口南非的煤炭和铀。但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提出一项议案，授权总统可出售大量黄金，以抑制黄金价格，从而打击南非的经济。卢格的助手告诉记者，这个想法来自《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该杂志估计，全世界各国央行的金库中只有不到10亿金衡盎司的黄金，其中四分之一以上在美国。《经济学人》称，只要公布美国政府将在特定日期开始出售黄金，这将“在一小时内大幅削减南非的收益，因为从孟买到布列塔尼的私人黄金囤积者将急于在美国央行开始销售之前低价抛售他们的黄金”。注

这里隐含的变化是深远的。在战后时期，美国出售任何大量黄金的想法都会被一笑置之，声名远扬的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不会提出这一点。现在，抛售黄金的想法不仅来自一位资深参议员，而且是一位共和党人，他想利用抛售黄金来降低市场价格，以惩罚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最重要的是，他的想法竟来自一本以自由市场的名义提出观点的杂志！

卢格提出的建议反映了全球黄金市场的巨变。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需要南非的黄金，这是美国迟迟未与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切断经济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黄金行业开始出现了繁荣，从多种测量指标来看，此时的繁荣可以媲美甚至超过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在加州和科罗拉多州的淘金热。1980—1990年，美国黄金产量猛增了5倍多，达到每年约300吨，并继续增长。因而，一些美国人开始不把南非看作重要的盟友，而是将它作为竞争对手。美国铸造的金币有力地打击了南非克鲁格金币，并对美国黄金业的复兴做出了适度的贡献——国会确保用来制造金币的黄金必须采自美国。

技术的改进也是一个因素。20世纪60年代“金手指行动”的策划者所宣传的一些采矿工序（除去核爆炸物和粒子加速器炼金术）的确是有效的。20世纪初被废弃的矿山通过一道工序获得了新生，运用该工序能从先前被认为含金量很低的矿石中提取黄金。该过程包括将矿石粉碎成非常细的粉末，接着将其浸泡在液态氰化物中，从而令黄金发生化学变化。然后将碳电极插入溶液中，大多数黄金会沾在上面，最后再将其从碳电极剥离。从1965年纽蒙特矿业公司在内华达州运营的开林矿开始，这种技术被用于生产金条，当然，这些黄金在矿石形态中即使用显微镜也看不到。因此，必须使用大量的矿石——3吨矿石才能生产出1金衡盎司的黄金。[注]这些大型“露天”金矿的开采方式被更广泛地运用，这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黄金业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尽管它们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环境破坏。

在通常情况下，一旦克鲁格金币和其他不太昂贵的、易于交易的黄金投资工具成为美国人投资黄金的标准方式，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发现的随着钱币交易所的增加而出现的黄金交易中的欺诈案便会减少。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更多的美国人有兴趣购买更多的黄金，这意味着更多的奸商和更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可能被蒙骗。最轰动一时的

欺诈行为来自国际金条交易所（IGBE）。它起初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一家珠宝店，由詹姆斯·奥德代斯和威廉·奥德代斯兄弟俩经营，他们两人都是自幼年起就失明了。他们抓住了美国人可以持有黄金的机遇，快速建立了业务。1983年，经过短短3年的经营，他们的年销售额近1亿美元，拥有1 000名员工，在达拉斯和洛杉矶都有分公司。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国最大的金银交易商，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电视上打广告（“要赢？就赢在20世纪80年代的淘金热！”），宣称国际金条交易所按折扣价出售黄金。

黄金专家对此迷惑不解。当《福布斯》的记者向经验丰富的黄金交易员询问国际金条交易所如何能够以市场价格或低于市场价格出售黄金并赚取利润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不可能的！”或是“如果你发现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请告诉我”。[注]一个主要的圈套是，客户必须等待数月才能收到货；在此期间，奥德代斯兄弟已经得到顾客所付的资金，并等待黄金市场下跌，以低于客户支付的价格购得黄金。全美国的国际金条交易所的客户开始投诉，从1982年开始，他们就再也收不到货了。康涅狄格州的一座教堂损失了278 000美元，这笔钱原本打算作为建造新教堂的投资。一位52岁住在拖车里的离异的得克萨斯州女子损失了46 000美元，她告诉一家杂志的记者：“我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困难了。我把一生的积蓄寄给了他们，但显然他们是一群骗子。”[注]

约有25 000名黄金和白银买家上当受骗。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引咎辞职了，该公司宣布破产，这两兄弟被逮捕并被指控欺诈。当法院指定的律师打开他们公司位于劳德代尔堡的办公室保险库时，他只发现被涂成看起来像金子的木块。在他们得到保释后，兄弟俩与他们起初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个人同住；那个人——詹姆斯·多伊尔——在1984年用菜刀砍死了威廉，被判三级谋杀罪。这桩案件的收尾颇为离奇，一名法官同意詹姆斯·奥德代斯在阿拉斯加海岸的矿井中挖掘黄金来偿还国际金条交易所亏欠债主的钱。

另一家从事大范围坑蒙拐骗的公司是北美黄金储备公司。在其电台广告中（这条广告碰巧引起了纽约州检察长的注意），该公司吹嘘自己拥有价值大约6 000万美元的黄金，这些黄金存放在犹他州的一个山地金库中。该公司董事长没有金属交易的背景，却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买了一辆玛莎拉蒂，每月还租用一架里尔飞机。他用公司支票支付了50万美元的离婚费用。[注]北美黄金储备公司竭尽全力树立正直的形象，请了杰罗姆·史密斯做代言人。史密斯是一位资深的金属市场分析师，他在1980年出版了《即将来临的货币崩溃》这一畅销书。史密斯在给9万名贵金属投资者的信中写道："我明确地、毫不犹豫地说，你可以完全信任北美黄金储备公司。我以我的名誉以及我的未来做出担保。"北美黄金储备公司支付了史密斯5 000美元来写这封信，并承诺再给他27 000美元，让他再写一些推介信。在另一批信寄出之前，该公司已申请破产。该公司在犹他州的黄金库里只有价值不到100万美元的黄金。该公司董事长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威尼思的家中，用软管将摩托车排气管中排出的尾气接入桑拿浴室而自杀。来自成千上万客户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在两家公司消失殆尽了。

黄金交易有什么内在的东西比其他交易，比如说猪肉期货交易更容易引发欺诈活动吗？一些执法官员、小说家和经济学家也暗示了这一点，尽管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黄金欺诈案明显增加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执法不严，管辖权范围界定不清——从黑色星期五到导致了21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危机均表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将贵金属交易称为"没有受到管制的投资的最后边疆"。[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长期以来认为贵金属不是证券，因此不属于其管辖领域。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某些黄金销售约定拥有管辖权，对另一些则没有，无法进行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所带来的数十万笔交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亨特兄弟试图操纵白银市场一直无能为力，[注]并且在管辖充斥于贵金属市场的非法证券交易所方面也没什么建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威廉·罗斯直言不讳地说："坦率地说，在这段

时间内，主要执法机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资源配备上已大大落后于其对手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只拥有大约25名律师和10名调查人员，负责保护公众、保护投资大众。对于数量众多的案件，这些人员无可奈何。”[注]许多人认为，此时提倡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政府喜欢不干涉期货市场的机构。一则新闻报道披露，里根政府曾邀请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在任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及其所有委员时起主导作用，《华尔街日报》称：“商品监管机构通常表现得过于友善了。”[注]

当到处存在无耻的欺诈行为时，消费者会谨慎参与，这多少会干扰市场。参议院的一项调查从被判商品欺诈罪的犯人那里获取了证词，他们说从事欺骗性证券经营的公司并不指望任何客户能够获利。当这些丑闻达到一定的数量、造成一定的影响时，它们有时会波及黄金的价格，造成正如某金属贸易杂志所称的影响整个行业的“丑事”。黄金经销商组织开始建议建立金币和金条的保险制度，以保证在购买后60天内交货。[注]对于那些认为黄金市场代表人类自由最高点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举措。对于成千上万被骗的消费者来说，被参议员罗斯称为“流动的赌摊而已”的这一描述似乎更为贴切。

此外，尽管黄金委员会的所有记录清楚地表明，里根政府对实际恢复金本位没有真正的兴趣，但黄金委员会对金本位的宣传确实与一些著名共和党人经济思想转变的早期阶段相吻合。在尼克松和福特任期内，共和党在20世纪的经济政策大体上与由华尔街和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精英阶层的利益保持一致。共和党支持平衡的预算、对美国政府的支出——特别是用于反贫困或类似的社会计划——和强化监管持怀疑态度、力图让劳工组织的影响最小化、更多考虑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老派的共和党人通常乐于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银行及证券经纪业高管提供重要的经济岗位。保守派主流共和党经济思想智慧的批评主要针对“老右翼”分子所关心的关键因素，包括与塔夫脱和孤立

主义相关的一些人，如老巴菲特以及像约翰·伯奇协会这样的局外人或机构。

“里根革命”改变了这种观点，其方式是在保守的经济思想中加入民粹主义因素并将其制度化。共和党中想要推进金本位的最杰出的成员是坎普。尽管坎普参与共和党政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还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但他似乎并没有在国会任期伊始时就视黄金为重要的政治事业，或者说他没有像拥护减税那样拥护黄金。如第十章所述，坎普投票反对1974年恢复私人合法持有黄金的法案。几年后，坎普似乎对黄金事业变得热心了。1979年，在引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坎普-罗斯减税法案》时，坎普所谓的美国需要恢复“有一些固定价值来支撑的货币标准”，大概指的就是金本位。坎普的传记记载了他同年对黄金表现出的更大热情。1979年坎普在万豪酒店走廊遇到了未来的国会议员丹·科茨，坎普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币，大声喊道：“不恢复金本位，美国永远回不到我们应有的样子了！”注

不过，黄金问题开始引起坎普的真正关注是在里根1981年上任后。坎普的那些在里根政府内部担任职务的供给侧同僚基本上都支持货币主义，这让坎普担心里根政府开出的药方不足以解决美国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根据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的说法，坎普在当年5月的共和党集会上对金本位问题持冷漠态度。但是，众议院在7月底通过了坎普的减税议案之后，坎普的顾问就极力主张坎普举起金本位的大旗，到秋天的时候坎普就开始这么做了。共和党内还有其他人支持金本位，包括菲利普·克兰。但别人都没有获得坎普那么高的政治地位。坎普在1996年尚未公开脱离金本位前就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注即使在实践中，共和党总统对实施金本位持谨慎态度，却也认识到金本位起到了良好的政治作用。1984年的共和党纲领更加明确地写道：“美联储决定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而金

本位可能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用机制。”即使这些话一直受一部分美国人欢迎，但是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只是纸上谈兵。

---

1. 有关牙买加协议的完整背景参见Tom de Vries，“Jamaica, or the Non-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Foreign Affairs, April 1, 1976。

2. 对作者的电话访问，2015年12月15日。

3. 即便是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也往往忽略了赫尔姆斯对黄金事业的倡导，例如，厚达643页的传记Helms, Righteous Warrior:Jesse Helms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onservatism（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2008）内容很全面，但却从未提及赫尔姆斯在黄金立法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4. Henry Mark Holzer, “Can We Restore the Gold Claus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7, 1975.有关黄金条款合同立法的年表，我从霍尔茨的专著The Gold Clause中获益良多（Highlands Ranch,CO: Madison Press, 2014）。

5. Milton Friedman to Senator Jesse Helms, July 30, 1976. Submitted into Congressional Record 122, part 25, September 28,1976, 32956.

6. “Washington & Business: The U.S. Gold-Clause Legislation,”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77.

7. 一年前，赫尔姆斯试图在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规则的议案上附上类似的修正案，未获得成功。他在参议院报告第94-1295号［“布雷顿森林协议及其他国际货币事务修正案”（1976年9月22日，27ff）］中表述了他对这一议题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赫尔姆斯在里根政府中的盟友并没有让赫尔姆斯日子更好过。尽管里根最初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授权，但他的政府在1982年为了避免债务国（包括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大量债务违约而转而支持它。为了通过这项立法，里根不得不求助于国会的民主党人以获得支持。

8. “Reagan Advisers Tout a Return to Gold Standard,” Washington Post, July 31, 1980.

9. “Enemies of Gold,” Washington Post, August 5, 1981.

10.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ole of Gold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Washington, DC:March 1982）, 2.

11. “An Urgent Return to the American System,” letter from Lyndon Larouche, January 8, 1982, in Report, 2:449.

12.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ole of Gold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 1.

13. “Gold Panel Off to Slow Star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1981.

14. 本文关于黄金委员会听证会和内在动因的记载大多参考安娜·施瓦茨1987年的专著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的其中一章“Reflections on the Gold Commission Report,”此专著是美国经济研究局研究系列之一。

15. 莱尔曼1980年写有“Monetary Policy,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d Gold,”一文，由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作为研究报告提交。

16.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ole of Gold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 140.

17. “Fiscal Nostrums for Monetary Ills,” letter to the editor,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1982.

18. The Reagan Diaries, vol. 1, ed. Douglas Brinkley（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7）, June 11, 1981 entry.

19. Murray Weidenbaum, Advising Reagan: Making Economic Policy, 1981–82: A Memoir（St. Loui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2005）, 26.

20. Nomination of Alan Greenspan: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10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uly 21, 1987, 61.

21. 美国总统行政命令第12532号“禁止与南非进行贸易和部分其他交易”，1985年9月。

22. “Go for Gold,” The Economist, July 19, 1986, 11.

23. 有关开林矿堆浸的发展详情参见Jack Morris, Going For Gold: The History of Newmont Mining Corporation（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0）, ix–xiv。

24. “The Will Rogers Method,” Forbes, July 19, 1982, 42.

25. “Fool’s Gold,” Time, May 9, 1983.

26. 有关北美黄金储备公司的违规行为，详见其董事长前妻在参议院的证词，他的前妻也是其公司的员工。Commodity Investment Fraud II: Hearings Before th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98th Congress, 2nd session（Washington: U.S. General Printing Office, 1984）, 56ff。

27. David J. Gilberg, “Precious Metals Trading: The Last Frontier of Unregulated Investment,”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41, no. 3, 943－991.

28. 有关亨特兄弟如何欺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详见Stephen Fay, Beyond Greed（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2）。

29. Hearings Before th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97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ruary 23, 1982, 1－2.

30. “Futures Imperfect: Puppylike Watchdog Irks Some but Pleases Commodities Industr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1984.

31. “Insurance Plan for Dealers Planned: Gold, Silver Bullion, Coins.” American Metal Market, November 29, 1984.

32. Fred Barnes and Morton Kondracke, Jack Kemp: The Bleeding Heart Conservative Who Changed America（New York: Sentinel,2015）, 81.

33. 可以说，多尔-坎普阵营以及1996年共和党不重视金本位，然而截至当年6月，坎普敦促下一任总统“恢复1971年美元与黄金被切断的联系”。参见Jack Kemp,“A Bipartisan Economic Agenda,”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1996。

第十二章

上帝、黄金和枪支



在21世纪，回归金本位尽管不切实际，却是民粹主义对技术官僚精英不信任的一种表现。在2011年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罗恩·保罗质问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黄金是不是货币。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奇普·索莫德维利亚摄。

福克斯新闻频道工作室的便携式黑板上写着三种经济情景：经济衰退、经济萧条和经济崩溃。站在黑板前的是主持人格伦·贝克，他正在进行直播。贝克穿着传统的深色西装、打着黄色领带——但他显然像所有街头示威者一样激动。这一天是2009年11月23日，美国正式走出了经济衰退，但从表面上还看不出来这一点：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仍然没有工作，申请破产的人数继续增加，即使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

政府救助计划之后，曾经强大的汽车业也还在苦苦挣扎。对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来说，大衰退造成的精神痛苦——随着2008年秋季开始的股票和住房市场的崩溃——还历历在目，贝克所讨论的任何场景似乎都是可能的。

这一日，贝克正在讲解有关个人理财的速成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可以轻而易举地摘抄自哈里·布朗35年前的书中。如果再次回到经济衰退，贝克建议他的观众“摆脱债务并存钱”。他说，政治家“永远不会告诉你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你花钱来保持经济发展”。谈到经济萧条，贝克回忆起前几代人储存食物的习惯：“如果你去商店，看到一个罐头汤在打折销售，你就买两罐。”但如果美国经济将要崩溃，贝克认为观众得依靠“三个G”，即上帝（God）、黄金（Gold）和枪支（Gun）。

对于数以百万计经常观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观众来说，购买黄金的建议并不新鲜。福克斯经常谈论经济萧条，其主持人总是把经济萧条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前一个月，贝克问他的听众：“我们正面临万能的美元的终结吗？”他站在桌边，把一堆硬币从摆着几面小型世界各国旗帜的桌子一头移到摆着美国国旗的另一头，以此来表示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中期黄金的位移。贝克叹道：“你们”——观众们——没有黄金，只有一丁点儿美元，在过去的7年里，它已经贬值了29%。正如贝克在接受管理顾问戴维·巴克纳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投资不太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东西”，即房地产和黄金。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福克斯频道的观众知道，曾经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在前一年已经崩溃，并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很快就会复苏，甚至是否能复苏也未可知。此外，巴克纳还说，房地产价值可能上涨，但如果利率过高，没有人能买得起——那么就只有买黄金了。

作为一项防御性投资策略而不断购买黄金的建议，对贝克的观众来说也可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在很多广告中都能听到这样的建议，

这些广告赞助了贝克的每日播出的电视广播、电台节目以及许多其他福克斯新闻节目，包括那些由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和弗雷德·汤普森主持的节目。在此时，购买黄金与支持共和党的信息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在贝克的节目中，购买黄金的信息几乎没有停过。当年早些时候，贝克声称奥巴马总统“根深蒂固地仇视白人或白人文化”，此后，各公司得到劝告，让它们停止对贝克节目的广告赞助。一直到2009年秋季之前，这一招非常有效，包括沃尔玛、CVS（美国连锁药店）和百思买在内的大公司都终止了对贝克节目的广告赞助。因此，其节目的一些最忠实的广告客户是贵金属卖家，包括黄金折扣经纪行（Discount Gold Brokers）、互动交易公司（ITM Trading）和金线国际公司（Goldline International）。金线国际公司与贝克的关系特别密切。贝克这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宣传此公司为“一流的机构”和“我信任的人”，该公司经常用贝克的这些宣传来做推广。贝克在他的广播节目中邀请金线国际公司总裁马克·阿尔巴里安做客，谈论黄金的价格可能会升到多高。

谴责贝克的人指出，金线国际公司作为广告客户和贝克在节目中推崇投资黄金之间的模糊界限，将贝克转变为金线国际公司的付费代言人。（2009年，福克斯担心贝克违反了公司立下的主播不得收受产品代言费的规定，要求对贝克在金线国际公司的角色进行“澄清”。虽然金线国际公司网站确实认定贝克是“付费发言人”，但贝克的律师却回应说贝克从未实际收到代言金线国际公司的任何单独费用，这一点也得到了金线国际公司的确认。金线国际公司随后将贝克在其网站上的称谓从“付费发言人”更改为“电台赞助者”。）注

曾担任消费者保护小组委员会成员，不久后卷入一桩网上性丑闻的纽约市议员安东尼·韦纳指责贝克和其他主持人“为金线国际公司当托儿”。韦纳控诉说，这些主持人“要么是最糟糕的财务顾问，要么故意向他们的忠实观众撒谎”。根据韦纳的调查，如果将金线国际公司出售的金币熔化，其销售盈利比金币的价值高出90%，而在其中一个案例中高出208%。此外，韦纳指控金线国际公司增加了存储、运输

和转售费用，这无疑使得任何购买其金币的人都无法从投资中赚钱，除非黄金的市场价格翻倍。[注]在韦纳进行调查前，2006年密苏里州政府对金线国际公司处以罚款，并迫使该公司退还该州一位消费者的投资，密苏里州政府认为，金线国际公司对这位消费者的投资建议是违法的。显然，自美国证交会在20世纪70年代试图制裁太平洋沿岸钱币交易所以来，零售黄金市场几乎一成未变。

2011年，加州一家消费者保护部门控告金线国际公司刑事盗窃和有欺诈行为，这使韦纳的指控变得更加有力。金线国际公司所在的圣莫尼卡市的检察官认为，该公司采用“引诱和转换”策略，迫使消费者购买价格过高的金币而不是金条。根据刑事诉讼，金线国际公司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引起人们对美国政府可能会没收金条的担忧。该公司宣传的一个基调是，引用罗斯福1933年对黄金的禁令。也就是说，销售人员接受了培训，让“客户感到害怕……美国政府会没收金条，然后告诉客户价格虚高的金币可以不被没收”。

虽然金线国际公司最初驳斥了这些指控，但该公司在2012年2月接受了一项强制要求它向先前索赔的客户退还高达450万美元、再拨出80万美元用于归还未来索赔的命令。圣莫尼卡市检察官办公室发布了一项很奇怪的具体限制，说明商业实体可以以怎样的尺度去讨论美国限制私人持有黄金的历史，并为金线国际公司如何向现有和潜在客户谈论20世纪30年代美国限制私人持有黄金的历史撰写了具体的文字。例如，金线国际公司被允许可以说“美国不止一代人被禁止拥有一定数量的金币和金条”。但只有当客户想要更多细节时，才允许公司讨论罗斯福政府对黄金采取的行为，而且该公司必须避免使用“没收”一词，并应该指出黄金所有者均按当时的现行价格得到了补偿。

虽然人物和具体指控发生了变化，但整个情节都遵循了一种在黄金再次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历史模式：世界末日情景的推销方式、与流行媒体人物的密切关系以及通过调查揭露出售黄金的不规范和欺诈行为。引人注目的是黄金投资总是带着欺诈性，其背后的事实

是，黄金作为投资有着特殊的市场。对许多黄金崇拜者来说，黄金具有吸引力的特性之一是黄金是摧毁不了的。这种坚不可摧的特性保证了未来地球上的黄金总供应量不会低于当前（除非有人将黄金送入太空）。而供应量则不断增加，地球上可用黄金的供应量通常每年增加1%~3%。对黄金的需求更加复杂，目前全球约有20%的黄金为中央银行所有，在私人市场不能轻易获得。中央银行的黄金交易经过精心安排，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以防止不必要的市场冲击。因此，任何特定的私藏黄金增值的唯一正常途径是私人市场需求增加。通常情况下，当人们认为经济疲软或处于弱势时，黄金市场价格就会上涨（很多人想购买黄金，因为他们害怕其他资产会停滞或贬值），而当经济强劲或乐观情绪抬头时，黄金市场价格就会下跌（人们想卖出黄金，因为他们认为其他资产会产生更好的回报）。至少从哈里·布朗时代开始，预测经济灾难一直是试探和搅动黄金市场以及提高现有黄金所有者投资价值的有用方式。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为通胀失控会导致经济崩溃；对于21世纪头10年来说，人们认为导致经济崩溃的是失控的政府债务——那些出售黄金的人将其作为解决所有经济弊病的解决方案，正如自由白银倡导者在19世纪末为他们的首选金属所做的那样。

在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中，对黄金的倡导不仅承担了经济功能，还承担了同样重要的政治功能——宣传黄金作为经济不景气的解决方案意味着谴责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造成了不景气的经济状况。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人反对金本位这一事实似乎只是证实了他们的不负责任！如果禁止金线国际公司告诉美国人他们手上的黄金可能不安全，那么其他人也会乐于那么做。瑞士出生的经济学家、著名的悲观主义散布者麦嘉华是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常客，他在2012年表示："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把黄金存放在美国之外，因为在美国，他们最终会被夺走黄金，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然而，从黄金价格来看，支持黄金的论据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运作良好。美国的许多黄金拥有者也认为，如果美国现在恢复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会更好，这既因为它会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支撑美元，也

因为它可以对热衷于似乎按两下键盘就可以拥有无限债务的政府实施财政约束。

人们可能预测当美国（以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将其货币与黄金脱钩时，黄金对美国人心理的控制将会放松。然而情况恰恰相反。许多美国人似乎陷入了对黄金的永久怀旧迷恋之中。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委员会也许未能将黄金恢复为美国货币体系的中心。然而，金本位倡导者向黄金委员会提出的论点仍然存在于政治言论中，提出它们的人也是如此。黄金委员会里最直言不讳的前任国会议员罗恩·保罗在2008年和2012年参加总统竞选，金本位成为他个人奋斗的一部分。虽然他未能召集到大量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但他仍然利用各种公开演讲的机会尽力推崇黄金。在2011年7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保罗抨击了长期被责难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尽管他是共和党人，仍然因美联储的政策饱受抨击）。保罗质问伯南克：“你认为黄金是货币吗？”当伯南克声称它只是一种贵重金属时，保罗继续问为什么中央银行以黄金而不是钻石作为储备。

虽然伯南克等技术官僚可能对这种挑衅不屑一顾，但这一对话通过互联网使支持保罗和偏好黄金的人沸腾了。该视频已经被观看了数十万次，分属不同党派阵营的美国网民在Reddit（社交新闻网站）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也对这一场争论的细节进行了探讨。

对于21世纪的共和党来说，支持黄金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例如，在2012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包括罗恩·保罗和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在内的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如果他们当选，他们会恢复金本位或者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最终得到提名的米特·罗姆尼是一大例外。尽管如此，2012年的共和党纲领反映了上述共识。纲领谈及了1981年的黄金委员会以及“考虑美元金属基础的可行性”计划。虽然黄金委员会拒绝了金本位的想法，但是2012年共和党人说：“我们提议建立类似的委员会，探究为美元设定固定价值的方法。”[注] 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力推金本位以响应某个最大的经

济后盾的观点，而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接受《智族GQ》杂志的采访时说："恢复金本位将非常困难，但是，这个主意非常棒。我们的货币有了一个标准。"注 2016年共和党纲领重复了2012年纲领中的"固定价值"论。

在共和党纲领中包含这样一条没有什么害处，至少还有一些潜在的政治利益。对21世纪的数百万美国人来说，黄金同时成了一种关于经济信仰和政治事业的物品。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其后微弱的经济复苏推动了这一趋势。2012年初选时对至少3个州的潜在共和党选民的民意调查发现，多数人强烈拥护或至少支持黄金。注 2011年对全美国选民的民意调查发现，44%的人拥护金本位。注同样的民意调查发现，再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就产生更加戏剧化的结果。当选民们面对"如果你知道金本位会减少银行家和政治领导人对经济的掌控力，你是赞成还是反对金本位？"这样的问题时，赞成的人数增加到57%，只有19%的人反对。

这种民意调查的可靠性肯定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其他现代国家中，公民都没有激烈地争论是否要将其货币与贵金属或任何实物挂钩。当然，其背后因素是整个美国对几乎所有曾经定义美国生活的机构的信心下降。总统，教会，以及有组织的宗教、大企业、劳工工会、国会、银行、医疗行业、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个人或实体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都不如20世纪70年代时信心足，尽管那并非美国最为乐观的10年。注在奥巴马时代，年老的美国白人尤其感到脱离了美国传统的权力和经济增长中心，他们年轻时一直就有的制造业工作根基以及工作带来的养老金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他们的愤怒情绪推动了茶党的崛起，茶党在2010年的选举中崭露头角。事实上，众所周知（对一些人来说是不愉快的），奥巴马在2008年曾评论说，在中西部的小城镇，当工作岗位消失、工资下降时，"他们用拥护枪支、依赖宗教、仇视与他们不同的人、反移民情绪或反贸易

情绪来解释自己挫败的原因”。在政治上，这个群体也赞同格伦·贝克和他的世界末日情景中三个“G”中的一个——黄金。

当然，正如20世纪80年代倡导金本位的共和党人所发现的那样，政治上激情澎湃的东西并不容易转化为政策。实际恢复金本位的障碍相当大，大到那些赞成它的人的诚意都得受到质疑。首先，金本位的倡导者无法就他们想要的体系达成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黄金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期间，这一难题就非常明显。对于一些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来说，唯一可接受的货币标准最好是自由市场货币或金币本位，即黄金是美国货币的实物基础这样一种制度，这就得取消法定货币法律、禁止使用纸币、让所有想要铸造金币之人都能铸造可以作为日常货币运作的金币。

一个更实用的版本是金条本位，即美元以固定数量的黄金来定义，但黄金本身不会作为货币流通。这大致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流行的制度，据此，世界主要货币的价值与黄金挂钩，并且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相互挂钩。然而，除却美元这一重要的货币之外，其他货币并非真正可兑换成黄金；相反，美元是其他国家的盯住指标和储备货币。虽然这种体系可能比其他形式的金本位更容易建立，但今天基本上没有人拥护它。当全球经济的发展赶超了这种体系时，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这个体系崩溃了，而对于美国的金本位倡导者来说，它实现不了他们通常所倡导的财政支出限制。

从绝对金币本位中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是这样一种系统：纸币由规定数量和纯度的黄金“支撑”或“计提准备金”；在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这样的情况，最近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本位制的一个假定优点是其可以抗通胀，因为它限制了政府印刷纸币的数目。然而，21世纪的美国金本位倡导者倾向于纯粹的金本位，除非纸币真正可兑换成黄金，否则他们不太可能支持这种制度。

就算假设美国的金本位倡导者可以就一个体系达成一致，也很难想象出一个实施该体系的理想政治场景。无论好坏，大规模、突破性的货币变化几乎总是产生于危机之中，而不是经过仔细和包容性的辩论，并且它们往往执行得很糟糕。正如本书一再证明的那样，美国新的货币战略总是以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为借口被秘密制定、在国会草草通过或绕过国会颁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无论是法定货币案件还是黄金条款案件——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办得最差的案件之一，部分原因是很难直接让宪法解释与政治和经济的必要性统一起来。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刻意研究和激烈辩论时，严格的、民粹主义的金本位观点往往会落败。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委员会是在一些黄金热爱者所期望的、最有利的政治环境下美国有史以来最近的一次，也可能是最彻底的货币讨论，但是它全面拒绝了金本位。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的成立常被今天的黄金民粹主义者称为一种原罪，它也是一个已经被研究了数十年的政策的例子，而它也拒绝了纯粹的金本位。无论好坏，今天的黄金民粹主义者在他们原本可能成功的时刻未能为他们的体系提出政治理由。问题的根本可能在于，这种操作就是试图让货币政策倒退。在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工作的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肯尼斯·达姆曾指出："当通货膨胀猖獗时，金本位最具吸引力，但矛盾的是，急剧的通胀使得金本位变得不切实际。"注

此外，现有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有强大的、几乎难以推翻的理由来坚持货币现状，特别是以发动战争的能力和为战争买单的能力为理由。美国支持金本位背后最吸引人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你让美国政府坚持用黄金支撑的货币，实际上就消除了国会和美联储搞坏经济的能力和可能性。正如堪萨斯市联储前主席和曾经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尔曼·凯恩在2012年《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对于

出手阔绰的政客来说，黄金是克星。大政府中的巧取豪夺者害怕黄金，正如吸血鬼惧怕阳光和大蒜。”(注)

尽管此观点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但它总是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50多年后，仍有批评者称林肯决定发行“绿背美钞”——没有任何金属支撑的纸币——是严重违法的行为，允许邦联继续分裂比起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来保护联邦可能更符合宪法。这些有悖常理的观点或许会在知识阶层达成一致，但没有现实意义。如果美国宪法赋予政府宣战和参战的权力，那么美国政府当然有权为此目的筹集资金。自那时以来，美国所参与的每一次大规模战争（以及几次小规模战争）都需要某种赤字支出或增加债务，这在严格的金本位之下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实施金本位会使战争或战争开支变得不可能——只是因为它会迫使未来的美国总统找到聪明但富于争议的方式以绕过其限制范围。就拿平衡预算修正案来看，许多美国保守派认为，在美国宪法中加入这样一项修正案会控制支出，他们列出具有此类修正案的数十个州作为其可行性的证据。但是这个论点自身无法成立，这些修正案很少会限制各州行使它们真正确信自己需要的，并且可以在政治上不受惩罚的支出权力。此类修正案只是迫使州长和立法机构使用花招来规避它们。

类似的观点是，金融机构，特别是美联储，将致力于保护其缓解经济衰退的能力。这几乎是21世纪技术官僚观念和黄金民粹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技术官僚认为，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相比，央行更有必要存在了，因为1893年和1907年的经济危机表明了一个支离破碎的银行系统和财政部是多么无能为力。在这种观点看来，大萧条也是由于美联储没有利用或无法利用必要的工具而造成的或使之恶化的。(注)美国金融领域的大多数负责人都认为，重返金本位是一条倒退的危险道路。

然而，假设实施金本位的一切政治和体制障碍都能被克服，这仍然无法解决阻碍以前每次试图将货币价值与黄金挂钩的供应问题。很简单，世界上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目前规模的美国经济。从

美国成立到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任何形式的金本位都伴随着对黄金供应不足的恐惧——这是一种反复造成危机的恐惧。在19世纪末期，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少到必须由摩根来解围。60年后，即使美国积累了史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同样的情况也在重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1960年多次出手进行黄金援助。

即使假定黄金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中提供了良好的货币标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开展日常业务所需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足，这使得回归金本位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罗斯福政府在1935年的黄金条款案判决中提到了这一点。30年后，一个国会委员会重申了这一观点："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黄金可被用作国际交易的媒介来进行私人交易商之间的实际交易，理由很简单：业务量超过了黄金的数量。"[注]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回归金本位对黄金的市场价格将会有何影响。现有的大量现金和其他国库券需要得到美国政府所拥有的黄金的支持。2012年，当共和党候选人提出建立委员会来研究恢复金本位时，大综商品分析团队凯投宏观指出，美国的货币基数约为2.56万亿美元，而美国储备的黄金数量约为2.62亿金衡盎司。这使美国金库中黄金的隐含价值约为每金衡盎司1万美元，或约为2012年中期黄金市场价格的5倍。这可能使目前的黄金持有者欣喜若狂，但它也可能为世界各地的人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

当然，像这样的飙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并且只保留一小部分货币来对抗黄金也是可能的——就像在20世纪的情况一样，直到黄金与货币完全脱钩。但即使是这种行为，也可以被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解释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因为究竟由谁来决定保留多少货币，从而确定黄金的"官方"价格呢？在实践中，或许只能是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再加上世界上其他持有黄金的主要的中央银行，这正是金本位倡导者长期以来反对的——由精英控制货币。若发生黄金定价"错误"，经济风险将会非常高，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它取决于现有投资者目前持有何种资产以及新定价格会让这些资产的价

值上涨或下跌多少。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讲，将货币价格固定在一块黄金上，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时间或比例来那么做。作家兼财务顾问詹姆斯·里卡兹曾支持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承担的角色，他写道：“今天想要有一个不会造成通缩的金本位，你必须要有每金衡盎司1万美元到每金衡盎司5万美元的价格。这取决于你对货币供给的选择做出怎样的假设、黄金支持的百分比以及将哪些国家纳入新系统。”注显然，每金衡盎司1万美元和每金衡盎司5万美元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价格差异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这种情形下同样不确定的是，通过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确定的黄金官方价格是否适用于世界私人黄金市场。也就是说，如果黄金-美元比率固定在本书写作时的价格——黄金现货市场价格约为1 200美元每金衡盎司，那么央行会采取行动对私人黄金市场强制执行这个价格吗？这样的价格控制将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难得多。又或者，新价格只适用于政府间交易，如1968年之后的情况那样，对私人市场则不进行监管。在这两种情况下，要想保持价格稳定都不太乐观，这一点艾森豪威尔之后的美国政府可以证明。

供给和价格波动问题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想采纳金本位的两大主要原因。在撰写本书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经济体都没有根据黄金或任何贵金属来定义其货币。实际上，近几十年的趋势恰恰相反。瑞士是最后一个取消金本位的重要经济体，1999年对其进行公投，次年生效。2014年，民粹主义/右翼运动让选民进行新的公投，试图增加瑞士国家银行支撑瑞士法郎所需的黄金数量，选民以将近4∶1的比例予以否决。

与美国一样，世界其他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早已确定，将货币与黄金脱钩会让它们获利更多。诚然，正如里卡兹指出的那样，许多国家还在大量储备黄金，他称之为“影子金本位”。注尽管如此，这与实际的金本位相差甚远，而且中国近期管理其货币价值的历史表明，它有理由拒绝恢复国际固定标准。为了让中国、日本、俄罗斯、印

度、巴西和欧洲这些更大的经济体（其中一些使用欧元，另一些不使用欧元）参与新的金本位，将需要比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大规模的、更复杂的国际游说，而且目前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衰落时期的那种紧迫感和共识。问题不是美国应不应该采用按照受欢迎程度来制定的货币体系那么简单。21世纪经济的现实意味着，贸易一直都是真正的全球化。这不仅仅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数十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和服务问题，所有这些交易都可能受到回归金本位的影响。每天都有数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绝大多数以美元结算。注

另一种选择是美国独自实施金本位。这似乎注定会导致与金本位倡导者既定目标不一致的结果。如果美国重新开启美元兑换黄金窗口，那么如何才能阻止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国际收支危机的重演？当时只能通过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来解决。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包括中国、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国家——理论上都可以通过用美元和美元支撑的证券来兑换黄金以威胁金本位下的美国货币体系。正如斯大林曾经说过的，一国独有的金本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毁灭。经济学家迈克尔·博尔多写了许多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和图书，几十年前他就认识到这一点："一国独有的金本位可能会导致其货币黄金储备及货币供应受到不可控因素的持续冲击。"注无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存在什么弱点，利用利率和汇率作为调整货币估值的反馈机制往往会阻止大多数主要货币遭受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金汇兑本位制中常见的冲击（正是这种机制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废弃）。

21世纪金本位完全不可行，这是几乎没有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主要原因。这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初黄金委员会人员构成所具有的显著特点。黄金委员会实际上找不到足够的支持金本位且有与之相称资历的经济学家来参加任何一场听证会。而参加听证会的对金本位制度更加谨慎的人，比如阿瑟·拉弗，相信金本位必须免受任何商品市场频繁被动的干扰。但是相应的对冲波动的手段是政治家所不

能接受的（以罗恩·保罗为代表），金本位对他们来说是表达坚定政治立场的手段。

一些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人士认为，经济史上的金本位优于其他货币体系。英国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1988年写道："从那以后，在信用体系和主要贸易货币关系中，从未有过如此长的金融稳定期。"[注] 1981年，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发表了一篇论文总结说："传统金本位制度下美国和英国的经济表现优于后来的受管理的信用货币时期。"[注]

当然，这一时期包括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经济事件——1893年的由野猫银行引发的经济危机。即使金本位优于其他货币体系这个结论有道理，许多在19世纪运作良好的系统也不一定适合21世纪。如果现在询问经济专家，你会得到同样的意见（很难将金本位视为经济学规范）：无论其理论价值如何，美国恢复金本位对其就业和价格稳定都是不利的。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教学的40位经济学家——包括许多曾在共和党政府中做过顾问或工作过的——对于2012年开展的金本位调查都未做出积极回应。[注]巴拉克·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回答说："呃，已经到这一步了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问道："美元为什么要与黄金挂钩？为什么不与1982年的波尔多葡萄酒挂钩？"

经济权威人士不仅认为金本位会损害经济，还觉得整个计划都像前现代一样落后，这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把黄金货币描绘为"野蛮的遗迹"相匹配。如今，大量货币瞬间转手，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保持这种速度和灵活性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即使你只把黄金作为一种货币的储备，它也又大又重，用于交易不切实际。举个例子，就在几十年前，如果法国想要从美联储购买黄金，那么实际把金条运到海外是相当昂贵的，难以想象的昂贵！取而代之的是，金条将通过叉车从金库的一个库区移动到另一个库区。当前的经济权威人士赞成罗伯特·特里芬的观点，特里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预测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金本位无法自我维持，并评论道：“在地球的遥远角落挖掘金子只是为了把它运走，然后立即将其重新埋在其他深洞中，特别是挖掘出黄金以接收它，然后重兵把守保护，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人力资源浪费了。”

就连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开始相信这个体系是行不通的。哈耶克是1992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其货币竞争理论激励了许多现代美国金本位倡导者。他在1984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同情那些想要回归金本位的人，我希望这是可能的。[注]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金本位不能实现。首先，金本位预设了一些无法被合理证明的教条主义信仰，而我们这一代人不准备重新将被质疑的古老传统作为信仰。其次，更为严重的是，我相信所有回归黄金的企图都会导致黄金价值的巨大波动，以至于引起市场崩溃。”

至于在务实的美国政治层面，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否“弄错了”几乎无关紧要。回归金本位需要极大地改变公共行为，以及大规模地破坏巨额的国际经济。这些重大决定只能由美国总统掌管的行政部门、美国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共同做出。美国任何当选的且负责的联邦政府都不会违背已享有公信力的金融和经济界的建议，唱反调去开展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经济和政治风险实在太高了。仅仅是传播有关黄金的奇怪论点就使许多共和党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黄金似乎推动了该党发展的方向感到惊骇不已。吉姆·利奇是1977年入选众议院的艾奥瓦州共和党人，此后他任职了30年，在1984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在支持金本位方面与共和党非常接近。必须有人告诉全世界那样做是愚蠢的，否则金本位就会被实行了。”[注]

然而，1984年共和党人看似“愚蠢”的东西，今天实际上已成为共和党党纲，至少在总统层面是如此。最近几十年，共和党内民粹主义的兴起与黄金民粹主义并行。黄金民粹主义不仅拒不接受美联储和经济机构提供的经济专家的意见，还对此进行贬低。他们认为，所谓

的经济专业知识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它可能是最大的祸根。对于黄金民粹主义者来说，法定货币是由金属支撑货币授权的替代品，它使美国和国外政府太容易造成堆积如山的债务。他们推测，债务迟早会崩溃，国际货币清算将会发生。他们说，彼时的获胜者将是持有最多黄金的人。迄今为止，21世纪的发展史为上述人士提供了大量证据——从经济大衰退到希腊危机再到英国公投脱欧，这一天即将到来。这种说法总是不乏拥护者，因为即使是最强大、运作最好的政治和金融机构也不太可能阻止像经济大衰退这样的未来冲击。

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林登·约翰逊都知道的那样，即使大灾难从未发生过，它的前景也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政治工具。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金本位的观点作为政治表达的价值比实际的政治计划更有价值。毕竟，如果里根和格林斯潘在利率、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达到危机水平的时候不能够或不想要恢复金本位，那么很难想象另一位总统、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完成此任务，尤其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官方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那样的大问题。因此，回归金本位的问题就呈现出边缘化的民粹主义特征；对一些选民来说，它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几乎没有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真的想要将之付于实际。事实上，黄金民粹主义者可能会从金本位的概念中比其实际被实行时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在当今美国政治角力的另一端与之相匹配的观点可能是堕胎权：如果在全美国范围内很容易堕胎，左派和民主党将失去其工具箱中一件最有效的组织和筹款工具）。在这点上，今天的黄金民粹主义者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时代的白银倡导者没什么不同（除了他们所选择的金属不同之外）。布赖恩的经济思想也往往为正统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所不屑，但是按照今天的说法，它们肯定“搅动了根基”。

当今黄金民粹主义的政治力量有多么强大，这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政治议程模糊或无法实现，部分原因是运动的最终规模难以衡量。很难区分当今黄金民粹主义者的说辞是让人购买黄金的推销还是赞成黄金支撑货币的论点，似乎这种混淆是故意将人们

对黄金和金本位的热情模糊化，一部分公众的确是两者都想要。然而，黄金支撑货币的政策或许并不能给黄金持有者带来最大利益。大致地说，黄金作为货币工具与其作为个人投资不一致。也就是说，如果美元固定在一定数量的黄金上，那么黄金的美元价值就不会升值到令黄金成为对美元持有者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它也不会贬值很多，但在正常的经济时期，大多数投资者寻求的回报不仅仅是保价）。

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有多少美国人投资黄金（可能以金币或金条的形式），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当然，相当比例的美国人认为黄金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正如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意调查反映，认为黄金是最好的，或者是其中一项最好的长期投资手段的美国人占有很大比例。这是一个与有多少美国人真正拥有黄金完全不同的问题。在美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这个问题要么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比方说在19世纪，绝大多数美国人无力维持确保生存之外的任何资产），要么纯属猜测（因为，例如，1933—1975年，美国人投资黄金是不合法的）。在今天，虽然拥有黄金已相当普遍，但人们仍只能估计。2015年，美国铸币局出售了价值约12亿美元的美国鹰牌金币和美国布法罗金币，注这表明了每年新供应数十万枚金币，许多美国人也从其他国家购买金条和金币。然而，市场变幻莫测，很难从这个数字推断出有多少美国人正在购买黄金：有可能某些人购买大量的金币，并且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追踪二级金币市场、非美国人在美国购买黄金的数量等。

世界黄金协会这个收集和传播大量有关黄金的统计数据的机构表示，它无法估算出将黄金作为投资的美国人的数量。注伦敦的贵金属分析公司Metals Focus说它没有可以透露的数据，但承认“看到过的市场研究”证实了笔者所估计的数据——只有不到10%的美国成年人将黄金作为投资。注 2010年，一项旨在调查美国人对茶党的支持程度的详细民调发现，有5%支持茶党的人表示，他们在过去的12个月内购买过金币或金条（可惜的是，民意调查没有报告一般人群对同一问题

回答的结果）。注建议人们购买贵金属的许多新闻通讯和顾问公司称，拥有贵金属的美国人口占1%~3%。

这些估计意味着大约有250万~750万美国人将黄金作为投资。这个跨度很广，足以使任何具体分析变得困难，尽管似乎可以合理地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21世纪有更多的美国人将黄金作为投资。就算在重新建立黄金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方面存在着巨大障碍，即使按最保守计算，美国的黄金持有人数已经大到足以成为某种规模的政治力量。

毕竟，民粹主义既没有败于曲折障碍，也没有毁于自相矛盾。民粹主义是一种动态的执迷，由一个回归过去的承诺推动着，无论那个过去多么难以实现或多么虚幻。那些主张将美国货币恢复为金本位的人面临着很大的障碍，但他们肯定没有放弃。他们已经将战场转移到胜算更大的其他阵地，例如技术创新和美国地方政府层面。

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货币方面的一项发展是，数字货币使用者的增加，以及支持它们的创新基础设施。一方面，比特币和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代表了与金本位的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比特币不仅没有内在价值，甚至也没有有形的存在。另一方面，比特币吸引了一些同样对金本位感兴趣的人，因为它不依赖于政府或中央银行。两种系统都从相对稀缺中获得价值；可以“铸造”的比特币总数预设为2 100万，而虽然黄金相对来说没有固定的数量，但由于金属稀缺，新的供应只能通过采矿和精炼来生产。通常情况下，世界每年的黄金供应量增加1%~3%。此外，区块链—— 一种广泛可查询的交易数字账簿——使得比特币能够提供一些人认为有前景的方法来跟踪由黄金支持的数字交易。注这种体系的一个假定优势在于，它只依赖于共识：只要黄金可以合法获得和拥有，就没有明确的法律来反对这种体系。

当然，那些认为黄金可能会被没收的美国人，会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会干预私人的、黄金支持的货币。正如一些在21世纪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所发现的那样，在美国政府权力之外创建的货币体系会

自动吸引非法行为，跟其投资者的意愿没有丝毫关系。早在1996年，佛罗里达一家名为E-gold的著名公司开始提供以价值2 000万美元的实物黄金为支持的数字货币，到2002年，该公司已经在100个国家积累了数量超过100万的客户。注然而，该公司违反了监管再定义，并在2008年被控非法转移资金。它的资产被扣押，其联合创始人被软禁6个月。

其他人试图将金属支持的货币战争转移到州一级，民粹主义者在那里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支持。2011年3月，犹他州成为第一个通过法律修订其“法定货币”定义的州，法律承认联邦政府发行的银币和金币为法定货币，取消了金银交易的几项州税。该法案极具新旧采矿时代的象征色彩。它由犹他州贵金属协会主席拉里·希尔顿起草，希尔顿也是茶党活动家。当州长签署法律时，当地一位名叫韦恩·帕尔默的房地产金融家将一套纪念金银币送给犹他州作为礼物。在这里，民粹主义精神与非法活动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不到一年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帕尔默进行庞氏骗局，骗取了投资者数千万美元。注

该法案除了对个人有限的税收优惠外，对犹他州的影响微乎其微。美国铸币局发行的一枚金币的价值可能超过1 000美元，但它只能按它的面值来使用，即50美元。因此，犹他州政府法律规定使用金币是合法的，但没有人会去用。一位犹他州政府的内部人士表示：“如果有人蠢到想在7-11便利店用一枚价值数千美元的金币来买一块士力架，他们倒是能那样做。”

尽管如此，“稳健货币立法”近年来已成为州政府的一种流行趋势。密苏里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者在2012年推出了稳健货币的议案，但都没有真正成为法律。2013年，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在一周内先后签署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法案，免除金银币和金银条交易的州销售税。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田纳西州和其他几个州也引入了类似的立法。

这一连串的法案并非偶然。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是一个由美国保守的州立法委员组成的联盟，负责就各种问题起草和分发示范立法。它和其他团体试图在十几个州复制犹他州的这一货币法律；一个团体甚至起草了一份“宪法性货币支付法律”法案模板，并鼓励金本位的支持者将其发送给对金本位有好感的立法者。

这些立法努力背后的动机和理由与它们取得的效果一样复杂。至少，他们想让人们注意到美联储纸币系统的弱点。然而，那位刚成为犹他州共和党立法者并成功将新货币法案在该州通过的议员并不支持恢复金本位。而对各州州长来说，这些法案看起来具有政治吸引力，因为保守派选民可能希望听到取消某些税收，特别是贵金属交易税收（当金银法案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立法后，两州的州长都在2016年参加了总统竞选，尽管他们都没能进入实际的初选投票阶段）。但是，上述立法努力并没能在上述各州都取得成功。亚利桑那州保守派州长简·布鲁尔在2013年否决了类似犹他州的法案，称其“含糊不清”，并称其税收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到2013年，黄金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类型的立法势头在各州也降温了，不过，对黄金的热情还在以其他形式继续。2015年，得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法律，批准该州建立美国唯一的州立金条存储处。按照该设想，得克萨斯州的任何居民或企业，或世界上任何贵金属投资者，都可以在存储处开立账户并将黄金储存在那里。金条存储处会给客户开具可以提取金条的支票或记账卡。引入该法案的州议员说：“我希望看到这一切都汇集在一起，因此我们成为北美洲的商品交易中心。”(注)

得克萨斯州也许能，也许不能成为北美洲黄金中心。关键在于，美国与黄金关系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在美国或美国部分地区恢复金本位的问题。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黄金！除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想一想20世

纪70年代以后的40年间，美国财政部根本没有铸造金币。今天，美国铸币局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银币生产商。2015年，美国财政部报告说，需求量如此之高，以至于西点铸币厂每周7天，每天3班，支付工人加班费来生产美国鹰元。在经历了金融危机期间的暴跌之后，美国黄金首饰的销售连续几个季度上涨。美国战胜了长期的竞争对手南非，成为世界第四大黄金生产国。虽然美国黄金产量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峰期后产量有所下降，但2014年美国生产的210吨的数量几乎比所有美国历史上的产量都要高。

当然，这种对黄金的迷恋也存在缺点。严格来说，美国金矿业在21世纪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环境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助于恢复金矿业的露天氰化物浸出技术十分高效，但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面临巨大的风险。在普通露天矿中，运营商必须挖掘3吨矿石，才能生产出打造单个婚戒所需的黄金。剩下的矿石就变成了一堆有毒化学废物。注

而且，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有时黄金热潮会引发潜在的暴力冲突。2015年，被联邦机构传唤的蒙大拿州金矿的所有者安排当地武装民兵守卫金矿，并禁止他人进入矿区和周围的公共土地。这虽没有导致实际的武装对抗，但却提醒人们，“上帝、枪支和黄金”在像美国这样可以轻易获得枪支的国家，极易引起群情激愤的事件。

这些有关黄金的辩论、销售宣传、欺诈计划、需求激增和政治姿态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们几乎与黄金本身一样持久。美国过去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同今天的世界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像安德鲁·杰克逊时代那样公开质疑银行是否应该存在，也不像布赖恩时代一样质疑是否应该自由制造银币并使之成为法定货币。摆脱纸币——19世纪中期的一种严肃的政治立场——在一场真正开放的遍及美国的辩论中，几乎与地球扁平论一样，不会有真正的支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受到了来自政治领域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但没有观众会来观看关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总统辩论，而且当

今没有一位美国政客会认真地提出一个没有这些机构参与的全球经济愿景。因为它们是金融领域被广为接受的角色。

在美国发现黄金200年后，美国人仍在为此而战。总而言之，相比过去的100年，今天黄金在美国已经成为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无数人来说，黄金是一种对永恒之物的寄托，是自由的守卫者，同时也是财富的保证。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避风港，也是一条纽带——将美国的历史与世界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对无数其他的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加工品、一种破坏性的妄想、一种环境污染。论证和言辞可能被颠倒、借用，可能充斥着误导与恶意，但它们与美国的先驱的论证和言辞何其相似。即使美国人在立场上存在分歧，黄金仍在寻找一种在政治想象中发声的方法。美国人因对黄金的热爱而争论，也因对黄金的热爱而团结。

---

1. John Carney, “Glenn Beck’s Gold Endorsement Goes Too Far For Fox,” 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8, 2009,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glenn-becks-goldendorsement- goes-too-farfor-fox-2009-12; Bill Carter, “Glenn Beck’s Gold Deal Raising Questions at Fox,”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4/business/media/14beck.html?_r=1.
2. “As Seen on TV: An Investigation of Goldline International,” report presented by Congressman Anthony D. Weiner, May 17,2010. 提取自http://www.avaresearch.com/files/20100527200653. pdf。
3. 2012年共和党纲领，第4页。
4. Zachary Mider, “What Kind of Man Spends Millions to Elect Ted Cruz?” Bloomberg Politics, January 20, 2016; “Donald Trump Weighs in on Marijuana, Hillary Clinton, and Man Buns,” https://thescene.com/watch/gq/donald-trump-weighs-in-onmarijuana hillary-clinton-and-man-buns.
5. 为“美国准则行动”这个组织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选民多数赞成恢复金本位制。民意调查是由Polling Co.，Inc. 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意调查没有向公众广泛发布，它们由代表寻求恢复金本位的组织进行，所以人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数据。尽管如此，其对共和党

选民的调查是符合美国民意调查（见下一个注释）及共和党候选人在2012年竞选中的表现的。

6. “Public Has Mixed Views of Return to Gold Standard,”Rasmussen Reports, October 21, 2011. 此调查在2011年10月18至19日询问了1000名潜在的选民，误差幅度为±3%。

7. 参见“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http://www.gallup.com/poll/1597/confidence-institutions.aspx.

8. Kenneth Da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0, no. 2,Fiftieth Anniversary Issue（Spring 1983）: 504–532.

9. Herman Cain, “We Need a Dollar as Good as Gold,”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3, 2012.

10. 以黄金为支撑的货币阻碍美国应对大萧条的论点与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一书的关联最为显著。

11. 8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R. 702,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July 30, 1965.

12. James Rickards, The New Case for Gold（New York: Portfolio, 2016）, 131.

13. James Rickards, The New Case for Gold（New York: Portfolio, 2016）, 52ff。

14. 国际清算局2013年的调查。

15. Michael D. Bordo,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Some Lessons for Today,”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May 1981, 16.

16.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4）, 97.

17. Bordo,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2.

18.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IGM论坛，2012年1月12日，http://www.igmchicago.org/igm-economic-experts-panel/poll results?SurveyID=SV_cw1nNUYOXSAKwrq。

19. James U. Blanchard III,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 A. Hayek,” CATO Policy Report,May/June 1984.

20. David Shribman and Dennis Farney, “Survival Strategy Plotted: GOP Moderates Are on the Outsid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2, 1984.

21. United States Mint Annual Report 2015, 6.

22. 彼得·特鲁曼，公司通讯，世界黄金委员会，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16年5月5日。

23. 尼尔·米德尔，Metals Focus公司，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16年5月10日。

24. 《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民意调查：美国茶党支持者调查。该调查于2010年4月5日至12日进行，共有1 580名受访者，其中881人确定为茶党支持者。该调查的误差幅度为±3%，但对于细分人群来说更高，因此黄金购买者在美国总人口占比有5%这一数据在统计上有问题。

25. 参见，如：Thorsten Polleit, “How the Blockchain and Gold Can Work Together,” Mises Daily, February 1, 2016, https://mises.org/library/howblockchain-and-gold-can-work-together。

26. Kyle Chayka, “How Digital Currencies Led to the Biggest Money Laundering Case Ever,” Pacific Standard, February 5, 2014, http://www.psmag.com/business-economics/ digitalcurrencies-led-biggest-money-laundering-case-ever-bitcoin-74083.

27. “SEC Wins Case Against Ponzi Schemer in Utah.”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Litigation Release No.23419, December 4, 2015,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National Note of Utah and Wayne L. Palmer,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5/lr23419.htm.

28. “In Bullion Depository, Supporters See Golden Opportunity,”Texas Tribune, July 3, 2015.

29.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Mining Industry,”278.

大事记

18世纪

●1788年，美国宪法获得批准。第1条第10款规定，美国任何州不得铸造货币，也不得“以金银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付债务的货币”。

●1792年，美国《铸币法案》在美国建立了金银复本位。1美元被定义为相当于24.75格令[注]的纯金和371.25格令的纯银，白银与黄金的比率为15∶1。由于全球市场金银价格比率的波动，黄金主要用于海外交易，而白银主要用于美国国内交易。

●1799年，北卡罗来纳州卡巴鲁斯县一名12岁男孩发现了一块17磅[注]（约7.7千克）的金块，这引发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淘金热。

19世纪

●1804—1828年，北卡罗来纳州为位于费城的美国铸币局铸造美国钱币提供所有黄金。

●1812年，美国财政部首次发行债券（非法定货币），承诺在未来用黄金或白银支付。

●1816年，英国将英镑与黄金挂钩，实行金本位制。

●1834年，美国国会将白银与黄金的比率改为16∶1，恢复在美国使用金币。

●1848年，在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萨特磨坊发现了黄金，迎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

●1859年，在内华达州发现了康斯托克黄金和白银矿脉。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首次创造了不能兑换成黄金或白银的纸币（“绿背美钞”）。一个美元-黄金市场立刻出现。

●1868年，在南非发现了黄金。

●1869年，一群投资者试图垄断美国黄金市场，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出售黄金后，黄金市场在“黑色星期五”崩溃。

●1873年，白银非货币化，美国实行非正式的金本位制。

●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黄金十字”演说。

●1898年，在阿拉斯加州的克朗代克发现了黄金，掀起了阿拉斯加州淘金热。

20世纪

●1900年，美国《金本位法》使美国正式实行金本位制。

●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建立，要求美国国债的40%由黄金支撑。

●1914—1919年，大多数国家（尽管美国没有这样做）放弃了金本位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买单。

●1925年，英国恢复了“金块本位制”，货币可以兑换黄金，但金币不能流通。

●1931年，英国停止黄金支付，放弃了金本位制。

●1933年，美国退出金本位制，个人持有金币和金条的行为违法。罗斯福政府开始对黄金价格进行日常管理。

●1934年，美国《黄金储备法》使美元贬值，美国回到“金本位制”，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5美元。

●1939年，欧洲的战况迫使伦敦黄金市场关闭。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所有金矿关闭。

●194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开会，以美元兑换黄金为基础，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1954年，伦敦黄金市场重新开市。

●1960年，黄金市场飙升，推高了此前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黄金价格，表明美国国际收支出现危机。

●1961年，主要的国家央行组成“黄金总库”，控制私人市场交易，禁止美国公民在其国内外持有黄金。

●1965年，美国政府官员开始秘密进行“金手指行动”，目的是大幅增加美国黄金产量。

●1967年，南非生产了第一枚克鲁格金币。英国使英镑贬值，从而导致大量黄金从美国流出。

●1968年，美国国会以微弱的优势投票通过取消对美元的“黄金准备金要求”。美国停止与个人买卖黄金。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意建立一个“两级”市场，设定一个私人交易的黄金价格，一个中央银行之间交易的固定价格。伦敦黄金市场闭市两周。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美元不可再兑换黄金，美元贬值。

●1974年12月31日，40年来美国人第一次可以合法购买和持有黄金。

●1975年，南非克鲁格金币在美国上市。

●1980年，美国共和党纲领呼吁建立“可靠的货币标准，即结束通货膨胀”，这被认为是数十年来第一个支持金本位制的政党公约。

●1981年，由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主持的美国黄金委员会召集会议研究黄金在美国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1986年，美国铸币局推出了美国鹰元，这种金币是用产自美国的黄金铸造的。

●1990年，经过10年的显著增长，美国成为继南非之后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21世纪

●2007年，中国超过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2012年，美国共和党纲领援引1981年黄金委员会的主张，提议成立一个类似的委员会，探寻为美元设定固定价值的方法。美国共和党2016年的纲领重申了这一条承诺。

---

1. 1格令≈0.065克。——编者注
2. 1磅≈0.45千克。——编者注

致谢

撰写这样一本书离不开与他人大量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关于书的内容，与我合作最多的是图书和档案管理员，他们引导我“在成堆的矿石中找到金块”。许多人都曾伸出援助之手，但我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人有：约翰逊图书馆的珍妮弗·卡德巴克和亚历克西斯·珀尔、拉斐特学院的黛安·肖、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瓦洛伊丝·阿姆斯特朗，以及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学会的安德里亚·法林。

在4年的时间里，一些研究人员与我通力合作，包括佐伊·卡朋特、道格拉斯·格兰特、萨拉·米勒、巴蒂·斯科特、克里斯蒂安·华莱士和莫罗·怀特曼，他们对本书的贡献不可或缺。

在本书出版前，我的许多朋友和支持者阅读了部分手稿并不吝赐教，我非常感谢他们：莉莎·费瑟斯通、马丁·希普斯基、迈克尔·卡赞、理查德·帕内克、安雅·希夫林、杰克·沙弗、保罗·斯马莱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伯恩哈德·华纳和朱利安·泽利泽。

我能够在不放弃全职工作的同时写好本书，离不开老板的大力支持。幸运如我，在写书的时候有两位一路支持的老板——路透社的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和《公司》杂志的埃里克·许伦伯格。

利夫莱特和诺顿的工作团队一直都非常出色。罗伯特·韦尔是一位杰出的、博学的编辑，本书的每一页都体现了他的风格和见解。玛丽·潘托扬耐心地帮助我完成了编辑工作；加里·冯·尤尔和唐里夫金在修改稿件时细致而颇有见地；史蒂夫·阿塔多让本书美观大方。在本书还处于纯概念阶段时，我的经纪人、勇敢的克里斯·卡尔霍恩

就大力支持这个项目，并敦促我撰写一份引人入胜的创作计划书，以用于投稿。

我衷心地感谢我的家人艾琳和亨利。许多个周末的下午，我置身于图书馆进行写作，为了创作此书，我多次外出调研，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耐心和支持。